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五分册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編者說明

本书是《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作者卡尔·考茨基(1854~193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是一部集其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的长篇著作。原书分一、二两部。由于原书篇幅过大,中译本把它作六个分册出版。

本书系内部读物,公开引用译文时,請仍用原著版本,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们人力和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卒,翻译上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读者指正。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64年6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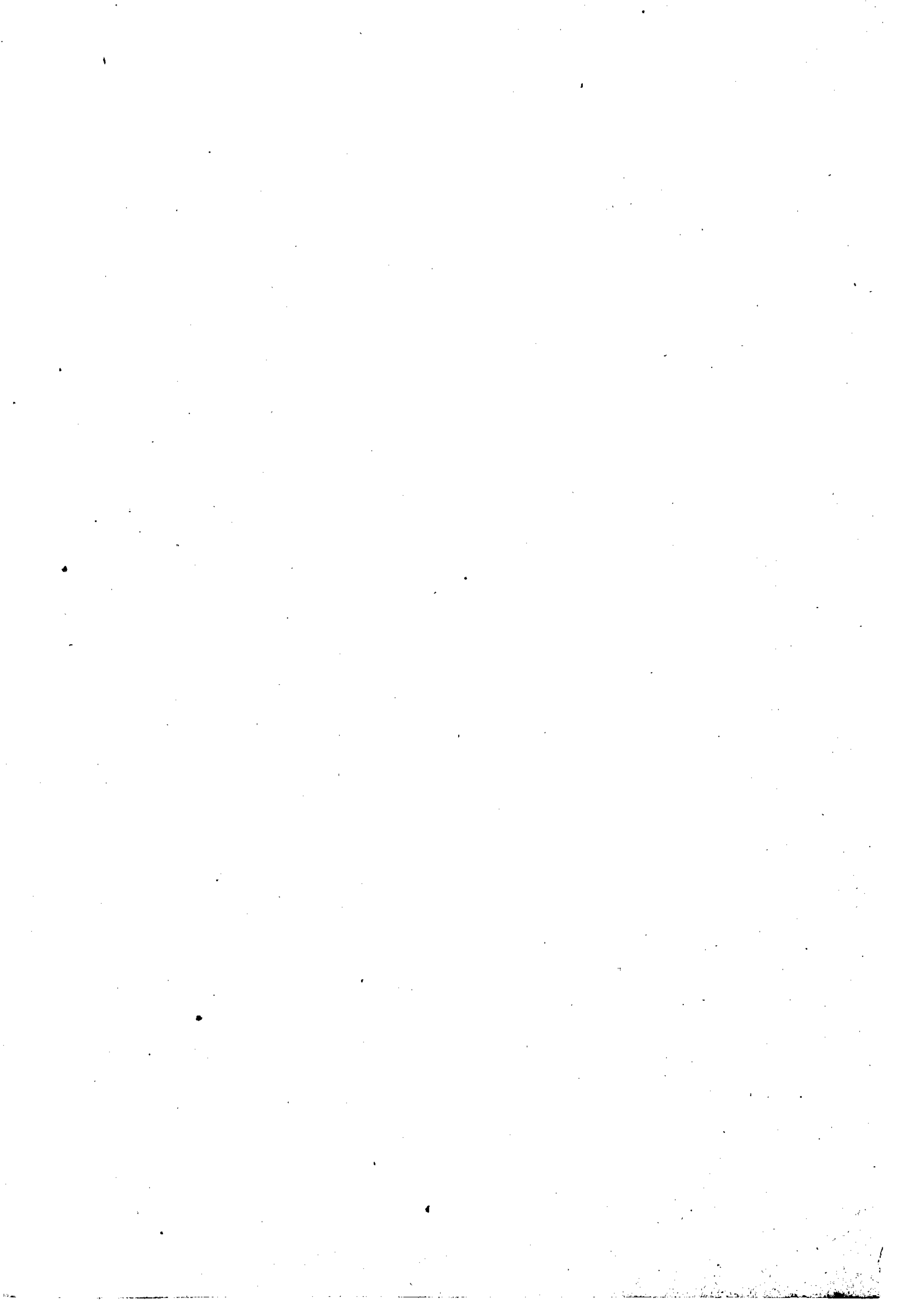
第四卷 阶级和国家(下)

第六篇 城市国家	3
第一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3
第二章 城市国家中的阶级斗争	11
第三章 城市国家中的民主与剥削	20
第四章 国家的混合形式	31
第五章 城市国家的没落	38
第六章 古代社会主义	47
第七篇 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55
第一章 工业资本主义	55
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	61
第三章 资本主义精神	67
第四章 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	73
第五章 自由劳动	81
第六章 禁欲主义	88
第七章 工业资本的兴起	96
第八章 进步与社会革命	104
第九章 现代民主制	110
第十章 民主国家中的资本	118
第十一章 民族国家	126
第十二章 国家机器的成长	136
a) 军队、交通、关税	136
b) 教育、司法、卫生事业	141

	c) 稅收.....	147
	d) 国家性质的转变.....	149
第十三章	作为职业的政治.....	150
第十四章	暴力与民主.....	161
第十五章	异能.....	171
第十六章	知识分子.....	181
第八篇	阶级和国家的消灭.....	195
第一章	无产阶级的衰落.....	195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201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縮短工时.....	211
第四章	无产阶级的胜利.....	220
第五章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228
第六章	埋葬资本主义.....	237
第七章	危机.....	241
第八章	资本积累的限制.....	246
第九章	农业中的积累.....	253
第十章	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前提.....	260
第十一章	阶级对立的尖锐化.....	264
第十二章	经济与政治.....	279
第十三章	生产社会化的条件.....	288
第十四章	国家的转变.....	301
第十五章	国家的消灭.....	306
第九篇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论述.....	319
第一章	再谈马克思的序言.....	319
	a)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319
	b) 经济变革对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326
	c)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27
	d) 任何新的生产方式都受物质条件的制约.....	330
	e) 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332
第二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334

第四卷

階級和国家(下)



第六篇

城市国家*

第一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以上我们主要是讲了讲这样的国家，即，在东方广阔的河流平原上，从北非到中国这段乾燥的狭长地带，由于和平的农民和好战的、掠夺成性的、到处游浪的牧人比邻相处而形成起来的国家。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这是国家的最初形式，而正是这种形式的国家，首先创造出了我们称之为国家成果的那些高度文明。

可是，这种形式的国家并不一直是唯一的国家形式。在别的地理条件下也出现过别种国家，不过，所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例如东方的专制国家，都是建立在外来部落或部落联盟对土著农民的统治上的。

关于由土著人形成起来的美洲国家，我们知道的太少，因而无法探讨猎人而不是牧人是怎样进行征服和奴役的。这些国家对于一般人类发展的影响极其微小，这里可以撇开不谈。

另一方面，却有一些国家对于一般人类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些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差别比美洲国家和东方各国的差别大得多，可是又和东方国家有着同样的起源，因为它们也是在农民与牧民的对立情况下产生的。

至少，我对希腊各国的形成是这样理解的。它们不是由“海盜”，

* “城市国家”，一般历史书亦译“城邦”。在本书中为行文方便，两个詞通用。

就是说，不是由来自海洋上并征服了当地居民的占领者，而是由从北方移居到当地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些民族大概同样是被其它民族从他们先前的居住地赶出来的。因为希腊土地的肥沃程度还不致于引诱得动他们。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

侵入这里的是印度日耳曼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文化不低的定居民族，他们征服了这些土著，并且在这些人的土地上建起了国家。那里有许多通海的河谷，他们在每一个河谷里都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家。

在本书的第三卷第一篇第十一章中，我们就已经提到贝洛赫的说法，即希腊人身上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东西都来自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入侵者——雅利安人，而其种种道德上的缺陷，则都来自那些本地人，入侵者和这些不但长黑头发、而且显然还有一颗黑心的本地人杂处着（贝洛赫《希腊史》第一卷，第93—95页）。当然，没有任何根据能够证明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民族的本来性格是什么。但是，有着强烈的雅利安人情感的人显然是会赞同这种说法的。贝洛赫在其书的前面（第66页）就曾强调指出，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一个民族能够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文化：“我们雅利安人”。

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民族大迁移是在纪元前三千年发生的，并且延续了好几百年之久。各个部落的推进是缓慢的、逐渐的。

对希腊大陆的占领大约是在纪元前三千年和二千年之交完成的。

在同一时期来自北方的其它希腊游牧民族就在小亚细亚海岸的北部定居下来。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希腊大陆的占领者才敢于来到海上，才成了“海盗”，作为海盗，他们占据了各个岛屿以及小亚细亚海岸的南部各地区。

希腊大陆上国家的形成主要地说和东方的情形一样。与国家形成相联系的阶级分化也是如此。象荷马诗篇所描述的那种古希腊社会的最初情景，使我们看到好战的土地贵族作为统治阶级统治着须为他们服役和纳税的农民。这种贵族有一个首领，即国王，不过，国

王的权力同贵族的成员们相比较却很微小。

但是，希腊的自然条件，比起东方广大河流地带的条件，性质完全不同。单就数量上来说，这里的条件与那里的就有差别。这个量的差别又转化成为质的差别。

东方大河流域可以使千百万人民的劳动换来丰富的收获，这些人民没有被巨大的自然阻碍隔离开来，因而能够容易地被一个占优势的力量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与河谷接壤的又是些广阔的平原，许多掠夺成性的部落可以时常骑着轻快的骏马不太费劲地在这些平原上聚合起来，侵入富饶的庄稼地带，使之听候自己役使。

在这些条件下，就形成了一些大国，由许多收入丰富、势力强大的贵族统治着，而这个统治权，最后又从贵族手里落到了专制君主的手中。

地方不大的希腊的自然条件，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它的境内贯穿着无数峰高谷深的山脉。它被割裂成无数狭小的，大抵是贫瘠的地带，每一个地带只能养活少数的人，而且道路崎岖，陆地上不易通行。

希腊只有少数国家的土地面积达到一千平方公里以上。因此，那里的居民就只能为数很少。

农作物收成不好，农民贫穷，除耕作外，还要多多依靠畜牧业过活。这些农民比纯粹种庄稼的农民要勇敢善战。每个地区都被一些难以通行的山脉与邻区隔开。各个地区是不会由于自然财富而诱致邻区来奴役自己的，因为假如要进行奴役那就只有通过残酷的战斗。

斯巴达人占领了希腊最大和最富的河流地带之一——欧罗塔斯(Eurotas)河谷，成了希腊陆地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阻碍，就连他们也对占领其它地带感到困难。

斯巴达人居住的拉哥尼亚地区，面积是五千八百平方公里，公元前四百年光景，那里人口大概是二十三万人，其中有一万人是斯巴达人。凭着他们的优越条件，斯巴达人曾试图并吞邻区。但是他们也

只对他们的西邻美塞尼亚人实现了这个企图，就连这个也是经过了可怕的几十年之久的战斗才办到的。继这些战斗之后，被奴役者也还经常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斯巴达人尝够了战争的滋味。他们对东部和北部继续扩张的企图都告失败。亚哥斯和阿尔加狄亚保卫住了它们的独立。阿尔加狄亚最后总算以同盟者的身分承认了斯巴达的霸权，即领导。可是对于亚各斯人，那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在希腊保持着独立的整个时期内，它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每一个小国家都执行着它独特的政策，并且，即使有时候遭遇到巨大的共同的危险，比如说波斯人的入侵，它们也不能团结一致。造成这种分裂状态的，是国家的特性，而不是种族的特性。

每个地区只有很少的人从事农业，他们生产的粮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奴役这些人民的入侵者，也只能是少数，入侵者从农民那里剥削所得也很微少。

贵族统治者也常常被迫在种地和盖房屋时亲自动手。

想通过掠夺邻区来改善本区农业收入的贫困状况的希望愈小，剥削者就愈益感到非到海上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不可。在希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连接着海。向海洋扩张，这是东方的专制暴君所考虑不到的，他们只力求增加能为他们服劳役的农民的数目。

要成为一个航海家，单凭居住在海边是不够的。正是沿海的居民才知道得最清楚，海洋狂暴起来是多么可怕，它的脾气又是多么难以捉摸。罗马诗人贺拉西就认为敢于到变幻叵测的惊涛骇浪中去冒险的人，一定是用三重铁甲武装起胆子的人。只有在闹严重饥荒生活不下去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去冒险航海寻找食粮。

罗伯逊提醒我们的下列事实是值得重视的（《国家的演变》第369页）。

公元五世纪时占领了英国的盎格罗萨克森人，是从佛里斯兰来的，他们当初也是被赶到那个贫瘠地区去的。但是到了不久，那块土地就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居民的需要了。土地出产养活不了的过剩人口，于是就试图依靠海上捕鱼来维持生活。等到这部分人在捕鱼

时获得了足够的航海知识，他们就试图以海上盗劫来维持生活。

他们是作为海盗来到英国的，但到了那里，他们发现有富饶的土地，可以依靠庄稼来建立舒适的生活，于是他们或者做了自由农民，或者做了奴役农民的剥削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忽视了早已非常熟练的航海事业。所以当时的英国，还远不是一个航海国家。公元九世纪，当诺曼人作为海盗掠夺英国沿海时，英国对他们是毫无防御能力的。盎格罗萨克逊的国王阿尔弗烈德大帝 (Alfred der Grosse, 871—901)，为了抵御诺曼海盗，建立了一支舰队。但是为了人员配备，他不得不去招募佛里斯兰的海盗。在英国本土，他找不到足够的海员。

希腊人之中也只是居住在土地贫瘠的地区中的人才这样被迫成为卓越的航海者的。希腊的航海能手，都不是来自拉西第蒙的肥沃的欧罗塔斯河谷，更不是来自希腊东部最大河流之一，帖撒利亚的佩涅欧斯河的广阔膏腴平原。

在那些地方，农业始终是居民最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社会的封建特性也保持得最完整。帖撒利亚这个地方很少有机会影响真正的希腊的情况。后来，它正和斯巴达一样成了希腊社会中贵族保守势力的荫庇所。

另一方面，希腊大部分其它地区，只要不象阿尔加狄亚那样处于内陆，早就发展了意义重大的航海事业。在从事航海活动的各地中，起初是亚哥斯最强大，后来是雅典。

起先捕鱼可能是人们向海洋发展的主要动机。我们从近代国家荷兰和葡萄牙那里知道，它们的海军就是在渔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希腊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

“从前依奥尼亚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没有别的，就是捕鱼的收入。春季从彭托斯涌入波斯普鲁斯海峡的稠密的金枪鱼群，很可能是促使依奥尼亚人继续航行去追索这种天赐恩惠的来源的主要原因……作为渔民，依奥尼亚人熟悉了北部的海洋，于是就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其他对象上。”(库尔提乌斯：《希腊史》第1卷第337页)

这里，库尔提乌斯讲的是促使希腊人远航黑海的动机。但是，他们开始远航南部海洋恐怕也出于同样的动机。

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一样，希腊人也同样不只限于捕鱼，而是利用了他们通过捕鱼取得的航海知识，去进行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他们从一个岛航行到另一个岛，终于来到了富饶的小亚细亚海岸，那里受着东方文明的影响，蕴藏丰富。这些宝藏诱使他们进行掠夺，或者，如果力量对比不允许他们劫掠，他们就用本国或西方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产品去换取这些宝藏。海上劫掠，自营贸易，以及转口贸易，终于给希腊人带来了远远超过农业生产的优厚利润。以东方为榜样，商业国家不久也发展了自己的出口工业。

当然，最先占有这些财富资源的是国家的统治者们，即军事贵族和他们的首领或者国王。他们以统帅的身分率领他们的下属进行抢劫，把虏掠得来的绝大部分战利品塞进自己的腰包。

麦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史》(第80页)中写道：

“在希腊人那里最初大概是城邦的国王拥有船只，而且是既为了进行物资交换，也为了海上掠夺。但是他无法阻止豪门巨族成长起来同自己并驾齐驱，他们也拥有了船只，并且最后他们只不过还把他看成是为首的伙伴而已。”……

实际上，这些豪门大姓，这些贵族，其实力地位就是在希腊也不是以占有船只为基础，而是首要并且一直是以占有土地为基础。这在当初是最高贵的真正贵族式的占有形式，并且始终如此。希腊国家开始时都是陆地国家。它们的贵族都是从陆地侵入的占领者。在国家转入航海国家之前，豪门巨族早已在这个国家中据有了很高的地位，他们不是依靠航海才起家的。

不靠军事贵族，国王是不能进行海上战争的。当商业取得了重要性时，他就象东方的国王那样力求进行商业垄断。可是在这方面他必然会遭到豪门巨族的反抗，比起他们来，国王可以说只有微不足道的力量。

象在希腊的陆地国家那里一样，在航海国家中，贵族主要仍旧是

地主和军人。在航海国家，正如在陆地国家中那样，贵族们是轻视商业的，这就是说，他们之轻视商业，只是轻视积极地参加商业活动，并不是轻视把经商的利润塞进腰包。他们试图用装备船只，给商业活动资助商品或金钱的方式来获取这种利润，至于商业活动本身那就交给特地为此而雇佣的、非贵族的人去进行。他们从一开始就允许这些人去进行商业，自己则利用投资来参与其事。

总之，随着时间的进展，在贵族以外，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商人阶层。同贵族一样，这个阶层的财富和势力也在增长着。

财富的不断增长却带来了这样的危险，那便是，强盗自己遭到抢劫。只要贵族们还仅仅依靠他们那些在希腊必然面积很小的地产来过活，并且生活得很贫困，就不会有人想去抢劫他们。从事农业的斯巴达人连同他们的朴素知足，在希腊社会的后期，可以说很好地代表了希腊社会的原始状况。他们从来不想躲藏在一座围着墙垣的城里，以策安全。

可是在从事航海的地区，特别是那里的日益富裕起来的贵族和他们的国王，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有一切理由去防御那些随时都可以侵入沿海地带的海盗的袭击。为了保证更大的安全，那些过去一直分散地生活在自己田庄上的、富裕的豪门巨族聚集一起，迁到一个便于防卫而又正是他们储藏珍宝的地方定居下来。这种集中居住使他们能够迅速集结，以便抵抗入侵者；而由于他们共同居住的地区范围狭小，也使他们有可能在四周建筑起一道坚固围墙。

这样就在航海者的国家中出现了城市。麦克斯·韦伯自己也认为，“城市最早正是作为贵族的居住地而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第530页）但是，这种说法和他认为豪门巨族只是在城市里和城市国家的国王一起兴起的这一观点，怎么互相协调呢？

不管贵族的兴起与他们居住的城市兴起怎样密切，不管他们怎样忙于城市的事务，他们始终是拥有城外庄田产业的地主，并没有成为纯粹的城市人。

可是城市本身的繁荣却愈来愈不依靠贵族的地产。在这一方面，

希腊各国的城市，一般地是地中海沿岸尤其是地中海东岸国家的城市，和东方各大帝国的城市根本不同。东方的城市是广阔农业区的中心，远离海洋，而所谓古代西方的城市则总是沿海城市。东方城市的规模和繁荣取决于受统治阶级剥削的农业区规模的大小。

农业地区越广阔，提供给剥削者的剩余农产品的数量越多，城市中商人和手工业者就愈益兴旺。城市是完全依靠统治阶级的。

反之，希腊城市的势力和财富几乎根本不取决于受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剥削的农民的人数，也不取决于贵族剥削的程度。希腊城市的重要性，它的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以及人口的增加，不依赖于那里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田庄的大小，而依赖于他们的船只航行范围的大小；依赖于船舶航行所经沿海各地的财富以及船舶所能发挥的军事力量。

雅典城的成长，不是由阿提卡的扩展所决定的。就我们从古代阿提卡的历史中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论，它的农业地区始终没有变动过。它的面积大约是二千三百平方公里，约有今天的安哈尔特自由邦那么大。反之，雅典城却成长得很显著，它的人口最后竟多过于郊区。贝洛赫估计，阿提卡的居民数字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约为二十万，其中就有十二万“或者更多的人”住在雅典和他的港口披莱乌斯。（《希腊史》，第3卷第1章第273页，274页）（又参看第3卷第2章第386页以下）

关于这种人口增长的原因，我们以后还会看到。

郊区的地主现在也成了市民，土地已成城市的附属物，而不是城市的基础。

农村很快就供应不起城市。城市只好指望从外面，即海外进口粮食。对雅典人来说，保证粮食进口，其中一部分来自埃及，但主要的是来自黑海沿岸各国，老早就成为一项重要事务。早在公元前610年光景，雅典人就占领了达达尼尔海峡的西盖隆（Sigeion），以便保证从黑海输入粮食。与此相反，东方大国生产的粮食不仅足以自给，而且还可以输出。古罗马在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没有来自

埃及的粮食，就不能维持。

对于希腊人来说，城市和国家同是一个意思。希腊文 Polis 这个字既表示城市，又表示国家。这样便形成了城市国家（或称城邦）这个类型，城市国家既不同于东方的城市，也不同于东方的国家。

第二章 城市国家中的阶级斗争

城邦的政治特征，尤其是内政方面的特征，是符合于城邦的特征的。

我们已经指出，希腊的地理条件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地理条件，这首先是由于东方的地理条件使许多农产丰富的小型共同体有可能结成为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财富和权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劳动阶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希腊则只可能有一些大抵土地贫瘠的小国家。这些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只要他们仅仅依靠剥削农民过活，数量就不大，收入也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在文化上，也不能在权力手段上大大高过被剥削阶层。他们在许多方面同被剥削阶层的差别并不比今天富农和小农的差别更大。另一方面，这几千人住在一个狭小地区里比几百万人住在一个辽阔平原上要更容易彼此了解些。

在希腊，从来就没有过象东方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统治阶级面前所表现出来、并且自己也感觉到的那种奴隶般的屈从，我认为这首先要归之于上述的原因。太尔希特斯(Thersites)的著名故事，可以说是一个例证。

荷马的诗篇当然不能用作论证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历史资料，可是对了解这些诗的产生时代的社会情况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当然，对于了解这些诗的最后编定时代的社会情况来说，也是如此。

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关于太尔希特斯的故事，看成是纯粹文学的虚构。假如听故事的人都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情，那么这样的故事就显得很可笑了。

根据故事的传说，希腊人围攻特洛耶城已有九年。他们开始厌战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一个全军的，不仅是军官的会议，讨论战争应该继续下去还是应该停止下来。仅仅这一件事就已表明，希腊的人民群众即使在那时、在“英雄的”年代里，也已绝对不是盲目地一味听从军令的了。

可是事情还不止于此。

商讨刚要开始，人群中站起来一个声名很坏，丑恶讨厌的人。他是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经常不是暗地里而是公开地谩骂高级官员和将领，特别是阿奚里斯(Achilles)和奥德修斯的人。现在他就开始攻击站在他面前的总司令阿伽门农。他声色俱厉地控诉，说他总是把战利品中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说他带领军队只会打败仗，所以他不配担任统帅。可是，他觉得兵士们也都是胆怯的，都已畏缩不前。于是他号召大家都回家去，让统帅带着他的战利品独自留在特洛耶城下。

这都是现代和平主义者一定深表同情的论调。可是，一个普通士兵竟以这种方式当着大批战士面前诬蔑最高统帅，并且宣扬“失败主义”，这在其他哪一个军队中是可能的呢？在任何其他军队里，人们都不会让他讲完话的，假如有了这种企图，那么刚一冒头，就早已被消灭在叛逆者的血泊中了。可是托尔希特斯并没有怎样倒霉，奥德修斯只不过转过身来向他狠狠地痛骂了一场，揍了他几个耳光，逗得全体战士都乐开了。这段插曲就到此结束。索福克利斯也认为，太尔希特斯，尽管他不说好话，在整个战争中并未遭到什么暗算，他是能够安然无恙重返家园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后来，席勒还感伤地记述过这件事。

贝洛赫对太尔希特斯的故事的理解是另一种样子。他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在贵族面前的软弱无力：

“统治者手中的手杖可使任何对抗立刻无声无息”。（《希腊史》第1卷，第1章，第214页）

人民群众在贵族面前不能贯彻他们的意志，这是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和东方国家相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希腊，一个普

通人竟能蛮横到什么程度，甚至在作战期间，他捣乱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几个耳光而已。

大家不妨比较一下，在希腊，联盟诸国国王的最高首领，不得不忍受一个根本不得人心的谩骂者的批评，而埃及的一个法老或者波斯的一个大君却具有天神般的地位，普通臣民接近法老或大君的时候，只能上身伏地，两目下垂，匍匐而行！

人们如果密集聚居在一个城市里，就会比分散在辽阔的乡间更容易意见融洽，而利益和目标一致，就更容易共同行动。此外，希腊城市也不是象东方城市那样处于辽阔广大的农村地区及其领主的压力之下，它勿宁愈来愈比农村地区及其居民重要起来，取得了控制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共同体的当局同他们受权或自认为受权领导的那部分居民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对当局进行反抗就容易得多了。

当国王企图依靠同贵族敌对的那部分人民来增强他本来脆弱的地位，或当他因争抢战利品或商业垄断而同贵族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摆脱王权的控制的是贵族。

如果说在东方，君主专制国是典型的国家形式，那么在希腊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城邦，共和国乃是典型的国家形式。

希腊的王权是这样的脆弱，常常用不着艰巨的斗争就可以把它推翻。至于传说阿提卡的国王考德罗斯(Kodros)死后，逐渐呈现出来的王位继承问题简直不再受到重视，这当然是完全不足凭信的。

据传说，考德罗斯的执政是那样英明，以至于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可以当他的继承人。不过，王权终究不会是这样诗意地结束的。关于这件事，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最初，阿提卡的贵族做到了这一点，即让国家元首，此时叫作执政(Archon)，从豪门贵族中选举出来，起初的人选还总是出身于梅顿蒂的王室家族，而且是终身职。可是不久，人们就把执政的任期限制为十年，使每一家贵族都可以入选，并且把他的权柄限制得越来越小。最后，每年选出九个执政官。所以，王权不是一下子废除的，而是逐渐取消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王权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和平演变废除掉的”（贝洛赫《希腊史》第1卷，第1章，第215页）。

早在那时，即公元前七世纪，人们就从共和政体中得出了一条直到我们今天阶级社会里还在不断重复着的经验。凡是王权已有些巩固，并且成为世袭的地方，它就想成为一个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权力，它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取消阶级，而是为了利用阶级矛盾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使自己不依赖于各个阶级。这样，阶级矛盾就被掩盖起来，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往往受到阻碍。在共和国中，阶级矛盾的表现要急剧得多，统治阶级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得多。由此可见，许许多多自由党人的希望显然都是幻想，因为他们以为共和政体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

共和政体勿宁是一种使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工具。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来说，这并不构成鄙视共和制的理由。

在大多数希腊国家中，贵族推翻了王权。共和政体首先就是为贵族和他们的利益服务。人民群众现在遭受着贵族无情的剥削，地位被压抑得愈来愈低。

可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压力增长，反压力也随着增长。我们已经提到有利于希腊国家下层阶级起来对抗和反对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是向着这同一个方向发生作用的。

沿海城市越是控制了整个的国家生活，航海的那一部分人民就愈在国家生活中占有势力。这些人比农民或者小市民更有活动力并且更不受传统的约束。因为他们在国外经常碰到并且要预计到各种各样同本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航海也要求有比农业和城市手工业大得多的胆量和毅力。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受了航海居民的影响，就获得了陆地城市居民所没有的那样一种动力、一种领导、一种力量。但是同时，最重要的沿海城市都不在岛上，而是位于大陆，因而是陆军可以到达的。它们的商业和财富的增长，固然也促使它们的海军有相应的增长，然而，这却不能保障它们不受陆地上的、即来自周围富于掠夺性的邻区的进攻。事实上，比如说，雅典，就不是

亡于一个压倒优势的海上强国，而是亡于来自压倒优势的陆上强国，先是斯巴达，后来是马其顿。

贵族阶级在小城市中数目不大。他们人数的增长不象城市财富以及城市面积的扩展那样迅速。只靠军事贵族，是不足以在陆地上保障贵族的安全，不足以对付捣乱的邻居而维护贵族利益的。

一方面由于节制生育，以便家产不致于分散，另一方面由于长年战争，人员消耗，贵族阶级就显出减少的趋势。平民在战争中当然也蒙受损失，但是平民队伍却可以继续不断地由从前不服兵役的阶层的成长而得到补充，而且还可以由外国移民来补充，这些外国人一旦定居本地，人们就允许他们服兵役，取得公民权。所以，在一个富庶而繁荣的城市里，平民的人数总是大的。而始终只限于某几个豪门世家的世袭贵族，就没有这种填补缺额的办法。

关于战争对贵族所起的毁灭性影响，只须举一个斯巴达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在留克特拉战役时（公元前371年），这个地方享有全部公民权的公民人数是1,500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斯巴达的最高军事贵族。其中二十岁至五十五岁的有1,000人。这里面有三分之二，700人参加了战役，其中阵亡了一半以上，400人。

斯巴达的公民，按其土地占有状况，分为享有全部和部分公民权的公民两种。按照贝洛赫的统计，在留克特拉战役时，十八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的总数是3,500人。“由于这场战役，公民数字下降到2,500人光景。”（《希腊史》第3卷，第1章，第283页）

在希腊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中，贵族人数该当是比在农业的斯巴达那里还要少些。这些城市的市区既然又狭小又贫瘠，于是那里一个农民的劳动就只能获得微乎其微的剩余物品。所以，只有少数比农民总数少得多的剥削者可以依靠这点剩余物品生活。

城市的财富愈增长，就愈会引诱贫穷国家前来掠夺。城市的面积愈扩展，贵族的势力就愈不足以捍卫城市，不足以抗御强邻，保护城市利益；而同时自由居民中的这样一部分非贵族的人也就为数愈大，这一部分人只在城市和国家中拥有可能受外来侵略损害的随便一点

什么财产而已。调用这一部分人来保家卫国，就愈来愈成为必要的和有效的办法了。而且，在城市里，非贵族居民中的富有者的人数也在增加，他们有能力把自己充分地武装起来。

于是，农民和市民中具有战斗能力的就有愈来愈多的人制备武装，进行作战训练。城市的财富愈增长，战争中虏来的奴隶愈众多，购买奴隶的手段愈增加，也就愈可能出现上述情况。这样一来，让奴隶来代替自己劳动，以便腾出时间去服兵役的农民和市民，人数就增多了。但是他们之中有办法制备充足的武器，使自己能够充当重装甲兵（甲冑兵 Hopliten）的人数也日渐增多起来。正如贝洛赫所指出的，冶金术的进步，使中产阶层易于获得金属装备，从而也加速了上述情况的出现。这样，骑士就失去了他们相对于普通市民中富有者的军事优势，现在，是普通富有市民的密集战斗方式在决定战争的胜败了。（第1卷，第1章，第348页）

在希腊兴盛的年代里，它的军事力量是以装甲步兵为基础的。波斯人的骑士军，就是败于这支训练有素的农民市民军手中，即使当时前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

由于这样，全部城市居民就产生了一种战斗性格。关于这一点，麦克斯·韦伯这样说：

“古代的城市，……自从甲冑兵种建立以来，是一种军人行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城市，只要想推行一种主动的陆地政策，它就必须在大或小程度上仿效斯巴达人，从市民中建立起有战斗训练的甲冑兵部队。就是亚哥斯和底本，也在它们扩张时期建立了若干由精兵组成的分遣队，而在底本，还通过私人交情把他们结合起来。没有这样的军队，而只有市民甲冑兵的城市，如雅典和大多数其他城市，在陆地上就只能处于防守地位。不过，在豪门巨族被推翻以后，无论哪里，市民甲冑兵都成了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至于中世纪或其它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类似这样的阶级。甚至非斯巴达式的希腊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了一种长期军营的性质。”（《经济和社会》，第596页）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和工业城市中的显贵家族，就不可能长久保持他们的优势地位以及凭此优势而进行的剥削，如果它们所剥削的是市民群众的话。

诚然，在王权被推翻以后，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处境是暂时恶化了。特别是由于参加兵役，他们遭受了损失，因为他们为了服兵役不得不忽略他们的生产经营，而这个损失并非总能从战利品中获得补偿的。他们的债务增加了，残酷的债务法律规定凡是无力还债的都须当奴隶。

可是就是这个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兵役任务，也赋予农民以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使农民不仅能够渐渐抗拒贵族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愈来愈重的压力，而且能够终于转入攻势，把贵族的特权一一予以废除，要贵族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办理国家事务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要他们多做必须由国家来做的有利于下层阶级的工作。这样，国家就在某种程度上转化到它原本状态的反面，由贵族和富人的统治手段转化为穷人的统治手段，由剥削穷人的手段转化为剥削富人的手段。

这种发展的动力，是军队组成的性质，是不得不把市民和农民武装起来这一必然性。关于这一点，麦克斯·韦伯十分着重地指出：

“民主化的基础到处都带有纯粹军事的性质，在古代，是训练有素的步兵、甲冑兵的兴起，在中世纪，是行会军的成立，而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军事训练比英勇善战取得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军事训练的日益重要，意味着民主的日益胜利，因为人们既然必须并且愿意征募非骑士的群众参加军队，这就把武器，从而把政权交到了群众手里。”（《经济史》，第 278, 279 页）

中世纪的行会军，是否象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军事力量，可以姑且不论。这里只想指出，如果韦伯认为古代希腊民主化的原因是纯粹军事性的，那就把事实真相过于简单化了。

我们已经看到，还有其它原因也在这里起着作用，首先是国家小，土地少，这就限制了贵族的优势，以至早在英雄时代，亦即骑士单独作战的时代，就已允许下层阶级的人们自由讲话。还有一点也应

该指出,那就是城市的政治生活的集中,城市居民日益增加,而贵族家庭的人数却不是增加而是在减少。

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人民群众,亦即国家中“庶民”的力量。诚然,新的军事制度在这方面也起过很大的作用。可是,这种新的军事制度本身却又是因新的技术和经济条件而产生的。人们不应该过高地估计军事革新对于民主制度的意义。

斯巴达人也象雅典人一样,装备和训练过甲冑兵,但是,他们那里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民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绝大部分人民集中居住的城市。此外,也许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欧罗塔斯流域也和美塞尼亚流域一样,非常富饶,它比商业城市的农业区能养活更多的贵族,特别是当贵族们生活非常节约的时候。除了阿尔加狄亚和俾俄喜阿之外,拉西第孟和美塞尼亚也是真正希腊——在帖撒利亚以南——的两个根本不需要进口粮食的地区。所以斯巴达的贵族并不象城市国家那样高度依靠征用自己底下的群众来参加甲冑兵战斗。他们只让庇里阿西人,而不让根本没有公民权的希洛人的广大群众参加这种战斗,而在同一时期中,城市国家的下层阶级在对付贵族的斗争中却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

这里不能详述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民主制度的胜利。这种胜利也是大家都熟知的,并且在任何叙述希腊历史的文献里都可以读到。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只是,在东方大国中,劳动阶级要为改善他们的命运而斗争,一般说来是办不到的。固然那里存在着巨大的,尖锐的阶级对立,可是,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是偶而由于特殊的情况,阶级对立才暴发为起义,那是绝望的发泄,大都没有什么意义,毫无成功的希望。一般的说,这些起义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使参加斗争的人民陷入比先前更加恶劣的境地。即使有少数例子并不如此,这些斗争也至多促使改换几个统治者,或者取消一项压力特重的新措施,不会产生什么本质上的变动。

希腊的自由国家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阶

级对立和偶发性的暴动，而且还有经常性的，进行得很顽强的阶级斗争。这些斗争，尽管偶而也遭到失败，但是一般的说，导致了下层阶级、民主制度的不可阻挡的逐步上升。

阶级斗争在这里成了国家的一个生活要素。参加阶级斗争非但决不会受到指斥，而且被规定为公民的义务。在雅典，自梭伦以来就有这样的法律：任何人，在爆发了内部斗争时，如果不参加一个党派，拿起武器来保卫它，就要失掉他的公民权。

由于这些剧烈而尖锐的阶级斗争，古代城邦的政治生活同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就非常相似。东方的政治生活对我们相当陌生，相反，古代城邦的政治生活却显得和我们的政治生活本质上相同。有一些人把这一点看作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和东方人种族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希腊人和我们的种族相同。另一些人则根本忽视东方，因为东方和我们，不但在内部情况方面，而且单单由于语言的不同，也是非常隔阂的，而拉丁文和希腊文，却直到今天还为我们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古代历史，亦即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在这些人看来，似乎就是人类的一般历史，而这种看法一直继续到我们中古时代。他们因而得出这样的见解：这部历史只是同样的一些戏剧故事的不断重演。假如他们也曾考虑过东方国家的历史以及国家形成以前的人类发展史，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

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的那个时代，当他们写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们心目中的古代民族也只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这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知识水平的。作为等级社会的最早的例子，他们援引了古罗马。

我们已经看到，并且恩格斯本人也承认，在国家出现前，谈不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即使在国家和阶级出现以后，也只是对于那些在古代，在纪元前最后的二千年中，出现在地中海岸特别是东部海岸、亦即与东方文化古国接壤的那一部分沿海城市国家，才能谈得到象在现代国家中所进行的那种正规的阶级斗争。

第三章 城市国家中的民主与剥削

不管地中海的城市国家和东方的大陆国家多么不同，两者最后都走向同一个结局，那便是，专制政体，政治生活完全停顿，经济衰落，从而国家灭亡。

古代的民主，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固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取消贵族的一切特权，甚至取消贵族本身这个特殊阶级，解散他们的氏族组织——在雅典就是这样，但在罗马却不如此——；固然可以争取到国家内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权利完全平等，让富人去负担国家的一切捐税，从而使国家养活穷人。可是民主要想把罪恶的根子亦即把阶级分化本身铲除掉，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它也就不能阻止由此而引起的国家的没落及其最后的灭亡。

尽管贵族失去了这么多东西，他们却懂得在国家生活中保持精神上的优势。由于家庭传统，文化教养和生活方式的缘故，他们对于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内外情况以及统治艺术，远比“凡夫俗子”，即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饭店老板、搬运夫、水手、乞丐要熟悉得多，甚至也比商人和银行家要熟悉些。商人和银行家，如果他们想在国家内获得威望和权势，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成为大地主，并采取大地主的生活方式。

当时的情况表明，在统治阶级和执政阶级之间可以有很大的差别。一个统治阶级可以没有能力亲自执政，亲自治理国家。但它却仍可维持它的统治地位。这时它是通过挑选出一批执政人员来实行它的统治的，而这批人只有当他们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意图时，统治阶级才让他们行使职权。所以政府和统治阶级并不是同一回事。政府是统治者的帮手。

因此，即使在城市国家中，民主也并没有干脆把贵族一脚踢开，而勿宁情愿把领导权交托给他们。不但如此，甚至民主运动本身的领导者极大多数都出身于贵族，是贵族的成员。这些人或者由于个

人理由已和他们本阶层的成员闹了分裂，或者有足够的远见，认识到民主的向前推进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认为，把蓬勃发展着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手里，是聪明的或者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从民主得到成功开始，从梭伦(公元前600年左右)起到柏里克勒的死(公元前429年)，雅典的第一流政治家，就连民主的领袖人物，一直都是贵族氏族的成员。

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论雅典宪法的那部书里也特别指出。他说(我的引文是根据莱克拉出版社出版的文采尔博士的德文译本)：

“在柏里克勒还是人民领袖那段时期内，宪法的情况始终还算大致良好。可是，他死之后，情况就严重恶化了^①。这个时候，人民第一次有了一位在上层社会里没有威望的代表。在前些时期，连这些上层人物也连续不断地参与了领导人民的活动；因为人民的第一个代表人是梭伦，继承他的是柏西斯特拉托(Peistratos)——这两个人都来自贵族和上层人物的行列——，在独裁统治倒台后，当代表的则是出身阿尔克毛尼顿(Alkmeoniden)氏族的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克利斯提尼驱逐了伊沙戈拉(Isagoras)之后，他根本没有敌对者，不过在此后一个时期，就互相对垒地出现了克桑蒂波斯(Xanthippos)领导着人民党，和米尔提亚戴斯(Miltiades)代表着上层社会，后来是泰米斯多克勒和阿里司提戴斯(Aristeides)对峙，接着又是民主领袖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和代表有产阶级的米尔提亚戴斯的儿子吉蒙(Kimon)相对立，随后是人民一边的柏里克勒和反对党一边的、吉蒙的亲戚修昔底德^②(Thukydides)旗鼓相当。柏里克勒死后，代表上层阶级的党的是尼吉亚斯(Nikias)，这个人后来在西西里结束了他的生命，代表人民一方的是克雷雅尼托斯(Kleainetos)的儿子克雷欧(Kleon)，主要是克雷欧，通过他的煽动大大助长了人民的道德败坏。从他开始还造成了在讲台上狂叫和谩骂的恶习。别人都

① 对贵族来说。——考茨基注

② 不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考茨基注

习惯于衣冠整齐地说话，他却穿着皮围裙演讲。”(第28节)

克雷欧是雅典第一个伟大的、非贵族出身的政治家。他出现的时代是雅典已实行了几乎二百年之久的民主的时代，这民主是以梭伦的立法开始的。可是，除了制革匠克雷欧和乐器制造师克雷欧冯(Kleophon)之外，贵族一直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取得对于人民的领导权。自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同情贵族的历史著作总是喜欢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及后来遭受的种种灾难转嫁于雅典的非贵族出身的领袖们。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市民出身的“煽动者”克雷欧作什么样的判断，克雷欧所能够造成的灾难根本就不能同贵族阿尔奇比亚代司(Alkibiades)给雅典带来的灾难相比。阿尔奇比亚代司是克雷欧在阿姆菲波力士(Amphipolis)阵亡后，取得城邦的领导权的。

实际上，雅典当时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以致几乎不可能有一个雅典的政治家不犯错误，不管他是出身贵族还是来自人民。

至于说“煽动”和腐蚀人民，那末贵族党和民主党的领袖们都同样有份。只是他们收买和煽动群众的方法不同而已。贵族的领袖们用送礼的办法来收买，花的是自己的钱，民主党的领袖们则是通过合法的规定，用国家向选民送礼的办法来收买。

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引用过的论雅典宪法的书中也曾对此加以明确的解释。在该书的第27章中他谈到了规定给法官的薪俸。自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公元前509年)以来，每年从公民中要抽派六千人去当法官。在阿提卡，属于公民行列的不仅有贵族，象在拉哥尼亚那样，而且还有全体人民，奴隶和外国人除外。陪审官的职务最初是一种讨厌的负担。柏里克勒实行了给陪审官薪俸的办法。薪俸是够微薄的，才两个欧博洛斯(等于德币30个芬尼)，但已足够应付那时代的无产阶级的低微的生活要求，因为在那个时代和那种气候下，衣著和居住对于那些人来说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

关于这事，亚里士多德写道：

“柏里克勒也是第一个推行法官薪俸制的人，他把这种做法作为

对付吉蒙^①及其财富的一种政治策略。因为吉蒙，这位富埒王侯的人，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他为国家负担起来的各项工作，而且也给他那个行政地区的许多人员以生活费用。在他的地区，拉基雅顿境内，任何愿意找他的人每天都可以亲自向他求情，从那里拿到生活必需之资。此外，他的每一块土地都不设置篱笆，每个人都可以去摘取水果。象他这样的慷慨布施，决不是柏里克勒的财力所能应付的。既然凭他的私人财富对付不了吉蒙，所以达蒙·冯·欧亚(Damon Von Oia)就向他建议，让人民自己支付酬劳。这样，柏里克勒就推行了法官薪俸制。有些人把法官道德败坏的罪过归之于这一措施，因为自实行这个办法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在选拔法官时，可疑分子倒比审慎的公民占了上风。向法院行贿的风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开这条方便之门的是既经交卸了皮洛士(Pylos)的指挥任务以后的安尼托(Anytos)。因为他放弃了皮洛士，所以就有人控告他。可是由于他贿赂了法院，竟得平安无事。”(第27章)

实际上，雅典人用不到从安尼托身上才看出金钱贿赂是一种受欢迎的办法。自从波斯战争以来，在所有希腊较大的国家的一切高级官署中，不管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不论在斯巴达或是雅典，受贿以及干脆利用职权来使自己发财致富的现象都在迅速地增长着。亚里司提戴斯被认为是一个特殊人物，因为他作官而没有发财；他没有收受贿款，这和泰米斯多克勒等人正好相反。掌握领导权的贵族们的巨大财富，不少是来自贿赂的。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尽量收买选票。他们一旦作了官，就会连本带利地捞回原来付出的代价。随着贵族在国家中的势力的增长，选民们凭借民主愈来愈成为领受国家资助金的人。他们的任何一个社会活动都有报酬，参加人民会议，看戏，也是这样，当然还有参军，频繁的战争很需要他们去参加。胜仗还会给他们带来战利品。

这样，一个贫苦的公民就完全可以靠国家和贿赂来生活，这些热

① 贵族党的领袖。——考茨基注

中政治的富人是不吝惜这方面的开销的。

国家从哪里去张罗这些为完成这项任务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呢？它不能从贫苦的公民那里去征集。这些人即使不停歇地努力劳动，也生产不出剩余价值来。他们从国家那里拿钱，但却不付给国家什么钱。这笔开支必须从富人身上挤出来。这方面主要是实物支付(Leiturgien)，而不是现金捐输。他们要为国家建造战船，要举办节日和戏剧活动，还要办得尽量体面出色。这就出现了富人受穷人剥削的奇怪情况。难道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这样——哪怕只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实现了的吗？

决不是的。

富人为穷人所花费的所有巨额资财，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来创造。那末通过谁的劳动呢？不是通过穷人的劳动，这些穷人愈来愈多地习惯于游手好闲，把田间或者工场上的劳动主要留给别人去做。这些必要的资财更不会来自贵族们的劳动。贵族人数太少，无法为人民群众创造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况且这些人从来就把劳动看成是一种耻辱，狂傲地拒绝不干。

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并且能够履行它的义务，只是因为，在这些穷的和富的市民以外，出现了为市民劳动并受市民剥削的大批的劳动力。民主只适用于市民内部。民主只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除了原有的剥削者以外又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更庞大的剥削阶层，这个阶层一部分是直接地，一部分是通过剥削富人而间接地牺牲真正劳动者的利益，来过一种寄生的生活。

属于这些劳动者的行列的首先是奴隶。

海上劫掠和战争带来了大批的奴隶。这些人在城市国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在大陆国家中的作用大得多。在大陆国家，土地由自由的或者隶属的农民来耕种，这些农民有交租和服私人劳役的义务，可是经常免服军役，并且能够过一种往往是利于繁殖后代的家庭生活。那里的奴隶制主要是供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家庭奴隶制。反之，在城邦，则奴隶越来越被使用在工业、建筑业、采矿业方面。最

后,在那里,奴隶制也实现在农业方面了。

因为农民被征调去服军役,而军役又在经常战争的年代里使农民疲于奔命。他不得不丢开他的土地,并且愈来愈是债台高筑。最后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土地出卖给富人。富人可以把这些土地交给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去耕种。无产化了的农民如果不愿意迁入城市,自己就变成了这种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但是奴隶也常常被使用来从事农业劳动。由奴隶来种地的趋势渐渐增长,同样,土地也愈来愈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奴隶不能过家庭生活,在长期进行战争,或战争胜利进行的情况下,农业人口才能维持着一定的数额。

这样,使农民一部分陷于贫困一部分归于消灭的战争,竟而成了输入奴隶借以保持农业正常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亚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学》一书中把战争也算作是营利的艺术,因为战争是获得奴隶的一种手段;这是地道的希腊式的想法。

“……所以,战争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一种营利艺术。因为打猎的艺术是战争艺术的一部分,它有时用来对付动物,有时用来对付那些生来就是为服侍人却又抗拒这样做的人。所以,象这样的一种战争从本质上说来是合法的。”(第1卷,第3章)

战争和政治愈是成为营利的手段——这不仅对贵族,象最初那样,而且对普通公民也这样——,城市和乡村中的公民也就愈要为这种营利方式争取时间。有一些人则搁下了他们的行业、手工业、小商贩经营、酒店业、搬运业等等,干脆靠国家和富有的政客们的照顾来过活。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窘的。谁要是有能力,谁就宁愿买下一个或者几个奴隶,让奴隶来代他干他的行业。这样,即使他本人出去打仗,他的行业也能继续下去。克雷欧就是这一类的手工业者,让奴隶来干他的制革业,自己竟能够有时间当统帅去打仗。奴隶的价格越便宜,公民们就可以越早实现这样的做法。奴隶的身价又完全取决于战争的频繁和胜利。

这样,在城市以及在乡村,以往是自由的劳动者,就愈来愈脱离了劳动而全靠剥削非自由的劳动者来生存。他们进行剥削一部分是

直接的，即由他们自己来使用奴隶；一部分是间接的，即向剥削大量奴隶的富人征税。

然而，在日益成长、繁荣的城邦里，市民阶级并不以剥削非自由的劳动者为满足。他们也懂得去使用自由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独立的手工业者，一部分是散工，特别是使用在农业和建筑方面。在一个工商业正在繁荣的国家中，总有大量的劳动者，为了寻找生路而从一些贫穷的、由于战争失利而经济上破了产的国家中迁移进来。和这些移民合伙而来的，有已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之能获得释放，或者是通过赎身，或者是由于完成了某些特殊任务，作为报偿，因而恢复了自由。这两类自由劳动者以他们的劳动使共同体富裕起来，并由于他们的人数增加，也使市民阶层的重要性比起贵族阶层的重要性有所增加，这样，在实行民主的初期人们乐于把他们吸收进城市公民的队伍里。可是当公民权恰恰由于民主的缘故愈来愈成为一种营利的手段，市民阶层也愈来愈感到自己的队伍已达到比贵族更壮大有力的程度时，人们就愈来愈不轻易给予移民以新公民权了。于是，在国家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既无公民权，也得不到国家或私人的照顾的自由劳动者的阶层，他们甚至连个可以买得到的选举权都没有。他们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过活，如果他们自己不使用奴隶的话。他们不但从国家那里得不到什么，而且还得给国家缴税。这样，他们就成为了剥削的对象，国内穷的和富的公民都靠他们过活。

在雅典，这些移入而在国内定居下来的靠自己的劳动过活的人叫作米土肯（Metöken）。他们必须要缴纳一种特殊的税（米土肯税 Metökion）来酬答国家给他们的保护。还在克利斯提尼执政时期（公元前 509 年），他们里面就有许多人被吸收为公民。可是在公元前 451 年柏里克勒时期就颁布了一条法律，按照这条法律，只有那些父母已经是公民的人，才能被批准为公民。

米土肯人的数字很大。贝洛赫估计在雅典他们的人数约为自由公民的三分之一。奴隶的数字当然要大得多。

可是，在一个势力强大的、战争顺利的城邦中还有第三种剥削方

法,这个方法给它的公民打开了一条可以取得优厚收入的门路,这种剥削方法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对于雅典这个较大的各个城邦中最民主的国家,情况就是如此。

在波斯战争中,雅典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在罗梭矿山开发的银矿,成了希腊各海军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只要受波斯人奴役的危险还存在着,希腊大部分(不是所有的)国家就团结起来反抗波斯人。当这个危险既经消除之后,这一联盟就瓦解了,代替它的是希腊各国的两个特殊集团:贵族的和民主的集团。这种情况通常是这样加以叙述的,说这里体现着两种不同的对立思想意识的冲突,而这两个集团的斗争也被说成是一种纯粹思想意识的斗争。实际上,在这个思想对立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物质利益的对立。

贵族国家的土地都是农业地区,天然就是富饶的,所以那里的人民没有必要到海上去。农业在那里始终是主要的生活手段。那里的贵族一直保持着他们的原有实力。在和平时期,他们的主要收入是粮食剩余产品,这是他们的土地在养活给他们种地的人,农奴,或奴隶,以及养活自己的家人之外所能给他们出产的。

民主国家都是那些土地贫瘠、农业不发达、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着的城市需要的城邦。它们迫切需要从外面进口粮食。这些粮食首先购自农业国。这样,在贵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似乎保持着十分协调的关系。贵族国家给城市国家提供它所需要并且对这个主顾的发展与繁荣极为重要的东西。

但遗憾的是,商品生产世界里不存在永远能维持下去的协调关系。只要农业国家掌握了供给城市国家粮食的垄断权,它们就要尽力利用这种垄断来抬高粮食的价格。破坏这种垄断就成了各城邦最重要任务之一。各城邦所以开辟一方面同埃及另一方面和黑海国家的频繁交通线,就是在于完成这项任务。

这样,城邦里下层阶级的处境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地主的处境却也有了显著的恶化,因为他们的现金收入是来自贩卖粮食。于是每一个希腊国家中就产生了群众和贵族之间的强烈的阶级对立,使两

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大大尖锐起来。可是在大地主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家和市民群众愈来愈重要起来的城邦之间，因此也产生了深刻的敌对情绪。

贵族国家的领导归斯巴达来担任，斯巴达是这些国家中最好战的国家，在那里军事贵族最放纵地统治着国家。这些贵族在每一个民主国家中都能找到一个同情他们的贵族党。

在民主的城邦中，除雅典外，没有一个能在作战方面和斯巴达多少可以较量一下。民主国家在波斯战争后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矛头与其说针对着波斯，不如说针对着斯巴达。雅典成了这个联盟的盟主。它得到贵族执政的国家中的民主党派的同情，如果那里能够出现这样党派的话，这在拉西第孟，譬如说，就根本不可能。

公元前 478 年，成立了提洛联盟。它是一个城邦的联盟，其中每一个城邦，为了共同斗争共同的敌人，都要提供船只和金钱。联盟的财库规定由雅典人来管理，共同的舰队归雅典统率。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使热中于攫取新的剥削源泉的雅典人感到满足。他们力图利用雅典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一步一步地去压低盟国的地位，把盟国愈来愈贬低到成为只有缴纳贡赋义务的臣民。

原来存放在狄罗士岛上的阿波罗庙里的同盟各国库藏，不久（公元前 450 年）就运往雅典。他们也不要盟国建造自己的船只，组织自己的人员配备，而要盟国缴纳数目变得愈来愈多的税款。他们就靠这项税收来建造自己的船只，支付自己的船员的薪饷。赋税愈来愈加重。最后，盟国甚至还得把一切较大的诉讼案件提到雅典法院来处理，这不仅有利于雅典对盟国施加影响，而且也给雅典带来了大量贿赂金，在当时不拿钱来贿赂是不能打什么重要的官司的。雅典人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剥削，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亚里士多德在他探讨雅典宪法的著作中也说，雅典的绝大部分居民是靠盟国缴纳的赋税来过生活的。他在那里说道：

“后来，当雅典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在城市里积累了巨额款

项时，阿里司提戴斯就建议雅典人去夺取希腊的霸权，并且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依照他的意见，雅典人应该在城市里谋生计，一部分通过在战场上服役，当卫戍军，另一部分靠管理国家和联盟事务，以便循这条途径日后成为希腊的第一个强国。雅典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此在希腊人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可是他们却利用这个地位对待盟国象对待臣民一样。他们只允许岐奥斯(Chios)列斯波司(Lesbos)和萨摩司(Samos)保持自己的宪法及其原有的权力范围，并且也就在这些国家中有了自己的统治的维护者。他们这样做时，同时也攫取到大量钱财，正象阿里司提戴斯所建议的那样；这样他们就替广大人民筹措到生活资料。因为拿盟国的赋税和关税就可以养活二万多人^①：六千名法官，一千六百名弓箭手，另外还有一千二百名骑士，五百名顾问官，五百名码头驻防军，五十名城堡守卫员，将近七百名在阿提卡的官吏，大约同样数目在阿提卡以外地区的官吏。此后，当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还有二千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常规驻防军兵，二十艘巡逻船；此外，还有征收盟国税款用的船只，船上有通过抽签决定派遣的海员二千人，最后，还有在元老院(Prytaneion)里吃饭的人，以及孤儿和狱吏——所有这些都从公款中领取收入。”(第24章)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到的不仅仅是这样一项规定：即，盟国一切较重大的诉讼案件都必须由雅典法院来判决。这项规定使得那里的官吏们除了他们的薪俸之外，还能够从贿赂中得到一笔好收入。重要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到的还有：

凡是想逃避联盟日益加重的压力并想退出联盟的盟国，雅典就使用武力迫使其就范。因此而受到处分的国家的各种惩罚中有那么一项：它必须把它的一部分耕作土地割让给雅典，让无地产的雅典人作为“保有兵役义务和公民权利的殖民者”(“Kleruchen”)迁移进去。这样作法是想减少在雅典的无产者和加强雅典的军事力量，因为在

^① 貝洛赫認為，在公元前431年时，雅典公民的总数为四万人(成年男子)。所以有一半人直接靠剝削盟国来过活。——考茨基注

当时战士还必须自己准备武装，只有富有的农民才能全副武装起来作为甲冑兵在军队中服役，至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就不行。

然而时间一久，这种措施当然就不能达到它的目的了。因为当初分配土地就是为了要人服兵役，而正是服兵役又折磨坏了这批新添的农民，象过去把老一批的农民拖垮一样。但是，除此而外，许多人还下不定决心，离开可以不化很多劳力就能生活的、欢乐的雅典，迁住到荒凉地区，去过农民的艰苦生活。他们宁愿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出租给受制裁的国家的居民，而自己在雅典化用收来的地租——这是雅典剥削盟国的另一种方式。

阿提卡的势力越强大起来，阿提卡的公民阶层的势力愈强大起来，加在盟国身上的压力就愈大，对他们的剥削就愈无法忍受。就是在希腊境内民主阶层中所激起的对民主领袖即雅典国家的仇恨，也愈来愈普遍化。雅典国家就愈来愈只能依靠凶残的暴力来维持它的地位。一旦它的地位动摇了，全希腊就会起来反对雅典，雅典就会悲惨地崩溃。象我们早已提到的那样，这个灾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发生了。

在保持和扩大雅典的实力地位以及继续进行战争上，雅典市民的贫苦阶层要比地主们感兴趣得多。在敌人入侵时，地主的田产将遭到最可怕的摧残。这却并不怎么影响城市的人民群众。只要舰队控制着海洋，粮食的进口就有保障，群众就感到在城墙后面很安全。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军饷和战利品。打仗是为了维持他们的剥削，也就是为了他们的生存，而地主则对停止从远处入口粮食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他们的贵族倾向上一样，雅典的地主却和敌国斯巴达是一致的。

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以及其它战争中，雅典的贵族都倾向于和平，倾向于同斯巴达讲和。而民主派则根本不愿意和平，只要敌人还没有倒下去。民主派坚持主张即使任何胜利希望都已破灭，战斗也得继续下去，直到完全崩溃。于是，战争终于以缔结斯巴达强迫其接受的和约而结束，而那个和约比我们今天的凡尔赛和约还要凶

狠，还要苛刻。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雅典的无产阶级和民主同现代的无产阶级和民主根本不同。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威尔斯(H. G. Wells)在他的《世界史纲》一书中说到：

“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把帝国主义说成是富人对世界的剥削。雅典的帝国主义则是雅典的贫苦公民对世界的剥削。”(德文版，第154页)

古代城邦中的民主制同贵族制和君主专制一样，只是一种剥削工具，它只是由于剥削阶层的不同而有别于其他的国家体制。而这个阶层和被剥削群众比起来，即使在最自由的民主制国家中，也只是国内一个微小的、享有特权的少数派。

这个少数派，正象在东方那样，最后在城邦中也失去了它的战斗力。占统治地位的公民阶层，在民主国家中，由于他们在国内的权力的缘故，也象贵族在其他国家中那样，被腐蚀了。在这个阶层中，某些人，由于寄生生活造成的懒惰，随着政治意识的消失，也丧失了他们的战斗性。那些仍然保持着战斗力的人，则习惯于靠战争来牟利。他们成了雇佣兵，谁给他们钱，他就听谁使唤。于是，政治领导就落到了那些懂得掠夺大量战利品的幸运的将军手中。民主制完蛋了。

希腊的自由，在公元前第五世纪时，在与庞大的波斯王国的对峙中，还能胜利地保全下来，可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就被马其顿的军权君主国摧毁了。马其顿军权君主国把希腊和波斯统一成为一个帝国，而这个希腊波斯帝国后来又分裂为一系列军权君主国，这些都是由一些拥有雇佣军的幸运的统帅们建立起来的东方形式的专制国家。

第四章 国家的混合形式

因为古代民主政治的国家不仅不能废除剥削，反而建立在剥削

習 題

1. ~ 4. 題假設砲彈的運動情形同例 1 一樣，也是不考慮空氣阻力的影響。
1. 若砲彈之初速為 1,000 呎/秒，靶與發射台之高度相同，當靶與發射台之距離為 25,000 呎時，試問射角應有多少？（有二解）又需多少時間才能射中靶子。
 2. 試證當初速增加一倍時，則砲彈能到達的最高點及最遠距離都將是原來的 4 倍。
 3. 試證砲彈抵達最高點的 $3/4$ 時所花的時間是到最高點的 $1/2$ 。
 4. 若飛靶與發射台同高但相距 b 呎，當砲彈發射時，飛靶以 a 呎/秒的等速度遠離發射台。試證若欲射中飛靶則初速度 v_0 與發射角 α 應能滿足下式。

$$v_0^2 \sin 2\alpha - 2av_0 \sin \alpha - bg = 0$$

5. 馬戲團裏有一項表演是以人當砲彈塞入適當管徑的發射台，希望能射到 200 呎外的墊子上，假設初速為 $80\sqrt{10}/3$ 呎/秒。若天花板距地面 75 呎，試問發射後能避免撞到天花板嗎？若可以的話，那麼發射角有什麼限制呢？
6. ~ 10. 題中已知微分方程式及初始條件，試求其參數方程式並繪其圖形。在繪圖前最好能先換成直角座標方程式。

$$6. \frac{dx}{dt} = x, \quad \frac{dy}{dt} = y;$$

$$t = 0 \text{ 時 } x = 1, y = m \text{ (常數) }。$$

$$7. \frac{dx}{dt} = x, \quad \frac{dy}{dt} = -y; \quad x > 0, y > 0, \text{ 及}$$

$$t = 0 \text{ 時 } x = 1, y = 2$$

$$8. \frac{dx}{dt} = x, \quad \frac{dy}{dt} = -x^2; \quad x > 0, \text{ 及}$$

$$t = 0 \text{ 時 } x = 1, y = -4$$

(提示：先解出 x 為 t 的函數，再用此結果求 y 。)

$$9. \frac{dx}{dt} = y, \quad \frac{dy}{dt} = y^2; \quad t < 1, \text{ 及}$$

$$t = 0 \text{ 時 } x = 0, y = 1$$

$$10. \frac{dx}{dt} = e^{-x}, \quad \frac{dy}{dt} = tx; \quad t > 0, \text{ 及}$$

$$t = 1 \text{ 時 } x = 0, y = 0$$

11. (a) 已知下式微分方程式試求其參數方程式

$$\frac{dx}{dt} = \sqrt{1-x^2}, \quad \frac{dy}{dt} = x,$$

在 $t = 0$ 時 $x = 0, y = -1$ 。

- (b) 試求此曲線的直角座標方程式。

返回家乡，重建耶路撒冷城，这时才又有了一个犹太国家（公元前538年）。耶路撒冷城于是就连同一小块农村地区建成一个城邦，然而是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城邦。它的生存条件不是商业与工业，但也不是海上掠夺与海上战争，而是完全另外的一种。

和那些因土地贫瘠与人口众多而构成奇特对比的其他地方的居民一样，犹太人也是很早就看到自己有必要把过剩人口遣送到外国的一个民族。因为国家无法掠夺新的土地，过剩的犹太人便只好以个人分散活动的方式，迁到异乡去；或者当雇佣兵，或者当商贩、当商人，这都是他们最便于做到的。他们投奔那些土地肥沃因而当地居民离不开乡土的地区。在这种地方，他们承担起当地居民所没有执行的商业职能。在埃及如此，在罗马亦是如此。但在雅典就不是这样。他们在雅典没有吃得开。希腊人和犹太人一样善于经商，而且和他们一样容易向外迁移。在本卷（上）第四篇第五章论商业民族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这一点。

在外国定居下来的犹太移民，人数日益增加，早在耶路撒冷的神殿第一次被毁以前就已经十分可观了。甚至在准许犹太人重新居住耶路撒冷之后，这个数目仍在增长。他们在耶路撒冷全没有找到谋生的机会。以前经过巴勒斯坦进行的贸易来往，这时都另走了别的道路。犹太国家以外的犹太人，即所谓“Diaspora”（希腊语“散处各地”）的犹太人，差不多全是商贩。也有一些是雇佣兵。

“因为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世界贸易的道路不走巴勒斯坦经过了，所以尽管他们取得了居住故土的自由，大批犹太人直到今天也没有返回他们的祖国。不管什么样的犹太复国运动，只要一天它没有力量把世界贸易中心移到耶路撒冷去，它就一天改变不了这种局面。”

这还是在大战以前我在我的《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版，第253页）一书中所写的。大战带来的变化并未使我需要对我的见解作什么改变。

但是尽管大多数犹太人在古代晚期若干世纪中就已经觉得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许多地区比住在巴勒斯坦舒适得多，然而他们在他们

们的居住地总是外人，因此他们渴望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自己管理自己。尽管耶路撒冷这个小城邦不大能够满足这种渴望，然而它看来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满足这种渴望的一个起始点。而且它只要存在一天，便构成一个中心点，散居外地的千百万犹太人便可以在精神上团聚在它周围。它给他们打上了一个特别民族的印记。但是使他结合成一个特别民族的，并不是一种民族语言。希伯来语在耶稣生存的时代就已经成了死语言，只有学者们懂得。使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乃是他们独有的宗教，他们独有的祭祀，这种祭祀是以耶路撒冷的神殿为中心的。保持这种祭祀的兴旺，通过朝拜耶路撒冷来使这种祭祀绵延不绝并且日益盛大，这成了每一个具有民族思想的犹太人的一项重大使命。耶路撒冷城和其它圣地一样，也只有依靠朝圣者才得以存在。因此，就象在其它圣地一样，耶路撒冷的居民也对宗教充满如痴如狂的热情，因为不仅他们的民族的强大依赖于宗教，而且神殿的所在城市的全部生存也依赖于它。

所以，犹太人城邦的基础是建立在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城邦的基础上的。犹太人的城邦不建立在商业和工业上，不建立在海军或陆军的威力上，而建立在宗教祭祀的力量上。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一非军事贵族，二非君主，三非人民大会，而是一批祭司，他们以祭祀为职，而且兢兢业业地维护着祭祀的纯洁，不让它为外来的掺杂或革新所沾污，不让它丧失其统一性及其对正统信徒的灵魂的影响。

这样，在犹太便出现了祭司国家这一类型，这类国家是希腊人从来不晓得的，因为祭司组织在希腊人中不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个类型的国家也没有在东方的一个大帝国中出现过。在东方，确实不乏强大的祭司组织；祭司组织有时还可以对君主产生有力的影响，但从来没有达到代替君主的地步。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告诉我们，祭司的势力在希腊各国中是多么微弱。在第7卷第9章中他讲道：

“祭司在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明显的。人们既不可委任农民作祭司，也不可委任手工业者（下等人）作祭司。因为众神宜乎从国家的

公民那里接受他们的尊崇。可是国家的公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有服兵役义务的人，一部分是在参议会里执行事务的人^①，而那些年迈力衰的人退职之后，照管祭祀神灵的事宜，是很适当的；这种人应该是人们授予祭司职位的人。”

所以这种职位在希腊人看来是给年迈官员的退休职位。

当一个新教派在罗马世界帝国中出现的时候，给这个新教派提供范例和论据的，并不是希腊的这类毫无实力的祭司阶层，而是犹太的祭司阶层。这个新教派虽然出自犹太教，但不久就跟犹太教背道而驰了。这个新教派本来主要是以办理慈善事业为职的，拥有自己的公职人员，它这批公职人员独立于国家的官吏之外，并常常和国家的官吏发生竞争；它这批公职人员之所以获得了祭司的性质，是因为他们从犹太祭司阶层那里接受了一种独特的祭司仪式，并且使之适应了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他们还从犹太祭司阶层那里学来一套妄自尊大的态度，仿佛他们是代天行道、由神选择来统治国家的。

他们最初是在罗马国家中提出这种要求的。罗马国家和犹太国家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国家。罗马国家与希腊城邦有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在海洋附近宜于商业的地方兴起的。但是罗马的后方腹地和希腊商业城市的腹地不同。希腊各城邦的腹地是贫瘠的、为崎岖的山岭同邻邦隔离开来的狭窄地带。相反，在罗马后面却展开着一带并不迫使人们远涉重洋的肥沃土地，而且这些土地之间没有不可通行的崇山峻岭分隔着。

罗马人并不盼望自己作航海者。他们宁愿让外国航海者，如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到自己这里来进行交易。罗马的统治阶级由于他们的商业地位变得富裕起来，但是他们并不把财富用于海军军备，却用于使自己取得对陆上邻国的优势。首先，罗马使城区以外最近地区的居民，即拉丁人，同自己发生一种类似于雅典联盟的

^① “Hoplitikon”[重装甲兵]和“Buleutikon”[参议员]。参议会(Bule)管理真正的国家行政事务。——考茨基注

从属关系。这样一来，拉丁人一方面成了罗马的同盟者，另一方面成了它的臣民；一方面成了征服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成了征服行动的合伙者。罗马做了这件事之后，便获得了力量，首先制服北方的埃特鲁里亚人的城市，然后制服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一直到在西西里碰上了迦太基人为止。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情况相象，依靠经商获得的财富，发展了强大的陆军。迦太基所占领的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银矿，比直到布匿战争为止罗马所征服的地区，提供了更多的财富。

然而迦太基的发展比罗马的发展要更早些。当罗马与迦太基发生冲突时，在迦太基已经盛行雇佣兵制度，而罗马还处于公民军阶段。

这时，迦太基已经象布匿战争后一世纪的罗马一样，那种能雇佣最多军队的最得意、最富有的将军，实际上是国家的统治者，尽管在形式上不是。海尔林在他的《论古代最主要的民族的政治、交通与商业》(第2卷,第1章)中,对这点讲得很精采。

西班牙的银矿激起了迦太基的大剝削者们的贪欲。哈密尔卡·巴卡斯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他征服了西班牙，获得了西班牙的银矿，一部分为了国家，一部分为了他自己，他用银矿的收益雇佣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同时也在迦太基雇佣了一批有力的扈从。他的女婿哈斯德鲁巴尔继续着他的政策，在西班牙越来越往前推进，因而增大了他自己的和迦太基的势力，但是也引起了罗马人的疑惧与贪婪，因为罗马人对白银财宝也是垂涎三尺的。当公元前222年哈斯德鲁巴尔被谋杀，哈密尔卡的儿子汉尼拔作了西班牙军的统帅的时候，双方的矛盾就酿成了战争的爆发。

“哈斯德鲁巴尔亲自培养起来的汉尼拔，先经军队推定，随后也经元老院任命，成了哈斯德鲁巴尔的继承者；汉尼拔虽然明明知道反对派会在迦太基设法争取到人民的拥护，因为当时人民正想有人出来清算那些因哈密尔卡和哈斯德鲁巴尔的收买贿赂而大发其财的人们，汉尼拔却反而更加迅速地作出了决定：发动对罗马的战争，以巩

固自己的地位。”(海尔林,第2卷,第1章,第215,216页)

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XXVIII, C.31)中附带讲了一段话,说明汉尼拔从他的银矿获得的收入是如何之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汉尼拔在西班牙所开的竖坑至今还存在,而且还沿用从它开创者那里得来的原来名称。有一个每天给汉尼拔出产300磅收益的矿阱,到今天还叫做贝布洛(Bebulo)。”

这个记载假如正确,那么仅只一个矿坑每年就要给汉尼拔提供大约100,000磅的白银!

汉尼拔完全有理由对罗马人啾恨入骨。罗马人不仅威胁到他的故乡城市,而且威胁到他的个人势力的基础。

除汉尼拔和他出身的家族——该家族拥有西班牙银矿的财产——以外,在迦太基最热衷于战争的分子,如同从前在雅典一样,就是民主派。民主派比最高统帅本人还表现出更激烈的战争狂热。当最高统帅最后已经认识到继续进行战争前途无望的时候,民主派还一直不愿意考虑和平谈判。

群众的一切狂热、统帅的一切天才、战争初期统帅所取得的一切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的胜利,都不能阻止迦太基的最后败北。时间一长,公民军相对于雇佣军的优越性就显露出来了。

迦太基复亡之后,在古代文明的范围内就再也没有能够抵抗罗马的强国了。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早已开始衰落,它们打仗的时候,只剩下雇佣兵可用。罗马进入古代侵略国家行列比其他国家较晚,因而它的国民道德还没有由于剥削的影响而受到败坏,这是罗马所以胜过其它一切国家的主要原因。不过,象奥本海姆正确地认识到的,罗马的优势也依赖于它的地理特点,地理特点把它造成为一个陆上强国,而它又和马其顿相象,有可能取得海洋国家的长处。

德耳布吕克在他的《世界史》(1924年柏林第二版)中指出,“迦

* 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年),罗马著述家,所著《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37卷,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但是内容很不可靠。

太基仅仅是一个城市，而罗马则同时既是城市国家又是农业地区”（第410页），并且他在前面第384页上说：

“罗马可以说同时既是雅典又是斯巴达。它和雅典一样，具有城市的资本力量，在城市中有大规模的统一的政治领导，它又象有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斯巴达一样，有大量能征善战的军队。”

所谓罗马同时既是雅典又是斯巴达这个说法，正如德耳布吕克恰当补充的，仅仅“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它既然是两者的混合，便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既不全是雅典，也不全是斯巴达。在雅典，不仅人民大众踊跃参与的海上交通，而且他们的闲暇、他们的无限的自由都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促使他们从事活跃的精神活动，喜欢美好的事物、喜欢大胆的思辨和才华四溢的机智，然而罗马却和斯巴达一样是农业国家，始终过分地囿于农民的愚钝和狭隘，所以发展不出一个贝里克利斯时代。

但在另一方面，罗马又过分带有海洋城市和世界城市的性质，以致它不会不去学习艺术与科学，它虽然超过不了雅典，却不会不去模仿雅典。尽管罗马贵族比雅典贵族把自己的政治势力维持得更久，而且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氏族组织一直维持到帝政时代以及一切政治生活都归没落的时代为止，然而它却未能象斯巴达的贵族那样压抑住一切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在罗马最后表现得就象在雅典一样不可抗拒，然而却是在没落时期已经开始以后才得势的。

没落是从布匿战争以后开始的。最初是道德风尚的没落，然后是内政的没落，最终则是经济和外交的没落。罗马压服了古代文明的其他一切国家，把它们熔合为一个世界帝国，结果只落得在它管辖之下的一切都归于没落。一个城邦的没落竟等于整个古代文明的没落。

第五章 城市国家的没落

城市国家虽然同东方专制国家不同，内部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

争,引起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性质的深刻变化,但是城市国家正象东方国家一样,终究也还是以政治和经济的衰退和停滞为结局,甚至常常以完全毁灭而告终。在古代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显然并不是一种使社会不断向更高的形态发展的手段。阶级斗争不能阻止城市国家最终衰亡,因为在当时进行阶级斗争的社会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具备条件,能够导致消灭阶级,结束任何剥削。甚至,即使仅仅想象一下无阶级无剥削的目标、理想,当时的社会条件都不允许,当然,更谈不上允许把这种目标、理想当作实际行动的准则了。

所以,衰退和没落即使对于城市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一种剥削制度,迟早都要走向这条道路。

有些近代历史学家,如德耳布吕克,竭力否认罗马帝国的衰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在帝国时代是十分兴盛的。罗马帝国在经济上和道义上有过光辉的发展,而消失了的仅仅是它的一些宏伟的业绩。罗马把高度的文化带给了野蛮的日耳曼人,因而使日耳曼人有能力用自己的国家来代替罗马帝国。

奥本海姆在其关于国家的著作中,已经对这种观点作了很精彩的反驳。

诚然,德尔布吕克摆出了一系列事实,说它们至少在帝国时代的第一世纪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在评述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下列情况: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罗马帝国之所以在经济上陷于困顿,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剥削制度带来的损失,关于这些损失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另一个原因则是长期的国内战争。当雇佣军队在罗马代替了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同时——与此相关——那些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支强大军队而成为国家的决定性政治力量的得意的将军们又代替了贵族和市民的地位时,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就发生了。正如在马其顿,亚历山大死后他那些最高军事首领,或如在最近的中国,那一大批自奉将军的军阀,为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而挑起了疯狂的雇佣军战争,在罗马,从马留这位击败朱古达的胜利者(公元前104年)把

罗马的军队建设成为专职军队，从而防御了奇姆布利人和条顿人之入侵意大利(公元前 102、101 年)时起，情况也是这样。从这个时候起，直到凯撒的外孙屋大维把自己的竞争者全部镇压下去并为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建立了独裁统治为止，野心勃勃的将军们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连续不断的斗争，使罗马帝国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屋大维所建立的这种独裁统治，虽然彻底清除了罗马在军事专政之下还勉强保全下来的一点政治生活的残余，但却根本没有给帝国带来长期的和平，至少没有带来国内的和平。

战争对于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是这样严重，而和平对于经济生活的刺激作用又是这样巨大，以致停止战争同经济上升总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在最苦难的经济制度中事情也是如此。即使在苏俄，停止对外战争以及随后又停止国内战争，也必然地带来了经济状况的改善。不过，单单提到和平这一点还一点没有说到布尔什维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好处。

所以，国内和平对罗马帝国经济的有益影响，决不证明那使国家衰落和最终毁灭的另一个因素没有在那里发生作用。

这个因素，即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在城市国家中，即使在有广泛的民主制下，也同在东方专制的农业国家中一样，是起着败坏作用的。甚至可以说，城市国家中采取一切剥削形式，在某些情况下比在东方专制国家中还更加迅速地造成衰落。因为奴隶制度在城市国家中比在东方专制国家中更加成了生产过程的基础。

在东方，奴隶制度主要是具有一种家用奴隶制度的性质。农业经济大部分是由依附性的、负有纳贡义务的农民家庭来经营的。农民家庭的生产收获很丰裕，产生了很多过剩人口，以致城市手工业很容易从这些过剩人口中招收足够的劳动力。此外，把大批奴隶遣送到遥远的地区又是一件费用浩大的事情，它会提高奴隶的价格。

小城市国家需要很多军人，以致必须拉农民群众服兵役，农业经营因而遭到了破坏。大地主夺回自己的土地，不再做高居于具有纳贡义务的农民之上的领主，而是同农民平行起来，以农民的竞争者和

敌手的面貌出现了。服役的隶农人数不足，大地主就设法一部分用雇佣劳动者，而大部分用奴隶、战俘来补充。战俘是可以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大量地获得的，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花费不多地用船经过很短的一段路程大批从地中海东部运送回来。

大量而十分廉价的奴隶劳动，把农民家庭从城市国家的生产过程中排挤了出去。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市民阶层由以得到补充的全部后备。

在古代城市中，卫生环境十分不好，以致城市人口的死亡数字远远地超过出生数字。如果不是有农村人口不断地流入城市，不断地重新充实起来，城市人口势必很快就死绝。农村人口之不断流入城市，是以有大量子女众多的农民家庭为前提的。但城市国家中的农民家庭日益为奴隶所排挤。即使国家想方设法，一再地给农民提供了重新从事耕作的坊地，这也不能阻止城市人口绝灭的过程，而仅仅是使这个过程有所延缓罢了。

甚至在城市中，奴隶劳动也获得了日益重要的意义。奴隶的和移居来的外地人的劳动，在城市中排挤了市民的劳动。

奴隶劳动排挤市民劳动的过程，由于日益加强的民主而得到了促进。民主给市民在战争中和政治中打开了很多获利的源泉，以致生产劳动对于这些市民来说愈来愈没有什么必要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也恰恰成了国家和统治阶级发展民主、提高剥削的一个强大动力。因为廉价的奴隶劳动的竞争越剧烈，受到排挤、一无所有的那一部分市民就愈感到需要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利，以便可以靠出卖政治权利来维持生活。

只要输入大量的和廉价的奴隶劳动有保证，这个过程就能顺利地进行。一俟获取新奴隶的来源堵塞了，这个过程就终必造成经济衰退和最终崩溃。没有奴隶，可以说生产就不可能进行了。

但是，通过战争和掠夺来获得奴隶乃是一种必然自己挖自己墙脚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最坏的掠夺经济形式之一。敌人的每次侵略都极其严重地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侵略是以战败国的劳动力

全部或者大部被运走而告终的，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因削弱以至毁灭。

一个国家需要经常胜利地向外扩张，以便可能一再从新的地区获得奴隶。捕捉奴隶的地方必然越来越远，他们到达他们的“买主”手里必经的路程越来越长，因此，奴隶的价格也就越来越昂贵，可是，在奴隶劳动的生产作用很小的情况下，只有当奴隶极其廉价时，使用奴隶才值得。

当奴隶开始变得很罕见和很昂贵时，这些城市国家的大地主便试图用象许多农业国家特别是东方大陆国家早已拥有的那种隶农来代替奴隶。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为许多小块土地，把它们租出去，大部分是租给他们的奴隶，企图用这种办法给奴隶提供建立家庭与增殖劳动力的可能。除了这些“佃耕者”之外，还出现了“寄居者”即战俘。人们不把战俘卖为奴隶，而是把他们派给大土地主充当隶农。

由于新形成一个半自由的农民阶层，所以有可能促使人口重新增殖。然而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增殖起来。

泽克曾以“种族的退化”的观点探究过当时人口所以没有增殖的原因。他在他的《古代社会没落史》中说道（第1卷，第385页）：

“从小租典出现起，就又有了自由的乡村居民。在有了过剩的未耕种的土地时，乡村人口的自然增殖不是又能逐步充实起这些空旷的地带来吗？虽然这种田地的肥力由于过去的竭力利用而有所减低，但是，几十年的长期休耕和吃草牲畜满地拉的粪便也必定早已又使这些田地肥沃起来了。古代世界的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经过整个中世纪，都养活着许多居民，他们并不人工施肥，恢复地力：为什么这些人在古代社会的最后几个世纪还不会施肥呢？虽然当时已不再有任何障碍阻止农民阶级走向新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还是没有出现，这既不是因为土地也不是因为政治状况，而是因为整个种族的退化”。

在这里，我们觉得首先必须问道：是什么样的种族呢？然而，大量的佃耕者和寄居者并不是衰颓了的城市居民，而是未开化的野蛮

人，这些野蛮人作为战俘，都是被迫脱离自己的原始的半游牧式的、过得充分自由而有力量 的农民生活，来到罗马帝国作为奴隶或强制迁居者进行劳动的。对于这样的“种族”，谈不到体质上的退化。

不过，泽克所看到的却根本不是这类退化。他把他在 这里所理解的退化解释如下：

“健康的民族，倘若有了增殖的余地，那么，其增殖的速度便是不可量度的；但是当 一个民族明显地感到自己衰微了的时候，在这个民族当中便立刻冒 出一种奇怪的自我毁灭的念头。这种念头，科学还没有解释清楚，但常常观察到了”。

在这里，“种族的退化”突然被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感觉，具体地说，就是被归结为一种关于“衰落”的感觉。但是，衰退根本不一定是 体质方面的，它也可以是社会方面的。那么这样说来，“种族的退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泽克引用的是关于原始民族的例子，这种原始民族被一个优势民族所征服，陷于悲惨的从属地位，除了绝种或自杀、也就是说自我毁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可找。但是，难道人们可以把这样的绝望处境称为“种族的退化”吗？自然，佃耕者也曾经陷于类似的处境中。

泽克本人在自己的著作的以后章节里曾经指明使佃耕者完全不想生育儿女的那种可怕处境的根源。他们不是单纯为自己劳动的自由农民，而是仍然跟他们应该代替的奴隶一样，是国家和领主进行剥削的工具。领主们对于剩余产品贪得无厌，他们所掌握的、可加以剥削的劳动力愈减少，他们的贪欲就愈增长。这个时候，要想使产品数量维持原状而不减少，每一个劳动力所要提供的剩余产品就必须增多。我们从下列事实即可以看出佃耕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利：国家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佃耕者用暴力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成为中世纪农奴的先驱，不过，这是在一个具有发达的货币经济，非常缺乏金钱同时又非常缺乏劳动力的国家中的农奴。

农民是异常安土重迁的，不能轻易离开他们的营业。农民投入

他们的营业中去的劳动，不能立刻得到果实。只有将来才能完全补偿他们的劳动。他们如果抛弃他们的营业而逃往外地，那就等于放弃了未来的收获即他们的劳动的报酬。但是当佃耕者变得不得被束缚在土地上时，他们的处境必然是绝望的。因为这种束缚格外增加了他们的贫困。

关于这个问题，泽克本人在讨论纪元 322 年的一条“造孽的”法律——这条法律不仅规定把奴隶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也规定把自由的佃耕者及其子子孙孙束缚在土地上——时，也说到：

“自从法律禁止佃耕者迁徙以来，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了。即使稟性并非残忍的人，也由于这种情况而不得不剥削佃农，大领主被国家榨取得越厉害，便越要肆无忌惮地到佃农身上补偿自己的损失，……只到一百年之后，就连立法也承认奴隶和佃耕者几乎没有差别了。甚至有一方面，佃耕者的情况还要更坏一些。因为当人们向法庭提起申明，将某人宣布为自由人时，主张这个人是自己的奴隶的那个人，无论如何总得提供证明。但是，如果有争议的人仅仅是个佃耕者而有人要求将他恢复为自由人，那么，人们就否认这样的人有提起这个法律程序的权利。不过，这也是一种阻止乡村人口流失的手段，而当时的立法就把这件工作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但是，人们把佃耕者越弄得贫困不堪，佃耕者便越想摆脱贫困；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命运默然忍受，那末，他们就会由于自己的生活悲惨贫困而无法养育足够数量的子孙，以便让自己的子孙可能在长辈死亡之后补偿人口的伤亡；因为，众所周知，人民的幸福和人口的增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野蛮的游牧民族一直处于罗马的宝剑之下，并且后来作为佃耕者被迁移到帝国的荒芜田地上来，但是，荒芜田地的面积仍然与年俱增，而且向那些变穷了的地主们征收赋税——这对于军队与政府的生活必需品是必不可少的——也日益困难起来。”（第 2 卷，第 334—335 页）

在这里，当泽克不去作理论的说明而必须描述事实时，“种族的退化”就不再起作用了，只有经济成分还表现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既然剥削继续向前发展，那么即使人们将剥削的方法作某种改变，也丝毫无济于事。罗马帝国居民的日益减少和贫困化，是不可避免的。

泽克在其著作的第一卷(第 345 页)中写道：

“在奥古斯都治下，罗马每日需用的给养是 14,000 公石小麦，而在塞维鲁治下就只还需要 6,000 公石了。因此，罗马的人口在两个世纪中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城的居民估计约有一百万。因此在塞维鲁皇帝时代(公元 193—235 年)，罗马城的居民可能总共有五十万。

再过三个世纪以后，在尤斯提安(527—565 年)治下，据格利高洛维尤斯的估计，罗马城的居民仅仅剩下三十至四十万人了，而且路多·哈特曼(Ludo Hartmann)还说这个估计“大约过于偏高了。”(《意大利的王国》〔«Das italienische Königreich»〕，第 1 卷，1817 年莱比锡版，第 406 页)

罗马帝国的经济崩溃，日益逼近，它的政治崩溃也就因而日益逼近。国家的整个存亡完全依赖于其军队的优势。但人口不断减少，财富日益枯竭，军事优势又焉能持久？

早在人口减少和国家贫困尚未引人注目之前，在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光辉灿烂的时期中，那支昔日参加过罗马人最光荣的斗争的市民军队就早已开始腐败了。

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中的市民群众，无论是穷的还是富的，由于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并有在辽阔帝国内进行剥削得来的大量财富，而过着无所事事的奢侈生活，这就既使他们的战斗意志丧失殆尽，同样也使他们对社会的现实感泯灭无遗。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的情况也和雅典的完全一样。

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剥削国家，除此而外，占统治地位的市民阶级就再没有什么别的打算。市民中的无产者，出卖自己的投票权，世袭贵族和金融贵族，收买选票，以期当选为官吏，可以用官吏的身分在各省敲榨勒索。乡村居民对于把自己压榨苦了的国家，自然就

丝毫不感兴趣了。

当罗马帝国皇帝作为全国最高的剥削者亲自代替罗马的市民阶级，派遣自己的官吏料理国家的剥削活动时，当贫困的后果到处（甚至也在剥削阶级那里）日益表现出来，而领主日益替自己必须向之交税的国家从事剥削而不是通过国家为自己本身从事剥削时，上述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未有所改善。因此，即使在统治阶级那里，对于国家的兴趣也完全消失了。

再没有人想到为国捐躯了。在罗马帝国以前，共和国存在的最后一个世纪，绝大部分市民已经逃避了兵役，在此以前，每个人都曾不惜自费去服兵役，把服兵役视为理所当然的义务。但这时，要想在经营生计之外，兼带着服兵役也越来越不可能了。因为，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进行战争的边疆地区离开帝国的中心越来越远，引起战争纠纷的机缘越来越多了。只有军饷和对战利品的渴望还能打动一部分市民的心，叫他们去服兵役。大部分市民则始终不羡慕这些东西。必须在帝国以外从好战的野蛮民族中去招募愈来愈多的雇佣兵，以便进行征战并防御这些贫穷而强悍的邻邦民族对边疆的袭击，因为旨在劫掠的入侵者指望从寇边中会得到丰富的战利品。

罗马帝国在被野蛮民族主要是日耳曼民族的侵袭完全崩溃之前，它的农业与军队已经依靠了它们二百年之久。在还没有因此而从外部引起国家灭亡时，国内的一切政治生活已经完全陷于停顿；沉溺于享乐生活的统治民族，在国家管理上丧失了一切力量和兴趣。经国大事也由最高军事统帅们来处理，而他们的主要活动只在于维持日趋僵化的经济生活，以便给雇佣兵提供薪饷。

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绝望的情绪日益加深：一方面，穷人们不愿意生育儿女，因为等待着他们子女的没有别的，只有极度的苦难；另一方面，那些过着享乐生活的人们，则盼望不要生出不愉快的性爱果实，来困扰自己的爱情享乐；人们得过且过，普遍地厌倦生活，甚至过着享乐生活的人们也是情绪沮丧，意志颓废——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理解的。

泽克正确地认为：

“许多基督教徒要求殉难的那种热情，归根到底，大概也同样是出于那种普遍的生活厌倦。”（第1卷，第387页）

但是，这种生活厌倦的最终原因，我们“从一种科学还没有解释清楚”的“奇怪的自我毁灭念头”中是找不到的，而勿宁要从社会状况中去寻找。这种社会状况是一种将国家元气消耗殆尽的、对广大群众长期进行的剥削的后果，而这种剥削甚至连古代城市国家所能实行的最广泛的民主制也没有办法加以控制。

第六章 古代社会主义

在古代，国家同剥削、尤其是同奴隶制，联系得非常密切，所以废除剥削，国家是办不到的，甚至连在思想上考虑一下都是不可能的。波斯战争以后，在希腊民主制有了长足进展，同时希腊城邦的许多海外殖民地也产生了新的城市国家，它们各自独立，各有特殊的制度，这时，就出现了很多极其不同的城邦制度，并出现了更多关于新国家制度的方案。什么是最好的制度这个问题，至少在民主制国家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然而，就是在最勇敢、最敏慧、最博学的希腊思想家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在希腊建立一个无任何剥削的国家的要求。这样的国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不放弃文明而回复野蛮状况，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坚持不断的剥削下去，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后当然也还是文明衰亡，复归于野蛮。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曾说过一句在我们今天时常被援引的话，即，如果织布梭能自动织布，人们便再也不需要奴隶了。（第1卷，第4章）但这并不是对机器时代的预见，而仅仅是对奴隶制的必要性的论证。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织布梭能自动织布，乃是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第五章里紧接着就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另外一些人天生就是主人，就象灵魂天生支配肉体，男人天生支配女人一样。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保守的现实哲学家，他并不想超出现状。然而，在他以前，希腊的哲学泰斗，不是写过一部独特的论国家的书，颂扬共产主义，提出共产主义国家的理想吗？

毫无疑问，柏拉图在其论国家的书中颂扬过共产主义，然而，他决没有提出共产主义国家的理想，因为我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对全体居民一律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柏拉图连想都没有想到。在他的国家中，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奴隶主，另一个是被统治的劳动者。而柏拉图仅仅要求对奴隶主、对国家中的极少数人实行共产主义。

柏拉图为了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利益，仅仅要求对奴隶主实行共产主义，旨在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消除他们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只有奴隶主阶级使他感到兴趣，只有奴隶主阶级的组织是他专门讨论的课题。

关于农民和手工工人，他仅仅是顺便谈到，他没有必要为他们提出什么方案。显然，他们应该一切如故。这大概也就是他在这部书中根本没有谈奴隶制的一个原因。他有过一句话，表示反对一些希腊人把自己在战争中俘获的另一些希腊人弄成奴隶，（第5卷，第15章，第469页）从这句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他并不想废除奴隶制。对于奴役野蛮人和建立奴隶制本身，他毫无异议。

他根本不想废除奴隶制，他就象他自己的大弟子和反对者亚里士多德一样，觉得奴隶制是不可缺少的。他在他的论国家的第二部书《法律篇》（《Nomoi》）中提供了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在这部书中，他没有谈论遥远的、不可企及的国家理想，而是提出一个他倒认为可以实现的、差强人意的国家图景；他没有要求取消奴隶制，而勿宁仅仅要求改善对待奴隶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应该设法使奴隶对主人怀有善意，因为奴隶怀恨在心，就可能变得很危险。

这就是那种众所周知的、希图既无损于剥削方法的愉快方面而又能摆脱剥削方法的不愉快后果的手法。柏拉图只晓得友谊地劝告奴隶主们好好对待自己的会说话的家畜，除此而外，他再也不知道要

怎么去触动奴隶制。

有些学者，例如珀耳曼 (Pöhlmann)，一心想表示早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全部思想。当然，对于珀耳曼来说，反对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跟表述古代希腊的思想进程是同样重要的，他常常以一种极其离奇的方式，牵强附会地解释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使之成为上述那个论战目的服务。

在他的论《古希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史》(«Geschichte des antiken Kommunismus und Sozialismus», 第1卷, 1893年慕尼黑版; 第2卷, 1901年慕尼黑版)的著作中, 我们倒是的确发现他提出了许多极其有趣的证据, 证明奴隶制和“社会主义”在古希腊人的头脑里是彼此相容的, 假如人们愿意把旨在消除市民阶级内部的势将摧毁市民阶级从而粉碎国家的那些社会对立^①而作的努力, 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话。

珀耳曼谈到一篇四世纪中叶人写的讨论阿提卡人富裕的来源的传单。这位无名氏作者号召大力加强“国家的集体经济”。国家应该为商人建造国有旅舍和商店, 把他们出租给商人; 商船也要这样。不过, 国家也应该将罗梭山银矿社会主义化, 这样, “这些本来属于集体所有的生产设备就可能以一种与迄今完全不同的方式造福于人民了”。珀耳曼接着说道:

“这样长入于集体主义的组织, 这样将最重要的劳动资料由国家予以集中, 在作者看来, 尽管只是逐步实现的, 然而却是完全可靠的”。(第2卷第252—253页)

我们且看一看这种“集体主义组织”:

“作者指出, 各别的大资本家由于搜集购买到了几百个不自由的劳动者, 把他们出租到银矿上去劳动, 因而私人资本就在矿山实业中

^① 在这部著作中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引证。例如, 他将柏拉图的贵族主义倾向跟哥德的贵族主义倾向加以比拟。他所援引的证据(第1卷, 第318页)是哥德的一句格言: “唉! 你们这些人将苍天的光明火炬借给了永远失明的盲人。”可惜, 这句格言已见于席勒的《大鐘歌》。——考茨基注

大发其财。国家也应该最大规模地仿效这种实例……作者建议，国家最初只买 1,200 个奴隶——不超过迄今个别资本家有时已经占有的数字太多——，把他们租给矿坊的企业主。从每个奴隶身上每天获得一欧博洛斯的收益，就足以在五、六年之内将（奴隶的——考茨基）数目提高到 6,000 个，这样多的奴隶将会在每年生利六十塔兰特。然后，奴隶的数目就这样逐渐增多，以至最后每个雅典公民都有三个奴隶，因而全雅典会拥有一支至少是由 60,000 个人组成的劳动大军”。

由此可见，应该实行国有化的不是全部生产，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矿坊。然而，即使在矿坊中私人企业主也应该原封不动。实行国有化的，仅仅限于对人、对奴隶的占有，其规模是要使全部公民都能从奴隶劳动的剥削中获得自己起码的生活资料。

这类“生产资料国有化”，珀耳曼称为“集体主义的激进主义”和“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第 254 页），而且他庄严地宣称：

“在这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如何在民主的基础上，以某种心理学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中生长出来。”（第 258 页）

有些人在分辨外部世界各种现象时，不根据它们的整个特征，而只根据个别表面事实。在他们看来，鲸是一种鱼，因为鲸看起来同鱼很相象。正因为这样，在珀耳曼看来，凡是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他没有考虑到，现在意义上的这些名称，所指的仅仅是其中已取消了任何剥削的那些社会形态。尽管国有化被当成了一种支持和加强现存剥削类型的手段，而在我们这位古代社会主义历史著述家看来，却是纯粹的“集体主义”。

当然，《尤利斯—弗尔尼亚德》（《Jules-Verniade》）这部游历小说——珀耳曼本人称之为亚姆布罗（Jambulos）的“太阳国”——，作为古代社会主义的产物，更使珀耳曼欣喜欲狂。这部书里叙述了一个想象的逸乐国，在这个逸乐国中“树上终年结着累累的果实，就象在荷马所叙述的菲亚肯乐园中一样，土地不经耕作，即生长出不完的食物”。（第 73 页）

珀耳曼将这种幻想的寓言著作当作真实的社会主义纲领。而且因为这部著作在报道逸乐国时没有谈到奴隶,也就是说,在那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每个人都轮流捕鱼,从事手工业或艺术,料理公众事务”,所以珀耳曼便穷根究底地研究了 this 线索,得出了一个结论:

“看来,太阳国的公民似乎是按照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1875年所提出的那样的纲领组织和管理自己的共同体的”。(第75页)

从一切方面说来都是一种寓言式的纲领!

对于古希腊的思想来说,比这个纯粹童话性质的太阳国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一出名为《说道者》(«Ekklesiazusen»)的喜剧中所描写的另一个逸乐国。阿里斯多芬在这出喜剧中嘲笑了当时阿提卡无产者的种种真实意图。

在这出喜剧中,“未来社会民主国家的女预言家”,让我们用珀耳曼的原话(第290页)来说,宣称从今以后一切东西都将成为公有,没有任何人,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将需要劳动。因为从今以后一切劳动都将由奴隶来干。奴隶们愿意自找苦吃。普拉克萨戈拉(Praxagora)向女预言家的丈夫许愿道:

“奴隶耕种着田地。对您(未来国家女元首的丈夫——考茨基)来说,夕阳西下的时候,就只留下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穿戴打扮起来赴宴”。(第681、682页)

有奴隶劳动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跟古希腊的社会状况,彼此还可以在某种程度协调起来。反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剥削强制劳动者而想要保持高度文明,则是不可能的。在亚姆布罗的“太阳国”中,其所以能保持高度的文明,完全是因为,几乎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大自然都能在无须外加人力劳动的条件下给大量地产生出来。这就等于对取消奴隶制提出了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象织布梭自动织布那个条件一样,显然是不可能的。

珀耳曼诚然也还援引过若干作者,他们宣称没有天生的奴隶,说人人天生自由,只有法律和暴力才创造了奴隶。但是,当珀耳曼让这

些作者去“倡导废除奴隶制”时(第2卷,第301页),他所援引的那些话就只字也不提了。

古代的自由无产者以及基督教无产者根本没有多余的奴隶,这一点,我们在这一卷(上)第2篇第3章中就已经说明了。

消灭奴隶制,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城市国家中,只能被设想为向野蛮状态倒退。谁梦想复返自然状态,谁也就可以象挨逊教派一样,希望摆脱奴隶制,或者甚至于能够实际摆脱奴隶制,当然,挨逊教派不是居住在希腊的土地上,而是居住在巴勒斯坦,在这里犹如在整个东方,奴隶制主要是家用奴隶制,不那么以获利为目的,因而对于反对奢侈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必要的。

人们所说的古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与废除奴隶制毫不相干,而且与向更高社会形态前进的发展思想也毫不相干。古代共产主义的一切形式,不仅指简单的平分财产甚至于杀富济贫的那种最粗野的形式——珀耳曼竟说这是“无产者队伍的群众性愚蠢行动的后果”(第2卷,第358页)——,而且也指象柏拉图理想国那样精心设计出来的形式,所有这些形式,从根本上看,都是反动的或保守的,都以实行过土地公有制的过去社会为自己的范本。他们根本不愿意创造什么还没有存在的东西。柏拉图式的共产主义的原本,乃是斯巴达贵族制的军营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mus),当然这个原本是按照一位阿提卡贵族兼哲学家的需要改造过了的。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没有发挥过任何实际作用的个别哲学家的玄思冥想不谈,那末我们看到,在下层阶级的斗争中两种社会理想是活生生的起作用的:一是依靠国家,即是说依靠奴隶和被征服者的劳动来生活,另一是返回于自由的农民经营。社会改革家和社会革命家努力追求的目标,是要农民能够偿清债务或为农民创造新的生活之路,他们盼望市民阶级不要毁灭于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希望他们始终保持充分的征战能力和独立的政治地位。例如,梭伦、格拉古兄弟或犹太预言者都不过如此。但是,即使真正的变革家、“社会革命家”,也都提不出什么更高的目标。

在一些希腊城市国家中，当阶级对立发展到火热程度的时候，偶尔也发生过非常激进的社会变革。

关于这些变革，贝洛赫记载道：

“将(关于财产平等的——考茨基)理论付诸实践的尝试，毕竟不乏其例。例如，在列昂提尼，公元前423年曾经决议重新分配公民的全部土地，其结果，土地所有者投奔到叙拉古札人那里去，利用他们的帮助，把庶民及其领导人驱逐出国土^①。在萨摩司，于公元前412年，平民们在雅典人的援助之下击败了或者说驱逐了土地占有者，大伙把他们的田地和房舍瓜分了。”(第2卷，第1章，第280页)

可惜，毕歇尔误以为这样的行动就是社会主义。毕歇尔在其论《公元前143—129年不自由的劳动者的起义》(1874年法兰克福版)一书中，曾说什么叛乱奴隶的“社会主义要求”和什么“那比斯的社会主义暴政”(第118页)。在91页上，他把这种“社会主义”描述如下：

“当公元前206—192年间，暴徒那比斯在斯巴达和亚哥斯杀死富人，将教堂抢劫一空，将被杀害者的住宅、土地、妇女和儿童分配给要求自由的斯巴达国有奴隶以及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汇集过来的贱民，——而这些情况就造成了一场极其可怕的社会革命。”

如果人们可以将这样的行动说成“共产主义的”理想，那末，这毕竟只不过是农民平分财产、将一切生产者变为自由农民的理想。这种理想，跟过去的共产主义成分更重些的土地公有或人们一起吃大锅饭的制度一样，都属于我们人类走过了的那个过去时代。

至于一个尚未存在过的新社会的理想，在古代是没有的，而且在古代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一——至少不能作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指针。

^① 奥本海姆在其巨著《论国家》(1907年)中也同样提到这个事件，他正确地说明了古代无产者与现代无产者之间的明显的不同(第434页)。现今哪个资本家能设想把工人“驱逐出国土”呢？如果没有工人，资本家怎么能生活一天呢？——考茨基注

而且,所有这些农业改革和革命,连自由农民阶级的继续存在都保障不了。自由农民阶级在古代社会中无论什么地方都在走向毁灭。

亚姆布罗之流那些讲述逸乐国的童话和游历小说,并不提供什么实际目标。反之,基督教所憧憬的那个拯救当前苦难的未来国家,倒是起过巨大的作用。可是这种国家也不是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变革的结果,而是作为行奇迹的救世主的造物来期待的,这位救世主变幻出一个美妙的仙境来,在这个极乐世界的居民,不假劳作即可张口吃到飞来的鸽子,享受无穷无尽的欢乐。然而,基督教运动越是变为一种群众运动,这个理想就越从尘世所期待的东西,升华为一种天国的、我们只有将来在美好的彼岸世界才能分享的东西。

正象在贵族国家以及东方专制国家中一样,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民主国家中,哲学和阶级斗争也都创造不出一个自己应该为之而斗争的、新的社会理想。

第七篇

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第一章 工业资本主义

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日益丧失，罗马帝国越来越依赖蛮人的劳动和兵役，势所必然，到一定的时候，这些蛮人就摆脱罗马统治者的统辖与压榨，自己以主人姿态在罗马帝国境内出现。分裂成的种族是太多了，它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各自为政，它们于是就不能简单地仍然按照它们当初所见到的那个国家形式和国家规模把自己的国家继续维持下去。主要充满希腊文化的东部地区，作为拜占庭帝国，还一直苟延残喘到十五世纪，虽然一部分由于北方斯拉夫族，一部分由于东方的阿拉伯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人的进逼，领土也不断收缩，日趋狭小了。相反，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从公元三世纪起受到日耳曼入侵者的掠夺，随后就土崩瓦解，分裂成了一系列的新国家，但这些国家却又并不是处于彼此完全无关的状态。

由于日趋衰落的帝国的日渐增长的需要，以及帝国官行制度在应付这种需要上的无能，一个独立的慈善组织于是应运而生。这个组织发源于犹太人中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遭受提图斯 (Titus) 破坏之前一直保持很大的独立性，他们在受到尼布甲尼撒 (Nebukadnezar) 的第一次破坏以后的苦难年代里，由于渴望一位救世主而发展到了信仰这样一位救世主。

从根本上说，这个组织是同古代的民主政治建立在同样的思想进程上的。它之所以强大起来，是因为它让这种思想进程适应了

民主政治废墟上兴起的帝国的情势。

这个组织，也象雅典与罗马的无产者一样，希望穷人不指自己的劳动过活，而靠富人的救济为生。但是在帝政的罗马，无产的公民已不再享有什么政治权利，可以换取富人对他们生计的保证。不愿劳动的或没找到工作的穷人，只有乞食，别无生路。然而穷困越是广泛，个人乞食必定越是讨不饱肚子。只有乞丐和他们的同一流人物组成的群众组织，可以带来一些慰藉。但是这个组织的行政权却不归乞丐们自己掌握。在这个组织的成长过程中，行政权落入于一批官仔之手，这批官仔，一方面，占自由民中多数的穷人越来越要依赖他们，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获得了与有产者及国家相抗衡的势力。这个组织发展成了一个统治群众的强大机构。它独立在皇帝的官仔机构以外，自成一套，因此，长时期曾受到后者肆意的排斥，直到最后，双方愿意在牺牲群众利益的条件下，达成了一种“谅解和平”；这正象现今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它们时常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最后在牺牲消费者的条件下，联合成为一个卡特尔。

现在皇帝不但是世俗官仔的首领，也成了教会官仔的首领；不但是世俗军队的主脑，也成了“ecclesia militans”，即“战斗教会”^{*}的主脑。不过，只在东罗马帝国，国家元首始终也是教会的领袖。在西部，在日耳曼人取代帝国而建成的各个国家中，蛮人过于落后，不能象他们征服国家组织那样也征服教会组织。教会组织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再度获得了独立自主，而当它保持住了它那包括前罗马帝国整个西部地区的组织时，它相对于帝国瓦解之后兴起的各别国家的统治者，就越发占优势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教会组织是“katholisch”（天主教的、公教的），“katholisch”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意味着“无所不包的”，“普遍的”。在英国，现下这个字不但用来表示罗马天主教会，也用来表示与天主教会正好相反的、心地宽宏的观点。

* 指地上的信徒。

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国际性组织，以罗马的主教为首脑，凌驾在罗马帝国分裂而成的各个国家之上。它在知识方面也胜于蛮人，因为古代产生的一切精神财富，凡是在帝国总崩溃之后仍旧残存的，它都囊括无遗。

所以尽管民族大迁徙以后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分裂成许多单个的国家，旧教基督徒却形成一个精神上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组织上的统一体。

然而这决没有根本改变新兴国家中蕴含着的发展趋势。在基督教国家里一如在古代国家里，征服者们也成了战争贵族，他们上面以一个君主为最高首领，下面骑在广大的被征服者与被剥削者的头上。这种新的剥削制度甚至已从罗马的农奴制中找到了适应其需要的形式。

在中世纪的国家中和古代一样，除贵族和僧侣以外，商业与工业也发达起来，出现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但阶级的活动自由，其最后结局也还是屈服在以官吏和佣兵为支柱的专制暴政之下。这种情况一如从前，从前这种政治生活的颓败总是和某种经济上的颓败比肩前进的；所以用奥本海姆的话来讲（见《论国家》，第475页），基督教西方世界仿佛被囚禁到古代社会曾经陷入于其中的那个“降魔圈”里，逃脱不出来了。这个“降魔圈”曾经使每个国家迟早必然灭亡；而文明之所以能够前进，只是由于，永远还有一些民族保持自己不受国家的种种败坏性影响，依然处在国家出现前的阶段上，却已发展出了充分的知识，因而足以作为征服者来建立新的国家；它在新国家中，把前人的国家所创造的知识学问至少部分地继承下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但最后总归还要再衰落下去。

事实上，十八世纪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中有一些现象，让人们以为这些国家当时好象达到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走的下坡路口。

然而从十六世纪以来，若干国家中却也出现了一些征兆，表明降魔圈是有缺口的。这种征兆在随后几个世纪内增多了，而在十九世纪当中，完全抑制住了衰退的趋势，并且开拓了一个簇新的、根本不

同于古代的历史发展方向，尽管古代有些阶级斗争和近代的阶级斗争外表上是一致的。

使人类历史的进程发生根本变化的重大力量是工业资本。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煞费苦心，企图发现资本的物质形态，弄明白它究竟是货币呢？还是生产资料呢？或简直就是非消费性产品呢？而另一方面，它自里嘉图时代以后，在它的许多倡导者手里，主要关心的是论证资本利润与资本利息的合法性，所以它在马克思以前对于区分各种资本形式只做了很少的事情。

从马克思起，我们才严格区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工业资本，才彻底认识这些资本型式的职能和历史任务，然而直到今天有不少经济学家还一再把这些资本型式混淆起来。我们知道，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已经很古，在有记载的历史初期就有了，反之工业资本到近代方才登场。就这一点而言，大家尽可按某种意义说有古代的资本主义，却不能说有珀耳曼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这是因为生产过程的型式决定经济的性质。商业及高利贷同各样极端不同的生产方式都是可以调和的。

麦克斯·韦伯也指出这一点。但他对每一个可能有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术语抱有一种往往简直可笑的厌恶之感，所以他的表述中的术语很特别，在我们觉得并不十分恰切。例如，他讲：

“但现在西方却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而我们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它产生了别处从来未有过的种种资本主义类型、形式与趋势。全世界到处有商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座地商和外销商，有各种贷款业，有各种银行，银行所表现的职能繁多无比，但至少说和十六世纪时我们的银行的职能本质上相仿。”（《宗教社会学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第1卷，1922年杜宾根版，第6页）

韦伯进而指出，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投机者与冒险家，直到现代有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具有同样性质。

然后他说：

“但是除此而外，西方在近代却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曾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型式：（形式上的）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第7页）^①

由上下文可知，这种资本主义型式终究和近代所特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即马克思所称的工业资本主义，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韦伯描述这种资本主义时强调了一个比较细小的特征：劳动组织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他所强调的是，各个企业都是依靠一套可以确切核定利润的严密簿记。韦伯对这一点所作的当然并不是那么平易的叙述是这样的：

“凡是资本主义赢利进行得合理的地方，其经营活动都是依靠资本核算，即是说，在这些地方，可以作为营利手段的那些有用的人力和物力，都得到了这样一种计划使用：使得各个企业的折成货币价值的资产在决算时按收支对照表计算的最终收益的估定价（或者说，一个连续经营的企业的折成货币价值的资产的定期结算的估定值）能够超过（因之，就持续企业而言，一再超过）‘资本’，亦即超过那用于交易营利的物力营利手段按收支对照表所作的估定值。”（第4,5页）

那么，资本核算的合理化（这不是指现今所说的企业的合理化，企业合理化问题这里不谈。）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赖以有别于以前的各种资本形式的特别不同之处。韦伯自己说：

“资本主义和那些甚至也包含有尚无不可的资本核算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有过。”（第6页）

近代资本主义新颖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合理化（它只不过是改进了合理化），但是可以说在于它的自由劳动的组织。韦伯极端着重这一点，自有道理。而且他还远远胜过珀耳曼等人，他晓得近代的社会主义只能够从工业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古代找不到类似的事例。比如他说：（第9页）

“确切的计算——这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只有有了自由劳动

^① 这里及后面的引文中，着重点全是韦伯本人加的。——考茨基注

才是可能的。近代西方以外的世界，正是因为没有合理的劳动组织，所以也没有合理的社会主义。诚然不错，因为世界上有了各种不同的城市经济、城市供应政策、君主们的重商主义及福利政策、定量配给、统制经济、(中国的)保护贸易主义及自由放任理论，所以世界上也就有了性质极其不同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起于家族的、起于宗教的、或起于军国主义的极其不同的共产主义，(埃及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独占卡特尔的以及消费者的极其不同的组织。但是，尽管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城市的市场特权、同业公会、基尔特、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城乡合法差别，然而由于除西方以外，别处都没有‘市民’这个概念，除近代西方以外，别处都没有‘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所以别处也都没有而且必然没有‘无产者’这个阶级，这是因为，别处都没有合理的、自由劳动组织这种企业。在世界各地，债权人阶层与债务人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土地占有者与无产者或农奴或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商业利害关系者与消费者或土地占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固然早就以各种不同的阵势，到处出现了。但是，西方中世纪就已有了的组销商与加工者之间的斗争，在世界上别的地方直到现在也只刚开始。现代的对立：大工业企业家和自由雇佣工人的对立，则完全没有。现代社会主义所遇到的那一类的问题，因而也就根本不会有”。(第9页)

所有这些话都很正确，而且重要之至。不过同时，若干极其重要的观点却被忽略了。

自由劳动确实为现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使自由劳动获得此种重要性的既不是商业，也不是高利贷。商人或高利贷者或者银行业者那里的劳动方式，是由当时的生产过程中盛行的劳动方式决定的，并非前者决定后者。这种人既可以使用雇佣工人，也一样可以使用奴隶或农奴。只因为“合理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组织”打入了生产过程，这种类型的自由劳动组织才成为在社会中盛行的、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及其内部斗争与目标的一种组织。

事实上，韦伯除了提出“现代的对立：大工业企业与自由雇佣劳

动”以外，再也不懂得如何更好地说明现代型式的劳动的特征了。

这个涉及到了生产方式的重要论点，在韦伯给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定义“合理资本主义的自由形式上的自由劳动组织”中，没有包含进去。这个组织之打入工业中去，是起决定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特别标志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色。因此我们认为宜于按照马克思的作法，把现代资本主义看作工业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与单只含有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古代及东方的资本主义形式对置起来。

另一方面，韦伯一谈自由劳动的组织，就把一个给整个事件打上资本主义印记的重大环节忽略过去。韦伯在“自由”一词前面用括号附加的“形式上的”一词，只是很不完全地对这个环节作了点暗示。这个词的含义用在这里是不正确的。

现代的劳动者实在是自由的，并不单单是形式上自由而已。他的自由所以显得仅是形式上的，乃是因为他无产。假如用“无产的”一词，代替“形式上的”一词，附加到自由那个字前面，那就比较得当了。正是因为自由劳动者不占有他为了可以劳动和生存而必需的生产资料，正是因为这种生产资料为别人所占有，而别人因而成了资本家，所以劳动者才被搞得依附于资本家，才不得不为资本家劳动，如果他的劳动还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带来利润的话。工业资本家觉得，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利润这件事，比起全部业务经营的“精密计算”、比起计算出来的赢利结果更重要得多，更有决定性意义得多。

并不是单单计算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方法，而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方法，赋予了工业资本万分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正是这些创造利润的方法，才使工业资本能够突破过去一直囚禁着国家及其文明的那个“降魔圈”。

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

我们至今所知的种种剥削方法，虽然曾给国家，就是说给它的统

治阶级，暂时带来财富方面、艺术方面以及科学方面往往极其辉煌的繁荣昌盛，但所有这些方法都使国家在经济方面最终趋于衰落与毁灭。

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情况的起源归根到底就在于这些剥削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以奢侈浪费为基础的，并且都是为奢侈浪费服务的。

掠夺者不顾被掠夺者的下场如何，把受掠夺的牺牲者的一切财产，凡是合乎自己心意的，统统据为己有，从而积聚起自己的财富。其后果则可能是被掠夺者的经济生计和肉体生存完全毁灭，遭受掠夺的地带整个被破坏，成为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

此种“杀鸡取蛋”的方法终于为另一种方法所替代，新方法是给被征服者留下他继续生活和劳动所必需的东西，而只拿去他所生产的超出这个限度以外的东西，即剩余产品，或者就商品生产而言，只拿去除了养活劳动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产品以外的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剥削固然可以长久继续下去，然而妨害着被剥削者在技术上的任何进步，因为除了养活被剥削者自身及亲属所必需的物品以外，就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东西。至于留给奴隶的，则连这么多都没有。奴隶通常是沒有可能建立家庭的。

徭役劳动者们过于贫困了，以致不能改进他们在劳动中所用的技术工具。奴隶们则是一批滿腹怨恨的劳动者，因此人们不敢把精巧的工具交给他们。

剥削者们拥有财富，虽然有资金可以采用适宜于生产的工具与方法，而且凭借他们所促进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也能够设想出这类有利的办法，但是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一切生产、一切经济活动，在东方国家及古代国家的状况下只是为消费、为享乐服务的。君主们在国家里进行剥削并力求尽可能不断提高剥削，仅仅是为了获得、享受和挥霍更多的消费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成果的技术进步，即使偶而对被剥削者的操作有所改进，这也不过是一些附带的事情，并且这种改善和进步同剥削者的文化发展比起来是极其不够

的。浪费劳动力是这些君主的经济手段(不是奥本海姆所说的那种手段),浪费产品是他们的经济目的。这一种浪费,以及其它一切连续不断、挥霍无度和增长不已的浪费,纵然暂时给我们虚构出一幅幸福繁荣的图景,但最后结果,无非是一个破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完全不同。我们可以从下述事实里找出其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上头一个不从强制劳动而从自由劳动取得剩余价值的剥削方法。同时,工业资本家仍然能象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者浪费奴隶和农奴劳动力那样,浪费受其剥削的人们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者,为了提高剥削程度,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除了浪费劳动力这种方法之外,再也知道任何其它方法。工业资本家则在这种方法之外,还有另一种方法可用。这种方法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被日益广泛地使用起来,正是这种方法给历史造成一个崭新的转折。

我们同样应该将这种情况的认识归功于马克思,归功于他对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所作的辉煌的分析,这种分析在一切不懂他的价值学说的人看来,自然是毫不重要的。

马克思区别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最简单、最近便的形式就是绝对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式。假定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费用是某一个确定的数量,那么绝对剩余价值就是这样获得的:劳动者除了为生产这笔生活费用的补偿物所必要的劳动以外,还被迫为雇佣他的资本家进行一段额外时间的劳动。劳动者的这种额外劳动时间越长,他所生产的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如果产品数量随时间相应地增长的话,但事实上不尽如此)就越多。

另一方面,削减工人所得工资的价值总量,也可以扩大剩余价值。资本家直截了当地把工资压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积累剩余价值的方法谈得不多。他之所以谈得不多,一来是由于在《资本论》里他作为理论家只研究重大的法则,因此

沒去考虑价格波动的偶然情况,而且,他在进行研究时有这样一条假定:商品都是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因而工资也是与劳动力的价值符合的。

然而,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所以仅只偶而讨论到资本家竭力要削减工资,而与此相反,详细地讨论了资本家竭力要延长劳动时间,这却并不是仅仅出于理论性的考虑。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大多带有地方性质,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沒有多大帮助。相反,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则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获得了全国性的意义,成为联合雇佣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手段。法定最低工资至今仍是理论上无知的工人人们的实际毫无意义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大多数国家中根本沒有提出来。反之,国家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则已经成为战斗无产阶级实际上最重要的阵地,全世界的无产者都同心一致地集结到他们共同占领了并且决心以最顽强的精神加以维护的这个阵地上来。

可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走到这个地步。在资本主义初期,远远谈不到限制劳动时间,倒不如说,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工资是当时增加利润的最重要的手段:这就是说,增加利润是依靠浪费劳动力,而这恰恰象古代以及东方迄至今日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用的办法一样。

然而,延长劳动时间和压低工资是有限度的。在对工人有利的情况下,这种限度很快就表现出来了。

于是即在工人数目一样多,而且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扩大剩余价值的新方法,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而并不减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这种方法虽然在古代并不能使用,或者说几乎等于不能使用,此时却能够无限制地加以应用和扩充。这种相对剩余价值方法获得了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与以前的剥削方式的分水岭。这种方法就是在生产和运输方面通过技术改进、和采用节省劳动力的工具、机器、进步方法,来降低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生活费用,这样,工人在实际工资不变,亦即生活费用不变的情况下,为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花费的劳动就少些

了；这样，尽管工作日的长度不变，工人却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剩余价值。

这个发展过程的原动力是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指挥着以最少的成本花费为市场进行生产的生产者。一切同类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上，在同一段时间，都是同一个价格。利润是由超过成本的那部分多余的收益构成的。因此，凡是对每个工人支付最低工资、实施最长劳动时间——只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会因而受到损失——的人们，就能提高利润。但是，凡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应用最有效的工具、机器、方法，因而以同样费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的人们，也都能提高利润。

资本家在实行这样一些改革的时候，所考虑的只是他的超额利润。然而通过这些改进，他却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如果他的技术改革收到了实效，那末，竞争就会迫使同一生产部门中的其他资本家也来模仿和推广这些改革。这就要造成价格的下降，而首先实行这种改革的企业主就再也得不到超额利润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新的改革才会给他带来新的超额利润。

但生产费用的下降是持续不断的，因而价格的下降也是持续不断的。如果这些价格下降的产品，从品种上说都是工人所消费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也就会降低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费用。于是，在劳动时间不变，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就减少，而为资本家干活的时间则延长了。这时，在世界史上，就破天荒第一次有可能不延长劳动时间或不降低工人生活标准而增加剥削了。这个思想，凡是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人都是十分了解的。我所以在这里重述这个思想，只是因为我不敢假定本书的所有读者都熟悉《资本论》。

这里只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应该预先谈一下。人们可能觉得，随着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费用的降低，实际工资即使不变，货币工资却必定会降低。但在最近几个世纪，货币工资一般说来表现出上升的趋势，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在本书的论述中,为便于理解起见,谈了价格。马克思所讲的是价值与劳动量。他说,劳动力的价值一降低,生产工人及其家属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就减少。

不过,价值与价格决不是一个东西,即使在二者大小相等这种例外情况下,也不是一个东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与价值也仍然不同,这是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某一特定时刻,一种商品的价格的高低,不仅以这种商品的价值及市场状况为转移,而且也以那种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金属——在现今通常是黄金——在当时的价值为转移。纸币决不能充当价值尺度。纸币本身的价值是按黄金来衡量的。

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了,而同时由于技术的改进或由于发现新的丰富的金矿,黄金的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减低了,则商品价值和黄金的价值就会按同样的比例减少,而这无非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就保持不变。即使商品的价值下降了,而如果黄金的生产费用回跌得更快,商品的价格也会上升。

这种观点,是我们在比较各时期的货币工资与价格时不可忽略的。

如果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货币工资不曾下降,这也决不会因而就证明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减少。

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同时,实际工资尤其是货币工资也还能够增长。在工作日中劳动时间保持不动的条件下,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为生产他的工资补偿品所必要的价值而做的劳动时间可以减少,但同时他的劳动生产力却可以大大地增长,以致即使在减少了他实际为自己而进行生产的那种劳动时间时,在这段时间内他制造出来的东西也比实行技术改进以前所生产的更多。他在产品总量中所分有的成分可能有所下降,但产品总量本身却可能增长得更快,因而他所分有的那一部分的数量也跟着增长。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中以互相消长的强度同时都起作用。然而一般说来，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趋势占有优势。

如果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剥削制度，它最终不是造成它现有的生产力趋于萎缩，反而是使之有所提高，而且提高得日益迅速；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归因于相对剩余价值。到了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并不一定陷入停滞和贫困，以至最后不得不屈服于掠夺成性的蛮人的优势之下，而毋宁是在自身中蕴藏着日趋完善的萌芽。

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章 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工业资本主义以什么为特点，它给人类历史带来什么新的要素。但是我们还得说明这种新要素是由哪里来的，以及工业资本主义本身是从何处产生的。

我们不能认为工业资本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以前各种形式的继续发展。

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不曾在任何地方反对过工业资本主义剥削方法的前驱——封建主和奴隶主的剥削方法，而毋宁是为它们效劳，从它们那里取得自己的力量，突出自己的作用。

商业资本是随着大剥削者的奢侈与浪费而繁荣发达的。同样，高利贷资本也是从这些因素中，即从战争的浪费以及享乐生活的浪费中，取得巨大利润。另一方面，高利贷资本由于从被剥削者那里榨取高利贷利息，就使剥削者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紧紧地寄生在它上面，使它变为贫困的。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血、破坏着它的神经，并强迫再生产在日益悲惨的条件下前进。”（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922年2月，德文第六版，第135页）*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4页。

这和工业资本的作用正相反。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工业资本初期也还常常跟封建主和好战君主携手合作，以与工业资本相对抗。只是后来工业资本取得了优势，开始利用商业与生息资本为自己服务，这两种资本才相应地改变了性质，并与工业资本一道对发展生产力发挥作用。

工业资本发达起来时的情况，也都已由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著名的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即“所谓原始积累”的那一章里阐明了。

原始积累是由于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大批地与其生产资料分离而造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可以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自由占有者，或至少也是自己的劳动工具的自由占有者，尽管他并不总是原料的自由占有者，而原料大抵说来是很不重要的。如果他不是自由民，那么他就或者作为奴隶而自己被当成生产资料，或者作为纳租劳动者保留着对其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虽然是在领主的统辖权力之下。领主夺去他的一部分产品，使用他的一部分劳动力，但容许他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当然这就意味着：领主不关心这些生产资料的性状，而纳租农民也没有财力改进生产工具，因为他除了养活自己所迫切需要的产品以外，一切剩余产品都被夺去了。至于奴隶，对待工具的态度也很不好，以致人们不会考虑把较好的工具交到奴隶手中。

除了这两种不同的劳动者之外，自然还有无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这些人必须受雇，当雇佣工人，在一些希腊国家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大多数是在拥有大地产的国家中，从事农业劳动，甚至当佃农或小农，经营自己的某些农业。他们在工业中没有起过任何作用。即使在农业中，他们也只是在一些国家、即落后国家中起过作用。

在十五世纪以来的原始积累时代，大部分农民被弄成无产者，作为自由劳动者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改进工具的手段和要求。

起初这些自由劳动者企图在大地产的占有者、即恰恰是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的那些人那里从事农业劳动。这一种雇佣劳动，还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如上所见，它在古代，虽然只是零星出现，不象在近代一些欧洲国家里那样广泛，却毕竟是古已有之。

但这时出现了拥有工业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这是一种新事物。在古代，那些想通过某种工业迅速致富的有钱人，总是购买奴隶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在近代欧洲，他们找不到奴隶了，但他们却找得到大批无产的劳动者。这些人不可能全都从事农业，而行会手工业又排斥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奔向工业资本家，谋求雇佣劳动。

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这些自由的工业雇佣工人，就构成了新生产方式最主要的特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这时兴盛起来，并且随即要使国家和社会发生变革。

资本家和所有的剥削者一样，也雇用劳动者，以便靠他们所生产的、超出他们生活费用以外的剩余产品来生活。若要工人提供的剩余产品总量足以让他过着舒适的生活，就必须经常有比较大量的工人受他的剥削。这批比较大量的工人并不必定都集中在一个劳动场所。工业资本进行剥削的最原始的形式之一，是对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剥削，因而劳动者都是分散在许多作业场所上的。

但是把工人集中在一个较大的劳动场所，却显得是最合算的。因此，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工业部门，即使不是一开始就非集中不可，迟早也都要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劳动场所。

家庭手工业劳动者的单独劳动，同我们将同样详细讨论的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比较起来，是一种技术上的倒退。

只有大企业才成为工业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者还自己占有他自己的极其简陋而由于穷困又无力改进的劳动工具。他所缺少的，是劳动对象，即资本家给他提供的原料。

反之，在大企业中，工人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了。资本家拥有劳动对象，同样也拥有劳动工具。这时劳动工具是掌握在富人手里，他们拥有改进劳动工具的必要的资金，也具有改进劳动工具的兴趣。

人们终于敢把奴隶会加以破坏的那种精致的工具交给自由劳动者了。

我们在这里如果详细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原始积累问题，将是不合适的。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资本论》。

我们在这里只研讨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当初本是对马克思的阐述的一个补充或一个反驳。这就是麦克斯·韦伯提出来并且经他既透辟而又渊博地予以发挥了的那个思想。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预先讨论一些以后才有必要阐发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等到以后才讨论韦伯的种种思想，那就会过分打乱我们的叙述。因此，现在我们就把它们提出来。

在原始积累时代，原始资本主义的各种要素已经形成了，一方面是少数人手中拥有大量财富，另一方面是大批无产者寻找工作。最后，也开始出现了较高的技术，改善了的工具，甚至在采矿的时候已经使用了机器。

然而，这一些仅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要素。要掌握这些要素，使它们彼此结合起来，活动起来，还需要有一种新的精神，在无产者那里需要它，在必须把生产过程置于新基础之上的资本家那里，更加需要它。

麦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篇透辟而博学的论文中曾指出了这一点。（《宗教社会学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第1卷，1922年杜宾根版，第17—206页）

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事实：一般说来，工业资本主义之进入新教地区比进入旧教地区更早。特别是加尔文派，对于发扬资本主义精神出力最大，时间最早。

他说，这种精神在有资本主义本身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精神，而不是相反。他引用本杰明·佛兰克林的话作为证明。佛兰克林这个出身于英属北美加尔文派所建立的一个殖民地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把资本主义精神刻

划得非常清楚。早在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就看得出有这种精神的踪迹，但“新英格兰殖民地则是由传教士与 Graduates (大学毕业生——考茨基) 联同一些小资产者、手工业者及 Yeomen (自由农——考茨基)，出于宗教上的理由创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文集》，第1卷，第37, 38页)

据说这是一件与“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抵触的事实。

“就这个事实来说，其中的因果关系，如果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是因果颠倒的。”

实际上，麦克斯·韦伯如果对这种因果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就会知道，值得疑虑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仅仅是“素朴的”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我们只要想到，上述因果关系所包含的那种足以摧毁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是以一套空话为基础的，我们的疑虑就可以平息一些了。如果我们应用另一套术语，把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看成是一种力求上升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这种疑虑就会立即大大减轻。

麦克斯·韦伯以佛兰克林的著作中引证了几段话，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表现。在这几段话中佛兰克林强调时间即金钱，信誉即金钱，金钱是极其重要的东西，人为了获得信誉和金钱，就必须勤勉、节制和正派。

这确乎是鼓励小资产者上升为资本家的一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只能用宗教的因素来说明吗？如果没有宗教因素，它就不会由小资产阶级所能介入的一定经济条件中衍生出来吗？

然而，一俟我们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兴起的小资产阶级精神，那个使历史唯物主义很是为难的因果关系就会自行崩溃，按这种因果关系来说，资本主义精神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出现的，并且是由它才创造出资本主义来的。

韦伯依据本杰明·佛兰克林来证明资本主义精神比资本主义本身出现得早，这个手法并不十分巧妙。一方面，佛兰克林的著作散发

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还很浓重的气味；而另一方面，这些著作也决不是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先产生的。佛兰克林和亚当·斯密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同在1790年逝世。这个时期美洲的英属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交往极其活跃，佛兰克林个人同英国和法国有着极其频繁的来往，他多次长时间在这两个国家居住。这个人的经济观点肯定不纯粹是他信仰卡尔文教派的结果。

卡尔文教派确实是大大地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只是卡尔文派的许多方面的一个方面。凡是有决心并且自觉有力量足以不仅摆脱罗马教廷的剥削、而且也摆脱君主专制的桎梏的欧洲人士，统统都集合在卡尔文派的旗帜之下。在摆脱君主专制这个问题上，卡尔文的看法与路德的看法形成很大的对立；路德只反对罗马教廷，对于君主的专制政权却极力支持。依路德的见解，君主应当代替教皇而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教会这个统治机构要完全受君主的指挥。与路德的这种见解平行，在英国建立了一种国教，它同样也奉国王为它的首脑。或者倒不如说，是国王亨利八世创立了这个教会，来增加他的权力与财力。因为教会财产如今成了国家财产，由专制君主随意支配。

从两个自由城市产生出了两个与教皇为敌的教派，它们反对一切属于教皇和国王这二大剥削者的教派——天主教、路德派以及英国的国教。这两个教派就是：苏黎支人次文利 (Zwingli) 的教派，和避居日内瓦的法国人卡尔文的教派。

只有卡尔文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意义。次文利仅仅诉诸城市市民，而卡尔文则号召一切反抗日渐增长的诸侯专制主义的人士，他不仅鼓动城市市民，而且也鼓动贵族地主，只要贵族地主还愿意为自己的独立自主而斗争，而不想充当君主的雇佣兵或朝臣，以求飞黄腾达。卡尔文本人，生性倾向贵族政治多于倾向民主政治。

由于把反叛的贵族同反叛的市民联合起来，卡尔文派在很多国家中便获得了雄厚的势力，例如，在法国、荷兰、苏格兰、在哈布斯堡王室的一些地区（下奥地利及上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就是如

此。

当然，在贵族不可避免地趋于没落因而市民阶级孤军无援，抵抗力量不足的时候，也曾在上述一系列地区出现过新教的失败。但在匈牙利则不然，因为匈牙利在经济上十分落后，所以那里的贵族还懂得设法保持他们的独立自主。在荷兰和苏格兰也不然，因为这两个地方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势力。在英格兰也不然，英格兰的资产阶级自始就十分强大，不仅能够反对国王和教皇，也能够反对贵族，因而那里的卡尔文派就采取了清教的形式，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

但是这种情况决非到处都是如此。同一个卡尔文教义，因其信徒们的阶级状况不同，既可以带有资本主义的特色，同样也可以带有封建的特色。因此，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根苗并不是很茁壮的。

韦伯以最坚定的态度强调说，“一定的宗教思想内容……完全在自身中包含有自己固有的规律性与强制力。”（第192页）

奇怪的是，宗教的这种固有的规律性竟如此地照顾信徒们的阶级状况。

不可否认，清教大大促进了荷兰、英国以及后来英属北美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为这个事实提出了大量的证明。他的论述有极高的价值。但是，他的论述并没有证明新的经济观点都是按固有的规律从宗教思想本身生长出来的，也没有证明宗教观念是这样一种新事物，它以自律的运动越过古代社会与东方社会而突入于中古社会，从而产生出了在古代或东方的基础上不可能有的工业资本主义。

创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完全是另外一些因素。

第四章 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

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各个国家的发展过程，看来好象是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一再反复并且一再由这同一点出发：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

服活动。国家一俟建立起来，便开始在文明上昌盛起来，但在若干时期之后，就开始衰落下去，无力保卫自己，成为邻近的、粗野的、贫穷而有力的蛮人的掠夺对象，而这些蛮人，在新的国家中作为贵族重新开演刚刚完结的戏。

但任何国家都不会消失得一干二净，毫无踪迹可寻。每个国家都留下了某种自己在鼎盛时代所发展起来的文化浸剂，尽管非常稀薄。这种浸剂和鼎盛时代华彩四溢的成果比起来不管多么可怜，却滋养了入侵的蛮人及其所建立的贵族制。一个新国家通常是在比自己的前驱更高的阶段上开始形成的。那种在表面上好象是循环的现象，如果加以仔细考察，实际上常常是上升的螺旋曲线。

因此，那些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国家的蛮人，也得到了罗马帝国遗留给他们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大大促进了他们的文明昌盛。

但是，和以前的国家相反，这些被继承下来的条件，这一次，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仅使那种有规律的循环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复而已，有时还起更多的作用。当然，那些征服了古罗马帝国东部和南部，用新的文明建立了新的国家的阿拉伯人，只能重新完成一种兴盛与衰落的循环。

在日耳曼蛮族于罗马帝国西部和北部建立和扩张出来的那些国家中，情况就不同了。这里促进发展的那些历史、地理条件，使国家发展的轨道从一种循环或螺旋曲线变为朝一定方向不断前进的轨道，至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是这样。

日耳曼各国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遗产是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把希腊罗马文明在民族大迁徙时代遗留下的那种稀薄浸剂，保存起来了。基督教会自始就赋予各个新国家的文明以自己的特色。它尽管是过去的一种遗产，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各国中毕竟获得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把天主教教士与东方祭司区别开来，而且把他们与古代希腊罗马祭司区别开来。古希腊罗马的祭司从来没有力量。东方祭司则常常在国家中取得巨大的实力，是国

家政权的工具，有时也是国家政权的主人。然而，这两种祭司都是国家的，即是说，他们的势力都不越出个别国家的领域。

反之，在天主教会中我们则看到这样一种教士组织，这种组织高过于各蛮族国家在罗马帝国的官行专制下所承继的国家机构，这不仅是因为天主教的教士组织纪律严格，行动集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组织包括了一整系列的国家。这样一个国际的、强有力的和由中央集中领导的团体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些极端重要的新现象，使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国家生活不同于古代和东方的国家生活，天主教的教士组织就是其中之一。佛教与回教的确也是包括许多国家的国际性宗教，然而它们却没有一个国际的、由中央管辖的、因而能够比国王和皇帝更有势力的严密教士组织。

由于这种情况，当时聚集在教会中的知识分子就获得了一种影响国家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他们在军事贵族独裁统治时期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的。通过这些知识分子，各个基督教国家在商业方面和精神方面也保持着一种远比在各国完全独立自主时更加密切的关系。

罗马帝国的另一宗遗产，就是奴隶制的废除。这件事情比教会的国际性还更加重要。

奴隶制并不是基督徒使之结束的。直到上一世纪，基督教与奴隶制还非常谐调。直到上一世纪中叶以后，拥护和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一切虔诚的基督徒都还是奴隶制的拥护者。反之，非基督徒、自由思想家们则几乎全都站在相反的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奴隶制在衰落的罗马帝国何以越来越无利可图，何以不得不代之以另一种强制劳动的方法，即野蛮民族后来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的那种隶农制的方法。

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兴起的各个日耳曼蛮族国家，不久便发生了曾在罗马帝国导致奴隶制衰退的那些原因。自从阿拉伯人开始民族迁徙以来，他们的推进逼迫了基督徒。他们俘虏的基督徒比

基督徒俘虏他们的更多。因此，在他们那里奴隶买卖又兴旺起来。他们的这种买卖所以兴盛，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们和非洲中部离得很近，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捕捉奴隶的富饶地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把奴隶用于营利目的始终还是无利可图的。

当然，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许多战争也能提供大量战俘，因而能提供大量奴隶。基督教并不制止人们这样做。它不仅不谴责奴隶制，而且从来也不指责基督徒主人占有基督徒奴隶。

罗伯逊由柏克所著《西班牙史》中引证了以下一句论西哥特王国西班牙主教们的话：

“主教是王国中最大的奴隶主之一，买入的基督徒被圣保罗和圣雅各的门徒毫不赧颜地买来卖去。”（《国家的演变》，第119页）

然而，教会毕竟不喜欢看到基督徒做奴隶——受教会自身剥削的基督徒除外。教会既然具有国际性，这就必然使它在两个基督教国家发生战争时反对把战俘当成奴隶，因为双方的战士都是属于教会的人。罗伯逊在这里看到有一种直接的经济利害起着作用：

“教会所以促进（废除奴隶制）这一过程，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是因为自由的信徒比奴隶信徒——教会自身占有的奴隶除外——对教会更有利可图。人们可以要求自由人向教士交纳租税，而奴隶则根本无法交纳租税，除非数量极少。”（《国家的演变》，第215页）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不利于蓄养奴隶，那就是，新兴国家的人口稀少，以及它们的田野之间遍布着许多茂密的森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奴隶和当地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都讲这个种族的语言，他就会轻而易举地逃掉。

人们要想笼络住一个强制劳动者，就必须给他配备一块足以维持他一个家庭的耕地。这样，他就比较容易束缚在土地上。况且在当时，土地本来就有多余的，而人口则很稀少。

在罗马帝国时代曾使奴隶制趋于衰落并导致隶农制来代替奴隶制的那些强大动因，在中世纪也迫使强制劳动只能采取隶农制的形

式,迫使奴隶制始终只是一种例外的现象,奴隶制虽然从来都没有根本废除,但在经济上是丝毫不起作用的。

对于广大乡村说来,对于农业地区说来,由于这些地区早在古代,特别是在东方,农民家庭的徭役劳动就已经时常超过买来的奴隶的徭役劳动,所以上述情况并没有造成什么显著的差别。

然而它却造成了中世纪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巨大差别。在古代城市中,奴隶制通常起着突出的作用。反之,中世纪的城市,则自始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经济活动建立在自由劳动上的。

但这并不是中世纪西方城市与各种古代城市的唯一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是同统治阶级亦即由胜利的蛮人形成的军事贵族的独特定居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独特的定居方式,乃是内地道路崎岖、交通工具缺乏、农业劳动生产力薄弱和自然经济存在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领主们不能联合成为巨大的军事阵营,从而统治国家领土,进行剥削。每个领主都必须带着他的扈从住在给他纳租税和服徭役的农民们中间。

领主为了自卫并使他的村落不受好战的游牧民族或附近掠夺成性的贵族们的侵袭,就在他居住的地方筑起防御工事,在紧急情况下,他的佃户也可以到里面避难。随着农业劳动的收益的增长,领主可以用来满足其个人目的的劳动力的数量也就增多起来。于是,他就有办法把他的住处修建得越来越坚固,终于成为一个城堡。

城堡建在丘陵上,村落位于丘陵脚下。

不少村落处于有利的位置,例如,在通商要道上,特别是在通商要道的交叉点上。意大利的贸易甚至在罗马衰亡后最黑暗的时代里也从来没有完全停顿过,而且一方面由那里向东方发展,另一方面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在那个时期,它的贸易主要成了内陆贸易;在古代时,曾经主要是海上贸易。

有些地点,由于不时地有大批携带货物过路的和前来兜售的商人聚集在这里,于是不久也就招来了大量不靠农业为生,或者说主要

不是靠农业为生，而是靠商品贸易、运输业、旅店业，最后还靠生产商品为生的居民。

在这样的村落里，除了一些前来参加农业活动的外地的、过往人口以外，当地定居的人口，越来越不从事农业了，因此农业的重要性就一天比一天减少。

这样的地方，既然蕴藏着大批财富，不久就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诱使私人或由国家组织起来的劫掠者对它们抱有觊觎心理。另一方面，随着它们人口的增长，附近的城堡越来越没有能力来保护它们的全部居民及其财产，使之免受侵袭。但是这时候，人数众多而财力充足的居民，自己却也有了力量，能够建筑围墙进行自卫了。他们或者把城堡以外的村落圈围起来，或者把这些村落连同城堡一起都圈围起来，于是由于有了这种围墙，这样的地方就变成为城市。

所以，中世纪城市产生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东方大河流域城市产生的方式，而且也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城市产生的方式不同。至少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形成起来的。但意大利不是如此。意大利的地势及交通情况，始终有利于建立古代样式的城邦。而且在意大利，古代城市也从来没有完全绝迹。在蛮族入侵之后形成起来的意大利土地贵族，不久就觉得住在孤独的城堡中既不舒适，也不利于经营自己的业务，于是就迁移到邻近的城市来挥霍他们的地租。他们也象古代就曾做过的那样，在城市里建造起城堡，定居下来。他们也象孟泰契家族与卡普莱提家族那样，在城市中以斗殴来解决他们家族之间的冤仇。那两个家族解决家仇的办法，曾使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人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

我们在意大利也看到一些城邦，象古代商业城邦一样拥有强大的势力和范围。沿海城市威尼斯就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

阿尔卑斯山北面的情况则迥然不同。那里的贵族在整个中世纪一直住在城市之外。当然，这些城市也还都是在一个城堡领主的管辖之下，依附着城堡形成起来的。而且城市居民这时由“城堡”(Burg)一词得到了“市民”(Bürger)这个称号，这个名称原来是人们用以称

呼那些负有保卫城堡的义务的人们的。

但是，同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的迅速增长比较起来，城堡领主在城市中的势力不久就迅速地下降了。对城堡领主负有服役义务的市民，不久就能够出钱赎免这种义务，有时就干脆拒绝这种义务，而城堡领主却无法强制他们。

因为这时不再有买来的奴隶，所以全部城市居民中不复存在任何类型的不自由劳动了。不自由的劳动在城市里被根本排除了。这可以说是国家里的一种全新的现象。

最后，城堡领主对于整个城市行政根本没有发言权了。城市于是有了自己的法庭、警察和自治机关。

这是中世纪城市完全不同于东方城市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中世纪城市是与古代城市相同的。但是中世纪城市与古代城市（正象与东方城市一样）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中世纪城市纯然是自由市民的城市，它没有不自由劳动者，但也没有战争贵族，至少在意大利以外是如此。

贵族和非贵族的市民在古代城市以内进行的那些阶级斗争，在中世纪具有了城市与居住在城市以外的骑士的斗争的性质。

当然，在城市以内，也还有阶级斗争，如手工业者与商人之间的阶级斗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Patriziat”，即城市贵族，他们是从后来发展成为城市的那些村落中的原来的地主发展出来的。他们和以后迁移到城市里来的人们相比，具有而且长期保持着一种优势地位。然而他们不算是地道的贵族，贵族也不把他们视为和自己有同等身分的人。

一般说来，在中世纪，也如同在古代一样，城市里的民主政治，是一天一天向前推进的。但是其间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古代城市中，贵族虽然不能单独地进行统治，却几乎到处都始终是统治阶级，当然，在一个民主的共同体中只是受全体市民委托的统治阶级。反之，在中世纪，贵族自始就不属于城市，中世纪城市的管理工作是在没有贵族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贵族对城市事务不但不比市民了解

得好些，而毋宁他们根本不懂并且也不希望懂得某种事情。

贵族与城市的这种完全分离，意味着市民的一种巨大的独立性。然而这种独立性却削弱了城市的势力。在古代，贵族同市民在城市中一起生活，双方可以通力协作争取实现共同的目标，比如说，一起来掳取战俘和奴役其它城市及其居民等等。对其他城市的人民进行剝削，市民和贵族是都有份儿的。这种剝削在好些得胜的城市里竟发展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至市民们觉得让奴隶、被征服者和外地移来的居民在城市中进行生产活动，而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用在军事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的。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能产生出以罗马帝国为顶峰的那些强大的古代城邦。在中世纪，多少可以和这些城邦相比的，只有业已提到的威尼斯城邦。意大利以外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取得如此强有力的地位和如此广阔的领土了。

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每个城市都有和自己作对的贵族。它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来抵御贵族的掠夺欲；它们并不想征服别的城市，而毋宁是想跟别的城市联合起来，共同保卫自己的自由，共同防御掠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它们就聚集在国家的中央政权、王权的周围，借以抵抗贵族，保卫自己。城市共和国能够成为独立国家的，在中世纪，我们只在意大利看得到。在德意志帝国，由于皇权软弱，有些城市连同一些乡区也在共和制度之下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但也只在脱离了德意志帝国的今天瑞士所在的那个地区里，出现过一些小的独立自主的城市共和国——同一些农民马克公社同时并存并结成联盟。除此而外，在中世纪或近代的西方国家中，和古代的国家相反，君主政治一般是站立得住的，君主政治的力量，绝大部分出于它玩弄手法，使城市反对贵族，贵族反对城市。这种把戏，曾因出现了一种古代没有的因素——教会，作为第四个争夺者，更加复杂起来。不过，教会的立场是超国家的，而城市与贵族又主要为偏狭的地方利益所左右，只有王室才主要以国家观点为重，但就连王室也并不是完全为国家观点所左右的。因为在中世纪，王室的实力并不依赖于它

所支配的一个什么有纪律的国家机器，而毋宁主要是取决于王室自己的地产亦即“皇家实力”的大小。设法扩大作为“皇家实力”的地产，乃是王室主要关心的事情。

在这些情况下，有许多条件就成长起来了，这些条件，正是在原始积累给西欧突然带来大量的财富和无产者的那同一个时代里，也使资本主义精神达到了成熟的地步。而大量财富和大量无产者，只要有了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就可以从自身中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了。

第五章 自由劳动

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正如中世纪的城市那样，也跟东方的或古代的手工业者完全不同。而且他们相应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也有一种不同的精神。

一般说来，在每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总是下层阶级的表率。这不仅是因为统治阶级在声势煊赫方面胜过群众，吸引着群众，而且也是因为统治阶级占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所渴求的一切东西。

然而，统治阶级的精神除了作为表率之外，还能起另外一种作用。当下层阶级强大得足以在精神上独立自主，但还没有强大得足以使自己能够希望占有国家中统治阶级所垄断的那些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时，统治阶级的精神就会成为下层阶级憎恶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在古代和东方，单凭军事力量获得了剥削和统治阶级地位的军事贵族，如何因为获利劳动有碍于他们的战斗能力与统治才干而轻视一切获利劳动。

古代轻视劳动的风气，由贵族蔓延到了其他阶级。商人从事一种受贵族轻视的活动，只是出于不得已。他热烈盼望有朝一日积聚了足够购买地产的金钱，能象贵族一样过着游手好闲者的生活，那时他就可以放弃这种劳动了。

手工业者却不能给自己设定这样的目标。然而，就连他们也渴望能过不劳动的生活。为此，他们或者买入奴隶，剥削奴隶，或者出

卖自己的政治权利,以便作为某个大剥削者或国家的寄生者,过一种虽然卑贱、但不负劳动重担的生活。

中世纪手工业者的地位则完全不同。他们是一种自由人,但毫无希望在任何时候成为别人的剥削者;他们全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但也能避开别人的一切剥削。

这时,手工业者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劳动产品跟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就是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劳动价值规律日益发挥作用。劳动价值规律,就是按照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进行商品交换,于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劳动,没有人肯以比别人给予自己的劳动更多些的劳动(以自己的产品为形态)付给别人。

这种趋势,从商品交换不再是偶然的、而成了一种定期复现的事情时起,就一直是商品交换所特有的。但是在古代和东方,这种趋势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为在那里,不自由劳动很盛行,出售劳动者的产品的不是劳动者,而是他的剥削者,即封建领主或奴隶主。而另一方面,当时的自由手工业者大多数是十分穷困的,他们常常没有必要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顾主就必须供给原料,手工业者为他加工制造,而且这多半是在顾主自己家里进行的,于是就成了劳动对产品或货币的交换,而不是产品对产品的交换。至于农民,又几乎不需要手工业者的任何产品。农民的家庭工业差不多就给自己提供了自己所需用的一切。

中世纪的手工业者越来越能够占有自己加工的原料。他带着制成的生产品——这是他的财产——来到市场,他在其他商品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面前是自由的平等的人。这时,价值规律就比在先前的工业发展阶段上更起作用。

这并不是说,商品在当时已仿佛被看成一定劳动量的体现,并按照劳动量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行为是无意识地完成的。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科学分析,才能够揭示它的内容,直到今天它还是热烈争论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交换看成一种孤立的行为,劳动价值规律就会永远

不可解释。只有把交换看成生产过程的一个单纯环节，并且把这个继续进行中的生产过程当作再生产过程加以探讨，这个规律才能够得到说明。

如果一个生产者或生产部门以低于产品的劳动价值出售自己的产品，而同时别的生产者或生产部门以高于这个价值出售产品，那末，他迟早一定发觉自己比别人吃亏。他将必须劳动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跟别人同样多的货币；换句话说，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他从劳动中所得的货币比较少。

谁能做得到，谁就会不再继续生产或只少量地继续生产给价太低的商品，转而生产其它给价较好的商品。于是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就会长期发生变化，直到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价值规律始终只是一种调节生产过程、调节各生产部门的相互关系的趋势，而决不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在一定时刻给各个商品作出精确计算的比率。这种趋势，在不同情况下，会同各种多少有些干扰作用的障碍和反趋势发生抵触，但在自由劳动的条件下，却总是一条基本规律，离了它，全部经济过程就永远无法理解。当然，到了劳动力商品也可以购买的时候，这种促使只按等量劳动对等量劳动进行商品交换、阻止一个生产者受别的生产者剥削的趋势，就将转变为自己的反面。不过，在这里我们还不讨论这个问题。在手工业中，制造商品的劳动者也就是商品的占有者和出卖者。在这种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越发挥作用，它就越排斥一切剥削。

然而，随着中世纪手工业的壮大，不仅通过劳动来规定商品价值这件事，比从前、比自从有商品生产从而有一般商品价值以来任何时候更普遍得多，而且同时人们对劳动本身的价值也日益重视了。

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劳动的价值愈来愈低；劳动愈来愈为剥削者所轻视，愈来愈为被剥削者所憎恶，是那些只会给劳动者带来祸害与贫困的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硬把劳动强加到被剥削者头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自由的劳动者及贫困的自由劳动者所梦寐以求的是摆脱劳动，逃避劳动，并且盼望或者象罗马与雅典的无产者那样自己

成为剥削者，或者找一个如原始基督徒的千年王国那样不必劳动的逸乐乡（当然，这样的逸乐王国的实现必然立刻被推移到美妙的彼岸世界里去）可以不劳动而生活。蒙昧人和野蛮人把他们的天堂想象为这样一个境界，在那里死者的幽灵作为猎人或武士日复一日极其忙碌；而那些出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们，则把天国想象为死后升天的人的最闲散的境界，他们在那里只须做一件事，那就是无尽无休地赞美至高的主——这种思想跟罗马帝国结合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所培植起来的那种奴隶劣根性是相配称的。

中世纪的手工业者重新使劳动成为光誉的事情。他的劳动并非任何人强加给他的。他的劳动产品不折不扣地归他所有。他的劳动是他的社会力量的基础，这种基础，使他得以在城市里向商人、高利贷者和城市贵族等等凌驾于他之上的阶级争取自由与平等；但这种基础也使城市能象贵族及教会一样对国家施加影响，迫使王权节节让步。

中世纪的手工业比起古代和东方世界的手工业，只就这时城市中奴隶缺少而自由劳动压倒了奴隶的竞争这一点而言，已经就重要得多了；然而，其所以更为重要，也是因为城市工业产品的市场这时已更加广阔，因而对手工业者的需求也更为巨大。仅仅由于文明扩展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由于那里的气候条件，对手工业者的需求也就一定要大大增加。

在亚热带尤其在热带的气候中，往往一条腰布就足以当作劳动者的衣服，一个用蔺草编搭的棚子，涂抹上粘土，便是住所。那里的广大居民要手工业者为他们做的活是很少的。

在北方的气候中，对衣服与住所的要求则完全不同。这里连下层阶级也经常需要手工业者。

除此而外，在中世纪，由于有了不存在无自由劳动的城市，农民就比在城市中盛行奴隶制的时代可以较好地安排自己。农民一逃到自由劳动的城市里，便自由了。这对领主们是一个警告，警告他们不可做事过火，不可要求农民做那些促使他们离乡背井，迁移到城市里去的事情。

中世纪农民的地位，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但一般说来，地位比在东方好，也比在古代好。中世纪农民一般都有较多的剩余来购买手工业产品，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手工业产品。

于是手工业者因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并不轻视和憎恶他们的劳动，勿宁因此而满怀自豪感，满怀职业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还因为同行的手工业者自己组成联合会，就象现今雇佣工人自己组成专门联合会、职工会那样，而更加滋长。

手工业者的行会和手工业本身几乎有同样长的历史。这种行会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东方及古代，手工业者的行会大抵跟手工业一样薄弱。只有在中世纪，行会才成为有力的斗争组织。

手工业者由于结成联合会而变成勇敢的和顽强的，自由的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精神，即以劳动自豪的、轻视不劳动者的精神。他们不仅轻视一无所有的浪人，而且也轻视统治者属下的懒汉，不管这些懒汉是君主宫廷里的，贵族城堡里的，还是教会里的。

另一方面，从自由劳动中，还产生出一种与教会为敌的因素。由于是自由劳动，人们才可以把比较精巧的工具交给劳动者使用，由于是自由劳动，在劳动中采用省工的措施才是有利的，自由劳动的深远后果是：自然科学的成就改进了技术，新技术的经验又给科学提供了新的知识。

这一点，最初在矿业中即可看得出来。古代和东方的矿业，完全是用强制劳动者，即奴隶与囚犯来经营的。这种劳动是如此繁重，以致成了一种苦刑，它很快地就把矿工们折磨死了。那时，只有最粗笨的劳动形式是可能的，采用比较复杂的技术措施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据记载，矿坑里的积水都必须用桶挑出去。

矿业中浪费劳动力的这种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以致矿业只有在奴隶劳动极其廉价时，才有利可图。一旦奴隶的供给开始中断，奴隶稀少了，其身价昂贵了，许多矿场很快就显得无利可图，于是人们就关闭了他们。因此，帝政时期的罗马帝国货币金属之所以日趋减少，

与其说可以归因于矿层开尽和贵金属外流——当时罗马帝国的贵金属一方面流向输出各种商品以换取贵金属的印度，另一方面以军饷的形式流向野蛮民族——毋宁说可以归因于矿场倒闭。假若在矿山上新的金块与银块的生产在大力进行着，贵金属的外流便不会减少现存的贵金属贮备。而且西班牙的银矿在帝政时代停止开采时，尚未开采净尽。当拥有大量奴隶的阿拉伯人，在公元八世纪侵入了西班牙的时候，那里的银矿就重新开采起来了。

在西方的无奴隶经济的地区中，民族大迁徙以后，矿业如果说又有可能经营了，那也一定是因为获得了另外一种基础。最初的金属开采，还是用十九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金矿使用过的那种类似的方法。各人自己花钱或者单独一人或者跟同道合伙一起寻找贵重矿石。当矿石接近地面，而开采容易的时候，这种办法还行得通。可是一旦人们必须深入地下开采矿石，而且选矿又需要有较大的设备，矿业就需要较多的资金来经营了，而这样多的资金只有少数人才有。于是，矿工们就不得不受雇于有钱的企业主，换取工资。矿业可以说是第一个大规模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但这些矿工都不是可怜的奴隶，而是倔强的自由人，人们必须给他们比给城市自由劳动者更好的条件，才能把他们招来从事深入地下的那些危险而可怕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企业主来说，实行一些节省或减轻劳动的措施，便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

同是这种矿业，在古代曾成了最粗野的劳动苦海，从中世纪以来却成了极高技术的出发点。关于如何从矿业中产生出蒸气机，我们已经谈过了。

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第十五篇，第八章）中把十七世纪巴纳特的基督教地区里的匈牙利矿山和土耳其人占领的地区里的矿山作了一个比较。后者虽然比较富饶，然而是用奴隶来开采的，因此提供的产品就比基督教地区里那些蕴藏较低而由自由劳动者应用机器来开采的矿山的生产还要少些。

矿业中技术的发展必定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城市

的手工业自己也产生出了一些有思想的、教养较高的、能够使现有技术不断完善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熟练助手，来实现他们的发明，并且具有充分的机会来卓有成效地应用这些发明。因此，自然科学知识又因得到新技术重新丰富起来，而它反过来也给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只就制造精密钟表与研磨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光透镜来说，就可以想见技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了！

古代人，由于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没有推动他们采用节省劳动的措施，所以他们的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就受到阻碍，没有得到发展。当然，尽管如此，他们的思维在这两个领域中毕竟还是有所成就的，这种成就大抵不是通过新的精确知识的扩大，而更多地是通过思辨取得的。可是最初日耳曼蛮人没有能够把这些成就发扬光大，倘若不是天主教会保存了其中可怜的一些残余，他们也许就让它们消灭了。后来由南方和东方侵入罗马帝国疆土的阿拉伯人，则比较能够继承古代人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甚至在犹太人的协助下还使之有所发展。然而阿拉伯人的文明始终以不自由劳动为基础，因此也和他们的先驱的文明一样，最后必然归于衰落。

但是，正当这种衰落开始的时候，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手工业与自然科学却通过自由劳动而十分兴盛起来，以致它们不仅吸取了阿拉伯人的种种成果，而且能够以之为起点，使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二者在不断的密切的交互作用中前进——得到一种灿烂辉煌的发展，从而给最近几百年的欧洲社会带来迄今任何其它社会组织望尘莫及的优势地位。

这种发展完全限于城市。统治和剥削着广大乡村地区的军事贵族之不能有助于这种发展，自是不言而喻的。

但中世纪时曾是智慧的保存者的教会，对这个发展进程也等于毫无贡献。它毋宁是竭力阻挠和抑制了这个发展进程。它是作为我们上述那种不绝如缕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保存者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不过尽管如此，只要一天这些传统比居于优势地位的日耳曼野蛮人的文化还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它就一天还不失为一种进步的

因素。一旦日耳曼野蛮人的文化被消除了，它所保存的传统就变成束缚人类对现实的认识、妨碍人类对现实因素的利用的一种桎梏。

但是教会摆脱不掉传统的束缚，因为传统已经成了它固有的精神本质。而且，由于它是一种统治工具，因而也象在它之前的其它层层节制的僧侣组织一样，追求思想的千篇一律，而不容忍思想的活动自由，它就更加无法摆脱这种传统。

这种在古代城市国家中曾产生过十分辉煌的结果的思想自由，从中世纪起又在基督教的西方城市中重新出现了，但在这个时候，思想自由是跟古代高度缺少的劳动自由联袂出现的。

这种非教会的、甚至反教会的，即是说，即使直到十八世纪还远远不是非基督教的却确实是反对天主教会这一统治工具的新思想，是从城市中产生出来的。但是，这种新思想的开路先锋和主要代表，并不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尽管城市手工业者的活动给这种思想创造了许多物质条件。这种新思想的对象或题材，是十分广泛而繁多的，以致凡是想掌握它们的人都必须拿出毕生精力，可以说，不久之后，单独一个人将根本不再可能完全掌握它们了。这样一来，那些不愿意对科学一无所知，盼望能从科学中学一些自己在工场和家里、在城市和国家工作中用得着的东西的手工业者，他们在工余之暇和假日里从事一些精神劳动，固然十分重要，可是谁要想在科学方面就象在政治方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还要讨论——那样，作出独创的和新颖的成就，谁就必须用全部精力来研究自己的对象或题材。

于是，除教会知识分子和宫廷知识分子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从一开始起就和前两个阶层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他们的作用，我们将来还要在另一个地方谈到。

第六章 禁欲主义

在中世纪，从自由手工业内部出现了一种思想方式，它与统治阶级的思想方式完全相反，而且是某种直到当时为止还未曾有过的簇

新的东西。关于这种思想方式，还有一个方面须加以研讨。

我们已经一再指出，军人和军事贵族如同掠夺者一样，也是肆意浪费的，浪费产品、浪费劳动力，甚至时常浪费生产资料。他们所以在他们爱好的战争中浪费资财，是因为战争如果获胜，就会给他们带来新的战利品、新的剥削地区。在战争的间歇时间，他们就以放肆无度的享乐来补偿战争中的辛苦和危险。

除军事贵族而外，还有一些别的剥削阶层，如祭司、商人及金钱商。他们都是军事贵族的统治地位的促进者和参与者，所以军事贵族的思维方式对他们也有决定性作用。他们尽管在军事行动中比不得军事贵族，但在显示豪华方面却力求赶得上国内显贵的统治者。

甚至下等阶层也受了上等阶层的奢侈浪费欲的传染。对于穷鬼们来说，如果他们可以参加上等阶层的庆典和展览，哪怕只是作为旁观者，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愉快，因为这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不幸的社会处境似乎好过一些。

在中世纪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贵族同样有这种战争欲，贵族、教士、城市贵族、商人和金钱商同样乐于放纵无度地享乐与奢侈，而且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奢侈浪费同样表现出这种满意，因为上层阶级完全公开地过享乐生活，这在当时还是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

然而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奢侈浪费并非都是一样的满意。在国家里面，生产力和生产产品的浪费趋向于漫无限度的增长，其速度超过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因为技术在国家文明时代虽然同时也在前进，但非常缓慢。即使其中进步最快的，譬如东方大河流域国家中灌溉设施的发展，最后也只是增加了被剥削的农民的数目和他们供给剥削者们的剩余产品的数量，而决没有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这种发展只不过助长了浪费的风气，而浪费风气形成之后，终至连高度发展了的生产力本身，例如水利建筑，也遭到忽视和废弛。最后的毁灭是势所必然的。

一俟这种情况可以察觉出来，就一定不会出现反对无意义的浪费的反对派。但是，这种反对派也可能在还没有人意识到有蛀虫在侵

蚀的那个表面繁荣的时代，就早已出现。

就事情的本性来说，剥削从来就是被剥削者所必然难以忍受的。但是当剥削已经成为惯例，并且毫无摆脱希望的时候，被剥削者大都把它作为一种合乎神意的依从关系听天由命地承受下来。一旦国家里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被剥削者有了比较自由地活动的可能，被剥削者中间立刻就会发生一种反对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上升为公开的暴动。可是，力量对比的变化常常只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它固然引起反对情绪，但并不带来可以通过斗争取得某种结果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就始终只限于是纯粹的思想上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形式就使剥削者可能只采取一些道德上的劝诫，而不必试图对它采取什么压制行动。

这时，人们就把被剥削的穷人的苦难说成一种美德，另一方面，又把富人的生活方式说成一种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禁欲主义*的说教与实践，把禁欲的困苦的生活赞颂为死后升天、永享极乐的途径，而骄奢淫侈则被认为足够进十八层地狱了。禁制欲望、含辛茹苦的人，大部分出身于穷人，但也有不少是因为过度享乐而把胃口弄坏的剥削者。

在古代，当罗马帝国衰微、基督教兴起的时候，情况是这样；在东方则很早就已经是这样，而且往往一直保持到今天，特别是在印度的广阔的领域上。

在中世纪末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被剥削者的数量到处都有了显著的增长。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无人地带和未开化的德国的荒野土地，自从那里的奴隶和隶农以及半游牧人被那些虽不自由、但处境较好的农民所代替的时候起，就逐渐人烟稠密起来。这些农民从事精耕细作，过着健康的家庭生活，所以他们的人口就迅速地增加，他们提供的农产品也有所增多，而且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给农民提供了改良了的工具和设备，农产品便更加增多了。

* 禁欲主义，原文是 Askese，有吃苦耐劳，克勤克俭之意，亦可作“苦行主义”理解。

因此，那些剝削农民的领主们的财富也就增多了。同时，在许多国家中贵族也扩大了他们的剝削地区。十字军打算在亚洲和希腊夺占这种地区的企图，虽然归于失败，但是东德意志的骑士在易比河对岸斯拉夫地区却获得了带有负纳贡义务的居民的新地区；西班牙北部的骑士也把阿拉伯人赶出了西班牙，收复了被占领的国土。而且当他们完成了这种事业的时候，由于航海的发展，美洲的巨大的掠夺和剝削对象也就展现在他们面前了。

诺曼人在法兰西北部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觉得这国家太狭小了，便移到英格兰，在那里定居下来。当这个地区不再能满足诺曼人征服者的剝削要求时，他们就回到故土法兰西，寻找新的可获得的東西。英国贵族被诺曼人击退后，陷于自相残杀的內战中，一直到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才得以首先通过海上掠夺，后来通过殖民地掠夺，在大洋彼岸无限地扩张他们的剝削范围。

天主教会也参加了这次基督教徒扩张剝削地区的活动，而且商品贸易和金錢兌換业在当时也同样兴盛起来。可以说，商品和貨币的贸易业比骑士阶层更加兴盛，因为骑士阶层的奢侈浪费比剝削收入增长得更多，因为，并不是每个剝削老爷的剝削所得都上升了，而毋宁只是其中个别阶层的剝削数额提高了。贵族和诸侯的浪费迅速增长，但他们的债务也跟着迅速增长。

一般说来，下层阶级对于宫廷和教会的铺张浪费，都非常喜欢。不仅仅是席勒在他的瓦伦斯坦中就这一点大加讽刺了的那些维也纳居民，而毋宁当时任何城市的居民，如果有人图谋让他们少看一场热闹，少看一次豪华场面，他们都是不会不抱怨的。何况劳动阶级里有好些人还为这种“给老百姓送錢来的”奢侈生活服务，借以糊口维生呢。

但是也并非沒有反对意见。对剝削者这种搞法的抗议，其最初表现形式是譴责他们的享乐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譴责一般的享乐生活，因此，这就是禁欲主义的说教了。

然而禁欲主义现在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方面，它继承了基督教中

现存的旧的禁欲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一直还是一种流传着的传统。它作为个人生活的楷模，跟主教们的骄奢淫乐固然水火不相容，但并没有使他们尴尬，因为教会久已找到了一些形式，可以一方面在理论上承认禁忌物欲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进行与此相反的活动。甘愿顺从教皇的托钵僧们奉行的这种禁欲主义，对教会和教会的剥削不但没有危险，反而是它们的一个支柱。

但此外又兴起了另一种形式的禁欲主义，它不是停留在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冲破了传统。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事物，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因素。

旧的禁欲主义是在轻视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印度的乞食僧和赎罪僧，伊斯兰教的流浪修道士，基督教兴起初期的埃及柱头修道者，以及后来的托钵僧，他们轻视劳动不下于轻视享乐生活，他们赖施舍物为生，也就是说依靠别人为他们劳动来生活。

和这完全两样的，不是乞丐奉行的那种禁欲主义，而是自由劳动者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是在中世纪晚期从那些顽强反对一切大剥削者——教皇和国王、贵族和高利贷者——的手工业者的思想方式中发生出来的。这些新的禁欲主义者从劳动中吸取了他们的力量与自豪。他们的禁欲主义不容许做得过分，以致损害到他们的劳动能力与斗争能力。因此，他们不吃斋，不苦修，不弃绝营养的食物、美好的衣着和安适的住宅，也不放弃健康的家庭生活。

马克思从前已经指出了小资产者的两面性。手工业者也同雇佣工人一样，靠劳动为生，所以自然是与雇佣工人联合一致的。然而他们与雇佣工人相反，自己拥有营业中的生产资料 and 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他们又与资本家联合一致。在我们目下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时代——当然还没有无产阶级意识，也没有一个工业资本家。然而在这个时期，手工业者阶层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两者的萌芽，因此手工业者阶层之反对统治阶级，也很早就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共产主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精神的基础，另一种是个人主义的，成了资本主

义精神的基础。

这两种思潮在种种反天主教的新教派中都有表现。我在我的《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一书中已经讨论了共产主义思潮。该书一直讲到再浸礼派为止，这个教派把异端共产主义体现得最为完满，因而异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史事件也就以再浸礼派而告终了。这派共产主义主要是从矿工的队伍中征集成员，因为在宗教改革时代，矿工已经是为资本服务的纯粹的雇佣工人；它也从纺织工人中征集成员，因为纺织工人也已经表现出许多无产阶级特色。再浸礼派比他们的绝大多数前辈，除胡司派以外，前进得更远。他们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不仅宣扬他们的教义，而且也在包括几百人最多到两千人的大家族公社中实行了这种教义，即所谓家族所有制。他们繁荣兴盛，把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使二者得到巨大的发展。

但是他们彻底反对教会、贵族、诸侯、高利贷者和大商人。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什么国家。即使在他们力量薄弱的时候，他们也拒绝参与国家事务，与国家合作；当他们遇到特殊机会获得力量的时候，他们就揭竿而起，造成声势浩大的叛乱，反对国家权力，例如1525年的农民战争和后来1534年的闵斯特暴动。这些起义就象十九世纪的1848年“六月战斗”及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在统治阶级中激起了对共产主义者的恐怖与憎恨的狂潮。

然而在十六世纪时，毕竟还没有纯粹的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再浸礼派以小资产者为基础，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十分狂暴的迫害气氛中坚持一种叛逆性的、与国家为敌的共产主义。再浸礼派的思潮并未完全中断，继续保存于一些秘密教派中，但是在这些秘密教派里再浸礼派的思潮并没保存下来多少，唯一残存的乃是其中的禁欲主义精神：弃绝一切娱乐，以劳动和祈祷为唯一的生活内容，当然这样做的时候大家是积极的相互帮助的。至于能够自己生产一切必需品而不必向外购买任何东西的那种规模巨大的公有企业，除了在美州人迹罕见的地区里由一些宗教共产主义者团体试行过以外，就再也没有被试图推行过了。

近代禁欲主义反对派的另一个思潮，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精神以及它的不急于向大企业发展的生产方式，是比较意气相投的；这个思潮是个人主义的，不要求把各个生产企业联合成一个共同的庞大的经济组织，而宁愿各个企业自行经营。这就是再浸礼派共产主义最后在实际上的归宿，而且也就是反对教会及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潮从来的经济基础：竭力促进个体企业，以互助协作的精神联合这些个体企业的力量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各个企业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这种相互协助的精神最终只不过是责成力量富裕的弟兄向缺少资金的弟兄提供信贷，这样的信贷当然不是为了救济贫困，也不是为了供应挥霍，而是为了生产上使用，这是以借贷者有特殊信用能力为前提的。

这种更适合于手工业条件的、禁欲主义的反对派思想形式，同共产主义的反对派思想形式一样，在许多教派中也有表现。其中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派是卡尔文派，说得更正确些，是卡尔文派中的一种特殊思潮，因为卡尔文派的针对君主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反叛思想，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贵族分子也象资产阶级分子一样，是能够予以接受的。

卡尔文派的资产阶级思潮在英国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因为英国的特殊情势使手工业，特别是大都市伦敦的手工业，和农民分子联合起来，势力十分强大，足以同时不但向国王和国教教会以及天主教教会宣战，而且也向贵族宣战。禁欲主义的特征使英国的卡尔文派得到了清教派这一特别称号。

清教派势力非常大，一度夺得了英国的政权。当然它不能保持政权，但是十七世纪英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长期斗争，并没有以清教派的被打倒而告终，而是达成一种妥协，这种妥协给予清教派以宗教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宽容，因此它享有组织和鼓动的自由以及极其自由地发展经济的可能性。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今，这种妥协就成了结束英国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一般形式。但自从那时以来，英国也比其它任何欧洲国家给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铺

平了道路。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出于英国地理形势的因素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英国的地理形势一方面防护它不受外国入侵，另一方面则促进了殖民主义扩张和海上称霸的政策，并且促进了国内交通的便利，因为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远离海上交通要道。此外，还有国内的对工业具有重大价值的天然矿产。社会因素也和这些自然因素在同一个方向上起了作用，其中清教派的威望和短时期的统治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清教派确实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勃兴，可是我们不可过分夸大它的作用。而且决不可把清教派这一宗教现象跟总的历史关联割裂开来，把它理解为纯粹神秘的东西，说这种东西恰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不假任何外来的推动，由于宗教本身的运动，就从信徒的心中涌现出来的。

麦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思想方式，据说在工业资本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正是这种思想方式才使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而且据说是由卡尔文派产生的；其实，这种思想方式，我们不仅在清教徒那里看到了，而且在根本不渴望资本主义的再浸礼派共产主义及其前驱那里也已经看到了。

反抗封建主、教会、诸侯与高利贷者的剥削和浪费的手工业的精神，是一种中庸有度克勤克俭的精神，一种生活节俭和生产积累的精神，换句话说，是聚集钱财的精神，这并非为了日后的挥霍，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借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种精神曾经使莫拉维亚再浸礼派共产主义的工业蒸蒸日上，一个世纪后也促成了英国个人主义清教徒的工业繁荣发达。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韦伯引用本杰明·佛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例。佛兰克林宣扬些什么呢？勤勉、有度、节俭。韦伯把这些东西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并指出佛兰克林还在他的印刷厂从形式上看来与任何手工业企业都毫无区别的那个时代，就充满了这种精神。（第49页）

那么，在我们看来，认为象佛兰克林那样一个经济学家，能仅仅

从他在自己的企业里积累的个人经验中创造出自己的基本经济原则，而不是从对他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特征的他那个时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的整个经济实践的观察中得出这些原则，这就足够令人奇怪的了。

但是这一点姑且不谈，那么试问在佛兰克林的说教之中究竟有什么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呢？难道这些东西不也是自中世纪以来一切善良的手工业师傅的特点吗？

当然，佛兰克林还说出一种思想，并且韦伯特别强调它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那就是：佛兰克林劝告人们永远注意信用，准时偿还一切债务，不要下饭馆，而要呆在工场里。

这句劝告个人注意自己的信用的话，当然不是再浸礼派共产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他们的企业是属于集体的，每个成员在经济组织中都工作有保障，生活很安定，一切盈余都不归于个人，而是归于集体，集体不把盈余贷给个人，而勿宁用于改良公有生产工具。

反之，在一个由许许多多从事获利营业的个人所组成的、斗争性的教派中，某些同伴向另一些同伴提供信贷，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既然把需要援助的成员弄成接受救济的贫民，是与自由劳动者的近代禁欲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事情，人们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必须给他们提供资金，让他们成功地经营自己的企业。但是，这只有当需要援助的人表现得“勤勉而有度”时，才能成功。

我们与其将要求个人勤勉和有度——作为信用的前提——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倒不如视为小资产阶级精神的特征。但是，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以彼此亲近的那一个方面的产物，而这个方面和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具有的那一个方面是对立的。

第七章 工业资本的兴起

清教徒的工业同浸礼派教徒的工业一样，必然地会向上成长起

来。这两派教徒都十分勤勉和节俭，戒绝一切耗费时间和金钱的娱乐。他们都有着聪慧而富裕的手工业者所有的那种特点，即竭力使自己的生产设备能有最大可能的效率，同时也使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最大可能的发挥。一切禁欲主义教派，都对充分的国民教育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一点和他们对于艺术与科学的轻视形成奇特的对比，在他们看来，艺术与科学只不过是剝削者们的恭顺的侍婢。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在清教徒们那里还是在浸礼派教徒们那里，都使企业中产生了巨额的盈余和大量的剩余产品。但是在使用盈余方面，这两个教派之间就显出差别来了。两派都是要将盈余积累起来，用于扩大和改良生产。但是在共产主义者们那里，这意味着全体相对于个人而言增加了资财和势力。而在个人主义者那里，则意味着个别的人相对于其他教友们而言增加了资财和势力。

新禁欲主义各教派中的人们，无论是共产主义者或是个人主义者，无论是再浸礼派教徒或是清教徒，他们都更为勤勉，都因减少教会节日而增多了全年劳动日，都削减那种歌妓侑酒的筵宴开支，最后他们还互相援助，这样就必然地使他们在事业上突飞猛进胜过他们的竞争者，尤其胜过那些天主教徒。上帝降福给圣光之子，而恶魔之子则很容易被破产魔鬼带走。但是，在那些有宗教情绪的教派中人看来是神恩天福的东西，在我们不信教的唯物主义者看来，无非是个人主义的清教徒们的资本积累而已。

韦伯曾这样评论将获得利润与信徒虔诚混为一谈的素朴观点：“一种职业是否有益以及其是否相应地能得上帝欢心，固然首先要依它（该职业——考茨基）能为‘全体’生产的财物在道德方面和重要性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而定，但是，紧接着却还有第三个、在实践上说来最为重要的观点，即，私有经济的‘赢利性’。因为，被清教徒认为在一切生活安排中都起作用的那位上帝，如果给某位教友指示出了一个获利的机会，这位教友就有了目标。而且，虔诚的基督徒就必须遵从这一神意，充分利用这个获利的机会。”

韦伯引证了清教徒传教士里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

1615—1691)的话,巴克斯特说:

“如果上帝给你们指示出一条道路,你们循着这条道路,可以无损于你们的或他人的灵魂,却能以合法的方式获得比别的道路更多的赢利,而你们却拒绝走这条道路,遵循获利较少的道路,那末,你们就是违背你们所以受上帝召唤(Calling)的一个目的,你们就是不愿意作上帝的执事(Steward*),不愿接受上帝的恩赐,以便能按上帝要求的那样为他而使用这份恩赐。你们所以要劳动以求富裕,当然不可为了肉欲和罪恶的目的,而应该是为上帝!”

韦伯在他的给这段引文加的一则附注中说得很对:

“以封建贵族形式加以使用的那种财产,正是一种可恶的东西……不是财产本身。”

非常正确。然而这却证明,清教徒的道德是出于自信而顽强的小市民、特别是手工业者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因而是出于一种经济基础,而并不是经济出于宗教。

韦伯自己对于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清教徒道德的经济基础很有认识。他说:

“我们在刚刚开始上升^①的小市民和农民阶层的行列中,经常发现清教徒精神的 genuinsten^②信徒。”(第195页)

韦伯在对这句话的一则附注中说:

“配第已经强调过这一点,同时代的一切文献无一例外地都特别谈到各派清教徒:浸礼派教徒、教友派教徒、孟诺派教徒**,说他们一部分是无产者,一部分是小资本家阶层,并且把他们与金融冒险家之类的大商业贵族对立起来。但是,正是从这个“小”资本家阶层里面,

* 原书误作“Stewart”。

① 着重号是韦伯所加的。——考茨基注

② 最纯正的或最不虚假的。——考茨基注

** 荷兰宗教学家孟诺·西蒙斯(Meno Simons 1492—1559)于1523年在瑞士的苏黎世发起的新教一派,不信原罪,反对战争、洗礼、誓言、担任公职、服兵役等。

而不是从大金融家如垄断资本家、国家承包商、国家财政家、殖民地企业家、Promoters ① 等等的手里，产生出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资产阶级私有经济的劳动组织！”

在这里或许必须说明，“资产阶级私有经济的劳动组织”不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志，也就是说，实际上不仅是韦伯所称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标志，而且也是中世纪的手工业就已经有了的标志。作为资本主义之标志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组织变成了一种剥削机制。这一转变却是我们根据新教徒的道德所无法理解的。

但是，新教徒的道德确实是有助于这一转变的。一方面，这是由于它促进了工业资本的积累。如前所述，清教徒们比其他经营工业的人发财致富更快。

这乃是他们的生活作风的必然后果。但是，他们的神学家却并非总是希望如此，因为一个教派中的人一旦变得富有了，就很容易“倾向于肉欲”而厌弃禁欲主义。

“甚至教友派中的 *beati possidentes*② 也往往倾向于否定古老的理想”

韦伯这样说(第 195 页)，并且在下一页上引述了卫理会领袖约翰·韦斯理*的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韦伯很正确地说，这段话“颇适合于作为有关以上所谈一切(有关清教教义——考茨基)的座右铭。”

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担心凡是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地方，宗教的内容就会相应地减少。因此我看不出，就事物的本性而论，纯正的宗教精神的某种复兴怎样能够经久不衰。因为宗教必然会既产生勤勉 (*industry*) 又产生节俭 (*frugality*)，而勤俭却只会带来财富。但是财富一旦增加，形形色色的骄傲、激情、世俗爱欲也将要增长起来。这样，卫理会这样一

① 股份公司的发起人，特别是诈财行骗的股份公司发起人。——考茨基注

② 幸运的有产者。——考茨基注

• 约翰·韦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英国宗教家，牛津大学教授。

种心灵的宗教，纵然目前是一株葱郁茂盛的树，而在这种状况之下，如何能够坚持得住呢？卫理会人士在各地都是勤勉而节俭的，因而他们的财产在增长着。于是他们相应地增长了骄傲、激情，增长了肉体的和世俗的欲念和生活上的自矜。宗教的形式固然还存在，其精神却逐渐消失。难道没有办法阻止纯洁信仰的这种不断的堕落吗？我们不应当阻止大家克勤克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赚得他们所能赚得的，节约他们所能节约的，这就是说，其结果是，敦促大家发财致富！”

韦斯理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个两难的局面，只晓得敦促富人拿出钱来，用到善的、能得上帝欢心的事业上去。对神学家说来，他在这段文章里所讨论的整个问题是个宗教问题。我们却必须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宗教的外衣底下来考察这个问题。韦伯自己就已经掀开了这个外衣的一角，指出最虔诚的清教徒都是新兴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反对封建式的放荡不羁，而阶级斗争愈趋激烈，他们就愈狂热地发展他们的清教徒思想。于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变得富有起来。但是这样一来，却出现了一种危险：他们投到敌人那一边，投到豪商和货币资本家的阵营中去了。问题在于怎样阻止富有的清教徒变成这种资本家。最便当的乃是，借用韦伯的词语来说（韦伯是决不会采用马克思所创造的词语的），到“资产阶级私有经济的劳动组织”中去寻找问题的解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说：到“商品生产中”去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说我们觉得比较明白具体而少绕弯子。

问题在于，变得富有了的清教徒们要不把他们的财富投入大商行或金融业，不贷给国家或封建浪费者，不包税等等。他们必须以能得上帝欢心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钱。但是，手工业者的上帝所特别欢喜的，却是工业，亦即商品生产。

然而，正是这一发展，即，富有了的清教徒感到简便易行的、将他们的钱用于扩大商品生产的这一发展，也创造了条件，使扩大商品生产得以有利可图地、符合上帝心意地实行起来。

清教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增长得最为迅速的时代。上升的小市民的清教徒思想厌弃一切享乐，十分尊重劳动，认为这是他们的力量、骄傲和光荣的源泉。这种思想必然会激励所有信从这种思想的劳动者，不管他们是在自己的企业中劳动，或是在别人的企业中劳动，使之奋勉勤劳。而自由手工业者，既然对于自己反抗的富裕主东所给的任何施舍都加以拒绝，认为有失尊严，当然是根本不愿知道乞讨是怎样一回事的。

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身分，都还仅仅以胚胎的形式，统一存在于手工业者一人之身。这两个阶级都必须经过深入的发展，才会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独立的思想。它们在很长的时期里，还始终是忠于小市民思想的。小市民思想回过头来对于那些被工业资本家在其企业中雇用的工人也很有影响，至少对于那些出身于手工业的雇佣工人是如此。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则较少受到小市民思想的影响，但是新“禁欲主义者”抗拒施舍的那种敌意态度却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这样便迫使许多乞丐从事雇佣劳动。

“卡尔文曾经严禁行乞，荷兰宗教会议激烈反对乞丐身分证和为求乞出具的种种证明。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特别在查理一世治下劳德*当政期间，官方救济贫民和教导无业者从事劳动的原则形成了一种制度，而相反，清教徒的口号则是：‘Giving alms is no charity’^①（这也是后来笛福**的一部名著的标题），并且在十七世纪末开始实行了无业者入 Workhouses（贫工院）的威吓制度。”（韦伯：《新教道德与资本主义精神》，第 177—178 页，附注）

在该书第 119 页上，韦伯再一次提到“清教徒禁欲主义”，清教徒由于主张禁欲主义始终“对于支持那个雷厉风行的英国济贫法案”采取保留态度。

* 威廉·劳德(William Laud, 1573—1645)，英国大主教，政治家。

① 施舍非慈善。——考茨基注

**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1? —1731)，英国小说家，《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

他补充说，清教徒们在自己的行列里面确实是不可能行乞的。但是，他们如果不愿对自己的教友们施舍捐助，那末，在商品生产的个人主义基础上，他们就只好对那些有希望创立自己的企业而能有成就的本宗派成员提供信贷，或者在不存在这种希望的情况下，把他们收容在一个既有的企业中当雇佣工人；这种办法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方式下来采用才能得上帝的欢心。

除说明清教主义严禁救济贫民以外，韦伯又举出大量例证，说明它如何教育出了安分顺从的劳动者。例如，他在第200页上一则附注中说道：

“巴克斯特（我们已经提到过他——考茨基）初到基德冈斯特教区时，基德冈斯特败落到极点，他在那里的活动，其成功程度在拯救灵魂的事业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禁欲主义如何教育群众从事劳动，即从事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剩余价值’生产，才终于可能使他们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家庭工业，纺织业）中有了用处。因果关系就是这样的普遍——从巴克斯特这一方面来看，他是为求有利于自己的宗教道德而将他的被保护者引入资本主义机制中来的。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方面来看，他的宗教道德的利益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服了务。”

在下一则附注里另有一段话说：

“资本主义在兴起时，需要有为了良心起见而接受经济压榨的劳动者。如今资本主义站稳了，能够迫使他们不要天堂的报偿而自愿从事劳动。”

这里面有不少是实情，但是过分偏于一面，而且未免尖刻。

如果除了来自于清教徒行列中的那些虔诚的雇佣劳动者而外，没有其他可供使用的劳动力，工业资本主义是不会有很大发展的。在这些虔诚的劳动者之外，工业资本主义在初起时就已经遇着了大批的无产者，他们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是迫于贫困来为资本服务的。也有过一些资本主义的企业，禁欲主义早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前就教育群众去在其中从事劳动了。韦伯只谈到家庭工业和纺织

业，作为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工业的最初形式。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以前，在清教主义以前，甚至在卡尔文以前，采矿业中就早已有了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在采矿业方面，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卡尔文教派之流的传教士到矿场来宣扬它的宗教精神。这样说自然并不是否认清教主义的宗教道德精神曾非常有助于许多工业资本主义要素的出现，作为工业资本主义要素，一方面出现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乐愿劳动而安命知足的无产阶级。而这样一来，积累起来的资本便不再象以前那样浪费在生活享受上面，或者投入商业和高利贷，助长贵族和公侯们的浪费。现在有可能有利可图地在工业里使用这些资本了。

但是，这种宗教道德精神，决不是可以用宗教和道德的固有运动来说明的，而是应该用某种向上挣扎的手工业的生活条件来解释，这种手工业具有力量和意愿，来摆脱封建贵族的统治及其在经济、政治、道德等等方面的桎梏。

而且，我们决不可以将清教主义思想对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所起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这种思想只是工业资本的根源之一，不是它的唯一的根源。它的最重要的根源是在于有了大规模雇佣工业劳动者以谋取利润的那种可能性，这些劳动者最初作为矿工或手工业者，不是为顾客或市场而劳动，而是为某一个商人劳动，这个商人作为经售者向外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可能性一出现，上升的手工业者便把他们的积蓄用于扩充企业，这是常常需要冲破同业公会的各种限制的，当然，在英国，这些限制早在清教主义时代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不仅如此，商人和高利贷者这时也开始将他们对殖民地和对本国及其封建主经营商业或从事高利贷剥削而积累起来的所得，投入于工业。而这些积累，对于上升的工业资本主义说来，不久就成了比从手工业得来的资金更为丰富的源泉。

韦伯在上面的一段引文里完全正确地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所建立于其上的那种“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劳动组织”，是由向上挣扎的手工业里面产生出来的，不是大金融家所造成的。然而，这种组织一旦

带有了剥削性质，一旦带来了利润，它的大量资本就流向“大金融家们”，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经销商，有的人是贷款者，不久也有人成为企业主。

这样的发展到处都在进行，不管宗教信仰多么不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方面有了积累起来的资本，另一方面有了大批或者耻于行乞或被暴力阻止不能行乞，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就都有这样的发展。

清教主义肯定是大大有助于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和使英国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的。关于这一点，韦伯曾经作了十分深刻而重要的论述。但是，他的论述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没有驳倒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作的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的说明。

第八章 进步与社会革命

工业资本也象手工业那样具有两面性，不过是另外一种两面性。在手工业者身上，一方面隐含着可以成长为工业雇佣劳动者的萌芽，另一方面隐含着可以成长为工业资本家的萌芽。反之，工业资本则一方面是一种剥削机器，当然是一种完全新式的剥削机器，它不象以前的剥削制度那样仅仅夺取剩余价值，而且也生产剩余价值，当然不是通过资本家的劳动来生产。另一方面，工业资本是提高和改善它当前既有的生产力的一种有力手段。

关于工业资本这种剥削制度的性质，我们将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时还会谈到。在这里，只谈谈它比较美好的、为自由主义著作家们所津津乐道的一面，即它的提高生产力的一面。

工业资本把为数众多的自由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共同的指挥之下。它掌握着手段，可以通过许多人为的办法，将劳动者们由于协作而增长了的力量再加以提高。而且它成长在一个科学已经有了长足进步的时代，因而能够以迅速扩大的规模发明那种人为的办法。

不过，工业资本家是否愿意进一步发展经济生产力，并不是由他随心所欲地决定的。如果他不愿意在同行竞赛中落后和破产，那么竞争就逼迫着他运用最完善的经营手段。竞争迫使他不断地将一部分所得积累起来，借以扩大和改善他的企业。他不可以效法以前的封建主，把全部收入都浪费掉。有一部分他必须保留下来。

就这一点而论，“禁欲主义”对他说来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必需。只不过对“禁欲主义”这个词，我们决不可以过分地按字面来理解。资本家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从经商、放高利贷、从事殖民掠夺等等中获得了财富以后，才将他们的财富投入工业的。这些资本家即使不将他们所能支配的收入全部浪费掉，也完全用不着过艰苦的生活。但是，就连那些出身于手工业、曾经必须节俭的工业资本家们，不久也都懂得，积累资本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收入不变而个人尽可能少消费；另一是个人的消费照旧，或甚至稍稍增加，而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提高收入、从而提高积累资本的可能性。

后一种方法不久就远比“禁欲主义”的方法更占优势了。

但是，工业资本的积累不管是怎样实现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如何都是在不断地进行，必然不断地进行，而且必然有助于不断地提高和改善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

这种倾向开始变得十分有力的那个时代，正是封建的生产方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走了下坡路的时代。封建的生产方式走下坡路，必然和在它以前的那些剥削方法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凡是封建主义不让新的工业兴起而力求保全自己的地方，社会就要衰落。

但是，凡是工业资本主义突破了缺口的地方，它就能消除封建剥削的那些促使社会衰退的作用，给社会带来不断增长的财富，也就是，促成经济上的进步。衰落的社会不再象以前那样由外部来获得新生，它的再生，不再需要通过那些还没因剥削而衰颓的、征服了停滞或衰落的国家，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看来恢复了青春的国家的未开化民族。现在，社会有可能由内部、依靠从它本身中发展出来的动力来获得新生了。

如果没有这种由内部产生出来的更生的能力，人类早就完蛋了，因为随着技术的日趋完善和剩余价值的增长率与增长量的日益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也日益加快了。而且，资本主义剥削所获得的辉煌结果，越来越诱使一切国家的富人把他们的财富变成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扩展的速度，变得比工业资本家进行积累的速度还更快一些。

如果这种生产方式注定要遭到从前那些剥削方法所遭到的命运，即它和它所依附的社会本身必然衰落，只能依靠强有力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之外的未开化民族从外面来灌注新的生命力，那末，社会发展的前景就无限暗淡了。因为在今天，什么地方还有不曾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侵袭、却充分发展了军事和政治的力量与智慧、足以击溃当代的国家体制而代之以新的国家体制的未开化民族呢？

今天，事情是这样的：社会内部的不时更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内部更新这样一种发展方法，比自有国家以来至今起过作用的那些方法更为合理，因为它使社会得以免除国家文明阶段之间常常延续许多世纪之久的那种极其粗野的中间阶段。但是它也是今天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可能的方法。

不过，现在这个发展却不仅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发展而已，它并且进行得十分迅速，以致不仅在那些比较研究过去千百年历史的理论家看来显而易见，而且在只凭个人的日常印象下判断的实践家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点。从前国家中的各种剥削方法基本上只使奢侈品的生产发生了变革，而让大众（日用品）的生产仍然处在旧的生产条件之下，甚至还常常使这些旧的生产条件更为恶化。反之，资本主义生产却很早地就成了大众生产，它首先变革了大众用品的生产关系。当然，奢侈品生产的技术和大众（用品）生产的技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奢侈品生产技术偶然地也给大众（用品）生产带来一些改进。不学会给农民锻造镰刀和钩镰，就不会给骑士锻造宝剑。只不过这种技术上的改进十分有限，而且不起什么变革作用。

资本主义大众〔用品〕生产的技术里面，当然也有许多是有助于奢侈品生产的改良，但是，对技术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随着工业资本的向前发展，高利贷和商业也改变了它们的性质。高利贷在从前原是促使那些或因过分浪费或者无端陷入窘困的家庭加速经济破产的一种手段。它现在作为信贷，却变成了给向上成长的工业增添更多资金的手段。

至于商业，它的主要收入在从前是来自于推销奢侈品，因而也就是来自于富人们的浪费。它从前大半只是附带地间或推销一些大众用品，现在则以此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商业也开始为大众生产服务了，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料的生产场所和制造工厂的所在地离得愈远，制造工厂所在地和消费者们离得愈远，每个生产场所和每个消费者的需要愈是多种多样，那末，商业就愈变得不可缺少。

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现在正在进行，既迅速而又不可遏止，不仅彻底改变着小小的剥削者阶层的状况，而且也改变着被剥削者群众的状况，群众的境遇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很少起过什么变化的。

我们提到前资本主义时代，当然总是指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那个时代而言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于它们在其中出现的那些从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都不曾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

资本主义新社会里的人，将自己这个社会的运动看作是一般社会的运动，乃是可以理解的事情。正如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样，人也倾向于按照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图景，来构想各种社会的图景。

资本主义工业给一切领域都带来了不断的进步。例如，随着技术和交通的扩展，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某种社会规律知识便都有了可能，这是前人梦想不到的。

工业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倾向，都只有在严重的利益斗争中才得以贯彻，都只有在形式最激烈的、规模上前所未见的阶级斗争中才得以贯彻。

阶级斗争并不是什么新发明。阶级及其对立是和国家一样古老的，凡是在国家里阶级能有几分活动自由的地方，这种对立就爆发为阶级斗争。这时可能会出现阶级之间的权力转移。不过，如果生产的条件、首先是大众生产的条件没有什么改变，那末，这种权力转移就不会导致新的生产形式，只不过导致人员的或这些生产形式的享益者的改变，或者，在最深远的情况下，导致一种现存的生产形式被另一种和它同时并存的生产形式所改变，而且还常常是被一种较老的生产形式所改变。

在这样的状态下，阶级斗争不论多么激烈，也决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向上发展的手段。

在阶级的和由阶级而产生的政党的斗争中，有时候会出现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斗，结果使统治的阶级屈服于它们的敌对者，在一个时期以内变得没有斗争能力，或者力量大大削弱竟而不得不退出战场。向来被压迫的或享权较少的人们，这时就夺取国家政权，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地使用国家政权来剥夺被击败的那一部人的权力手段，将它据为己有，不过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政党和阶级将它据为己有。

阶级斗争中的这种决定性的、将一个向来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打倒、有时甚至完全粉碎的战斗，人们称之为革命。革命都是从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因而都是政治革命。这样的一种革命是否会成为一场社会革命，要视它在其中进行的那些条件而定。凡是创造新生产形式的条件尚不存在的地方，那儿的政治革命即使最强有力和最彻底，也不会变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导致某些阶级中的人的身分地位的改变。

如前所述，在古代便是这种情形。

弗兰茨·奥本海姆在《论国家》(1926年版)一书中，概述了古代希腊各城市国家中的社会革命，这些革命结果都成为劫掠富人和分占他们的田产。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些革命。奥本海姆将它们称为“一种颇象布尔什维主义早期形式的、狂暴的共产主义的突然爆

发”，并且认为其中含有一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基调”。

在我们的时代，“共产主义”这个词可以用来指称完全不同的各种努力。不过必须指出，布尔什维主义者自己并不认为把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就算是“共产主义”。

如果没收敌对者的财产分给自己的党羽就算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末，宗教改革时代信奉新教的公侯们就个个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尽管路德的煽动性演说是反对起义农民和托马斯·闵采尔的。而且后来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也有很多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成分了。

如果法国大革命除了进行这种没收和分配以外，没有再作其他的事，它就和古希腊的历次革命或公元前2400年时的埃及革命同样是对社会毫无助益的；古代希腊和埃及的革命只不过是新占有者代替旧占有者，从那种革命里产生不出任何新的生产形式，因为不存在产生生产形式的条件。

法国大革命是在完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在它之前的英国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都已经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分，有了一个向上挣扎的、独立的城市小市民阶层，这个阶层里面已经包含着工业资本和工业无产阶级的萌芽，而且它是和农民结成联盟的。

从这些成分里面产生出来的新的生产方式，会感到自己被旧的、要使整个社会衰亡的封建势力紧紧束缚得陷入瘫痪。一旦终于推翻这种旧势力，其后果就不止于是不同的阶级的人员更替，也不会是曾被取消的某些生产形式重新复生，而将是从来没有能够得到发展的那些新的生产形式迅速地、坚强有力地向上发展起来。

所以，从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突变，就产生出了向新的、更高的经济、社会形式的蓬勃发展。

如果我们不是只从国家的倾复中，而是从那些随之而来的新生事物中来找社会革命的本质，那末，社会革命就是一种只随着工业资本才一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但它既经出现以后，就成了社会向

前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从前的那些革命，不论它们具有多少与工业资本的兴起时的革命外表相似的表现，终究不等同于后面这一类的社会革命。

第九章 现代民主制

工业资本不可能只在经济上上升并取得最后胜利，而不同时也彻底改变着国家的结构。工业资本在政治方面也如同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一样，是会带来崭新关系的。

不过，手工业者、资本家、工业劳动者这些工业阶级以及与这些阶级结成同盟的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是简单地直线上升的。城市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固然日益增长，但主要以剥削农民为生的贵族和教会这两个阶级的财富则增加得比较缓慢，部分地说来甚至是在减少。

但是，由此而获得政治利益的，首先并不是从事工业的那些居民，而是壮大了自己的专制政体的那些君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必须不谈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古代城邦，尽管几经变迁，而在近代若干城区中仍旧存留下来，特别在威尼斯。威尼斯自始至终是一个贵族制的共和国，它上面没有一个国王。

西方各国的基督教的军事贵族也象所有军事贵族一样，各有一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最高领袖。不过，最高领袖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并没有因为在国家里设立了天主教会而得以扩大，在国家里设立天主教会是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些大半是负担税赋的农民群众的。天主教会首先凭借着它的知识的优越性和它的坚固的国际性组织，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也凭借着这两点，很快地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它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分割，而是不断地增多。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现在又加上了城市。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城市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力量，不足以形成具有较大主权的城邦，而毋宁只能在君主国家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君主权力薄弱的地方，例

如在王室几乎总是无权的德国，一些城市就常常感到不得不结成同盟以图自卫，这种同盟有时倒能形成很大的势力，例如汉萨同盟。这样的同盟都没有演变成持久的国家形式，在欧洲，只有瑞士的一些城市和农业州所组成的联邦过去和现在都算是一个例外。

王室的任务在于将国家里的一切不同的成分结合起来，使它们遵行共同的政策，特别是遵守对外攻守的共同政策。

国王们也象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力求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长时期以来，他们只在很小的程度上达到了、常常根本达不到的这个目的。如果他们能成功地挑拨离间贵族、教士、城市市民等等上层阶级，他们就能加强自己的权力；反之，如果遇到上层阶级的联合阵线，他们的权力就更削弱了。

人们常常以为，阶级合作的思想是同阶级斗争的思想抵触的。实际上只有在国家里仅仅存在着两个阶级时，情况才会是这样。而且，即使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两个不同阶级的政治合作也还可能成为十分必要的。马克思本人就曾认为，在驱逐入侵者的卫国战争中，例如在1870年法兰西共和国对普鲁士德意志君主国的战争中，这种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在一个有了较高的发展的国家里，阶级区分更为复杂得多。那里会出现许多阶级，各有不同的利益，有些利益互相对立，有些利益彼此一致，而每一个阶级本身还又有进一步的分化。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只能讨论无产者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如果人们因此便以为在今天的国家里只有这两个阶级，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粗疏肤浅的理解。

还在1889年的时候，我就曾经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写过一篇论文，专门驳斥对阶级斗争观念的这种浅薄化理解。题目是《1789年时的阶级矛盾》，以后的版本将标题改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矛盾》。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这次革命确实是一场阶级斗争，然而却是极其复杂的许多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每个阶级内部往往又有很深刻的分裂。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有些不同的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另外的一个或许多阶级，以便更有效地维护某种共同利益。这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并不抵触，正如国家联盟同国家主权不相抵触。

只有将这样的联盟看作是长久的体制，那才是错误的。1918年时新建立的那些国家，都是建立在沙滩上面的，因为它们的存在的可能性，全部寄托于一个期望，期望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的联盟会是一种永世长存的体制。同样，一种政策，假如以不同的阶级的长久合作为前提，或者甚至相信这种合作是本阶级（或政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多讨论）取得国家政权或达到自己的特殊的最后目标的方法，那末这种政策也是错误的。

但是，不同的阶级的合作在世界历史上是常有的事，而且常常取得极其重大的结果。没有一次政治革命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实现的。这种合作从来总是构成革命的第一幕，第二幕当然就是胜利者们的相互冲突。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初期，凡是市民和农民同贵族、君主、以及一部分教士联合起来、对于在思想上倾向于罗马教皇的那一部分教士采取行动的地方，宗教改革运动就获得胜利。

另一方面，十三世纪时英国王室没有能力抵抗贵族与市民的联合，于是就奠定了国会掌握大权的基础。

不过，通常总是国王同市民合力对付顽固的贵族，因为贵族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也威胁着市民的经济繁荣。中古时代（意大利以外）的城市则和古代的城市不同，一般地都是倾向于君主主义的。

不过，强大而独立的城市也同强大而独立的贵族和强大而独立的教会一样，势必要危及君主的权力。

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时代，大大扩充了商品生产的范围，因而使商品生产者、买卖商品的商人、经营货币的商人（银行业者）等等掌握着货币的人，增大了势力。另一方面，这种势力又增加了贵族、教士、诸侯这些非工业、非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们对金钱的饥渴。这样一来，教士们利用出售赎罪券之类的办法来剥削世俗人的贪欲固然

变得日益强烈，而贵族和公侯们觊觎教会财产的心意也日益炽热起来。同时，就是这种货币经济的发展，使许多贵族在经济上趋于没落，使他们在没有别的办法弄到钱的时候，不得不向他们所憎恨的城市人借债。

不过，没落的贵族还有另外一条弄钱的路子，那就是，抛弃自己的独立，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出卖给诸侯。贵族们由倔强、自主的骑士，一变而为在宫廷里盗窃国库的、阿谀恭顺的侍臣，或者变成佣兵队里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官，从这时起，佣兵队已经代替了以前那种难于驾驭不可信任的封建征募军。

除了贵族以外，教会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现在，教会变成了国家教会，教士们变成了领取国家薪俸的官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在天主教国家里也是这样，当然在新教国家里更是如此。

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君主的权力。贵族和教会由君主的最危险的敌人一变而为他的最忠诚的支持者，国家里于是出现了绝对的权势。

这些成分的联合权势，现在开始来对付农民而特别对付城市居民了。这是因为，城市必须负担一切开支。凡是没落的贵族和衰微的教会不再能凭自己的力量向城市居民夺取的东西，强大起来的国家权力就代替他们夺取，以使用掠夺品来支付贵族和教会的薪俸，使之成为国家权力的忠顺奴仆。

专制的君主们倒是作过一些努力，希望尽可能地好好饲养他们的母鸡，给他们生一些金蛋。他们采用了所谓重商主义的种种办法，来促进商业贸易、工业和交通。工业就这样也顺便得到了增强。但是，一个在发展中受到阻抑的阶级，是不会因为别人允许它增强力量而安于自己的命运的。随同着工业的成长，各工业阶级都壮大了力量，同时它们和统治政权的对立也尖锐化了，因为这个政权所以促进工业，目的仅仅在于从中能够吸取更多的血，来养肥那些腐败堕落的教士和游手好闲的宫廷侍臣。

同时，这批寄生虫对国家的要求远比工业的纳税能力上升得迅速。他们威胁到了国家本身的存在。所以摆脱他们，成了势在必行

的事情。但是，专制君权既然是和他们存亡相共的，也就必然要随着他们一同垮台。

于是，必须出现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使君主的专制权力和贵族与教会的政治统治都不复有存在的余地，使劳动分子代替那些大寄生虫来掌握国家权力。请不要忘记，还有一位圣西门曾将工业企业家算作劳动阶级。

从这种反对教士所支持的封建君权的斗争里，产生出了一种新式的民主制，它虽然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完全实现，而且到处都不时地遭受挫折被迫后退，但是总的说来却是胜利地勇往前进，不断地增强力量和扩大范围。

在古代，城市和城市中的市民阶级也曾由于反对贵族而壮大起来，导致了民主制。新的现代民主制固然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民主制，但同时也不同于国家出现以前那个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因为，它是国家中的民主制，它有着一套国家机器，只就这一点来说，它就已经和原始民主制大不相同了。

但是，现代民主制所以不同于古代民主制，却有两方面原因，既在于它所依据的社会基础不同，也在于它从中产生的历史形势不同。

古代民主制，大多是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完成的。它使国家走向下坡路，成为整个政治生活趋于衰落的过渡阶段，而从政治生活的衰落中就产生一种暴君制度，对于这种暴君制度人们只有默默无言地忍受，要想废除，则只能依靠自由的未开化民族的军事优势。

相反地，现代民主制却是在另一种形势下出现的。在这种形势下现代民主制才打开了一条使技术和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经济繁荣是日益有力而且没有止境的。

一个在佣兵和官竹支持之下的君主国家，它的专制主义，不是它的终点，而是它的起点。它并不陷入暴君制度，而毋宁是在与暴君制度作斗争中兴盛起来。并且最后民主运动会获得力量，彻底粉碎暴君制度。

为现代民主制预作准备的新近的专制主义时代，也不是象古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它不是一个精神停滞甚至倒退、政治上缺乏思想和不知所措的时代，而毋宁是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迅速地超越前人的时代，即，一个跨过了古代所曾达到、而中世纪又在恢复古代思想技能的文艺复兴时终于再度达到过的那个科学最高水平的时代。

人类的思想从来没有象在新近的专制主义时代中那么广阔、那么深刻、那么带有大胆的批判精神。这个时代被称为启蒙运动时代，而在德国，则更在前一点，还应该称作是古典哲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时代。可以说，费尔巴哈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属于德国专制主义时代的。甚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初期活动，也还包括在这个时代里。

当然，在法国和德国，那个时代的精神活跃不应完全归因于本国内各工业阶级对教士、贵族、君主制的日益增强的反抗，而毋宁也应归因于邻近各国反抗获胜所造成的激励人心的榜样：首先是荷兰人反抗哈布斯堡王室的专制主义，接着是英国人反抗斯图亚特王室的专制主义。后来，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对法国人是一个很起鼓舞作用的榜样。最后还有法国大革命对于德国的榜样，它所以特别有力地影响了德国思想，是因为德意志民族最初是只能够在思想上而不能在行动上进行革命的。

因此，近代的专制主义完全起了另外一种作用，不同于古罗马的专制主义在一个疲惫的、对自己绝望的社会里所起的作用；那个社会并不渴求冷静的现实知识——现实太可悲了——，却渴求超自然的奇迹，只有奇迹仿佛才是脱出人世“流泪谷”*的唯一出路。

诚然，古罗马的专制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和近代专制主义相同的倾向：在近代和古罗马，所有的人在君主及其官厅代表者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这就是说，不管出身于什么家庭、什么等级、

* 聖經《旧約》，詩篇，第八十四篇，第六节：“他們經過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什么地区，人人在没有权利这一点上是一律平等的。在罗马帝国里，贵族的一切特权，罗马城的市民的一切特权，都很快地便消失了。基督教所宣扬的一切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只不过是一切人在皇帝面前一律平等的一个反映。罗马皇帝从帝国的一切地区、一切等级中收罗他的工具，要求一切臣民毫无差别地一律对他顺从。

近代的专制主义在一律平等方面还没有作到这个地步，因为它不是在一个一切政治热情完全疲惫的时代产生的。它倒也创造了一个人人必须服从的中央集权官厅集团，但是，它并不是单独依靠这个官厅集团来进行统治的，而毋宁也要依靠一批贵族和一批教士，这固然由于他们已不再对它独立抗衡，但主要因为它必须利用他们作为支柱。它不能简单地取消他们的特权，那样将等于自挖墙脚。然而，专制君主手下的官厅集团却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尽可能取消他们的一切特点和特权。

民主革命只不过把专制主义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这种努力继续下来而已，但是，只有民主革命才有力量把这种努力贯彻到底，把贵族和国家教会在法律上的特权完全废止。这一点如果说还没有作到，那末，随着民主制即各种民主成分的继续增强，是必然会完全作到的。

现代民主制不同于古代民主制，其原因固然在于它所由产生的历史形势，却也同样在于它所依据的社会基础。关于社会基础的不同，我们已经多次地讨论过了。这里只须再说明几点。

古代民主制始终是建立在奴隶制以及各纳税地区由自己的共同体来进行统治这两点上的。现代民主制是从城市里的劳动自由中产生出来的，它必然力求在广大农村里也有劳动自由。而且，现代民主制不容许在国家里有任何特权组织来统治和剥削国家。它给国家的所有成员都带来许多权利，这一点很不同于古代民主制，古代民主制在最良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给城市共同体的所有自由市民带来权利，而城市共同体从来也不构成整个国家。古代民主制只是城市的民主制，现代的民主制则是国家的民主制。

现代民主制是在国家形成以来第一次，因而也是在国家史上第一次，给所有成年的国家成员、给所有成年的共同体成员带来了充分的权利平等。这一点使现代民主国家在根本上有别于所有以前的国家。在这一点上，现代民主国家是和国家出现以前的那种共同体相一致的。但是，它不同于那种共同体之处，不仅在于出现了我们所已提到的国家机器，而且还在于它的内部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这一点上，不仅古代的民主国家和历来的其他形式的国家相一致，而且现代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并不立即消灭剥削。

有些社会主义者自以为很激进，因为他们认为，只须有必要的果敢精神和意志力量，就可以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对民主制嗤之以鼻，认为它只是“形式的”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因为只靠这种民主制的实现是不能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

我们只要用那些包括在民主制这个概念之下的具体权利来代替民主制这个抽象概念，这种见解的荒谬就立刻显明了。

一般说来，列举出一个抽象词语所统括的那些具体现象，来澄清这个抽象词语所带有的意义含混，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例如，不谈“经济”的需要，而谈资本主义企业主的需要；不谈农业的需要，而谈大地主的需要。谈论“资产阶级科学”未免显得奇特，因为不可能有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化学或资产阶级天文学。但是，如果我们说明，所谓资产阶级科学，指的是资产阶级科学家，指的是某种类型的教授及其门徒们，那就不会显得奇特了。

在民主制的问题上和科学的问题上事情正好相反。如果我们只就抽象概念来谈，那么“形式的”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样的词语听起来就好象很有道理。请注意，在这里如果谈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它所指的就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政党，而是国家公民的全部权利。

我们只要把民主权利列举出来，立刻就显出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形式的”和“资产阶级的”这些字眼是多么可笑。我们能够谈论什么形式的或资产阶级的普遍的、秘密的选举权吗？或者能够谈论什么

形式的或资产阶级的联盟权、结社权、集会权、出版权等等吗？

当然，无可否认，纯粹形式的民主制也是可能有的，而且很遗憾，实际上也确实时常出现。在民主权利仅仅存在于宪法的纸面、而在国家的实践中却遭到践踏的地方，人们就必须说那是形式的民主制。但是，在民主权利充分有效的地方，如果仅仅因为这种民主制的存在并没有立即也将一切阶级差别消除，也就说那是形式的民主制，可就完全是胡闹了。

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说来，这里的问题是：民主制究竟是不是无产阶级实现其社会地位的上升所必需的。如果人们将这个问题暗中偷换成：民主制是不是等于消除一切剥削，如果人们随后自鸣得意地把对后一问题的否定，当作对前一问题的否定，那就是玩了一套变魔术的把戏。

第十章 民主国家中的资本

在前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假如说有充分的民主制，那肯定是和剥削关系的继续存在不相容的。因为在那种国家里，虽说一切剥削关系并非都是军事行动所造成，而国家和剥削却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军事基础上的。奴隶制、个人的依附关系、被征服的公社的贡赋义务，全都建立在军事优势上面。假如没有这些关系，大概很难出现教士、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

国家是起源于军事行动，同样，国家内部重大的有决定性的权力转移，也总是通过武力实现的。现代民主制本身也并不是在别的方式下出现的。在英国革命的那些内战中，军事行动还是大规模的野战，后来则一般地是在首都中进行巷战。当然这也并非总是必然弄到真正动用武器的地步。有时君主派的军队不中用了，或显得不可靠了，反对民主制的对手们因而根本不敢应战，结果是不战而降。但是，民主制所以终于取得胜利，总是由于民主派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显得比敌人的武装力量更为强大。

甚至在民主制终于实现了以后，它也还经常必须依靠武装力量来防备敌对者的武装叛乱、暴动和政变。不过，民主派在居民中愈占多数，剥削者在战斗力和自信方面愈不能超过被剥削者，那末，上述那些反动的图谋活动便愈是难望成功，愈是不大会发生。

从来没有一个民主的阶层比英国的清教徒更有战斗力、更充满着力量的自信了。而英国的人民群众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这种力量和自信。清教徒们不论在自己的行列里有着多么不同的政治见解，在抗拒警察式的专横和独裁式的压迫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还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掌权者们对于现代情况有很多地方不了解，因此他们抱有一个不很小的期望，以为只要有一小撮共产党人花费一些必要的精力，就能够在英国建立起一个带有秘密警察的、废除出版、集会等等自由的布尔什维主义政权。这样的一种专政，无论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今天在英国都同样不可能成为长久存在的政权。一种政权，只要具有较多这样的性质，也就无疑马上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了。

对于法国说来，情形也是这样，即使在程度上并不如此之甚。

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情况比较坏些，而愈是靠近南方和东方，情况也就愈坏。那些地方不曾有一个顽强而富有斗争性的小市民阶层取得过民主，并给民主阶级遗留下反对专制压迫的独立自主的传统。我们在德国（包括波希米亚）和意大利，尤其从上一世纪初叶到七十年代，最容易发现小市民的反叛精神。而在西班牙和东欧，却看不到这种东西。

不过，这种小市民反叛精神在德国较多表现于思想上的勇敢，较少表现于行动上的勇敢；在意大利则较多表现为交通梗阻地区的盗匪行为和暗杀之风，而较少表现为公开的阶级斗争。作为与剥削者社会对抗的反叛者的那种盗匪，我们在古代的东方就已经见到过了的。尤其在那些管理不良、被搜括一空的农业地区，更是盗贼蠢起匪徒成群。

在今天的工业水平之下，手工业在东欧和东方的城市里再也不

可能获得它直到十八世纪时在西欧所曾具有的那种力量了。当然，在东欧和东方，工业也会日渐增强，但是，它将会跳过中世纪手工业的阶段；从前在西欧，在古代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之间，是曾经有过一个历时甚久的中世纪手工业阶段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才使得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可能。在东方，新的工业刚从西方传入，便立即带上了今天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发展的形式。这样一来，在东方就不能产生出坚强有力的小市民阶层，作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开路人而有利于赢得和保持真正的民主制。在东欧，尤其在亚洲，工业无产阶级并没有“市民的”，也就是说，小市民阶层所传留下来的民主运动的一切传统，就立即走上了争取民主制的斗争的最前列，从而给民主制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这意味着，在东欧和亚洲，历史的进程将不会是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单纯的重演。

因为，工业无产阶级在能力、倾向、需要等方面的发展，是不同于小市民阶层的。而且，争取民主制的斗争，决不是一场仅仅争取民主制所包括的那些政治权利的斗争，而毋宁也同时是一场争取改善民主主义分子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斗争。

但是，尽管赢得和保持民主制非常需要民主阶级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尽管在这件事情上现代民主国家仍象至今一切国家形式一样凭借军事暴力的方法，随着现代国家而出现的毕竟是一种全新的国家类型。

在民主国家内部——在民主制已经得到了保障的情况下——用武装斗争来解决阶级冲突，是不再行得通了。阶级冲突只能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宣传和投票来解决。在这里，就连群众性的大罢工，也不大被考虑为工人阶级施加压力的手段了。不错，群众罢工完全可以和民主制相协调，它纯然是民主制所保证的集会自由权利的一种广泛应用。但是，它只是在用以对付一个不为多数居民所支持的政府时，才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少数人想以停止生产为手段，来迫使多数人接受他们所坚决拒绝接受的某种解决办法，这在民主制下

是永远办不到的；而且这类罢工最后所遭到的失败，只可能使失败的政党和阶级，在相当长久的时期里大大削弱其斗争力量。

如果是少数人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多数人，而且是意在摧残民主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这时，总罢工对于保卫民主制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阶级斗争也如同剥削和阶级对立一样，并没有为民主制所排除。它仅仅不再是有破坏性后果的内战而已。就这一点而言，民主制确是缓和了阶级斗争。但是，经济方面的种种对立仍旧存在，甚至可能更趋尖锐化。

但是，在民主制下既然剥削统治阶级不再占有军事优势，剥削怎样可能仍旧继续存在呢？

实际上，在赋予国家的所有居民以同等权利的现代民主国家内部，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剥削都能够照旧保持的。依靠外在的暴力而建立在强制上面的那些剥削方式，正如奴隶制和人身占有制一样，是和现代形式的民主制不相容的。

然而，工业资本主义并不属于这类剥削方式。它并不是从军事暴力中产生出来的，也不需要军事暴力以维持其存在。在原始积累的种种方法之中，使用军事暴力诚然占有一个主要地位，但是，工业资本家并不是使用或促成原始积累方法的人。他们往往根本不同意那些方法。各种类型的掠夺者们以原始积累的方法聚集起来的那些财富，一定要通过商品交换的和平方法才能够从那些掠夺者手中夺取过来，转入工业者手中从而促进生产。毕萨罗*、哥泰斯**之辈从来不曾建立过任何工厂。

工业资本所以能够兴盛起来，不是由于它发挥了军事威力，而是

* 弗蘭西斯柯·畢薩羅(Francisco Pizarro, 1478—1541)，西班牙殖民者。1530年率領暴徒侵入巴拿馬和秘魯，在那里大肆劫掠，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 韋蘭多·哥泰斯(Hernando Cortez,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領暴徒侵入墨西哥，在那里建立了西班牙的殖民統治。

由于它比原有的那些生产方式更能廉价生产，因而从经济上说来对于社会更有好处。它之不同于奴隶制或农奴制之类建立在军事优势上面的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奴隶或农奴，并不比他们所取代的自由劳动者生产得更好些，而毋宁是更坏些。由于奴隶制或农奴制之类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很不合理，所以它们只是通过人身强制才强加给社会的。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必要这样作。

当然，这只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它由于在大企业中发展了生产力，所以对社会有促进作用。不过，它所以能作到这一点，全因为它在企业中使用了大批的雇佣劳动者，而它剥削这些雇佣劳动者，正如从前奴隶主剥削奴隶一样。而且，这种剥削，（这是个人收益，而不是社会收益），就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的目的。

然而，资本家所使用的劳动，不是直接的强制劳动，而是自由的劳动。自由劳动者所以不得不得受雇而成为雇佣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人身强制，而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广大劳动者群众的一无所有，仅次于大量资本的积累，乃是工业资本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劳动者的一无所有，也正如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在其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是野蛮的暴力行动，诸如迫使自由农民和佃户离开他们所经营的土地等等暴力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过，这种暴力同样不是由工业资本家施行的，虽然它的后果也如原始积累一样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

后来，工业资本的竞争甚至使大批手工业者也陷入破产，终至一无所有，但是这在资本主义初期还不起什么作用。

资本家在最初是以施恩者的面目出现的，他给那些饥饿待毙流离失所的一无所有者提供了工作。他被看作是施舍面包的人，人们对他感恩不尽。

工业资本一旦有了较大的扩展，它就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自行制造出来它所需要的大批无产者，而这样一来，无产者们就只好听人剥削了。这种情况，完全是通过没有任何暴力的和平道路，通过一些使产品价格低廉的办法发生的，这些办法使全体社会获得利益，当然不

免要有损于无数勤劳而有用的人的生存。但是，由此而获得好处的毕竟是多数人，是广大消费者群众，虽然这多数人中个别的人由于自己特殊的身分，由于自己是生产者，不免因此而蒙受损害。

但是，无产者们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不是由于有人使用了外在的暴力，而是受了现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逼迫。这种私有制并不是资本创造出来的。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如果盼望兴旺起来，也都需要这种私有制。如果他们的财产没有保障，不能免于私人或国家政权代表人的任意侵犯，他们就要衰败下去。财产没有保障，资本就无法形成。没有财产保障，谁还肯进行积累呢？就连雇佣劳动者也是坚持认为财产要有保障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继续保持了他们的作为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先人们的思想习惯，一部分也是由于他自己认识到，没有这种保障必然会使整个生产过程、从而使工人们自己的生存陷入极度混乱。

每当比较高度发展的工业劳动者暴动起义的时候，他们总是不但不从事抢劫，而且还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防止流氓无产阶级从事抢劫。

在1848年二月革命时，胜利的巴黎工人们在一些房屋的墙壁上写道：“偷窃者处死！”不论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或1918年德国革命时期，都不曾发生过抢劫事件。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之下，抢劫倒是家常便饭。但是，法西斯主义本来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人，而是无产阶级的践踏者。

古代的那些在奴隶制和徭役制影响之下取得了胜利的暴动起义，表现出了和我们时代的无产者恰恰相反的态度。如果说，列宁在1917年竟能提出“掠夺掠夺之物”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实际被遵循了，那末，这就证明俄国的那些城市还带着多么深厚的东方特性。

麦克斯·韦伯有一次提到莫斯科，曾说它直到废除农奴制的时候都还“完全带有着—座东方大城市的那些特征”（《经济与社会》，第585页）。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就已被废除了的农奴制，直到今天显然还余波未已。

如果说,工业劳动者也象工业资本家一样拥护对财产的保障,那末,这自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财产的看法是一致的。劳动者反对任意侵犯财产以有利于各别的人,但是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位于财产之上的,而且不管什么地方,社会利益同某种财产发生了冲突,这种财产就必须让步。在资本家看来则相反,财产,或者至少他的财产,是在社会之上的,他坚持认为对他的财产拥有绝对的权利要求,国家和社会都必须尊重他这种权利。

这种权利是劳动者所不承认的,不过,劳动者对待工业资本,必须不同于对待前资本主义时期那些形式的财产。无须付与任何补偿,出租的土地可以没收,奴隶可以解放,封建法权可以废除。在这样做的时候,佃农、奴隶和隶农都不会受到什么损害,而是恰恰相反。

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这一类的财产侵犯,往往是一些地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干出来的,他们丝毫也不感到良心不安。

工业资本则相反,是不能简单地剥夺它而不使社会和劳动者本身受到经济损害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下子同时改变成社会主义企业,而只能逐渐地改变它们。但是,那些暂时还有必要保留的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它们的占有者们必然料到这些企业明天就会毫无补偿地从他们手里被夺去,那末,他们就会不再继续经营它们。当然,有许多资本主义企业是能够被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立刻加以社会化的,甚至往往必须立刻加以社会化,如果它们已经带有了垄断的、压制整个社会的性质的话。对于这类企业,如果它们的占有者们不能自愿同意国有化,人们就可通过特殊的立法来强制实行,而这种做法,从经济上或无产阶级道德观念上考虑,看不出有任何抵触或不相一致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即被剥夺的资本家们得到充分的补偿。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对待这些资本家同对待其他那些所经营的企业尚未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化的程度的资本家们比较起来不公平,但从经济上看,也是不聪明。因为如果不作那种补偿,就取消了其他的资本家继续经营他们的企业的一切动机,因为如果他们必然估计到,他们投入企业之中的资金不久便会

$$\begin{aligned}
 &= - \int_0^1 \frac{1}{1+x^2} dx \\
 &= - \frac{\pi}{4},
 \end{aligned}$$

故等式不成立.

等式不成立的原因是被积函数 $f(x,y) = \frac{y^2 - x^2}{(x^2 + y^2)^2}$ 在点 $(0,0)$ 处不连续, 不满足本节学习要点 3 中积分号可交换的条件.

第三节 含参变量的广义积分

含参变量的广义积分和函数项级数有许多平行的定理(前者是连续型理论, 后者是离散型理论). 与讨论函数项级数一样, 首先要讨论收敛域. 同样, 一致收敛概念是本章的难点, 广义参变量积分 $\int_0^{+\infty} f(x,u) dx$ 也有类似函数项级数 $\sum_{n=1}^{\infty} u_n(x)$ 一致收敛的判定定理等. 所以, 在学习这一节时, 应与第九章第二节的函数项级数比较着学习, 归纳出哪些是平行的理论, 并同时注意到不同点.

学习要点

1. 广义参变量积分(包括无无穷的广义积分与无界函数的广义积分)收敛域的求法

使 $\int_a^{+\infty} f(x,u) dx$ 收敛的 u 的全体称为广义参变量积分的收敛域. 求收敛域主要用广义积分的收敛判别法.

2. 广义参变量积分一致收敛的概念

(1) 无无穷的广义积分 $\int_a^{+\infty} f(x,u) dx$ 一致收敛的定义

设 $f(x,u)$ 在区域 $D(a \leq x < +\infty, \alpha \leq u \leq \beta)$ 上连续, 且 $\int_a^{+\infty} f(x,u) dx$ 在 $\alpha \leq u \leq \beta$ 上收敛, 若对任给的 $\epsilon > 0$, 总能找到仅

说来是一种暂时的经济必要，而且对于被剥削者说来也是如此。只要它还是一种必要，它就不需要军事暴力来防范全体劳动阶级。不错，资本是需要有所防范，它固然要防备流氓无产者的财产侵犯，有时也需要防备少数被资本主义的放纵恣肆弄得贫困不堪的劳动者阶层的绝望暴动。要给资本提供这样一些防备，有警察就够了。

因此，资本是能够和民主制所带来的那种新的军事制度配合得起来的，民主制的军事制度，要么是象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那样，将和平时期的军队缩减到最小限度，要么是象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至今所作的那样，将全体人民武装起来，使他们学会使用武器。这样一种军队，可以成为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但不会象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里那样为国家里的少数人服务，让这少数人凭借军事威力压制多数人。

工业资本和现代民主制创造出了一种过去完全不可能有的国家类型。

第十一章 民族国家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到，这一点也是现代民主制国家不同于从前那些国家形式之处。

我们知道，国家的特征不单单是阶级统治。国家还有第二个特征，其重要性不下于阶级统治，那就是，国家是由许多、往往为数极多、因而必然规模很小的共同体结合而成的一个为某一征服者部落所统辖的大整体。

即使在国家出现以前的一个共同体内部，也可能发展出剥削统治阶级，但这个阶级的成员还不能摆脱维持生活的日常劳动。因为劳动生产力还太微弱，不能提供大量的剩余产品。在被剥削者人数很少的那种情况下，剩余产品数量不足以使剥削阶级过富裕的生活，尽管剥削者的人数也还非常少。

在国家里，许多共同体结合在一起，剥削阶级才有过富裕生活的

可能。许多共同体结合起来，意味着被剥削者的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可能随着国家的日益扩大而增加到数目极为庞大的程度。这样一来，即使各个剥削者的剥削所得仍旧十分微少，剥削总量却增加了。剥削者们这时就有了可能，不仅自己不作一切“普通的”劳动，只从事于战争、统治和享乐，而且还使另外一大批人摆脱原始方法的求食劳动，不再去打猎、捕渔、畜牧或种地，而为他们剥削者私人服务，利用这些人来美化剥削者们的生活，使之更为内容丰富，更为安全舒适。这时，工业、艺术和科学才有可能成为特殊的职业，许多人专门以此为生。这一发展的一个最重要部分，是在农业领域之外、即在城市里完成的。这时开始出现的国家文明的发展，在主要方面和城市的发展是同义语。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里，情况只有很微少的改变，而且这些改变一般地都是城市带来的。农村相对于城市说来显得是一个僵固不变的庞然大物。国家的往往十分迅速而灿烂的向上发展，在根本上乃是城市的向上发展。

国家的几个主要的类型，是和国家里的城市的主要类型相一致的。我们已经知道城市有这样几个主要类型：

1. 东方的内陆城市。这种城市对国家权力有着最大的依附关系。

2. 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城市。这种城市完全不依附于一个凌驾其上的国家权力，倒是自己成为这种权力的掌握者，并因此而成为城邦或者说城市国家。

3. 中世纪的内陆城市。这种城市既不象东方内陆城市那样完全依附于国家权力，也不象古代城市那样和国家权力成为一体。

不管那些和城市的这种不同类型关联着的国家类型是多么各不相同，也不管城市的发展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即是知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一种文化发展，国家和一切文明的基础却始终是国家所掌握的——最初是征服者部落所掌握的——那个军事力量，因为首先是通过军事力量许多不同的地区才结合起来，然后从它们的结合中才产生出国家。

从这种结合中得到好处的，差不多只是统治和剥削阶级及其寄生者们。对任何一个被征服地区的广大居民说来，这种结合只意味着接受剥削和强制，丧失财物和独立。

一个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只要还有战斗能力并有过政治生活的才能，他们就总是力求重获自由，摆脱国家的束缚。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叛。如果他们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且不再热衷于恢复原来的共同性，那末，他们就会毫无抵抗地归顺国家，不过，这种归顺当然是纯粹消极的。他们决不会在国家面临崩溃危险时努力维护国家的团结，他们也不关心谁来统治这个国家，只要新的统治者或剥削者不比旧的更坏，谁来统治对于他们都是一样。

不论在前一种情况下或在后一种情况下，都只有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在维系着国家。

古代暴君制度的出现，使这种状态达到了最高点，因为暴君制度甚至将居民在国家里一直还保有的那一点儿残余的政治自主性也扼杀了。这时除了君主手下的官厅以外，再也没有维护国家免于崩溃的任何因素了。

看来，在基督教的西方，公侯国家所起的也是这同一种作用。公侯国家的专制主义从商品贸易日趋繁盛的时代，亦即我们称作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时代起始，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我们曾经谈到过，中世纪结束时期以来近代专制主义的向上发展，是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结束时期罗马帝国的那种社会气氛中完成的。在罗马帝国中，暴君制度是在一个经济和精神都趋于衰落而居民对国家日益漠不关心的时代巩固下来的。

相反地，在基督教的西方，专制主义是和工业资本同时，在一个生产力和知识迅速发展、对国家事务的关怀至少在大城市的居民中日益增长、而在思想上有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大无畏精神的时代壮大起来的。

自从宗教改革以及紧接着的启蒙运动以来，时代的特征，不再是对暴君制度的淫威表示卑怯的屈服，至多只在思想上逃入彼岸世界

以求减轻暴君的淫威之苦，而毋宁是日益增长的反抗，首先是思想上的反抗，但可能的时候也表现为行动的反抗。

于是专制主义就造成了一些与前此全然不同的后果。

在专制主义之下，国家的官厅制度对全国一切地区的压迫都是一样程度的。所以反对国家官厅制度的斗争，也就席卷国内一切地区。争取民主的努力，将全国一切地区都团结起来，合而为一。国家机器的集中化，使某一个特殊的城市变成了国家的中心点。

在中世纪，国王们或者是仍象贵族们一样住在城堡里，或者带着扈从时而住在这一个城市时而住在那一个城市，那时的国家机器还小，需要的人员不多，他们这样跑来跑去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国家机器后来变得愈是庞大，便愈有必要将它固定在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就成了王都，地位高于所有其他城市。

这件事情的发展是和国王权力的增强联系着的。不仅国王和大部分国家行政人员与军队以及军队首长们都住在京城里，而且宫廷贵族们也都住在这里。首都以可能最完善的交通工具和全国各地联系着，把全国各地的大量剩余价值，都汇聚到京城里来，供人们在这儿耗费。而这样一来，又引诱来一大批在“外省”没有前途、想到大城市中碰碰运气的人。于是，全国的知识分子，当然其中也有流氓无产阶级，都争先恐后涌入首都。

自古以来城市便已具有这种作用，所以巴黎被称为塞纳河畔的巴比伦，柏林被称为斯普里河畔的雅典，是不为无因的。但是，近代的大城市，与东方的大城市不同，却象古代的城邦一样拥有着顽强好斗的人民群众。可是同时，它又象东方的城市一样，而且在更高的程度上，影响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近代的首都是在交通和工业不断革新的时代出现的。

在首都通用的语言，成了宫廷、国家行政部门、法庭和培养官吏的学校中的语言，成了军队中发号施令的语言，但也成了不仅住在京城、而且住在全国各地的有教养的人的语言。

在国内各地被人使用着的另外一些语言或方言，都没有发展出

自己的文献，在学校里也不传授。它们变成了没有教养的人的语言，或者只限于在家庭里使用，或者完全消灭掉，以至最后，国家里所有的人便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首都居民在文学、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生活和活动，成了全国的表率。

代表着不同省份的人们，聚居在首都，在首都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团体，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从首都日益向外扩张，终于将全国居民甚至较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都包括在自己之内。^①

如前所述，我们有时发现在古代，尤其在罗马帝国，早就有了类

① 不结合成为一个组织的社会团体，大半都是很难划清界限的。社会本身，无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或一个阶级，或一个作为具有一定信仰的信徒总体的宗教，都是如此。各个教会是有确定的界限的。然而，谁能够说出真正的基督徒有多少人？他们以什么为特征？

民族这个概念也是难以划清界限的。即使用同一个词表示两种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用两个不同的词表示同一种团体，也不会使困难减少。

在具有古老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西欧，每一个国家，其居民都觉得和自己的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一个国家的居民就称为一个民族。就这个意义讲，例如，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比利时民族。

我们在欧洲愈往东走，就愈发现在一个国家里有許多部分的居民不愿意从属于国家，他们在国内形成自己的民族性共同体。人们或者同样称它们为民族(Nationen)，或者称它们为民族集团(Nationalitäten)。最适当的办法也许是只称它们为民族集团。这样，在比利时民族内部，就可以将法蘭德斯民族集团和窩龙民族集团区别开来。不过，民族和民族集团这两个词在一般的使用上是不加区别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奥托·鲍威尔在一本重要著作《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主义》(«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維也納，1907年，第二版，1924年)里极详尽地论述了民族(和民族集团)的问题。

该书第一版问世后，我曾经对鲍威尔的观点表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没有能够消除他在第二版序言中进行反驳的意图，不过，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象乍一看来那么严重。奥托·鲍威尔将民族(和民族集团)看作是“由命运共同体成长起来的性格共同体”，我却将它看作是语言共同体。

但是，鲍威尔也并不否认民族是代表着一种语言共同体。他明确地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也不否认民族(和民族集团)正如一切共同体一样，

似的发展。在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语至少成了一切有教养的人的语言，甚至成为全体居民的语言。但是，这种发展是在导致罗马帝国完全灭亡的那个帝国衰落的时期中出现的。

现在，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这一发展的终局不是国家的衰亡，而只会是国家中君主专制这一统治形式的消灭。这种君主制的继承者，不会是那些没有能力引导国家在过去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未开化民族，而是由现代工业产生出来的、建立在一切国家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平等上面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不仅能够建立在现有基础上引导国家继续向前发展，而且还可以将国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且和一切存在得比较长久的这类共同体一样，在它的成员中间会发展出一系列的性格特征，从而变成一个性格共同体。

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在于，我所着重的是语言共同体，鲍威尔则着重于性格共同体。人类的一切共同体都是命运共同体，存在得久了就变成性格共同体。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阶级、一种行业或一种宗教也同样如此。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民族是一个语言共同体，语言极不相同的许多人则可能属于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行业、同一派宗教。

而且，在还没有成为纯粹的民族国家、而仍旧是多民族国家的那些国家里，各民族集团之间的斗争全然是语言斗争，所争执的问题是究竟应该由哪一种语言、以及从而（这是关键所在）由哪一个语言共同体来统治国家、剥削国家。我们唯有将民族集团(Nationalität)看作是语言共同体，才能理解这种斗争。

不过，我也愿意接受奥托·鲍威尔的一个论点，即要想了解各别的民族和民族集团，仅仅将它们作为语言共同体来研究是不够的。

当然，在考察民族和民族集团时，问题不是仅仅在于了解我们时代的语言斗争。在现代民主制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切民族和民族集团，也如同一切国家及其国民一样，都各有其自己的历史和一种由此历史而产生的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对于该民族如何影响着我们时代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要想说明这一点，将民族作为语言共同体来理解是不够的，将它作为性格共同性来理解就十分重要了。

奥托·鲍威尔本人对于说明民族性格作了许多重要贡献。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我始终也认为历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根据各个社会结构的命运来说明它们的特点。由民族的命运共同来推断它们的特性，是我们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我们不主张以先天的不变的种族特性来解释民族。

——考茨基注

但是，民主制将国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从专制主义那里或多或少全盘继承下来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以后，不仅引导这样一个国家继续发展下去，而且还将它整个倒转过来。

不再是国家形成民族，而是民族形成国家。在专制制度之下，不问居民愿意不愿意，语言复杂的许多不同地区是一起被征服的，甚至最后它们一起被看作是公侯们的私有财产，从而一起被世代继承着，并且使它们的居民不分彼此互相通婚。

专制主义力图将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法律和同样的经济政策强加给这些不同的地区。

在民主制度之下，这一切都已倒转过来。当某些地区的居民，由于相同的语言或其他共同的纽带而感到共属于一个民族的时候，民主制就努力将这些地区结合成为一个实行自治的共同的国家组织。政府应该由人民里面产生出来。在行政管理中，在法庭上，在学校里，在军队中，都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国家的团结一致，对于一些使用别种语言而竭力想在国家中取得特权地位的部落的存在，是不能容忍的。同样，一个民族，如果要分裂成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注定虚弱无力的各个小国家，这也是不能容忍的。

民族国家这一倾向，恰恰也是从产生现代民主制的那些条件里产生出来的。这种倾向是同现代民主制有着内在的联系，同样是建立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上面的。民族自决的实际进展正如同工业的实际进展一样，也是不可遏止的。民族自决不仅在确定国家体制和国家行政上起着作用，而且在确定国家疆界上也起作用。

但是，从专制制度那里接收下来的国家机器，当然拥有一种专制主义的保守力量，而且，许多阶级利益都依存于国家机器，因而民族自决在国家的体制和行政方面受到种种挫折阻碍，只能十分艰辛地向前进展。民族自决在国家疆界方面，则因为疆界问题不仅关系着愿意确定那个疆界的那个民族，而且也同样关系着相邻的民族，所以会遇到另一种强大的阻碍。如果说，民主通常总是依靠武装暴力才

从军事君主手里夺取来的，那末，争取建立民族国家这一努力，也往往会引起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

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对于民主制没有好处，对于民族国家也没有好处。战争永远是不利于民主制的，它促成军事独裁，而军事独裁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合法形式和革命形式，但无论如何是要限制人民的自由运动的。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战争也同样是一种极不适宜的手段。因为在重新划定疆界的时候，胜利者固然将在这个问题上实现本民族的自决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忽视对方的自决要求。

所以，以战争来确定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这一办法，会导致一个民族以损害其他民族的自决、亦即以损害其他民族的民主，来实现自己的民族自决。

但是，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民族自决终归到处要得到贯彻，那末，一个国家只要它的疆界是依靠对一部分外国民族而形成起来的，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得到安宁，就要一再受到外来的威胁。

俾斯麦所以受到颂扬，是因为他的政策给霍亨索伦王朝建立了军事力量，以符合王朝利益的方式，把德国统一起来。德国是通过两次获得胜利的战争统一起来的：一次战争违反着住在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的意愿，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分裂出去；另一次战争违反着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所强烈表明的意愿，将亚尔萨斯—洛林并入了新帝国。

正是由于后面这一次违反民族自决，法国和德国之间才积下后患无穷的仇恨，而这一仇恨，归根到底，对世界大战的发生负有责任，——当然不是对世界大战的爆发方式和失败方式负有责任；对此负责的不是俾斯麦的兼并政策，而毋宁除了奥国的统治者之外就是威廉二世及其（首相以下的）廷臣、走狗和将军们。

假如普鲁士的民主反对派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就已强大得足以在军事冲突中取胜，那末，德国大概就只会是通过与哈布斯堡王室及霍亨索伦王室相对立的民主方法统一起来的了。假如是这样，那

末德国固然不会得到亚尔萨斯,但也不会有后来失去它的问题了。而且,即使在一场德国革命当中,波森*的东部站到革命的波兰人一边去了,我们仍会保持住且泽**和上西里西亚***这个“走廊”。况且还有整个德意志奥地利。

当人们用战争的办法来划定民族国家的疆界的时候,胜利带来的祸患也并不比败北带来的少些。对于这一点,那些滥用自己的胜利来强夺表示反抗的地区的世界大战战胜国,将会有所体验的。

1919年确定的那些疆界,就其部分地符合了民族自决的需要来说,意味着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就其不符合有关地区居民的渴望、而毋宁引起他们的憎恨而言,则意味着对战胜者经常存在的一个危险。

在民主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持久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与那些表示反抗的边疆地区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将是势在必行的。除非是,有关的国家前此已经保证了被征服者们的自由和幸福,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心。民族压迫的道路在这里是最不适宜的。它和当今国家生活的条件不能相容。

当然,如果战败者企图通过一次新的战争来消除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那也将是令人不敢设想的。一场新战争只能消除现有的不公平,而代之以另一种不公平。

幸而这样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欧洲的民主主义成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从而也在政治方面强大得够快,能够赋予国际联盟以力量和愿望,按照民族需要通过民主方法来划定各国疆界的话。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现存的独裁制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被一个民主政权所代替。一个这样的民主政权不仅能将俄国迅速引向经济繁荣,而且还能给国际联盟和国际联盟中的民主主义增

* 即波兰西部的波兹南 (Poznan) 省, 德意志帝国占领该地后曾改称为波森 (Posen)。

** 且泽 (Danzig) 即波兰的格但斯克 (Gdansk)。

*** 上西里西亚 (Oberschlesien) 是旧普鲁士的一部分。

加压倒一切的威望。

现存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不论对内对外都是建立在军事暴力上面的。对民主地实现全面民族自决，不能作出任何贡献。

在今天，民族自决还遭遇着重重障碍。然而，它已经有了深远的发展，足以赋予国家以全新的性质。

现代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仅仅由于外来的强制、由于某个征服者部落的军事强制而将许多共同体维系在一处的那种结合物了，在那种结合物里，各共同体对于国家不是怀有敌意，就是漠不关心。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它的居民是依靠着它的，并且会誓死反对国家的任何一部分强行脱离国家。对于国家的各部分，不需要使用一点儿军事暴力来维系它们。

而且，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疆界从一开始起就由它的居民的分布情况划定了，明确规定了。民族国家的居民，既会挺身而出反抗任何侵略者，又不会从事侵略以损害邻国，如果邻国也同样是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话。

我们在这里，没有考虑殖民主义侵略政策，这种政策是许多近代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这里既然只考察一些一般倾向，所以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详细讨论。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出现是针对着没有资本主义工业、没有现代民主制和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意识的那些国家的。但是世界可以说已经分割完毕了，而且，由于欧洲资本的扩张能力，现在又由于美国资本的扩张能力，资本主义工业正在那些殖民地地区里迅速发展起来。有了资本主义工业以后，在殖民地地区里与其说会出现一个本地资本家阶级，不如说会出现一个有斗争能力和斗争精神的、带有强烈的民主倾向和民族倾向的本地无产阶级。它的这种民主倾向和民族倾向，很快地就会使任何侵略者都对统治和剥削彻底厌倦。群众为了反对一个外国剥削者，会比为了反对一个当地出生的剥削者，更容易团结起来。

我们愈接近于这样的状态，即一切相当工业化的国家都普遍实现了民主，则使用军队来保卫国家就愈成为多余的事。依靠民主力

量来保卫国家在任何地方也就愈加可靠。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民主制，国际联盟和永久和平便都是乌托邦。在康德那个时代，国际联盟和永久和平还都是乌托邦。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至少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里，民主制才开始变得充分坚强，以至从历史上崭新类型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共同生活里，也可能成长起来一种通过这些国家的某种联盟来废除军队和消弥战争的崭新制度。

在这种现代民主制的国家里，不论是对内部劳动阶级的剥削，或是与邻国的对外关系，都不是建立在统治阶级的军事力量上面的。但是直到现在，即使是在民主制下，国家机器也始终还是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里，为他们的剥削目的服务的。

第十二章 国家机器的成长

a) 军队、交通、关税

在民主国家里，压制下层阶级的那些职能既然日益退居于次要地位，那么人们就可以设想，原来主要为执行这些职能而设的国家机器，将因实行民主制而越来越无足轻重了。这也正是自由主义的见解。最大胆、最激进的自由主义，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想将国家权限减少到最低限度，正如拉萨尔所嘲讽的，想使国家仅仅成为一个守夜的警卫。

但是实际上，在民主制日益发展的时候，国家机器不是变得微不足道，而是变得日益范围广阔。这是和民主制的倾向相对立的；但是，这也正是使民主制不可遏止地向前迈进的那同一个工业发展所造成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对立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对立面就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不断扩大内部没有关税壁垒而能进行自由贸易的经济区。这种经济区，如果其他条件一样，就愈大愈繁荣。这就是美国在经济上所以远远胜过分裂为许多经济区的

欧洲的原因之一。根据这个理由，俄国只要有了民主政权，它在经济上就必然突飞猛进地繁荣起来。

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想把这个因素说成是“帝国主义”，即现代国家力图不断扩大的理由根据。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本书第四卷第三篇第八章里讨论过了。

实际上，在今天的欧洲，我们看到有一种和国家不断扩大的倾向相反的倾向，即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些巨大的民族集团国家纷纷解体、分裂为许多较小的民族国家的倾向。这乃是民主主义强大起来的必然后果，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在这里又和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倾向对立起来了。

政治对经济的从属性，并不象有些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拥护者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它可能招致一些严重的矛盾。通过一个更高的综合来消除这些矛盾，乃是历史发展的任务之一。对于欧洲国家说来，这就意味着，有必要把那些不同的、各自为政的、或多或少按民族划分疆界的国家，合成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区。这个任务不是不可能解决的，但由于世界大战的种种后果却加重了解决的困难，因为世界大战已将一些较大的经济区打碎，代之以许多较小的国家。

唯其如此，在力图日渐限制国家权力的民主制倾向，和力图不断扩大国家的职能并扩大为完成这些职能所必要的国家机器的经济发展倾向之间，也必须有一个综合。

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一书（1891年柏林版）里说：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

在实际上，至今的一切革命，不仅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都要提高国家开支，增加官吏。而且一般说来，至今的一切革命也都沒有能够减少军队的开支。

民主制带来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也就是带来了军队的大量扩充。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1页。

激进的民主主义反对常备军，赞成民兵制，然而这是出于政治的理由，并非出于经济的理由。我们要求建立民兵，为的是要从国家权力手里夺下那些与本国人民群众作对的常备军的武器。但我们决不可以指望这样就能缩减军事开支。恰恰相反，民兵制有可能比常备军制训练出更多的兵员，要求供应更多的部队以必要的装备。世界大战中的那些庞大的军队，最后说来也无非都是民兵。

今天在许多国家里，都有一支小小的、由征募来的士兵组成的职业军队。但是，职业军队，只要象在那些盎格鲁萨克逊国家里那样，不是强迫参加的，而是自愿参加的，那末它骨子里就暗含着战时可以实行全民征兵。这样做法，使战时所需的军备供应在平时已经有了准备。

而且这种军备还在急剧地扩张，因为技术正在和民主以同样的步伐向前进步。现有的武器不断地在改善，而新的、往往威力异常巨大的武器，在不断地发明出来。这些武器不仅以其战争时期所能造成的万分可怕的灾难威胁着我们，而且还意味着和平时期的的一种愈来愈重的负担。

德国人民不必抱怨凡尔赛和约，这条和约减轻了德国的军事开支，免除了德国的殖民耗费，从而使德国在恢复它的因战争而萎缩了的经济时，轻易得多。

德意志共和国已经再度赢得了国际声誉。这件事却同时表明，今天一个民族，它的威望之取决于它的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何远远胜过取决于它的军队的多少。事实上，在民主主义大大发展了的今天这个时代，只要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的国际联盟这种组织，一个立身于许多民主国家之中而并不抱有任何侵略意图的国家，就不再需要什么军队来从事自卫了。如果俄国有了民主政权，加入了国际联盟，那么普遍裁军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消除了。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因此，直到现在民主的进步总还是伴随着军队和军备的不断扩张，从而也伴随着军事性质的国家机器的不断增强。

我们当然可以期望，从现在起民主的任何进步都将产生与前此相反的作用，即是说，当民主进步不象过去那样只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扩展到了一个较大的区域，即使不包括整个今天的资本主义（连同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却也尽可能地包括整个欧洲，从而使普遍裁军成为可能了的时候，民主进步将会造成与前此相反的情况。

但尽管如此，国家机器仍将继续扩大。它因担负和平时期的工作而必须履行的那些职能，并不减少，反而增多。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国家除了要履行它统治下层阶级的那些原始的固有的职能以外，在某些情况下早已增加了一些经济性的或文化性的职能，例如兴修水利或建筑公路等等。

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里，需要建设公路或兴修水利的机会都不多。所以国家不从事这类工作。①

无论如何，在整个中世纪，大规模的水利或道路建设，是既不具备技术力量也不存在客观需要的。

当欧洲人口在中世纪这段时期中变得稠密起来，而具有较高技

① 一个民族是否从事水利建设，在爱德华·迈尔看来，主要决定于“种族的天赋”，“种族的天赋固然能够由于外在的影响而被促进或被阻抑，但在其核心却存在着某种确属固有而无法深入解释的东西……自然界、土地的素质等等所提供的那许多可能性，其中从来只有某一些被人类把握住了——在这里我们只消提一提美洲的那些大河谷，它们原本可以象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黄河的河谷一样，成为巨大的文明发展的中心地，然而却完全没有被印地安人利用过。”（《古代史》一书导言，第65页）

爱德华·迈尔的某一位奥古斯都时代的先辈，也可以同样很有理由地断言，正是由于日耳曼人天赋太低，所以在那时易比河或奥得河的河谷还“完全没有被”日耳曼人“利用过”，而闪族人却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懂得在沙漠里的尼罗河河谷等等地方创造出高度的文化。

显然迈尔认为，河谷就是河谷，不论在哪里都必然会起同样的作用，只要人类的各种族都有着同样的天赋；他完全不考虑河谷位于什么样的气候地带、河谷区的居民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难道也是决定于这个民族的天赋？有的民族是游牧人，有的民族是游牧人，还有些民族是定居的农民，难道他们都是天生如此永远不能改变的么？——考茨基注

术的工业城市出现了的时候，情况就立刻改变了。日渐增多的人口有时迫使人们兴修巨大工程，来向海洋夺取新的陆地；尤其是在荷兰，这种工程变得万分重要。另一方面，这时交往频繁起来了，这就要求改善交通工具，而交通工具的改善又转过来促进交通，提高对交通的需要。

这类建设工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是由某种纯属地方性的组织、由城市、马克公社来负责兴办的。但是后来规模扩大，其中有许多便不得不由国家来兴办了。而且，国家愈是一反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而增强了权威，它也就愈拥有兴办这类工程的力量。新兴的专制主义所以不得不改善公路，不止是为了商业上和交通上的利益，而且还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为了能够更迅速地调动军队。自从封建的应征军为雇佣军所代替以来，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已扩大了，而且从军的时间也比较长久了。

这时，国家既要修建军用公路，也要修建运河、海港等等。

这一类的任务在古代国家和东方国家里都是曾经有过的。但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技术革命，由于出现了铁路和电报，由于邮政事业扩大，这类任务就变得非常庞大了。在盎格鲁萨克逊各国中，铁路始终是私人经营的事业。在欧洲大陆上，最初也多半如此，后来却日益趋向于铁路国有化了，当然在铁路事业上也和公路建设上一样，这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至于邮局，就连在英国和美国，也是国家机关。

同时，铁路正如邮政和电报一样，对于全体国民的生存极关重要，因而铁路的建造和经营，即使在英国和美国，也不能不由国家来监督和调节。

这些新的国家职能，对经济生活发生的影响最为强烈。而且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企业性质的任务。生产过程从来都不是由个人任意安排的，即使当个体劳动者单为自己而生产的时候，他也不能任意决定生产过程。生产总是由社会调节的。但是在过去，起调节作用的乃是一些较小的组织，如马克公社、村社、城市、行会。在

中世纪,国家从不关心经济生活——除非国家也就是一个城市。

随着工业资本而首先出现的那种公侯专制制度,摧残和扼杀了城市和行会以及诸如此类独立组织的自治。它接替了这些组织的职能,另外还加上了工业资本带来的一些新的职能。

详细论述这些职能,未免扯得太远。这里只谈一个问题,即关税业务。

关税制度是由来很古的。往来各地的商人,在通过那些掠夺成性的部落的地区时,必须向这些部落纳贡,以求获得比较安全的护卫,这种贡物就是关税的起源。关税在最初只是征收关税者的一种致富的手段。在今天都还常常是这样的,例如财政关税。征收关税是一个实力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谁有实力,谁就征收关税。在中世纪,征收关税的城市、州郡、封建领主,多如牛毛。

新兴的专制政体逐渐取消了这些对它没有利益的关税,而代之以在国境线上征收关税。在国境线上征收的关税对于使新式国家成为一个紧密团结的统一结构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这样一来,关税除了使征税者致富的旧有作用以外,同时又日益取得了一种新的、促进工业资本的作用。除了征收财政关税以外,又开征保护关税。

只这征收保护关税一事,就已经使经济生活密切依附于国家政策了。而进一步的经济的发展,就要求国家对于经济生活进行越来越强的干预。我们只消想一想日渐增多的、社会政策方面的任务,想一想采矿事业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等等就够了,采矿从一开始起就总是部分地直接由国家经营,部分地由国家调节的。

b) 教育、司法、卫生事业

在许许多多其他领域里,也出现了国家从前不曾过问的许多任务。教育事业就是其中之一。在古代,教育大多是由私人经管,是一种家庭事务。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读书写字是后来才有的事,一般说来仅仅限于统治阶级范围以内。甚至在民主国家里,下层阶

级通常都是不会读书写字的。他们不需要学会写字，也不需要学会阅读。依靠口头交谈的办法来互相了解，就已经足以使他们获得他们需要的消息。

贝洛赫认为，“读书写字的知识在雅典是很普及的，虽然那里也还有些例外的情形。”（《希腊史》，第2卷，第1章，第275页）如果没有读书写字的知识，就不可能有贝壳放逐和陶片裁判等制度。这种保卫民主的制度，规定每年春季人民应该投票表示究竟在雅典有没有某个市民危害自由。如果多数人对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就再举行投票指出谁是这个危害自由的人，这个人就必须离开国土十年之久。每个投票人须投一张票（贝壳陶片），在票面上写明他认为有危害自由嫌疑的那个人的姓名。

这种投票法应该是以人们一般都能读会写为前提。不过，能够勉强写出一个姓名的人，不一定就能流畅地阅读，这就是说，不一定能从书本中汲取知识。而且在雅典，书籍是群众所难以获得的东西。贝洛赫本人也强调地指出了这一点。贝壳放逐法决不要求每个投票人自己写下他想放逐的那个人的姓名。

关于贝壳放逐法，有一段著名的轶事。某一次，要以贝壳放逐法来决定危险人物是泰米斯多克勒还是阿里司提戴斯。有一个雅典人想要投票指出是阿里司提戴斯，但是他不会写字，于是去找人代他在他的票上写下阿里司提戴斯的名字。他请他所遇到的第一个人给他写，那知这个人正是他所不认识的那个阿里司提戴斯。

可见贝壳放逐法决不要求人人都会读书写字。

无论如何，在古代的雅典，即使在它的精神发展达到顶峰的时期，也不曾有过一个国立学校。

“如果我们撇开那些靠公众出钱建立和维持的体育学校（Palästren, Gymnasien）不谈，那么国家对于公众教育就几乎还毫无贡献可言。”（《希腊史》，第2卷，第1章，第112页）

至于罗马人，贝克尔曾经说：

“国家对于教育毫不注意……国家一点也不曾想到亲自经办学

校。”（《伽卢士，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景况》，第3版，第2卷，第72页）

在中世纪，负责教育事业的是教会。在那些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国家里，教会所以能取得它的实力地位，首先是因为它是衰亡的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残余的保存者。它的力量不是出自当时十分可悲的现实生活，而是出自一个伟大的过去时代的传统。那些传统都是通过文字留传下来的。教会就凭借这些留传下来的传统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而且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它就毫不犹豫地以伪造的证据来补充真实的证据，或者消灭真实的证据。

对于教会中的职务人员说来，读书写字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知识。

教会不让私人有机会教导子女读书写字。在每座大教堂，每座修道院里，都建立起一所学校，这种学校教育学生，当然不是为了让它们能应付实际的生活，而是为了教会。

人民群众学会读书写字这件事，教会是并不关心的。相反，人民群众如果有了判断力，对于教会用以支持其权威的那些证据开始自行考察，那倒可能使教会感到很不美妙。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当城市强大起来、由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胜过教会传统而且与教会传统发生矛盾的文化的时候，人们便必然要求能有更多的、独立于教会之外的受教育机会。同时，货币经济的扩张，既增加了罗马教会对货币的需要也增加了受其剥削的人们对货币的需要，从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教会传统与现实文化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

在宗教改革者反对罗马教会剥削的斗争中，双方仍旧都是站在他们现有的教会传统的基础上的。宗教改革者们的种种倾向，原是从生活里产生出来的，然而他们也象维护罗马教会剥削的那些人一样，都向圣经和教会圣徒们的著作里去寻找论据。

正因为这样一来斗争是在文字上进行的，是一场关于书本的论战，所以一切反对罗马教会的人，至少也在阅读的能力上是同维护罗马教会的那些人相匹敌的。

对优良的平民学校的关切，是一切宗教改革者共有的特征。这是致使新教国家取得对旧教国家的经济优势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促进新教国家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而且它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或许比麦克斯·韦伯十分强调的卡尔文派清教主义所起的作用还更大些。

改善和普及平民学校所以势在必行，不仅是由于要反对教会垄断知识，而且也直接地是由于在城市里已经具备了新的经济条件：

“大教堂、修道院和教区学校中所施行的教育大抵内容非常贫乏。因此这种教育不再能够满足力求向上发展的城市的需要。大商业城市中的自由贸易要以在那种学校里无法得到的知识为前提，人们没有这种知识就不能与其他城市进行竞争。因此，对于独立于教士集团之外的新式学校的需要虽然早已产生了，却在和教士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后才得以满足，而且在最初也还只能同样是内容贫乏的。”（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第3卷，1870年埃尔兰根版，第61页）

这种城市教育事业，在德国是在十三世纪时开始的。后来，宗教改革运动又使城市的平民学校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改革时代，至少在城市里，广大阶层的居民必然已经懂得阅读了，否则当时出现的那些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的大量小册子和报纸便无法解释。也正是由于广大居民已能阅读，这才出现条件，使人终于发明书籍印刷。

随着城市自由的衰微和城市自治之为公侯专制所取消，平民学校便改由国家来经办了。这就是说，国家让公众组织负担学校的开支，自己却掌握着管理学校、规定课程、任用或解聘教员等等职权，以便保证学校里不出现任何自由思想。平民学校的水平被尽量压低，只限于读、写、算和教理问答等课程。从这时起，平民学校也慢慢在农村里广泛地普及起来，就这一点而论，专制制度是带来一点好处的。

至于对新兴的民主制来说，平民学校乃是国家关怀的最重要对

象之一。平民学校此时所须培养的，已不再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奴性的臣民，也不再是仅仅可供使用的劳动者，而是有思想有知识的人了，学校使人们对自然、经济和国家事务都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进入生活以后能够在自己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里，独立地继续培养自己。这就意味着国家的任务的巨大扩展。

除了平民学校以外，在中世纪末期的城市里也有一些较高级的学校、拉丁文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讲授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文，从而打开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就连这些学校，在专制时代也由国家接管了。由于工业和商业发展了，又由于知识分子的需要增加了，国家就另外又建立了一些新的拉丁文学校。

在若干城市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学者收聚生徒，给他们传授一种和当时的知识相应的高等学问。在中世纪，一切职业都必须组成行会。不仅手工业者，连艺术家如画家或诗人也都如此。学者们也是这样。在有些城市里，首先是在意大利的城市（如博洛尼亚）和法国的城市（如巴黎）里，相当多的学者及其生徒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些名符其实的有师傅、有伙计、有徒弟的行会，这些行会以一定的学习期限和杰出创作为根据，授与会员以可以从事科学实践或担任科学教学的权利或资格。这些行会，亦即所谓大学，按不同的科学分成一些分会，亦即学院。最初是三个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后来又添了第四个学院。这第四个学院起初称为艺术学院，这并不是因为该学院的教授们长于杂技（固然不少教授在这方面是能手），而勿宁是因为它包括许多自由艺术*（*facultas artistarum seu artium liberalium***）。后来人们称这个学院为哲学院。

大学变成了一切高等知识的中心，因而具有极重大的社会意义。无怪当时的统治势力不能若无其事地看着它自由发展。教会和国家都很早就竭力要使这些行会为自己服务，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管辖之

* 即文法、逻辑、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等七门学问。

** 拉丁文，艺人或自由艺术学院。

下。新兴的专制政体终于在这方面也战胜了教会，当然不是仅仅依靠鞭子，而是更多地依靠甜面包，依靠保证给予教授、博士、和大学生们以各种特权。大学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事务，它们首先是作为大批教士和官吏的生产所，须将国家所盼望的精神灌输给他们。

工业和科学的兴盛不仅促使许多新的大学建立起来，而且还促使现有的大学不断扩大，这尤其是因为大学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变成了官吏制造工厂和学术研究场所的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一方面必须传播最恭顺的国家思想，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最自由的学术研究。

大学作为研究场所，必须按照科学及其技术设备的发展扩充，增设数目越来越多、方面越来越广的新机构，例如附属医院、实验室，等等。

由于技术和经济有了发展，另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学校，这就是不仅宗教改革时代而且就连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时代也未曾见过的那些技术的和商业的中学与大学，这些学校也主要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城市来维持和管理。

但是，医学知识的发展不仅仅使医学教学机构扩大了，而且也使一般的卫生事业扩大了，其扩大的程度使卫生事业不再能够单由城市负责，而毋宁也同样成了国家的任务。国家一方面必须直接设立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机关，一方面将这种任务托付给其他组织，例如疾病保险会，这些组织可以实行自治，但它们的权限则是由国家法律保证了的。随着民主制的成长，对患病的贫困居民的照顾也在日益增多，在从前，国家是听任他们陷入不幸的。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法学家人数增多，由国家聘用的法学家例如法官也增多了。

大城市发展起来，罪犯的人数也随同增长，不仅有迫于贫困的犯罪者，还有出于贪婪的犯罪者，因为在这些城市里除了一些事业失败的人以外，还聚集着许多肆行机诈以图改善命运的冒险之徒，这些人在农村和小城市里是难以施展他们的活动的。

雇佣劳动者的组织，在经济上和道德上会给予它们的成员以他们彼此孤离时得不到的强有力支持。这些组织的成长，对迫于贫困的犯罪者的增多固然能起一种阻止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直到最近这个时代才有可能开始显出效果。在此以前，即使在民主国家里，一直是有着犯罪不继增长的趋势的。

不过，这还只是涉及司法活动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则在于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规定着个人或社团对其他个人或社团的权利与义务。在从前，大多数人都在自给自足的经营中生活着，或者只和少数几个邻人或顾主有着简单的、一目了然的关系。由于工业资本主义扩展了贸易，于是出现了日益复杂而范围广阔的种种关系，尤其在经济生活中。这样一来，法律制定和案情审判，也就更加复杂了，需经法庭裁判的冲突案件或权利义务不明确的疑难案件，也就增多了。

因此，司法事务也日益繁重起来。自从专制主义时代以来司法就已经完全变成了国家的事情，而在此以前则主要是在一些较小的圈子里处理的，比如，在中世纪的国家里，是由领主、村长、城市等处理的。

c) 稅 收

国家机器不断地向越来越广的领域里扩张，在民主国家里也是如此。而这样一来，国家机器的开支也增多，赋税也增多，因此又有了征税的国家机器。

在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前，征税的国家机器是很小的。在古代和中世纪，国家的开支在很长的时期中非常微少。国家的主要任务即其军事力量的活动，无须花费国家很多的钱，至少就陆军来说是如此。因为那些封建的战士和能作战的城市市民，参战都是自备武器和给养的。这在短暂的作战期间固然可以行得通，但战役的时间拖长，军队要远离家乡出外作战，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就必须由国家来负担兵员的给养。后来，当雇佣兵完全代替了封建的或民主的应

征军时，雇佣兵要求很高的薪饷，而且常常还必须由国家来装备他们，于是国家的开支就大大地增多了。海战则自始就是耗费庞大的事情。这样，征税就成为必要的了。

但是在最初，征税还是很简单的。人们在为数不多的几处商业集中地征收关税，另外还对一些被征服的城市和地方课以贡赋，各个城市和地方必须统一缴纳。至于城市或地方如何向下面分摊和征取这笔赋税，国家是不过问的。

那时候，国家时常完全不让官吏来经办关税和赋税的征收，而毋宁交由一些有钱的私人来承包，这些人有能力缴付大宗款项作为承包费，从而就取得对他们承包下来的这些人民尽量榨取的权利。

在中世纪时，国王的权力十分薄弱，不能强行征税。国王无须给他的骑士支付薪饷。为了执行国家当时所有的一些极少的其他职能，国王多半必须从自己的土地收入里拿出资金来。除了土地收入以外，他可以使用的还有一些关税以及向来对各村社课征的例行赋税。如果在这个时候偶尔必须支付某项较大的开支，为君主自己所力不胜任，他就不得不为此而向自己的“臣民”，即是说向大贵族和教会以及城市求乞。为了这一目的，君主不时要召集上述各界的代表开会，而这就是后来成立常设代表大会的起因。

每个等级都在会议上协商自己愿意为当前事件向国王承诺多少。各等级承诺下来的东西，当然可以用种种方式缴纳。但是，赋税的征课和分配，一直是国家的事情。

各等级万分顽强地向国家坚持要求，纳税必须出于自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国王与国会之间曾经起过重大的冲突，因为国王要征收未经国会认可的赋税。国王的这一企图，使查理一世断送了头颅。一个世纪以后，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一次同样的企图，使英国断送了它的属地。

在欧洲大陆上，新兴的专制政体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专制政体的官吏和军队，使专制政体能够强行征税。另一方面，当然也正是这些官吏和军队的薪给兵饷，使征税成为加倍必要。赋

稅收入远远不能滿足国家及其当政者对金錢的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就必须求助于发行公債、伪造貨幣、以及后来发行纸币。但是这些临时应急办法,不能长久解决问题。于是征課賦稅、征課越来越高的賦稅、征課花样一再翻新的賦稅,就成了国家行政的主要活动。而这样一来也就需要建立专管征課和催索賦稅的国家机器了,因为专制政体是不再通过领主和城市的中介而直接向农民和市民征收賦稅的。当时也曾经有一个时期,象在古代那样,实行賦稅承包,作为辅助办法。可是那只能让包稅人发财致富,对国家沒有好处。民主制是完全不能和可恶的吸血鬼交朋友的。征收國稅最后就完全由国家官吏负责了。

d) 国家性质的轉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机器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在不断增长,但是也意味着国家机器的性质在不断转变。如果说国家机器从最初产生直到近代,主要地是一种通过武力产生并依靠武力维持的军事组织,那末现在,其军事组织的意义,相对于其他一些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任务说来,越来越减退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任务,一部分是国家机器从一些较小的组织那里、特别是从城市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完全是新近才从过去从来沒想到的一些经济、技术、政治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这样一来,被剝削的下层阶级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从前,各别的阶级对于国家的关系是这样的:上层统治阶级,自从国家里出现了一个以上的这种阶级以来,就为爭夺国家中的权力而互相斗争。被统治被剝削的下层阶级则与此相反,只要感到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几乎就只想到推翻它们被强行嵌入于其中的这个现存的国家,从这个国家中摆脱出来,当然,它们感到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是罕见的。一般说来,被剝削的下层阶级总是听天由命。

现在不同了,国家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对于被剝削阶级说来也很重要的职能,而且这些职能是只有国家机器才能充分执行的。现在

就连被剥削阶级也越来越不大想到破坏国家或解散国家了，他们毋宁更想夺取国家政权，使之为自己服务了。而且同时，下层阶级的绝望的听天由命思想也日益消失，它们越来越大力参与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它们大力参与的斗争首先是争取民主，随后就是为争取利用民主对国家施加日益强大的影响使之合乎它们的心意。

尽管如此，国家至今却始终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国家机器仍和向来一样是维持剥削的。不过现在，剥削越来越少依靠武力了。从经济上说，剥削现在是来自一种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也是手工业者和农民之类的自由劳动者本身为保障其生产资料和产品所需要的；从政治上说，剥削是依靠一种国家机器，而这种国家机器则是自由劳动者本身为了自己也必然日益需要的。

这样，劳动群众对于国家就有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与国家的军事手段无关，甚至在完全民主的国家里也是存在的。但是，民主也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连同它的至今仍由大剥削者们掌握着的不可抗拒的暴力，从大剥削者们手中夺取过来，从而使统治的机器变成解放的机器。

第十三章 作为职业的政治

国家机器愈是变得庞大而复杂，操纵和运用国家机器的人就愈是需要具有特殊的知识。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国家里，这种人就是官吏，亦称官仔。在民主国家里，除了官仔以外还有各党派的政治家、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

认为民主制就在于废除官仔制，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机制庞大而多变的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任务繁杂的大组织都需要许多专家，专门致力于管理这种组织；在多数情况下，担负管理工作的人们还时常进行非常细致的分工。就连股分公司、职工会、合作社也都需要有官仔，甚至政党在有了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紧密性和一定的寿命以后，也是需要官仔机制的。

并非官行制本身就是祸害，为害的倒实在是官行的全能，官行的迂阔，以及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呆小病*，即某个别机关的成员们爱把本机关对社会总过程的重要性估计过高，只根据本机关的作用来说明社会总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这种意义下来谈论议会呆小病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谈论官行呆小病，但是，同样地也可以谈论教育呆小病，新闻呆小病，军人呆小病，等等。

官行呆小病在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变得十分严重，在这种国家里，当权者决定一切、过问一切，而臣民连一动也不敢动，只等待当局赐与一切幸福。

这种官行呆小病，正如官行的全能和它的不明世情的迂阔一样，都并不是和官行制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毛病最显著地表现出来，乃是在例如俄国或旧日的奥国那样的大国家里，这种大国家产生了伴有现代官行制和现代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却没有强大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有斗争能力的工人阶级。

在英国则相反，官行不是全能的。英国广大居民群众反对一切警察式的监护，而群众的有力的自主活动对于官行们的不明世情、迂阔和呆小病等等虽然不能完全防止其产生，却很可以阻止其趋于严重。

专制主义阻碍一切社会性的自主活动，防止它所统治的地区以内出现任何自由的组织。它只容许有一个重要组织，即它所指挥的民政性和军事性的统治机器，统治机器固然不可能容许内部有任何自由活动，对外也阻止社会中的一切自由活动。这是专制政体的一条生活原则，不仅是沙皇的，而且也是法西斯的和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政体的生活原则。这样一来，臣民面对着统治者固然变得无能为力，但整个民族面对着其他民族，也变得无能为力，而且这种无能为力还不仅表现于和那些比较民主的国家的军事竞争上，而且也表现于经济竞争以及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的相互竞争上。

* 呆小病(Kretinismus)又名侏儒病，患者形体矮小而呈现白痴状态。

民主制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乃是结社自由，仅仅这一个方面就足以使评论“形式的”民主制的那种谰言显得荒唐可笑了。在民主制下除国家机制以外，还会产生许许多多目的极不相同而与国家独立无涉的自由的组织，虽然其中有些是多余的或不足轻重的，但是也有许多是极端重要的。有若干组织十分庞大，甚至本身需要有一个官行机制，形成“国中之国”。

此外，甚至在民主国家里，国家的官行机制也会成长起来，有变得比专制国家中的官行制更为方面广阔的趋势。其不同于专制国家的是，利用警察进行侦缉、镇压、监视这类职能减少了很多，庞大的军队最后也必然会消失不见，但文化任务却日渐增多。在民主国家里，警察比较少，而教员则比较多。

但是，在民主国家里，不论官行机制成长得多么迅速，自由的组织却成长得更为迅速，而这些自由组织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因为国家政权所统率的乃是一些无组织的、彼此分离的臣民。在民主国家里，国家的官行机制虽然有着绝对的扩张，相对于自由组织说来其势力却在减弱。国家官行越来越不能够号令指挥自由的组织，越来越必须同这些组织多多协商，常常争取它们来帮助解决种种任务。这样一来，国家官行就会日益失去在专制主义时期所曾具有的性质，而变得更灵活、更有伸缩性、更明白世情一些；就会不再患过去的那种呆小病，那种病曾使官行们相信，全部社会生活是由他们决定的，他们的档案中没有的事物，在世界上就不存在。

在民主国家里，国家的官行机制改变了性质，但决不是不复存在了。仅就这一点而言，把国家民主制说成人民所实行的国家自治，恐怕不尽恰当。人民全体是不能够自己治理自己的。它需要有自己的器官来执行各种人民组织的管理工作。在最庞大的一个人民组织里，即在国家里，最需要有这样的器官。

我们最好不说人民自治，而说人民自决。

国家官吏管理国家，但并不统治国家或决定国家。官吏不是国家政权的所有人，而是它的仆人。国家政权当然总是由一些人员构

成的。它根本说来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只不过是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必须使用的那许多抽象概念里面的一个，但人们在使用抽象概念时，决不可以忘掉抽象概念所由产生的那些具体现象。国家没有意志，没有目标和目的。只有那些在国家里面并且通过国家而实行统治的人，才具有这些。

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就是君主，可是严格地说来，不是君主一个人，而是在他身边同他一起生活、教育他、启导他、与他休戚相关的所有那些人，亦即自成一个阶级的那些廷臣：宫廷贵族、宫廷教会、将军等等。但是从理论上说，在专制国家里，是君主任免官吏，对官吏们颁布他们所须遵守和在国民中贯彻实行的法律条令。是君主给官吏的全部行为指定方向。最后，是君主通过自己委托的人来控制 and 监督这些官吏。

专制政体被推翻时，国家主权的这些权限便移转给民主制，就是说，移转给全体人民。然而，对于全体人民说来，国家主权在最初确实仅仅是形式上的东西。因为一个比较大的集体，唯有组织起来，并且有了某些器官，也就是有了某些受委托的人来实现集体中多数人的意志，这个集体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正是出于这种必要，猿群就已有带头猿，人类最原始的部族就已有酋长。正是出于这种必要，最后才产生出了国家的官行机制。但是，这种必要也使专制制度下由君主本人执行的国家主权的职能，在民主制下由不时集会的人民群众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们，转交给议会，然后由议会以人民群众的名义任命、监督、罢免政府和颁布法律。

这样的议会常常和封建时代那种旧式的等级代表大会裹在一起，实际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在我的《议会制度与民主》（最初于1893年由斯图嘉特的狄茨出版社出版）一书里，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旧日等级代表大会里，每一个代表都是作为某一地区的特殊利益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他必须在国家政权面前代表那个地区。在现代的国家里，每一个议员都是全体国民的代表，都必须考虑到全体国民的利益。这一点在近代议会产生之初，还并非总是表现

得很明显的，那时个别议员还常常只考虑到他自己那个选区的特殊利益。实行了比例选举权以后，选区政策就完全取消了。

最初，人们曾经恰恰以民主的名义激烈反对过议会。因为选民们一旦投了选票，对于当选人就毫无权力了，要想对他行使权力，就一直要等到下次选举。

而且最初，候选人在作竞选演说时，许下种种诺言来引诱散漫而天真的选民群众，选举过后便统统忘掉，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

一旦选民和一部分对政治有兴趣的居民，能利用民主权利把自己结合成一些长久性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来经常注意了解议会的政策，只让受过考验的政治家参与竞选，并对当选者加以严格的监督，上述情况就会改变的。

这种改变当然不可能在包括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居民的一个唯一的组织里发生。因为民主制还并没有消灭阶级，在选举时某些候选人和其他候选人之间的斗争，在议会里当选者之间的对立，骨子里都是不同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当然，不仅有着不同的阶级，而且也还有着不同的方法。因为人们可能试图经由不同的道路来达到同一个目标。譬如，社会民主党工人，共产党工人，天主教工人之间的政治对立，就不是阶级的对立，而是方法的对立。

在民主制下，由于有种种阶级对立和方法对立，就形成起来许多不同的政党。只有在民主生活的初期，当人民群众不会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面对着民主权利不知道该当怎么办的时候，议会里的政党斗争才会仅是各别政治家抢占国家秣槽的私人纷争。群众愈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政党就愈分明地成为一定阶级利益和阶级方法的代表者。

政党扩大成庞大的、完全自由的群众性组织，乃是现代议会民主制的一项绝对要求。

但是现代议会民主制还有另外一项要求：自由的、为群众阅读的、向群众充分报道政治生活的报纸。

报纸、政党、议会(包括议会任命的政府),这三个“P”*就是现代民主制的三大器官,其中若有一个缺乏必要的力量或自由,现代民主制就还算不得充分。

在民主制下,政府要由议会选举,议员由居民选举,政党的工作人员由党员选举,党报的编辑人员也由党员选举(多半是间接选举)。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自由的作家和不属于党报的报纸编辑人员。但是,这些人也是经过某种形式选举的,因为每一个具有一些政治生活经验的人,都是从他能读到的许多报纸书籍之中,选读他认为最符合他的政治目的那些。

议会、政党、报纸,只要它们具有充分的力量,就是人民借以,也就是说,人民当时最强有力的阶级和政治方法借以统治国家、监督国家机器亦即官厅机制、并指导国家机器行动方向的三个器官。

但是,在复杂的现代国家里,国家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必须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专家;同样,与国家的器官相对立的那些人民的器官,即人民要通过它们来行使最高主权的那些机构之中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必须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专家。

一切大力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人——有时甚至仅仅参与社团政治活动的人——都越来越变成是在从事一种特殊的职业,这种职业不能再当作业余活动附带搞搞,而毋宁占去人的全部时间,要求人具有特殊的才能、特殊的知识和经验。议员、政党工作人员、新闻记者,都是这样。

在现代民主制下,产生了一种新的职业,即政治家这样的职业。职业政治家决不是政治掮客的同义语。人们能够以政治为职业,象人们以学术为职业那样。人们不论在政治领域里或学术领域里,如果不全力以赴就不可能有卓越的成就。当然,全力以赴也不应该弄到患了呆小病的程度。我们在本书第四卷第一篇第五章里曾经谈到,

* 德文里,“报纸”(Presse)、“政党”(Partei)、“议会”(Parlament)这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P”。

职业并不是必然同片面性和局限性联结在一起的。

正如对于任何职业一样，人们自然也能够将政治这种职业变成一头乳牛，给这种职业的剥削者供应奶油。这是席勒曾经用过的比喻，不过他的比喻所指的不是政治，而是学术。然而他紧接着说道，对于另外一些人说来学术又是“崇高的天上女神”。因此，政治也能对政治家成为一位女神。她并不是一定要变成可供政治家利用的乳牛。究竟是成为乳牛还是成为女神，主要是依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从事政治而定。而且，利用政治以求个人发财致富的，并不限于职业政治家，更不限于民主制下的政治家。报纸在公众间所起的监督作用和政党对于党员所实行的监督，在防止政治腐化方面，比恐怖主义的专制政体用以对待不忠诚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那一切恐怖手段还更为有效。在只有独裁者一个人可以踌躇满志的黑暗时代，独裁者的眼光是看不远的。

不过，促使政治发展成为职业的，不仅仅是现代民主国家里的那些条件。现代民主制所由产生的那种经济基础，即工业资本主义，也以另一方式促进了同样的发展。

最初的剥削统治阶级，即军事贵族，是自己管理国家的。军事贵族进行剥削的那种剥削方式，能够使他在个人经济活动以外还剩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用以观察了解以至彻底掌握当初那种相当简单的国家情势。在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内外政策变得日渐复杂。但同时每个大的贵族家族却也在这方面日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世代相传，不断改善和增多。

凡是在没有暴君制度窒息了一切政治生活的地方，贵族便永远是国家的实际的统治者和掌权者，是国家的政治领袖，尽管日常的行政事务是由职业官吏负责的。正象我们所已谈过的，甚至在古代的民主国家里情形也是如此，后来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制的祖国即英国，也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英国的贵族在国内早已不再是单独统治，自从十七世纪的革命时代以来，他们就不得不和资本主义集团分享统治权。在议会选举中，贵族候选人有时还得同平民候选人激

烈竞争。尽管如此，英国议会直到十九世纪时基本上还是带着贵族的性质，不仅上院，连下院也是这样。下院不是由贵族家族的成员就是由贵族家族所庇护的人组成的，内阁则由大贵族家族来组织。不仅保守党即托利党是如此，而且“自由党”即辉格党也是如此。

说来真是命运的讽刺，这条成规在上一世纪中叶，恰恰是在托利党人当政时被破坏了，而且是被一个犹太籍的文人迪斯累里破坏的。这个迪斯累里改造革新了托利党使它适应于业已壮大起来的民主政治的条件，而他就作了该党的领袖。

资本家则相反，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掌权者阶级。我们曾经谈到，还在古代的时候，贵族就已不能参与商业活动。参与商业活动会有损于他们的政治才能。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政治也同科学和艺术一样，要求从事它的人不要因外务而分心，如果他想要在这方面有大成就的话。不错，有一些穷艺术家和穷学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穷艺术家们通常总是非常放蕩不羁的，不为物质上的生计所累，而穷学者们，则清心寡欲超然世外，根本不把贫困挂在心上。他们都把他们的物质生活交托给他们的妻子和朋友去照管。

商人却正好相反，他愈是会作买卖，作起买卖来愈是得手，就愈是充满了物质方面的忧虑，尽管不是生计上的忧虑。他的生活使他不不停地忙于计算，不是理论上的计算，而是实际的计算。他必须正确地估计和利用商品市场的未来情势，才能维持他的生存。

这种情况对于工业资本家说来也没有什么改变。固然，工业资本家阶级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取得他们的收益。但是，他们之中每个人的收益仍旧取决于商品市场。如果他有办法比他的竞争者更廉价地购入原料或更高价地出售产品，他就能够多获得出自剩余价值的收益。而如果他的原料买得太贵，产品卖得太贱，他就也有可能使他的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全部落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而自己破产。

而且，在工业资本的时代，商品市场变得日益广阔而难以掌握。而对于工业资本家说来，除了商品流通过程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生产过程的问题。他不仅必须购买原料，还必须购买机器。他必须建筑厂房，招募工人，组织工人劳动，跟工人们作斗争，等等。

我们当中往往有人把资本家想象成无忧无虑游闲浪荡的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资本家所过的是一种充满忧虑的生活，不是一日三餐的忧虑，而是在对付竞争者、批发商、顾客和工人们以求获利和增强势力的日益尖锐化的斗争中如何确保胜利的忧虑。

我们在这里无须研究这些斗争对社会有什么必要和益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一方面已经在别的地方充分讨论过了。在这里只须指出，这种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占据着资本家们的全部心思和精力的。

有人也许以为，股份制把资本家变成纯粹的食利者了。事实决非如此。股票也象公债一样，只能使一个人数众多的食利者阶级的出现成为可能。然而对于资本家说来，资本积累已经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只要还有活动能力，就不大会决意去过食利者的生活。多有资本意味着在社会上多有势力和威望。仅仅作一个食利者就不能享有这些了。

股份制毋宁能使资本主义企业主在关心自己的企业之外，还关心他持有其股票的别的企业。其次，股票还使各行各业的有钱的人，如自由职业者、国家官吏、其他机关的公务员、地主等等，能够参与资本主义企业，关心它们的成败兴衰。

商业投机的活动范围，并没有由于股票的出现而缩小，而毋宁是大大扩展了。除了商品市场的动荡以外，现在加上了证券市场的动荡。

经营企业的资本家的生活，并不是可供休憩的躺椅。

这决不是说，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是从事企业活动的人。这更完全不涉及他们的活动究竟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有害的这个问题。

资本家们并不把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都积累起来。工业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至于商人，一般说来禁欲主义对于他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但是，消耗资本家并没积累起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项职能主要是由资本家的妻子儿女来执行的，他们将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们从被剥削者们双手勤奋不息的劳动里得来的东西，尽情虚糜浪费。

完全不能指望这些骄奢淫逸的懒虫会严肃地从事政治活动。忙碌的资本家们又被自己的业务牵制着，无法积极参与政治。他们不仅在办公时间以内为业务所困扰，而且在办公时间以外，在闲暇的时间里，也往往是如此。

幽默画家欧伯蓝德(Oberländer)曾经作过一幅伊齐希·路易的化妆舞会图，画的是蒂罗尔地方一个教会纪念节日的集会。人们正在高歌狂舞，调情作乐，忽然，主人家里的一位朋友从外面跑过来，喊叫着说从纽约传来了交易所最新行情的电报。那些小媚妇们和阿尔卑斯山区的青年们顿时忘了一切多情的媚眼和放浪的戏谑，忧心忡忡地开始盘算自己要遭到的损失。

企业经营的得失之心不来缠绕资本家的时刻是很稀少的，它夺去了资本家的时间，但也夺去了他的远大眼光，使他不能卓有成就地从事政治。

在工业资本的时代，大地产也成了一种谋利的经营。在英国这种情形还不多见，因为英国的大地产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封建性，土地是由许多佃农耕种的。在欧洲大陆上则不同，地主自己经营他的田地，而且往往还跟工业企业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就丧失了他的政治才能，其缺乏政治才能的程度甚至更甚于工业资本家，因为工业资本家倒还能够受到大城市的形形色色的刺激，而且他的经营多半是和世界经济有联系的。以经营田地为业的乡绅地主集资本家的贪婪短视和近乎农民式的偏狭固陋于一身，即使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军官团里度过的，军官团一度成为他的生活学校，也无助于改善他的这种缺陷。就政治认识方面而言，贵族地主一般说来今天已不

再是国家中的最上层阶级,而是最下层阶级了。

因此,对于城市里和农村中的资本家说来,也正象对于世上一切人一样,管理国家和统治国家的方式便越来越重要起来了。

不仅资本家的阶级利益,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事业利益,都迫切要求资本家奉行某种特殊的政治策略,但是他极难得到时间和集中心力去获得必要的知识,而没有那种知识,一个政治家是不可能在现代国家里卓有成就地活动的。

因此资本家与其让自己在政治斗兽场中败北,宁愿将他雇用的斗牛士送上场去。

在专制政体之下,资本家可以贿赂少数官吏。他如果是一个金融巨头,也能通过答应借款或其他类似的手段收买大臣,甚至还能左右君主。

在民主制下,他就尽力收买民主器官:议员、政党、报纸。

随着民主制日益发展和群众的政治经验及政治势力的日益增长,这种政治策略当然越来越难施行。在十八世纪时,英国议员受贿——当然不仅通过私人来行贿,而且也通过政府本身——以及收买议员选举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十九世纪中,这种事情已日益困难起来。在今天,最初那种粗鄙形式的行贿已完全不可能了。

个别的资本家给某些政党提供选举经费,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很时行的作法。但是,这种手段之促进资本家们的普遍的阶级利益,更甚于其促进特殊的企业利益,因而从国家利益的观点来看,终究是一种略高一筹的手段。

今天在民主制下,资本家们为了在国家里实现他们的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使用的主要器官就是报纸,特别是日报。日报已经变成了一部庞大的机器,要建立和运转这部机器,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在这方面,大资本相对于无产者的那种优势地位以压倒之势显露了出来。

第十四章 暴力与民主

以上这些事实，主要都是常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提出来借以攻击民主的，为的是要证明，民主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手段是不中用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多半出身于经济落后而无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他们对民主的怀疑，归根结蒂乃是对无产阶级本身的怀疑。他们想抛弃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之下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起来的那种主观能动性，代之以一位弥西亚*或一位摩西，让他来引导无产阶级走进天国。

他们的根据是马克思所说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这句话是马克思有一次说过的，然而只是偶然地说过的，他并没有说明他心目中所指的这种政治状态是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可是就在同一个地方（即他那封1875年的著名的信《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发表在《新时代》第9卷第573页）**，他却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不管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理解的，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说过，专政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所必不可少的国家形式。假如是这样，那就和他在第一国际的章程开头所提出的原则相矛盾了，根据那条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地指挥工人的独裁政府的事情。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到能够解放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有能力解放自己的工人阶级会容忍一个政府来给自己规定应该读什么和听什么、应该怎样行动。

期待一位救主带来社会主义的不是马克思，而是魏特林；这种想法在四十年代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下出现，是可以理解的。

议会、政党、报纸，据说是民主政体的一切祸患的根源。这些祸

* 意为救世主，实指耶稣。

** 即《哥达纲领批判》。

根，按照今天的国家基础说来，即使在专政政体之下也是消除不掉的。就连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有它的由选举而产生的代表团体，它的共产主义政党，它的共产主义报纸。其不同于民主政体的仅仅在于，资本家收买个别的议员、政党党员和报纸的那种可能性，被现在这个政府对议会、政党和报纸的专一垄断代替了，因而除了政府给应经选举产生的团体所指定的候选人以外，除了执政的政党和政府的报纸以外，国内再不容许有别的候选人、别的政党、别的报纸。

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那封论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信里曾说，“工人的目的”即在于“把国家由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器官变成完全从属于这个社会的器官。”*

相反地，专政却把国家之凌驾于社会之上推到了极端，因为它除了控制国家机器以外，还控制那些原是为了使国家从属于社会的器官，使之变成国家机器的器官。如果这个国家机器作出从前任何一位暴君都没有作过的事，使全部生产过程也从属于它之下，那末，社会之从属于国家就将成为完全无法忍受的了。只有一个从属于社会的国家机器，不是一个专制独裁地统治着社会的国家机器，才能成为一种手段，来消除资本家私人的生产领导，代之以由社会决定的领导，从而解放无产阶级。

专政作为国家的正常状态而长久存在，就说明这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高度无能，也就是说一时没有能力用社会主义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政权，如果不愿意完全放弃工业中的大企业（放弃大企业就显然是破产，不仅是经济上的破产，而且也是军事上的破产），那就只有在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但是，恰恰是国家权力愈绝对化，民主监督和批评愈少开展，国家的官僚机制就变得愈拘泥、愈繁复，但同时也愈腐败，愈不可能具有商品的生产过

*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0页。

程和流通过程所要求的那种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而国营工业也就愈远远地落后于私营工业，落后于国外的私营工业，如果在国内没有私营工业被允许存在的话。而且这样，专政就愈发觉不得不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以求继续生产；对于农民，对于工业劳动者，就要大大提高工业产品的售价，因为国家官厅也象一切无能的企业主一样，总是要竭力降低工资和尽可能提高工作量，来补偿他们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损失。

这样，专政便不管最初的用意如何良好，也会由于受经济规律的力量影响，越来越和对它毫无权利可言的工人日益严重对立起来。

然而，既然没有任何民主器官会给国家的官厅机制带来较大的伸缩性和专门知识，国家的官厅机制在经济上的无能，就不会因为与工人对立而得到克服。于是由于同样的一些经济必然性，专政便越来越感觉到不得不求助于国内和国外的私人资本，不得不日益扩大私人资本在国家里的活动范围。

大资本家们并不需要通过民主来左右政府。他们的势力不在于他们那个阶级的人数众多，而毋宁在于他们的财富雄厚。但是，劳动群众如果没有民主，如果没有建立一些独立社团、从而在社团中并通过社团而在国家中自由活动的可能性，那倒的确是不能发挥任何威力的。

因此，即使一个专政在开始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使在这样一种专政之下，无产阶级最后也将变得面对着日益强大的资本而完全陷于虚弱无力。在专政之下，资本用不着去贿赂议员、政党和报纸，因而它更能收买国家机器，起初收买个别的官吏，最后甚至收买专政统治者本人，这种收买即使不是采取个人贿赂的形式，却也总是采取讹诈的形式，那就是说，它向国家提供资金与否要视国家是否作出一定的让步而定。人们愈需要多与外国资本家打交道（因为国内资本已被消灭、赶走或慑服），这种讹诈方式便愈行之有效。

因此，专政决不会消除资本家利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甚至最后

控制国家机器的可能性。不管它愿意与否，它一定会落入这种状态。

另一方面，专政总是千方百计不让资本家们有可能掌握报纸、社团、政党和议会，而在它所采取的对付方式之下，它不仅使这些机构对资本家关上了大门，而且也同样对任何有独立思想的劳动者关上了并且必然关上了大门。否则它也就不成其为专政了。

在这一方面，专政必然竭尽所能对只有在自由的群众性组织中才能发挥威力的劳动者阶级，设置障碍。相反，国家愈需要有资本源源流入和不断增长，从而愈需要资本家的信任，专政就将愈容易受到那些不需要群众性组织、而只需要与当政者个人交往的大资本家们的影响。

反之，仅仅一些民主机构的存在本身，肯定是阻止不住大资本家的收买活动的，他们尽可以收买或通过不那么粗鄙的手段来为自己争取个别的民主器官如报纸、议员、以至部长先生们。但是，恰恰这些民主机构，也同样给劳动阶级中的一些较为强大而不断增长的阶层提供了可能，使这些阶层也能利用它们来创立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政党和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权，而劳动阶层的这些东西却是资本家所无法贿赂的，而且是以反对资本为自己的最重大的任务的。

如果在一种民主制下，劳动群众还没有能创立出来这类代表他们的政治意志的器官，那末，这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治意志，而他们所以如此，则是与他们那些可以从经济、地理、历史上来予以说明的生活条件联系着的。单有一种民主制，当然还不能产生政治意志。民主制只是一个手段，可能在已有政治意志的地方将政治意志在国家里表现出来而已。

而且，这并非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回顾一百年来的社会发展就可以明白。随着民主制的进展，随着民主权利的赢得和扩大，工人的政党，工人党的报纸，工人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以及他们对政府（有时他们自己也组织政府）的影响，也都同时在成长壮大。

每日发行的新闻报纸确实达到了十分巨大的规模，以致工人政

党的报纸很难起而与之抗衡。在法国和英国，工人政党的报纸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压制，也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在法国，资产阶级日报的主要收入不是它们的销售所得，而是一些大公司的和政府的贿赂金。在英国，单一份报纸的成本常常高于它的售价，它完全是依靠源源不绝的大量广告才得以维持下去的。

社会主义的报纸，当然不能接受贿赂金。不过，英国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公司也不愿意在这种报纸上刊登广告。

所以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的日报都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它们至今都还没有能够象在德国和德国周围的许多小国家里那样，扩大规模和获得广大的读者群众。

但是在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的期刊，特别是周刊，却多少能够代替日报。周刊不象日报那样需要昂贵的设备，用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出版和推广。在没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日报却有想要向群众说话的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周刊就成了一种普及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

毫无疑问，资本家们可以用来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收买民主器官的那些财富，对于工人政党的壮大是一个重大的阻碍。但是，实际的结果表明，这个阻碍不是不可克服的。在民主制下劳动阶级的政治经验愈是丰富，他们的政治教育手段愈是广泛，他们的政党愈是众多，愈是团结，那末他们在政治上也就会愈益壮大起来。不仅他们的票数会增多，而且他们的见识也会提高。有不少工人政党已经通过民主手段接近于取得政权了。

但是，资本家们对此会安然接受吗？社会主义者们中间那些反对民主方法的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要坚决进行阶级斗争，唯一的方法就是武装内战。

毫无疑问，资本家们将会利用民主制竭力抵抗对他们的政治放逐，因为对他们的政治放逐最终必然导致对他们的经济放逐；并且他们将会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武力手段——如果他们能充分支配的话——来阻止民主制的胜利。

我们曾经谈到，征服者部落的军事优势是怎样建立国家并从而

造成剝削的，贵族的军事实力是怎样对付无力抵抗的农民而将国家和剝削维持下来的。任何人只要明了这种状况，就能认识到就连现代民主制的内在发展也是以武力作为最后根据的。但是，我们曾经进一步谈过，随着自身包含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工业资本的出现，在经济和政治中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因素：从这时起，剝削和阶级统治越来越不再建立在军事暴力上面，因而也越来越不依靠军事暴力来维持。国家的工业发展愈向前迈进，在国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愈不是军事上的实力手段，而愈是经济上的实力手段。

资本家们进行统治，不是象军事贵族那样依仗自己对群众的军事优势，他们在人数上也远远不及群众。他们所以至今维持住了他们的地位，全是依靠他们的财富，并且由于他们的经济职能在今天的生产过程中还有重要性。只要受他们统治和剝削的群众一天还不懂得如何用工人阶级的机构来代替资本家和从属于资本家的机构、把资本家的职能即使不能更好至少同样好地担当起来，那末，资本家们就将一天还保持他们的地位。

资本家们能够用以对付劳动阶级的民主政权的武器，乃是经济上的不可缺少性，而不是军事上的优越性：资本家们如果感到民主发展威胁着了他们，就会怠工或破坏生产，使他们的企业陷入停顿，就象他们在俄国 1917 年革命时有一个时期大规模地干过的那样。

资本家的这种武器是否会有效果，或甚至是否会被使用，首先是决定于取得政权的工人们的政治认识和经济认识，即决定于工人们是否能够使生产过程保持进行，并且在那些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中依靠自己的组织把生产继续下去。其次则决定于工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和自我克制，在不可能立即实行上述办法的那些生产部门中向资本家们提出条件，让他们感到值得继续经营他们的企业。

如果不能象这样来解决生产问题，如果工人政府不懂得立刻将一些生产部门社会化，在另一些生产部门中促使资本家继续生产，那末，结果就或者是工人干脆向资本家投降——当然不是永久投降，但是却要在一段时期里投降——或者是工人们转而采取无意义的暴力

行动，占领一切工厂，驱逐厂主和经理，就象 1917 年时在俄国那样。然而，这后一种作法在既定的情况下并不能导致社会主义生产，毋宁必然以混乱状态告终。而继混乱状态之后出现的，并不一定立即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复辟，在某些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可以走一段弯路，中间还经过某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想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由工人组织领导的社会生产，是办不到的。

经济斗争手段，特别是停止生产这一斗争手段，是最适合资本的性质的手段，它可能会使资本面临着一种大有危害于资本的民主发展。如果事态发展到了使用这种斗争手段的地步，而又还没有使用起来，那末，一个工人政权就必须按照无产阶级或生产的不同成熟程度采取不同的对策，来对付这种斗争手段的使用。

这并不触及我们对民主持什么态度和我们预料民主会提供些什么可能性的问题。

通常，反对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们也总是有些不同的想法。他们预料，一旦民主威胁到资本家，资本家将不是进行经济反抗，而是进行军事反抗。于是，民主就会被暴力废除，因而内战和以军事暴力为后盾的专政就将是不可能的。

这种情况固然可能在这里或那里出现。但是，在那些地方进行的斗争，毕竟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争取民主的斗争。资本家是会起来反抗民主的，因为他们认识到民主对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有着怎样的重要性。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他预料资本家会采取这种反对民主的绝望行动，那么他这个预料本身就恰好证明——即使他常常不是明知和情愿这样——那些说什么“形式的”民主，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没有实现之前形式的民主必然始终等于零，种种调言，是多么可笑。

预料资本家会在军事力量支持下试图废除民主，这种预料就证明，无产阶级多么有必要竭尽全力以最顽强的态度来抵御对民主的任何进攻。但是人们如果因为怀有这种预料就贬抑“形式的”民主，那他们就等于做了一件最可能严重麻痹劳动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精神的事情。这一类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可能成为一种对民主的危险，

而且可能成为一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

不过，必须不让事态发展到资本家对民主发动武装进攻的地步。我们曾经指出，资本家只形成一个很小的少数，他们并没有什么超出多数人之上的战斗本领。在某些地方资本家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出钱雇佣了或指挥了被剥削阶级里面的战斗者。

因此，资本家是否会对民主发动武装进攻这一问题，可以简化为资本家是否会找到可以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足够的武装力量的问题。

这是一个自始就无法肯定也无法否定的问题。答案完全取决于工人政党掌握政权时的情况。

在民主制下工人政党只在拥有多数居民的支持时，才会掌握政权。如果国家实行普遍兵役制，尤其是实行短期兵役义务制，那末，多数军队拥护新政权，也将是工人政党掌握政权的条件。

然而，依靠民主的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而已。民主对于居民中的一切广大阶层说来，甚至对于没有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阶层说来，也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现代工业国家里，而且只就这样的国家而言，全体劳动的居民，人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愿意保持民主权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如果号召一支普遍兵役制的军队来颠覆民主制，那么这样的号召对于任何人将都不象对于号召者自己那样危险。

如果有一支由自愿受雇的士兵组成的招募军，形势是否有利些呢？

这样一支军队，按其招募时的选择标准不同，可以是具有无产者思想的，也可以是具有资本家思想的。但是，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之下，这支军队也太小了，不足以违抗国民中的广大群众而严重动摇民主制。它即使能够造成一阵骚扰，但并不会因此而使他们的雇主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资本家们募集一些可以收买的家伙，将他们武装起来，利用他们去打击资本家所讨厌的工人阶级的活动。最初，美国资本家曾在内战中利用过这类雇佣兵，即，所谓平克顿*，而尤其在罢工的时候他们必须出来捣乱。在今天，绞杀人民自由的雇佣刽子手乃是法西斯党徒了。他们确实是很有危害性的，但是幸而他们的危害只发生于一定的情况之下，而这些情况却不是资本家老爷们可以随心所欲召之即来的。

法西斯党徒如果要在政治上起作用，就必须人数众多——在意大利的 3,900 万居民中，大约有 50 万。在德国，要达到这个比例，就必须有差不多一百万。在一个工业国里，是收罗不到这么多壮年流氓来供资本家驱使的。在意大利，形势特别有利于法西斯主义。

在意大利自古以来——这是一个光荣的传统——丧失阶级地位的人数就例外地众多。丧失了阶级地位的农民和小市民，就流为盗匪，特别是在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许许多多没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都试图通过政变之类的政治活动来猎取地位。

马克思在他的《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1874 年不伦施魏克版)一书里(第 42 页)引了以下一段巴枯宁的话：

“在意大利有一些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感情炽热而精力旺盛的青年，他们没有地位、没有事业、没有出路，他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却没有象其他国家里年轻的布尔乔亚那样到了道德和智力衰竭的地步。”

马克思接着补充说道：

“领导着一切所谓意大利国际的宗派的，都是一些没有涉讼人的律师、没有病人和学识的医生、专玩弹子戏的大学生、跑单帮的商人和各种经纪人，特别是一些声名多少可疑的小报记者。”

半个世纪以前，这些分子都是巴枯宁的追随者。今天，他们聚集

* 艾隆·平克顿 (Allan Pinkerton, 1819—1884) 是美国著名的侦探，1850 年在芝加哥组织了一个侦探事务所，后来“平克顿”即泛指私人侦探之流。

在莫索里尼的周围，狂热一如以前，但较前更为成功，因为他们今天受到了大资本的恩宠。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诚然使这种分子的人数有所减少，并且可以说也使盗匪之风告一结束。但是，世界大战使许多本来十分勤劳的人脱离了正轨，使他们不惯于劳动，使他们重新把从来也没有完全死灭的旧日那种流氓无产阶级传统承接下来。

如果我们另外再想到，法西斯主义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的，在这个时期里共产主义的影响使得意大利无产阶级发生了分裂，陷于最深刻的混乱，并且促使它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试验，而这些试验一方面吓坏了资本家，把他们推入法西斯的怀抱，而在另一方面，试验的失败同时又使无产阶级精疲力竭，丧失了斗争能力，那么在想到以上种种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法西斯主义出现的条件了。这些条件都仅限于一个特殊的国家、一个特殊的时刻，并且不会那么容易再度发生的。

资本本身在这五十万惯于劫掠讹诈而逍遥法外的武装匪徒那里将得不到什么快乐。这批匪徒最后对待他们当初的庇护者们将不会住手不干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终究只可能出现于财产和人身享有充分安全的地方。资本主义的这些基础今天在意大利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元首”如果想要重建这些基础，他会对于他的行动结果大为吃惊的。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证明法西斯主义将在任何地方都是资本对民主制下工人胜利的回答。法西斯主义仅仅证明资本今天对于即将到来的工人胜利已经感到忧心忡忡，仅仅证明今天在一些有着有利机会的国家里，胆大妄为而眼光短浅的各资本家阶层已经利用有利机会对民主制发动武装镇压。如果说今天不是到处都发生武装镇压，那不过是因为并非到处都有有利机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统治阶级中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认识到，采取这种方式来拯救资本主义无异于让别西卜来驱逐撒旦*。

* 别西卜和撒旦都是《圣经》上所說的惡魔首領。

沒有任何根据可以预料，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那个时刻的形势，会比今天的形势更为有利于那些想以暴力推翻民主的企图。恰正相反，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们离开世界大战和大战造成的佣兵思想方式越离越远，生产过程重新走上正常轨道越走越近，失业者和绝望者的人数越来越少，因而资本家当中的暴徒们想通过发动内战来遏止民主制下工人的向前挺进以至消除民主本身的那些希望，也就越来越趋于幻灭。

但是，即使在某种特殊的形势之下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里出现了那种情况，那也将是一坊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从长远上说来，现代国家里民主的前进是阻止不住的。而且，如果在什么地方民主暂时被遏制了，那也不过是由于人们采用了这样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将最最深重地损害经济生活，并将大大降低采用这种手段的那个国家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

第十五章 异 能

我们曾经谈到，异常庞大而极度复杂化了的、有着多方面的艰巨任务的国家机器，要求每一个官吏都具有大量的专门知识。官吏们在什么地方获得他们的知识，这是国家不能听其自然的。在专制时代，既然官吏应该是国家的盲目工具，国家就更加要注意让官吏们从国家所领导或控制的那些特定的学校里获得知识。在国家的官制机制中也如同在军队里一样，服装和思想的整齐划一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官吏们的独立思想和行动，对统治者们说来乃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当任命官吏的时候，证明曾在某些学校里进行过学习、且经考试证明学习确有成绩的那种证件，是不可缺少的。已经任职的官吏，在职位升迁的时候，则又是要按照专门制定的等级次序来实行的。

官制制的这一个方面，在中国的满清官制里得到了最高的发展。中国的军事贵族——至少说来，最后这一个侵入和控制中国的

部族——是非常落后的，而城市的市民阶层又非常缺乏独立性和斗争能力，因此，国家的官行机制在中国所获得的那种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里都不曾有过的。所以在中国，高等学校的目的就单纯是为官吏生涯作准备，学生们的目标就单纯是通过考试，学者们的目标就仅仅在于记诵官吏阶层所认可的那些特定书籍，而不在于研究事物的原因或作一般的自由研究。

西方专制政体所造成的那种官行机制，也带有与此相同的倾向，只不过还没有达到那么深远发展和独揽一切的程度而已。

民主制的各种器官则完全与此相反，它们原是因反对国家的官吏而产生的，其使命乃在于限制官吏、监督官吏，给官吏们规定任务，使他们变得富有伸缩性一些。诚然，出版报纸和领导政党，以及在议会里和政府中工作，要想取得成就，也需要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但是，有关的政治家究竟在什么学校里获得这种专门知识，或者他究竟是在学校里还是依靠自学获得这种专门知识，究竟是从书本里还是从生活里获得这种专门知识，这些问题都是那些有权推选这位政治家充当新闻记者、政党领袖、国会议员或内阁部长的人们所不过问的。而且，作为新闻记者、政党工作者、议员或部长的每一个人在他所属的报纸、政党、议会、政府里能起什么影响，以及他和他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个机构对于居民能有什么影响，也都不是由他的知识的来源决定的。

政治家在一个民主机构里取得某种地位，并不是由于他通过了学校的考试，而是完全依靠他因自己的功绩而赢得的信任和声望。凭借这种信任和声望，他就能保住他的地位，扩大他的影响与势力——或者，当这种信任和声望降落时，他就丧失他的影响和势力。

麦克斯·韦伯在他的《经济和社会》一书里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统治，并且，谈到一种由个别的人依仗自己所赢得的信任和声望而对群众施行的统治。他把一个人物借以赢得信任和声望的那种能力称为异能(Charisma)，从而大谈其异能制，作为是官行制和封建制以外的一种统治类型。

异能(Charisma)这个希腊语源的词，原来的意义是指某一个人得之于天的一种福惠或恩宠，即上帝所颁赠的一种特殊才能。在考茨什和魏茨塞克(Weizsäcker)两人合译的德文本《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这个词被译为“恩赐”(Gnadengabe)。它在《圣经》里应被理解为，神所授与的许多才能之中那种能行奇迹和说预言的才能。然而，韦伯却放着平易的、一般人都懂得的“天赋”(Begabung)这个词不用，而要大谈其“异能”，在下意识里给他的全部与此有关的论述带来一种无助于清晰明确的神秘意味。他说：

“异能制不同于任何一种官阶制的官职制度，它既没有一种任免的形式或程序，也没有‘升迁’或‘晋级’的形式或程序；具有异能的人或其助手们既没有‘薪俸’也没有规定的专门教育；对于他们既没有监察或弹劾，也没有给他们指定官职所管辖的地区或专门的职务权限；最后，也没有按照官阶制的‘官署’方式设立起来的一些与个人及其纯个人性的异能毫无关涉的常设机构。相反，异能只知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和界限。具有异能的人把适合于自己的任务担负起来，并且凭着他所承受的天命要求人们听从和追随。至于他的要求能否实现，那就要由实际成就来决定。”(《经济和社会》，第754页)

在这里麦克斯·韦伯心目中所考虑的不是民主器官，关于民主器官他在这里根本没有讨论，他毋宁仅仅讨论了并非按寻常的方式产生、而只是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由于出现了异乎寻常的人物才得以成立的那些统治关系。

“异能应该是指一个人物所具有的那种可以看作异乎寻常的(在最初，不论在先知、巫医、法律圣人身上，或在猎人首领、战争英雄身上，都被看作是出于魔法的)个人品性，而这个人物正因为赋有这样的品性，所以才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或超人的、或至少是独特地异乎寻常而非任何别人所能获致的能力或特点，所以才被认为是负有神圣使命的或可以为人典范的，并且因此才受人拥戴为‘领袖’。”(《经济和社会》，第140页)

这样说来，韦伯在这里所谈的，只不过是借助于一些超自然或可以视之为超自然的业绩而使群众对自己服从的那种“超人”而已。他所谈的不是寻常的民主器官，而是常例之外的狄克推多，这种人物不是半神就是骗子。

这种“异能”虽然有它很受麦克斯·韦伯喜爱的那种“魔法”意味，却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赢取信任和威望的那种简单的本领而已，这是韦伯自己立刻就向我们说明了的：

“异能能否算作异能，取决于被统治者对它的认可，而统治者的认可，乃是一种因有证验——在古代经常是凭奇迹——而深信不疑的自由自愿的认可，是出于皈依天启、崇拜英雄、信任领袖的心情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第140页）

韦伯根据什么来断言例如酋长之类的人的“证验”“在古代经常是凭奇迹”而表现出来的呢，这在他的著作里是无从查明的。他如果把时代推得更古远一些，一定会认为猿群对带头猿的认可也是一种对于“异能”的认可。然而在猿类，可以归因于奇迹或神示的那种异能肯定是不会有的。

此外，由异能所导致的“威权”这一概念，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概念。韦伯这样写道：

“不论是‘狂战士’*（人们显然错误地认为，这种人战斗如狂是由于服用了某种毒药的缘故；中世纪时在拜占廷，有许多这种赋有战斗狂异能的人，被人作为一种战斗工具而豢养着），或是‘沙门’（以癫痫病发作的可能性为达到真纯昂扬状态的先决条件的术士），或是那位（也许真正可以算作是、但还不能完全肯定即是骗子手的精妙典型的）摩门教创始人，或是象库尔特·艾斯纳**那样的一心只图取得煽动效果的文人，等等，所有这类人物的异能，在不谈价值的社会学中，都被视为同那些按一般价值观念说来‘最最伟大’的神人、救世主、先

* Berserker，北欧传说中醉酒战斗如狂的人。

** Kurt Eisner (1867—191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作家，曾任巴伐利亚政府总理。

知们的异能完全是同属一类的东西。”(第 140 页。)

那末试问，狂战士曾在什么地方建立起过威权？

癲痼病的痉孪又曾在什么地方被用作主宰群众的手段呢？未开化的人们也许会把一个有神经病的人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他们却决不会听从他的领导。还有，库尔特·艾斯纳！不管韦伯对他持有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把他归入狂战士和沙门之列，那就毕竟不止于是奇谈怪论了。

不错，我们是应该将库尔特·艾斯纳看作是凭借“异能”而登上决策地位的一个民主器官。但是，他决不是凭借魔法，也不是凭借痉孪或骗术。要博得群众的信任是可以另有凭借的，例如，凭公而忘私，凭热情充沛，凭才智超群——而且，在历时较久的民主制下只能凭借这些。艾斯纳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他的当时十分有力的“异能”的。

官制和异能制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是依据寻常的才能，而后者是依据只有少数卓绝的个人才具有的异乎寻常的才能。

固然，就韦伯所唯一考虑的那些个别的神人、狄克推多、救世主而论，情况也许确是这样。可是关于这类人物，尤其是关于他们行奇迹、施神术的方面，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足以征信之处：而在现代，这类奇迹人物几乎再也看不见了。至于韦伯曾经谈到的“纯粹由平民推戴出来的异能统治者拿破仑”（见上书，第 141 页），我们须知，拿破仑的异能是建立在他的兵士的战功和他的密探的灵敏嗅觉上，而不是建立在魔法般的奇迹上的。

整个的异能问题可以归纳如下：在不论是原始的、古代的或现代的民主制度下，一个人要想取得领导地位，只能依靠公众的信任，就是说，只能依靠他在某些对公众事务说来关系重要的方面，有了超出一般人之上的表现。在特殊情况下，这种信任可能会带上魔法的色彩，不过魔法的色彩却并不是属于“异能”制的本质的东西。但是，某些个别的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由行动为所欲为的可能性，倒是属于异能制的本质的东西，这是因为这样自由行动为所欲为的人能够充分

发挥和显示自己的最大优长。而这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不可能的，不论是在世俗的或教会的官行制度之下、或是在任何一种暴君制度之下，都不可能。在贵族政体下，这种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被排除掉，但那也只限于一个很小的圈子以内。只有在革命的时期中，旧的权威业已崩溃，新的权威必须有机会表现出优越性以便建立起来，这时，发挥“异能”的可能性最大。

“具有异能的人物”在依靠自己的业绩（不是依靠奇迹）赢得群众的信任以前，“凭着他所担负的天命”要求群众“听从和追随”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依靠自己的业绩使群众站到他的背后来了以后，以群众的威力作支撑，是能够要求个别反对他的人对他服贴的。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此刻尚未谈到的那种统治机器，而想违反群众的意愿来统治广大群众，那却是他永远也做不到的。就这样的意义说，从“异能制”中将永远不会产生出、也从来不曾产生过威权（Herrschaft）。至于广大群众的代表人物对于少数脱离群众的个别人物所有的那种优势，我们毕竟不大好说那是一种威权。

在韦伯关于异能的论述里，还有一点应该在这里谈一谈：

韦伯说，具有异能的人不同于官吏，是不领酬金的。

就他所谈到的那种狂战士和癲痲病者而论，情形可能是这样。他说不领报酬，也许从来不是就所有的狂战士说的。韦伯提到这件事实：在拜占廷人们曾豢养了大批专长于疯狂攻袭的“金发野兽”。（《经济和社会》，第753页）

这一批人大概是领取酬金的。且不管那情形究竟是怎样，在今天我们谈到神人、先知和狄克推多时，无论如何也不再能够无条件地断言他们谁也不领酬金。至于谈到我们在这里所要考虑的民主器官，那就更是不能这样说了。

在一个商品生产十分普遍的社会里，没有金钱收入谁也无法生活。即使是具有异能的人也不例外，除非认为异能是某种只会出现于商品生产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韦伯自己就谈到过“异能统治者”拿破仑，其实拿破仑的异能，却曾帮助他以将军、执政、皇帝的身

分领取非常可观的酬金。

至于根据异能，也就是说，根据才能和信任而任命的那些现代民主器官，也是没有金钱收入就无法生存的。如果他们没有别的金钱来源，特别是当他们的政治性劳动超过了业余劳动而需要他们付出他们的全部劳动力的时候，他们就得依靠从他们的政治性劳动取得的某种形式的金钱报酬来维持生活了。当然，对于一位为某一个政党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人们必须要求他在为这个政党斗争的时候纯然出于信念而不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单靠信念他就能过活和全力进行工作了。有一条古老的经验：若要军队打胜仗，就必须使战士既受到热烈的鼓舞，又获得足够的给养。

在官制实行以前负责治理国家的那个阶级，即地主贵族，不需要为了他们的政治性活动而领取酬金——正如不需要为了他们的战争活动而领取酬金一样；因为他们是依靠他们的佃户们的劳动过活的，佃户们按时缴租，无须他们多所操心。正因为这个缘故，英国议会在它是贵族机构的时候，一直是不向议员们供应膳食的。

资本家的情形，已经就不同了。他们的买卖需要业主经常在坊照料。如果政治工作使他们远离自己的买卖为时较久，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因此他们大多数都是情非所愿地被选入议会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更其是这样，他们不能象资本家那样出钱聘用一位经理来代替他们。至于雇佣劳动者，那就完全不必提了。他们离开工作就等于是被解雇。

威尼斯共和国贵族们的情形很值得注意，皮埃里·达吕^{*}在他的1819年出版于巴黎的《威尼斯共和国历史》（«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我所利用的是1828年斯图嘉特版本）第39卷《威尼斯政府概况》（«Description du Gouvernement de Venise»）中对此有所论述。

威尼斯共和国的贵族，是一种适应国家特点的非常特殊的贵族，

* Pierre Daru(1767—1829)，法国历史著作家。

这个国家形成于海港与沼泽之间，自始即既无地产也无农业可以经营。威尼斯的贵族从最初起就不是地主贵族，后来当威尼斯拥有了大片的陆地时，甚至还禁止贵族获得封建领地。贵族的主要财源是商业，另外还有对自己的国家的掠夺，例如通过包税。这样的经济基础，使得威尼斯的贵族即使受到最大可能的照顾，也极难参与每一项政治活动。例如，议会规定只在星期日开会，因为其余的日子议员们需要料理自己的业务。虽然这样，这些贵族仍和别的国家的贵族们完全相反，乐于逃避被选担任国家职务，因此，一个贵族如果拒绝接受他担任的职务，是要缴纳罚金的，罚金的数目在1766年时由三千杜卡特提高到了七千杜卡特。而且担任公职是有报酬的。因此，在商人出身的、有着那样的意识的贵族手里，共和国的政治生命完全僵化，而贵族本人毫无抗拒地屈服于一个小小统治集团的严酷的警探制度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单靠这些资本家，那就连他们本阶级的政治自由也建立不起来的，更不用说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了。

这些不乐意放弃自己的买卖的资本家们因担任国家职务而领取报酬，是不能和民主器官接受国家为了使他们能够全力献身于国家和政治而给予的金钱补偿相提并论的。新闻记者领取薪金，在今天理所当然的。国会议员必须受到膳食供应，在今天也同样是理所当然。但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政党，为了使它的一些党职人员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给他们付酬也是必要的。

虽然如此，一个政党当然是只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展壮大，即，它本身充满的热情，因而它的大量党务工作，只要能在谋生工作之余同时兼顾，就尽可能多地以不付报酬的方式来完成。

然而，即使付给薪金，在异能制之下，任用职业政治家，毕竟不以学历和学校考试为依据，而以他们的才能和他们凭自己的业绩而赢得的信任为依据。

韦伯因为竭力要使异能带上魔法的意味，所以在描述拥有追随者的人物的才能特征时，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他谈到了一个人

物得以成为群众认可的领袖所凭借的启示和奇迹，却没有谈到较高等的经验和专门知识，而正是这两者，才使他有可能作出较大的业绩，并从而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倾心。

而且，正因为倾向于以魔法作解释，他才把赢取这种信任的过程完全弄颠倒了。他设想，保证个别领袖人物始终保持群众对他们的信任和忠诚的，是那些象魔法一样出现了的事件，是他们自称经验到了、并且行使出来了的那些仿佛确有其事的神示和奇迹。领袖人物仿佛只是在赢得了群众以后，才需要用自已的业绩来表明他的异能是否是真的：

“如果长久不见证验，如果得天独厚而具有异能的人显得好象已经失宠于他的神灵或丧失了他的魔力，如果长久表现不出业绩，尤其是，如果他的领导没有给被统治的人们带来福惠^①，那末，他的异能的威信就有消失的危险。”（第 140 页）

实际上，事情恰恰与此相反。任何人都不能单凭一句空口白话，说是受神眷顾，就会使他朝夕共处的群众盲目信从他、把自己的休戚祸福交托给他。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作出重大的业绩。

现在韦伯却以为，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受神眷顾的人行了奇迹。韦伯当然不会相信有什么真实的奇迹，而毋宁是些幻觉或骗局而已。但是这么说法毕竟只能解释一部分的异能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异能显然是一种很难有可能出现的东西。近代的那些拥有许多热烈的追随者的大政治领袖，不论是拿破仑或俾斯麦，不论是倍倍尔或列宁，没有一个依靠什么神示和奇迹而得到了异能。就连墨索里尼在崇尚迷信的意大利人那里，也决没有通过这个办法获得他的异能，虽然他关于自己的受命于天作了不少的胡说乱吹。

但是，即使对于早先那些比较盲目轻信的时代来说，人们也不可高估一个癫痫病人或魔术师所能产生的政治作用。群众会目眙口呆，对他惊駭而敬畏，但不会不经进一步的证验便让他领导和驱遣着从

① 着重点是韋伯所加的。——考茨基注

事真实的战斗。

穆罕默德得要经过长久的努力，然后依靠（他的妻子的）钱财和亲戚关系，才勉强在一个小圈子以内获得一批追随者。直到他领导着人们打了几次掳获甚丰的胜仗，才得到了情绪昂扬信仰热切的追随者。奇迹和神示所以有人相信，是由于有实际的业绩在背后起作用。但并不是在取得实际成果之前仅仅自吹什么奇迹和神示，就招来大批狂热的追随者。

轻于置信的时代当然是有的，在那样的时代里，群众容易信服奇迹和神示，觉察不出它们后面有什么虚幻或欺骗。但是，恰恰在那样的时代里，奇迹的故事到处都有，因为有着许许多多的人在吹嘘自己能行奇迹，想使群众只对自己一人倾心信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除了会讲一些有关自己的神示和奇迹的故事而外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来，那他就不会成功。

我们发现在任何时代里，那些在公众中突出的个别人物都是凭他们的坚强性格、他们的知识、从而他们的业绩而得以显露头角的。这种情形在轻于置信的时代里，也和比较富于辨别能力的时代里没有两样。在轻于置信的时代里，那些突出人物固然可以诉诸魔力，但是他们同时代的许多别人也都同样可以诉诸魔力。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比别人具有什么优势。

例如，我们发现在宗教改革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人自以为并且向人宣告说，他们和上帝谈了话，从上帝受到了灵感。但是在他们之中，只有实际上创造了杰出功绩的人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倾心，而杰出功绩不会从他们魔术般的想象中，而只能从他们实实在在的、结合着重要知识的、比较高度的明智和坚毅中产生出来。

而且，我们如果看看比如说旧约里面的先知们，那就会发现，他们尽管装腔作势代他们的耶和华发出雷霆之声，骨子里却也含有他们自己关于本国和邻国社会政治情况的重要知识。

象韦伯这样一个人，竟会如此低估知识的作用！

一个政治家，其所以能凭他的人格——这倒确实是“异能”——

而不凭官职的任命、不凭武力或财力之类的强力手段赢得群心归向，这应该归因于他的人格优越于或者说高过于同一条道路上致力于同一个目的的其他人物的人格。我们必须探讨人格优越性的实际根据，实际上人格的优越性是建立在与生俱来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知识上的。我们不要去研究人格优越性的假想根据，从这些假想的根据出发，轻信的同时代人尤其是轻信的后世史家，就利用一些显著的表面现象和主观想象来解释人格的优越性。这一点十分重要，特别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异能”，不仅是太古传说时代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当前时代的“异能”。

第十六章 知识分子

就一般趋势而言，国家的官行机制是从一切居民阶层中召募自己的成员的，虽然就实际情况而言并非总是如此。上升的专制主义，在最初的时期，当它还没有制服贵族的时候，甚至会特别喜欢从下等阶级中寻找它的工具，因为下等阶级和贵族相反，完全依附于专制君主，因而更可信任得多。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所要求于他的官吏的那种臣服隶从，权势甚高的贵族会感到难以忍受。

后来，贵族面对着地方公侯失去了独立地位，逐渐安于幕僚生涯，同时，官行机制已经变成一个庞大的团体，它的上层有着一系列不需要干很多工作而收入丰厚的位置，其下则有许多俸给微薄工作繁重的职位。贵族乐得将这些下级职位让给资产阶级的“无赖”。他自己力求稳占上层的位置，那样的位置常常是专为贵族能以这种方式来掠夺国家才设立起来的。

新兴的民主制竭力想要取消贵族的这种和其他各种特权，这种努力，例如在英国，至今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

特别是掌管对外政策的官职，在许多国家里从来都是贵族所独占的。对于有钱的资产阶级，则另有一种优先权，可以让他们的子弟凭着规定的必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证明，担任薪资优渥的官职。在

今天，受那样的教育要花很多的钱，因此没有财产的人是难以办到的。要求谋求职位的人提交上述证明，有时也确有客观的理由。但是，职位的获得也可能故意被附加上一些毫无客观必要、却往往足以将最优秀的谋职者排斥在外的条件，而这样做的用意，只不过为特定的阶层保留入选的可能而已。现在在大学圈子里广泛流行的反犹太主义，大部分是为了使较高级的官职成为某些“基督徒”阶层的专享特权。在这里面，除了追求较高的收入而外，对权力的追求也同时起作用，因为高级官职常常既是财源又是权柄。

对民主器官说来，这些特权化的作法是不存在的。在政党彼此斗争的时候，每一个政党都必须把它拥有的最适当的人派去主办报刊，就象派去主持公开讲坛一样。同时，政党必然欢迎任何愿意拥护它的事业的人，只要他懂得一点什么和会干一点什么，就不管他出身于居民中的哪一个阶层。

甚至贵族阶级的老爷们也无法逃避这种必然情势。由于这种必然情势，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高傲的英国贵族不得不接受犹太人迪斯累里充当他们的先锋。普鲁士容克贵族是自古以来完全轻视犹太人的，却在上一世纪中叶，即在1848年左右，由于精神力量极度贫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屈从犹太人弗里德利希·斯塔尔*的领导。

贵族阶级以受洗的犹太人充当自己的旗手，这并没有使贵族老爷们的事业变得较有起色一些。上面提到的那两个人，差不多是在同时受洗转信基督教的。迪斯累里在1817年，斯塔尔在1819年。

在现代民主制下，出身于任何等级、任何阶级、任何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属于任何政党的律师、记者或议员。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居民阶层都具备同样有利于培养担任领导的、眼光远大的政治家的条件。

具备培养政治家的最好条件的是一些——不是一切——知识分

* Friedrich Stahl (1802—1861): 德国法学家，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建人和领袖。

子圈子。

我们已经谈过，知识分子形成社会中的第一个特殊的职业——不是阶级，这个职业能作某些不是人人能作的事情，从而取得了某种社会势力，但决没有达到统治和剥削的地位。麦克斯·韦伯所谈到的许多关于异能的例子，都不外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势力的例子，狂战士当然不在此列，但医生、术士、祭司则肯定都是知识分子。

国家和阶级一旦形成，新的国家政权往往就会设法保证知识分子以及酋长们在被征服的部落中的地位，以求赢得他们的支持。酋长们和知识分子，被国家提拔到本部落的同胞们的上面，居于和他们相对立的地位。所以祭司可以成为国家的特权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即，不同的征服者部落相继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一个部落的贵族阶层处于另一个部落的贵族阶层之上。这时，他们彼此之间就可能出现分工。征服者的贵族们掌握着战争事务，被征服的贵族则不得从事可能造成危险的任何军事活动，他们被限制只能从事智力活动，成为一种特殊的祭司阶层。我们在前面曾提到米底人的玛果伊部落，他们就是在波斯人统治下变成祭司的。以色列祭司的那个利未特*的名称，原来也是一个部落的名称。

除了组成祭司阶层的知识分子而外，随着国家的发展又产生了另外一些个别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正象活动于王公大臣的宫廷庄园之上的手艺人一样，是一种高级的奴仆。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活动，象我们所已经谈到的那样，赢得了很大的尊荣，以至就连贵族阶级也有人从事这些行道的。

我们发现，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是处在这种状态。当时，出现了中世纪的城市，并且产生了一类前所未见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条件：读书写字对于广大城市居民说来变成了极端重要的事，这是和古代大不相同之点，在古代，即使是高度发展了的民主的城市国家中的人民大众也没有这样。由于这种情况，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就取得

* Levite，这个名称原来是“利未人”之意。

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地位。

在城市里形成了一些独立于教士集团、或者正向教士集团争取独立的学校。从这里产生出知识分子的许多职业，既不隶属于教会这种教士组织，也不托庇于某个王室文人充当他的仆从或食客。这种新型知识分子，在城市的市民阶层那里找到了出售自己的活动的市场，比如说，充当他们的律师和医生。新式的工业和交通需要大批受过特别教育的技术人员。不断增长的城市财富，也使艺术家们得到一些部分出自公家部分出自私人的创作委托。同时，随着城市里读书人数的增长，书籍印刷业的出现，于是笔墨制造出来的产品就在教会和宫廷之外另辟了一个独立的市场，书籍市场，后来，新闻报刊事业的活动也加入了这个市场。

所谓“舞文弄墨之徒”的作家们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维持生活的收入，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极不稳定而又十分微薄的。至于医生、律师、艺术家、教师和学术研究者，他们的那些与商品生产规律相适应的新的生活条件，也并不是总能使他们生活得丰足富裕。

但是，这些人却得到了教会的和宫廷的知识分子所没有的一样东西：个人自由。他们和城市一起并且依靠城市，站起来进行了反对教会、贵族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他们的这种斗争首先采取的形式是争取言论自由。

知识分子既然只能用精神武器作斗争，只能用这种武器战胜对手，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感到自己在精神方面比敌人优越，就总是要求言论自由。那些想用警察手段阻止持有不同思想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不管怎么自吹自擂，仿佛真理在握，却因阻止别人言论自由就证明他们对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缺乏信心，至于他们是天主教的宗教裁判者或是法西斯党徒或是布尔什维克，那都是一样。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他们分散在有着不同职业利益的各种各样职业之中。他们不能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却能把别的阶级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事业，参与别的阶

级的斗争,并使这些阶级斗争在精神方面高度丰富起来;特别是自从民主制兴起,精神方面的优越性变得比粗野的拳头更为重要以来,这种情形就尤其显著。而且,一个人清晰正确地认识自己要在其中生存下去并有所作为的那个周围世界,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的。在一个象现代社会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一般说来政治,要求人们进行一番特殊的研究,而某些阶层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日常活动的缘故,特别有能力作这种研究。

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把某个阶级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事业并成为那个阶级的成员以前,得力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业务性质的不涉及实际利害,他们能够使自己超脱地区的、行业的和时代的局限,能够不为狭隘的特殊利益所囿,从而认识到那个有关阶级的长远而普遍的利益,并且为之进行斗争。

但他们所能作的还不止于此。诚然,他们即使抱有极重的唯心主义思想,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难免会受个人物质利益、亲戚朋友关系等等的影晌,他们毕竟并不构成一个具有特定阶级利益的特定阶级,因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什么立场,并不是一开始就已决定了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成为某一阶级的成员以前,能够无所偏私地认清,社会发展和社会兴盛的各种条件如何与某些个别阶级的利益有着深切联系。而且他们能够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观点出发,来决定拥护某一个阶级,除此而外,也还能出于道德上的原因,出于对贫困劳苦的人们的同情,决定拥护某一个阶级。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是由于个人利益和私人关系的缘故而将某一阶级的事业变成自己的事业的,那末,另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由于道德感或学术信念的缘故。

只有这后一类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所倒向的那个阶级说来,会成为重大的收获。他们将会使那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提高一步,使它多获胜利少受牺牲。这种收获的大小,取决于他们带来的知识的程度的高低。收获可能极其巨大。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知识分子就已经起了突出的作用,从

而使阶级斗争带上了他们的印记。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出发点或最初对象，还是罗马教皇的教会。人们是用教会自己的武器，首先是用《圣经》，来同教会作斗争的。各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先锋战士，在当时绝大多数都是神学家，他们只是在外表上，在神学观点的论证上——不是在他们所维护的根本利益上——互相区别为不同的派别。

真正的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在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时代，才对政治和社会斗争发生重要作用。没有他们，伟大的法国革命将始终是不可理解的。

关于他们在当时的作用，我曾在我所写的《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阶级对立》中论述过。我曾指出，独立于宫廷和教会的法国思想家们，在十八世纪已不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越来越变成不仅反对僧侣和贵族、而且也一般地反对“富有者”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了。尽管这样，他们并没有成为社会主义者。

“时代的要求是消除阻碍商品生产发展的封建桎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实际情况具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不会看不清这一点，不会献身于一种当时尚无成功希望的社会主义。可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十分同情受苦难、被剥削的阶级，毕竟也不能超脱他们自己因家庭关系、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所隶属的那个资产阶级的视野。然而，他们同时又并没有被个别的资本集团的暂时利益和特殊利益局限住；暂时的特殊的利益，阻碍了个别的资本集团，使他们认识不到全体资本家阶级的长远阶级利益，使他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和使他们不能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作出努力，这些暂时的特殊的利益使许多资本家成为封建政权的拥护者，使几乎所有的资本家都对改革心怀疑虑。至于知识分子则超脱了只关心买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那种狭隘性；他们的职业本身要求概括和逻辑发展，他们的职业给他们带来关于古往今来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全面认识。因此，是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了与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相一致的资产阶级的长远阶级利益；是知识分子，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不仅反对宫廷、贵

族和僧侶，有时也反对农民、小市民和无产者，而且甚至还反对许多资本家集团本身，如果这些资本家集团的暂时利益和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有冲突的话。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长年从事思想工作而获得了对社会情况的深刻见解，并且以这种见解为基础、而不以个人利益和暂时利益为动机采取自己的行动，所以他们的出现，不是作为物质利益的代表人，而是作为单纯原则、纯粹观念的代表人，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实行家’的‘理论家’。资本主义的‘实行家’，自满于自己的无知，想使国家单为他们的眼前事业服务。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不要求政治家服从理论，却使理论适应‘实践的政治家’的眼前愿望和心情。而且他们在法国依靠革命也取得过实现他们的理论的权力。

“宫廷贵族以及和宫廷贵族相勾结的大金融家被推翻以后，在法国只有一个可能有能力治理国家的阶级，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今天，在大多数立宪国家里，广大人民，尤其是城市里的工人群众，由于他们作了许多政治斗争，都已熟悉了一个现代大国的立法需要和行政任务，都已学会了议会事务的处理程序，可是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立宪国家里，仍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议会中占居多数。那么，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从许多世纪以来任何政治运动一直都遭到了窒息，那里的议会之更加必然以知识分子居多数，就可想而知了！就连巴黎的小市民们，也都不选举自己一类的人，而要选举律师、新闻记者之类的人去充当自己的代表。

“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掌握了国家政权，并使国家政权服务于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他们的倾向因为大半是符合于业已成为必然的那种发展的种种需要的，所以是和革命的实际倾向相一致的。也只有他们在革命中发言最多而又最易受人听信，也只有他们的在演说里、书本中和报纸上发表的意见被保存得最好。无怪乎那些根据表面现象作论断的理论家们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制造出和领导了革命的。”（第

46、47、48 页)

以上是我在 1889 年写的。那时我还把知识分子理解为一个特殊阶级。自那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已经使我看出，那样理解是不精确的。不过虽然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十八世纪的知识分子看作一个特殊的阶级。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还相当简单，并且通过等级分化可以一目了然。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有着共同的敌人：贵族、教会、官厅、宫廷。在另一边的则是他们代表着它的事业的第三等级的“人民”。“人民”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分化，因为“工业者”既包括工业资本在内，也包括雇佣工人在内，而两种人都还充满着手工业的思想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中间，就可以发展出一种目的和道路尤其是同情心的深刻一致。当然，他们之间也有重大的个人差异。比如，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是多么不同！但是，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之辈的唯物主义者之间又是多么互相对立！

但是，这些对立并不大于我们在每一个阶级内部所发现的那些对立。阶级的休戚相关，原不意味着整齐划一。所有那些思想家，在他们的决定性社会倾向上，毕竟是全体一致的。

从那时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更加深刻地分化了。当时显得那么统一的第三等级的“人民”分裂了，尤其是在人民内部出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十八世纪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众，尽管有着种种个人差异，却都具有共同的同情心和倾向。今天，共同的同情心和倾向被极不相同而且极端矛盾的各种同情心和倾向代替了。它们将知识分子群众弄得四分五裂，迫使他们加入极其对立的阵营。

一个阶级，即使它的个别阶层在方法上和知识上大不相同，却有它大多数普通成员所共同具有的某些倾向和目标，所以有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工厂主，有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或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但是，有什么共同性将今天的知识分子全体联结在一起呢？医生们有着共同的职业上的利益，律师们、工程师们、演员们也是这样。但

是，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将他们全体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呢？

我们驳斥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性，自然并不证明我们否认他们的社会作用。

德曼说：

“很奇怪，马克思主义在它的社会描述中竟完全忽视了知识分子。”（《论社会主义心理学》，第 276 页）

却又在这里说：

“出现了一个阶级，它的思想决定着现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它给国家和经济提供领导人员，从而实在就是整个社会的统治集团。”

只要看一看我的 1889 年的论著，就足以明白，完全忽视知识分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德曼。他在这里以及在他的书中几乎每一页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正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实际说过的话的“完全忽视”。

在上面几章里我们曾经谈到，知识分子是一个由各种职业组成的阶层。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或一个特殊的阶级，另一些人则可能变成某个阶级的组成部分。

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即僧侣，取得了一些经过训练的“统治职能”，从而变成了一个统治的剥削者等级。

如果说天主教会的以及后来其他一些基督教国家教会的神职人员都变成了统治的等级，那末，另一个方面，骑士等级内部却形成了吟游诗人和抒情诗人的知识分子阶层。

情形有些相似，今天有一些知识分子阶层，就他们的工作条件而论，而且往往还可以就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论，和雇佣工人没有什么不同。在一段时期里，他们由于要矜骄自己的文化教养，有时，例如许多普通职员，还由于要显示自己的“统治职能”，因而同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逐渐地，他们之中毕竟有越来越多的人终于认识到了他们与无产阶级有着共同性，并且看出来他们的得救全在于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不在于强调他们的统治职能。现在，他们有了阶级意识，但不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

现在他们把社会主义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此外，知识分子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他们身上，统治职能发展到了较高程度，比起他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接触点，显得更加突出得多。他们由于统治职能占了上风，于是就有了另外一种阶级意识，一种剥削和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很多工厂经理、枢密顾问、法官之类的人，就是如此。

在无产者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之间，还有一个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中间地位不禁令人想起旧日那些既非纯粹的资本家也不是纯粹的无产者的小市民。

我早在 1899 年我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一文中，就曾谈到这一点，并且讨论了整个知识分子问题。那本书里有一章“新中间等级”，就是专论知识分子的。当时我就断言他们是

“居民中增长最快的阶层。根据德国职工会的统计，从 1882 年到 1895 年，各企业的雇佣工人增加了百分之 62.2，职员增加了百分之 118.9。”(第 130 页)

从那时起，这个发展一直在以同一个速度继续前进。1895 年到 1907 年期间，德国的雇佣工人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 44，职员增加了百分之 160。

在该书同一章里，我对知识分子的不同阶层作了和在这里一样的区分：

“但在有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和具有坚决的无产阶级情感的知识分子阶层之间，还有一个既没有无产阶级情感又没有资本家情感的广大阶层，就他们的观点而论，他们是站在阶级对立之上的。

“新中间阶层中的这个中间阶层，其社会地位模棱两可，和旧日的小市民相同。因此，他们和那种小市民一样，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可靠的，他们是摇摆不定的。他们今天对于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大为愤怒，明天又会对无产者的不良作风深表不满。他们今天号召无产阶级维护人类尊严，明天又会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要维护社会安

宁。”(第 133 页)

“仅仅这几点就已经表明,正在增长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阶级^①,它本身含有一些对战斗的无产阶级说来重要而且有趣的问题。将它完全当作无产阶级,固然失之过当,但是将它简单划归有产者一边,则将更加错误。我们发现,在这个狭小的阶层里存在着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一切对立因素。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个微观世界中如同在社会总体中一样,有着不断进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第 135 页)

由于自己工作关系而接近了无产阶级的那些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来说,是一个大大的加强。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无产阶级带来关于阶级斗争本身的什么新认识。在这一方面,工人之中毋宁另有一些阶层,他们比职员之类的人们组成的新组织参加阶级斗争的时间较久,积累的经验较多,所以后者倒是可以向前者学习的。

另外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知识分子,将不是以整个行业、而只是以个人身分加入这一边或那一边。在那些加入无产阶级这一边的人们之中,有些人其所以对无产阶级说来意义重大,不是由于他们的人数或经济作用,而是由于他们带来的高深知识。

在民主制下,每个阶级都需要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知识,以便显示自己的力量,以便能够不受煽动和错觉的影响而完全根据专门知识来选择自己所选举的民主器官,并向这些器官指出自己认为最为合适的政治方向。

每一个从事于政治的阶级,都需要关于法律和经济学、关于本国的以及国际贸易涉及到的其他各国的经济状况的知识,都需要关于至少近几百年来来的政治社会历史的知识。劳动阶级的个别成员能够

① 今天,正如我所已经说明的,我不会再把这个阶层称为阶级。但是,这一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讨全不相干的。德·曼在我们这里挑剔这种研讨,断言“马克思主义因而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给否定了”(《论社会主义心理学》,第 286 页),这是不公正的。——考茨基注

通过自学获得这些知识,但是,只有在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和凭借异乎寻常的天分才有那种可能。而且,个别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究竟获得些什么样的知识,那还完全是偶然的事情。

给劳动阶级的广大群众带来这样的知识的,只能是那些有可能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就能在政治上教育劳动阶级。只有在知识分子掌握了某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知识的时候,劳动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因他们而提高到一个更高阶段。

在今天脑力劳动的职业分工十分细致的情况下,政治知识所需要的好些专科知识,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说来完全是隔行。如果,比方说,某个语言学家或天文学家因为在他的本行中是一位权威,就自信也能在政治上以权威的身分发表意见,那是一种可笑的狂妄自大。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能比那些仅仅受过国民学校初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获得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必要理论知识,并且通过这种理论知识,能够尽早地将从事阶级斗争的战士们带上更高的了望台,指给他们看更远的目标,使他们的行动更统一一些和更少矛盾些。

这些就是民主制下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任务,知识分子里面懂得怎样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的人们,就能够变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另一方面,如果以为知识分子必然会给劳动阶级带来较高的道德,并从而在道德上提高劳动阶级,那就完全弄颠倒了。道德是不能传授,只能亲身体会的。一种道德如果不是来源于生活现实,而是从别人的说教中接受过来加在自己身上的,那就完全象是刷在墙上的灰粉,经不起雨雪的侵袭。

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所受到的高等教育也同时使他们赋有了高尚的道德,这种想法是很奇特的。在今天,只消提一提那些不计其数的教授、大学生和法官,就足以让人明白看出这种想法多么荒谬。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可以只把大学出身的人算作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指出，通过自学也能获得高深教育。至少，不需要利用高级的科学仪器，只要利用一般人都能弄到和使用的学习资料就不难获得的那种较高深的知识，是可以通过自学去获得的。自学的人能否获得知识，要取决于偶然情况，但是，只要自学能够取得知识，那就不大会是学校里传授的那些八股，而容易出现一种比较独到的、比较独立的思想。

而且，在民主制下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于何种职业，如果他被安放在一个作为民主器官的位置上，如果他在这个位置上必须进行职业活动，那他就会因此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将成为作家、政党工作人员、工会工作人员或国会议员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即使他原来的出身象倍倍尔那样是钣金工，或象狄慈根那样是制革工人。

德曼谈到“在代表机构或行政机构中获得职位”的无产者时，他的话说得很对：

“他们就变成了知识分子。”（《论社会主义心理学》，第272页）

但是，当人们听他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就只能加以限制了：

“他们一旦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便立即也在举止态度、思想方式、交际礼貌、甚至也在衣着穿戴和外在的生活方式上，都带上了表明自己属于一个新的阶级的标记。在革命以后的德国，旧日的一个鞍匠学徒当了总统，这与其说是鞍匠们的地盘扩充到知识分子这里来，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地盘扩充到鞍匠那里去了。”

而且，在这一段话的前面他还说过：

“从他们当上了议员或官吏的那个时刻起，他们就不再是无产者了。他们就加入到向来行使政治职能的那个阶级中去了。”

在这里始终还是那同一个错误，即把知识分子看作自成一个阶级，有独特的阶级意识、独特的思想方式、甚至还有独特的衣着穿戴和交际礼貌。

知识分子的衣着穿戴，究竟是怎样不同于资本家或地主的衣着穿戴或一个裁缝出街时的装束呢？裁缝出街时的服装也许要比大学

里一位副教授的衣着还更华贵精美得多。而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思想方式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方式呢？是圪字党徒的或自由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方式么？很显然，不会是社会主义者的那种思想方式，因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据说是不同于无产者的思想的方式的。

实际上，知识分子只形成一种特殊的职业，并不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人们即使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还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担负起知识分子职能的工厂工人或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改换了职业，并不是改换了阶级。

但是，知识分子即使不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自己的阶级意识的新的阶级，既然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国家中获得了一些形式和职能，那么他们对现代阶级斗争之以什么方式出现以及现代阶级斗争之以什么方式决定全部历史进程，毕竟算得是一种具有最高意义的因素。

当然，工业无产阶级更是对现代阶级斗争具有最高意义的因素。知识分子只是由于和工业无产阶级相结合，才获得他们的充分历史意义的。

在这一章里我们已经不得不一再论及无产阶级。现在我们必须更详尽些地讨论它，以便以此来结束我们对国家和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的探讨。

第八篇

阶级和国家的消灭

第一章 无产阶级的衰落

工业资本含有两个倾向，由于这两个倾向，它才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起划时代的作用，并根本改变社会和国家的性质。以上我们主要只讨论了这两个倾向中的一个，即促使人的生产力不断地和越来越迅速地增长的那个倾向。

但现在，我们必须也对另一个倾向加以考察。在进行这一考察时，有许多问题我们得假定我们的读者早已熟悉，因为现在我们所涉及的这个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早已有了详尽的论述，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主义文献、甚至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献的基本问题。

工业资本的统治促使生产力不断增长，但并不是促使一切生产力不断增长，它所促使其增长的，只是那些人为创造的生产力，而非总是那些天然固有的生产力。

工业资本固然也力求通过人工选种、特殊饲养或施肥等等措施来提高对人有用的天然有机物的生产力。它还远远胜过旧日的剥削方法，力求通过系统训练来提高许多受它剥削的人的生产力。

但是，与这个倾向同时并存甚至更早存在的还有一个相反的倾向也在发展：不通过扩大现有生产力、而通过摧残天然固有生产力来提高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使具有天然生产力的那些物品或者是日益减少，或者是败坏到后人无法弥补这种损失的地步，因而这种生

产力就日趋贫弱。

这两个互相矛盾而又同样为了追求扩大利润的倾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著名章节里讨论得十分透彻。

他在那里关于人的生产力所作的论述，也适用于别的、天然存在的生产力以及这些生产力所提供的产品。资本在追求廉价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时候，不仅使煤炭、石油、铁砂等等矿源迅速濒于枯竭，而且它还使广大地区因不加爱护地采伐森林而变为一片荒凉，使巨大的食物来源因不加选择地渔取而日渐减缩，将海豹、鲸鱼等等贵重毛皮兽类捕捉殆尽。

这种斩尽杀绝的倾向，当然是与商品生产、与为了私人使用而不是为了社会需要的那种个人的私人生产同时出现的。社会的生命比个人长久，相对于个人来说，社会是长生不死的。生产如果是为社会着想而进行的，它就会考虑长久保持生产力，就会考虑保证后世人类能有有用的动物植物。这样的考虑对于眼里只看到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的那些个体商品生产者说来是不存在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毫不犹豫永不停息地把各种极为贵重的动物和植物斩尽杀绝。不仅许多大资本家如此，完全不是资本家的那些乡村居民也同样如此，例如，只市场上要求供应，他们便不惜把许多稀有的高山植物砍净伐光。

但是，只有工业资本先以巨大规模发展了技术，然后技术才能以远大规模造成一个自然资源的摧毁过程。我们在这里姑且完全不谈那种使战争变得越来越可怕、使整个文明随时受威胁的惨酷的毁灭性技术。但是即使在和平时期，现代技术的这种毁灭力量也是在发生作用。我们在这里可以想想交通的技术。比如说，摧毁森林，古代就已有过，但在古代，这种事情只发生于可以水路运输木材的个别滨海或近水地区。有了铁路，这个界限就可能突破了，森林中凡是落后时代的技术所不得不任其留存的东西就可能被一扫而空了。

许多高山植物的不断绝种，也是交通工具的改善所带来的一种

后果。当然这种绝种之值得惋惜，主要是出自美学和科学观点，而不必是出自经济观点。现在，新式的交通工具给从前最难到达的山谷，带来大批游山寻乐的旅客，他们的乐趣就在于毫不经心地随手摧毁所遇到的美好景物。在美国建成太平洋铁路之后，交通工具的改善又造成美洲野牛的无意义的绝灭。今天在非洲，它又假手于那些因在欧洲玩得厌倦而来寻找新刺激的游手好闲的阔佬，造成了大象的绝灭。

诚然，自然界供给的那些为我们所需要的无机物，只要人们开始掘取，不管在什么生产方式之下，总是会日渐减少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再生长出来的。它们在地球上的数量是有限的，只要人们想取用它们，它们终有最后告罄的一天。但我们毕竟应该有一个为将来着想的管理机构，设法把最后取尽的一天尽量推迟，那就是说，要使现有的地上宝藏尽量用得节省，不要再象今天的许多政府和资本家那样，常常为了荒唐的甚至有害的目的，拚命采掘矿山和浪费出产。

同时，煤和石油最后可以用水力、潮汐之力、风力、太阳的光力等等来代替，至少作为机器动力可以这样。铁可以用别的金属，例如铝，来代替。就是作燃料和建筑材料之用的木材，也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代替的，至于起着调节气候的作用的森林，那当然是无可代替的了。

资本主义式的掠夺性开采对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真是灾难重重，总的看来可以这么说：工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种种毁灭性作用，是与它有着联系的那些科学技术进步所无法抵偿的。

然而，工业资本主义的灾难性的威胁，恰恰首先是针对着对我们说来最为重要的那种生产力：劳动的人。没有劳动的人，一切生产工具都是死东西，只有他才赋予它们以活力和生命。

但是，人不仅是最高的生产工具，而且也是最高的生产目的。至少从一般的社会观点看来，人是劳动者的同义语。当然，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来，雇佣劳动者确实只是生产工具而已，跟供役使的牲畜一样。而且生产的目的，就是资本家的利润。一种生产方式，即使能给

劳动者带来许多的久远幸福和高度文化,如果它不能产生利润,不能给资本家们制造盈余,就会被他们和他们的理论家们看作是不值一顾的。

但是,对于这样的资本家说来,劳动的人作为生产目的固然无关重要,他所雇用的劳动者作为生产工具,是否兴旺却不能也同样是无关重要的。

劳动者如果没落,他们如果迅速趋于毁灭,来不及另找代替,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最后也一定趋于毁灭。因为,别的生产力由于掠夺性开采而被摧毁倒还能有办法另找代替,人的生产力可就不是这样了。人的生产力是无可代替的。人的某些活动虽然可以让机器来作,但是这些机器本身还得要人来开动、管理、加添材料和原料。亚里士多德曾经设想过,织梭会自动织布,每一样工具只消一声命令就会动作起来,完全象荷马所叙述的提达拉斯的雕象或赫菲伊斯托斯的三脚架,在天神聚会需要它们的时候,会自动出场。可是这样的事是永远也不会有的。

因此,工业资本尽管带来了技术上的巨大发展,它的剥削方法却仍旧和在它以前出现的一切剥削方法完全一样,有着造成社会最后崩溃的危险。人的生产力如果衰落了,发挥物的生产力又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发展过程势必危害整个社会,这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着优越技术,将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方式部分挤垮,部分搞穷,从而将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作的劳动者也象从前那样交到饥饿、过渡劳动、或完全失业这些死神手中。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愈是使工人们拥挤在悲惨的贫民窟里,使男人们酗酒中毒,使女人们为娼卖淫,男男女女都患梅毒,那么饥饿、疲劳、失业这些死神就愈是惨酷地施展威力。

而且,资本主义剥削对群众的摧毁,远比从前任何前资本主义时期剥削方法所造成的群众摧毁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剥削方法,由于它所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微不足道,只限于特定的

地区以内，而在那些地区以外还保存着为数众多的野蛮民族，他们在后来还能出来继承没落文化。尤其是因为，从前的剥削方法所依仗的是单纯的、当然由经济所制约的暴力，剥削阶级的武器技术虽比那些自由民族的武器技术优越，却还没有达到能使他们的任何反抗根本无望的地步。

相反地，面对着工业资本的武器技术，野蛮人或蒙昧人的任何认真的反抗都不可能了。而且，现代的交通技术能够开辟通往一切野蛮民族的通路。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扩大它的剥削领域，不是依靠武力。它能利用从前的剥削方法所缺乏的一种手段，即，它所大量生产的产品的廉价，依靠这种手段，它将任何别的生产方式都打垮了排除了。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曾经成功地开辟过一些广阔的经济领域，其中各个部分有着频繁的交往，这些文化地区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最后达到十分庞大惊人的扩张。

这些文化地区之中最庞大的一个，大概要算中国的了，它的面积大约一千万平方公里（西藏和蒙古计算在内），人口现为四亿左右；次大的一个是印度的，面积约为三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在三亿以上。面积大约与此相等的是罗马帝国的文化地区和波斯帝国的文化圈，但是前者的人口远远不足一亿^①，后者的地区里今天约有四千万人。在古代，这个地区里人口也许较密。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肯定是如此。

然而，这些文化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和我们当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地区相比较又算得了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地区已经差不多囊括了整个世界，它还准备要把诸如新几内亚、婆罗洲、中非、以及加拿大的极北地方等等地区内最边远的部落也拉进资本主义的文

^① 根据威廷斯基的统计数字是五千四百万（《用数字来看世界》第1卷，1925年柏林版，第24页），与贝洛赫和爱德华·迈尔两人的统计数字不相上下。根据德尔布吕克的统计数字则为七千万（《世界史》第1卷，第576页）。——考茨基注

化范围里面来。

但是这就意味着，地球上已经再也没有那样的未开化的民族了，他们的力量之强大和知识之丰富，足以使他们有能力在资本主义世界万一象从前罗马帝国那样腐烂时，继承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所以现在，最深刻的毁灭在威胁着整个人类。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安定人心地指出，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这种由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劳动阶级的衰落，只不过是一种小儿病症而已，是可以由工业资本主义来克服的，因为它自己能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它自己能产生出力量来对付人民群众贫困化这种局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对的。但是，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某种意义，还必须用具体的想象来代替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理解为资本家，上面那个论断就不对了。资本家在今天仍象一百年前那样，不管在哪里都是只想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征用女工童工、提高工人住所租金，等等。凡是他们能够为所欲为的地方，例如在中国，他们今天也还是象在工业资本主义幼年时代的英国那样，对人的劳动力和人的生命进行可怕的劫掠。在资本家身上是不会产生出较为高尚的社会情感和社会思想来的。在中国，最惨酷的剥削者里面有中国的企业主也有英国的企业主。

但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能产生出力量来对付劳动群众贫困化这种局面，这是对的。不过，仅仅只在一个意义上，即在《共产党宣言》说下面这句话的意义上说来，它才是对的。《共产党宣言》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或者，象在另一段里所说的：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贫困化的趋势所以会成为资本的一种单纯的小儿病，并不是因为资本家们有了钱财有了势力之后，也会生长出他们的社会认识和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

社会感觉,也会在他们身上出现一种社会良心。他们之中个别的人,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有良心,而在他们绝大多数人那里,直到今天良心也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如果说过去曾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成埋葬一切文明的坟墓,那末,这是因为曾有可能反抗资本家。今天的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不是作为个别的人来看——和两三个世代以前比较起来,多少有了一些较高的社会认识,这决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欲望已经有所减缓,而是由于这种追逐利润所遇到的反抗起了作用。工人已把他们的企业主教育成比较具有社会良心的人。每当企业主同没有能力进行反抗的工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新获得的社会良心就立刻停止活动。

事实上已有可能成功地抵御资本制造贫困的趋势,甚至已有可能从某个时刻起转而对资本采取攻势,并对资本剥削它的被剥削者的势头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个事实乃是国家和剥削出现以来最重大的社会事实。随着工业资本带来的生产力的扩张,生产力终于已使我们有可能结束一切剥削而不抛弃我们业已达到的一般文化水平。工业资本出现以前情形就不是这样,那时候剥削的普遍消除,不可能有别的下场,只可能是社会的普遍农民化。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产生了对资本的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不象从前的剥削方式那样以社会的停滞或退回野蛮状态而告终,毋宁会终于产生出一种没有任何剥削的完全新型的社会。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工业资本含有促使它的雇佣工人日趋贫困终至灭亡的倾向,对这种倾向进行反抗的,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被剥削者自己,一是那些同情被剥削者的非无产者阶层。

工业无产阶级在初出现时力量很弱,以致他们的反抗几乎无足轻重,倒是那些反对资本家的非无产者的反抗,更为显著一些。

能够依靠军事优势一举而加以实施的那种剥削方法，也能一举而予以消除。工业资本却只是渐渐地、首先只在个别地区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才在经济先进国家里，即在英国，变成居统治地位的，决定整个经济生活的生产方式。

有产阶级里面热衷于资本主义工业利润的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为数不多的，即使到了新的工业制度给劳动阶级造成的最令人愤慨的损害已经显明昭著的时候，情况也还是这样。大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们完全能够丝毫不带资本主义偏见地认清工业资本在劳动人民中造成的损害，并且看出因此而给社会前途带来的危险。

在军国主义的国家里，当工业败坏了劳动人民的体质的时候，为国家兵力担心的军人们也和上述那些人一样，变成了抱批判态度的观察者。

道德感亦即对于受苦难的人们的同情，同经济方面的见解结合在一起，形成作为一种意图，竭力制止资本的这些害人倾向。

这种意图、这种努力本身又可以采取两种表现形式。比较勇敢而有远见的思想家们，有感于可怕的社会弊害，就极力寻求能在根本上消除任何形式的苦难的方法。他们草拟了能为一切人保证幸福的种种社会组织计划。这样便形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开端。这些计划还都是乌托邦式的，但已不是纯粹的国家空想，其立意毋宁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有些乌托邦的发明者热切盼望立即付诸实行。

然而，他们可以用来建立个别的社会主义新区 (Sozialistische Kolonien) 的那些资金毕竟太微不足道了。它们和今天犹太复国主义所征集到的那些资金都不能比拟。这些新区于是不得不规模极小，远离着文明区域；在那样的环境里，久经锻炼的农民们也许还能生活得下去，但城市居民，尤其是在那些社会主义新区中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是万万不行的。他们在热情鼓舞之下聚集到那里，却耐不住日常生活的空虚平淡。这些新村没有一个曾取得什么成就。

走这条道路，无产阶级解放不了。

走另一条道路，成就稍微多些。这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社

会政策的道路：呼吁国家颁布劳工保护法，尤其是最无反抗能力的女工和童工的保护法。在这方面也是英国领先，英国的一些博爱主义者在上一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使国会通过了若干劳工保护法。

两条道路并不互相排斥。罗伯特·欧文就是两路并进的。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区，又为争取颁布劳工保护法进行了斗争。

但是，走这后一条道路也还是没有取得很多成就。资本家们感到他们剥削人的自由受了威胁，对劳工保护法进行了疯狂的反抗。本来劳工保护法的规定就十分有限，可是它们时常还只是一纸空文。对利润的兴趣，显然比同情心和科学认识还更强烈。

同情心可以成为一种坚强的力量，但是，只有在真正是情同一心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的时候，它才可发挥作用。但广大的有产者，如果他们所同情的那些无产者的痛苦，主要只是他们从一些报导里间接地、偶尔地、片断地获悉的，那么他们的同情心就总是一瞬即逝。骇人听闻的悲惨事实被揭露出来的时候，许多有产者的同情心象山洪一样迅速涌涨起来，随即又同样迅速地涸落下去。

至于科学认识，也就是，单调的理论，根本就产生不出持久的斗争力量，足以制服一种强大而坚决的社会势力，足以迫使这种社会势力接受使它感到自己的获利条件和生存条件都会因之而受威胁的那些法律。

社会主义和社会政策这两条道路，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强大到足以自己站立起来、成功地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才会成为不断限制资本主义势力的道路。只有在无产阶级走上了这两条道路的时候，这两条道路才开始导致社会改造。当然，它们最初的意义只不过是挽救资本主义社会以免它早日毁灭而已。它们为资本主义社会保存下了它的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能够持久地从事紧张劳动的工人。

几十年以来，工业无产阶级总显得好象是完全没有能力胜利地抵御他们的压迫者，总显得好象是最多只能够表现出几阵绝望的爆

发，其结果不是一无所获就是遭受流血的惨败。在许多同情无产阶级的作家和画家们看来，特别适合于用作艺术题材的就正是这些绝望的爆发。从霍普特曼的《纺织工人》和凯绥·柯勒惠支的一些速写画算起，直到托勒的《机器破坏者》和波将金号电影，都是如此。在根本上说来，所有这些艺术作品对于无产阶级和它的朋友们，必然会起令人沮丧的、而不是令人感奋的作用，因为这些作品都把受压迫的人描绘成处于绝对没有能力充分利用机会取得某种胜利的状态中，即使在本该暂时取得一次胜利的时候也是这样。连装甲巡洋舰波将金号最后也失败了，被舰上的人员抛弃了。如果说描绘那些事件的作品在今天完全起着不同的作用，不再是令人沮丧的了，那末，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观看那些作品的无产阶级，已经非常不同于作品中所描绘的过去时代的无产阶级了。

一切事情的开端总是比较难于认识，现代工人运动也是如此，它的开端是远比它的已经明显可见的后来的进程更难于认识的。不象后来的进程那么一目了然的，是使无产阶级虽在资本的一切压制威力之下竟能终于胜利地进行反抗的那些因素。

在这方面，有一个情况肯定是极端重要的，即在无产阶级里面存在着具有很不相同的反抗力量的不同阶层。完全没有反抗力量的是那些受到资本的最残酷的待遇的童工和女工。反之，男工们就其所受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整个情形而论，则是能够进行反抗的。他们也分为两类：有技术的工人和没有技术的工人。

后一类工人一部分最初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一部分来自农村居民。这两种人是没有任何组织经验和任何彼此关联的。有技术的工业劳动者情形比较好些。他们多半来自手工业。在从前，手工业的工人们曾组成许多自卫性很强的帮会，这样的传统在工业资本主义初兴时期在一些熟练工人的圈子里仍旧有生命力。

对于资本的最初的反抗就是出自这类工人。这种反抗往往牺牲重大，因为在上一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即使在英国——从1799年到1825年——也还是严禁一切集会结社。

这类工人的成就鼓舞了地位更低的工人阶层，并给他们指出了道路。大量的工人群众集中在少数的工业中心，而在这些工业中心之内又是集中在工业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个别大工厂里，这就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在英国以及后来在法国所发生的民主运动，对促成无产阶级的上升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很不小。民主运动在初起时是一个一切劳动阶级都参与的运动。正象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工业资本家，与商人和银行家相反，也是算在劳动阶级之内的，而劳动阶级里面的无产阶级则在当时还没有获得独自の阶级意识。

但是，随着工业资本不断增强，不仅它在经济上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它在政治上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也在民主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明显。造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的，首先就是这个政治对立。在这一方面，政治对立的作用远远胜过经济对立的作用。经济对立当然和工业资本本身有同样久远的历史，但是在最初却还只能看作是对于坏资本家的一种个人对立，或者最多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地方性或行业性的事件。

我们这样断言这一事实，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批评者们也许会认为这等于承认不是经济因素决定历史，而勿宁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也在决定历史，因而认为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错误的。幸而这只是这些批评者本人硬把这种偏狭性塞到我们的历史观里去的，为的是这样可以得意洋洋地驳倒我们的历史观。在我们看来，正如在本书中所一再论证的，也正如恩格斯所经常强调指出的，经济环节只是历史发展的最后的因素，却并不是显露于事件表面的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

从一个意义上说，民主就在于使人能够享有国家之内可能最大的行动自由，取消官厅机制的监视，获得在言论和著作的批评自由，以及能够委托民选的代表大会来制定法律和组织政府。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热衷于民主的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毋宁是一切工业阶级以及全体农民群众。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地热衷于“人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那种民主的扩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过程中，一旦斗争的成就有了明晰可见的前景，为民主而斗争的各个阶级之间就会马上出现严重的分歧。

“中等阶级”，从本质上说，有产阶级以及那些不从属于贵族而社会地位较优的受过教育的人士，想要在政府中占有势力并在国家中代表自己的利益，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争取民主权利，而他们想要为自己赢得民主权利，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号召全体劳动群众参与争取这些权利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权利自然就应该成为这些群众全体的权利。

同一个资本，一方面竭力要将它所雇佣的劳动者弄得完全没有进行社会斗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又亲自驱使他们去参与斗争，而这些斗争的成功必然会给他们灌输力量和自觉。

不过，劳动者们实际上最初并不是为他们自己，毋宁只是为他们的剥削者而进行斗争。这一点在选举权的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主运动曾立刻争取到普遍平等选举权。如果民主运动变得过于强大，特权阶级就要设法分裂它。它们把选举权给与资本家，有时也给予农民和小市民。无产阶级则始终被排除在外。

全力参与最初那次争取选举改革的伟大运动的英国工人们，就经验到了这一点。那次运动以1832年的改革法案告终，而这个法案将选举权给与了所有的有产者，却剥夺了工人们的权利。工人们又展开了一次运动，与资产阶级的改革家们对立起来，单独进行宣传鼓动，从而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运动，即宪章运动。1848年的欧洲革命遭到失败，使各地的工人们意气沮丧，也使宪章运动陷于停顿。反动时期过去以后，当整个欧洲的工人们又展开了运动的时候，在英国再度爆发了使工人们受到鼓舞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后来托利党走了一着分裂工人阶级的妙棋，将选举权给与了工资较高的工人们，而不给与缺乏组织而又工资甚低的工人群众（1867年选举改革法案）。这一纯政治性的手段确实起了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

斗争的作用，竟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大不列颠范围以内从此时起分裂成为地方性和行业性的个别运动达数十年之久。

在法国，1789年的革命固然带来了民主，但最初也只是一—种区别选举权（Zensuswahlrecht）。1793年的宪法确实规定了普遍选举权，然而，在沒有按照着它来实行选举以前，热月反动便把这个宪法废除了，并在1795年另订了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的又是区别选举权。

从这时起，一连串的政治变革给法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选举制度，但它们一律都是有限制的，直到1848年二月巴黎无产阶级才取得普遍选举权。六月的失败摧毁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力量，巴黎的无产阶级因而沒有能力向那些既被起义吓破了胆又被激怒了的中等阶级坚持这个权利。中等阶级就以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剥夺了他们的这个权利。拿破仑三世在他发动的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又恢复了普遍选举权。因为在他看来，在农民占多数的法国，利用反动的农民群众来控制反叛的首都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从这时起，普遍选举权在法国已不再受到威胁，于是法国工人们便利用行政区的独立，从事于争取从把巴黎乃至各个工业中心从农民的压倒优势中解放出来。普鲁东主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其政治意义就在于此。从这时起，法国的工人们便学会了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将普遍选举权从一种愚弄无产阶级的手段转化为一种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

象在法国那样，1848年的普鲁士革命以法国为榜样，也取得了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这个选举权在普鲁士也象在法国那样，遭到随即到来的反动派的败坏，被改变成为不平等的选举权。反动时期过去和政治生活恢复以后，在六十年代初期，那些自由主义者們并没有想到要去争取普遍的、平等的、不记名的选举权，虽然他们有他们那种方式的民主思想，而且还曾号召一切阶层的工人都来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拉萨尔在当时是以使工人脱离资产阶级的领导和建立独立的工

人政党为目标的，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十分明智地选择了要求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出发点，因为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性的民主要求。差不多与他同时，马克思也参加了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

自由主义曾以阶级选举权这一政治手段向俾斯麦进逼，俾斯麦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在1867年仿效路易·拿破仑1851年的先例，恢复了普遍选举权。他将普遍选举权纳入了北德联邦宪法，1871年又将它纳入了德意志帝国宪法。他希望能象拿破仑那样充分利用它。当时在德国确实还是农民占多数。然而，当他改弦更张推行普遍选举权的时候，显然他是心怀畏惧的。因为人们只在选举没有多大实力的国会时享有普遍选举权。在选举各邦的邦议会时，连普鲁士也包括在内，仍旧是使用区别选举权。而且，俾斯麦不久就对于国会选举也后悔不该允许实行普遍选举权了。

俾斯麦在仿效拿破仑的时候，忘记自己是比拿破仑迟了二十年才上台的。拿破仑实行普遍选举权是在一个反动的、工人阶级一蹶不振的时期，当时工人阶级在1848年的希望破灭以后对于一切政治都灰心绝望，漠不关心。而俾斯麦允许普选权的那个时期，工人们已经忘掉1848年的失败，都热情地大力地投入政治活动。而且，帝国时期的法国始终是个农民国家，统一了的德国则在消除了该死的小邦分立状态以后，很快地发展成为欧洲大陆上有着极重要的大工业的国家。

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里，情况也和普鲁士相似。自由主义既然是经过资产阶级改造过的一种民主，当然不是民主的观念的同义语。自由主义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拒绝给与群众普遍选举权，在奥地利是如此，在比利时和北欧其他小国里也是如此。因为在那些地方没有出现过要篡夺革命观念来为自己的王朝服务的拿破仑式人物，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曾由一位登上宝座的暴发户或由一位新登宝座的暴发户的顾问（1871年德国皇帝的顾问无疑就是一个例子）做过给予普遍选举权的实验。在所有那些地方无产阶级都必须进行艰苦

的、牺牲重大的斗争，来赢取普选权。在普鲁士，为了实行普遍选举权也曾需要一次无产阶级革命。

普遍选举权不是一件赠品，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它并不象巴枯宁分子在半个世纪以前断言的和共产主义新巴枯宁分子今天重又断言的那样，仿佛可由资产阶级用以愚弄劳动人民使之俯首听命。说普遍选举权是资产阶级工具的这种共产主义论调，不仅在共产主义者中间十分流行，而且由于它轻视“形式的”民主，因而也在许多和共产主义者们秋波频传的、揭露“形式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中间，得到支持。而在今天，许多事实已经明白摆在眼前，还需要——或者再度需要——列举这些事实来驳斥这种论调，实在不是什么十分令人高兴的事。

普遍选举权，尤其是发展完善了民主制，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收获和成就。马克思在世时还没有能够考察究竟阶级斗争在高度发展了的民主制之下会采取哪些形式，因为在他那个时候，欧洲最多只在瑞士有着这样的民主，而瑞士从各种不同方面看来，都是一个完全非常态的、很微小的社会组织。英国则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还离着普遍选举权很远哩。

因此，关于在一个发展完善了民主制的条件之下阶级斗争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不能请教什么。今天有一些人，想从那个连1848年的经验都不知道的《共产党宣言》里汲取关于民主制的作用的知识，借此来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弄得有凭有据，这真是太荒谬了。

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些国家里的民主制：这些国家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封建公侯专制政体和拥有庞大的官厅体系及常备军的中央集权这个阶段；在这些国家里，民主制须由无产阶级去争取，而不是象在瑞士各邦或美国里那样现成存在的，因为这一类国家都是独特的事例。特别是在美国，民主的赢得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毫不相干。因此，民主不曾能够滋长和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在前一类国家里，高度发展的民主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收获。但在这些国家里，争取民主的斗争很早就已经是一种号召无产阶级的强大手段，它号召一蹶不振、几乎毫无斗争能力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斗争，使之在斗争中从别的阶级里找到同盟者。无产阶级通过这些斗争坚强起来之后，他们就进行从前不敢单独尝试的斗争，并获得经验和自觉。可是通过这种斗争，那些曾使无产阶级最初陷入分崩离析的地方性和行业性隔阂，也被消除了，无产阶级于是开始关心涉及整个阶级的那些普遍问题，并且也学会把整个阶级的力量联合统一起来。

这样，无产阶级在这些政治斗争中最后一定会获得一种力量和理解，而这种力量和理解，或早或迟总会驱使他们，并给他们提供成功的可能性，让他们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阶级，而且作为这样的一个阶级走上自己的道路。无产阶级走上自己的政治道路，并不意味着其他阶级和政党的行动就对它无关重要了，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不能为了某些共同的目的而同一个别的阶级或政党暂时联合行动，假如这种联合行动有利于达到这些目的而又无损于别的同样重要的目的的话。但无产阶级走上自己政治的道路，倒是意味着无产阶级即使在这样的联合行动中也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暂时的共同行动决不可以使无产阶级屈从于异己阶级的领导之下。

争取民主的斗争究竟对无产阶级的精神能力和组织能力、对他们的团结一致和他们的力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只要我们把那些曾经必需有这种斗争的欧洲国家和那些未曾有过这种斗争的其他工业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作为后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在那里，工人们现成地享有一种相当发展了的民主。所以尽管有很多从别的国家移殖来的，从无产阶级必须在其中艰苦奋斗以争取民主权利的国家移殖来的社会主义者，作了许多最有力和最忘我的努力，而在那里一个强大的工人政党至今还是组成不起来，其原因在不小的程度上即在于此。

与此相反的是俄国，它的人民在晚近半个世纪里为了争取一些极原始的民主权利，比任何一个其他现代国家的人民都进行了更多的牺牲极为惨重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俄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阶级意识，而且许多社会主义政党都把自己的重要性提高得远远超过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达到的实际地位。

诚然，首先，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已使大多数国家走向一种发展完备了的民主制，然后，争取民主的斗争作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已使无产阶级超脱了它被工业资本主义逼入其中的那种看来绝望的衰退状态，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民主还通过无产阶级之进入民主生活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内容。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缩短工时

我们曾经谈到，资本家以及农民和小市民们，通常总是为他们的业务所累，因而就没有时间，也常常没有兴趣和机会，来积累必要的政治经验，以便在充任民主工具时，例如充当议员或部长时，能够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

不过在政治理解方面，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比资本家还更糟糕得多。资本家站在世界机构的中心，站在世界市场上，所以他们有着一切可能，不仅充分了解经济形势，而且也充分了解政治形势。

农民是孤立在农村中的，但就连城市里的手工业工人，其政治视野也往往越出不了教堂钟楼以外。他们通常只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及其附近寻找市场。他们只关心这个范围以内的情况。

而且，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十分缺乏时间。在中世纪时，他们的劳动还不太紧张，许许多多节日使他们，尤其是使城市里的工人，能有充分的闲暇来从事自修，扩大见识。我们曾经谈过，宗教改革时期在许多城市里，读书写字已经非常普遍，人们都热烈地学习。

工业资本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紧张和忙碌，不仅它的雇佣工人，而且连同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和农民，都被逼着不断延长工时，直到

劳动过度精疲力竭的程度。

所有这一切，大大地妨碍了小市民和农民，使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政治知识。所以他们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同资本家一样，感觉充当民主工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他们同时还想继续从事于他们自己的业务的话。但是，他们还赶不上资本家，因为他们通常都无法获得必要的能力，去对国家事务进行考察和作出独立判断，去在全国范围内组成和维持自己的政党，给它规定出自己的方向。

因此，他们也象资本家们一样，通常不得不委托特殊的职业政治家，在国家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执行他们所愿望的政策。但是，资本家们有足够的势力和政治认识，能使他们所选定的职业政治家至少在精神上，往往也在经济上始终依附于他们。农民们和小市民们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所选的人很容易从他们的仆人一变而为他们的

主人。

情况既然如此，在民主制度之下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劳动群众变成职业政治家们和他们背后的大剥削者阶层手里掌握的一种单纯的投票动物。于是民主制度，原来被认为是人民统治国家机器的工具，竟变成了资本或整个有产者（包括大地主）的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

和巴枯宁主义素有渊源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们想到的正是这种局面。他们认为有必要警告无产阶级提防民主制，当然不会给无产阶级提出什么比下列想法更好的东西来，按照他们的想法，如果能有一位类似上帝的救世主出来实行独裁，会对于劳动群众更有利得多，而他们又没有说明究竟怎样才能保证恰恰是一个正派的人成为独裁者，成为人间上帝。可是对于奇迹，我们已不再相信了。

这些民主批评家的做法，仿佛是说民主组织在极不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一定永远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们这些多半自命为严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永远不停地唠叨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这个词句，却忘记了研究一下，在这种阶级斗争之下民主会起什么作用。

在最初，无产阶级比起小市民和农民来，还更没有可能系统地

事于独立的政治活动。过度的劳动和居住条件的恶劣，逼得他们陷入比农民和小市民还更加不如的境地。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曾亲自举出駭人听闻的例证，说明在资本享有充分自由的那种美好的日子里，许多雇佣工人则沉沦于十分可怕的愚蠢。

如果说，在那种资本主义气氛的大力压抑之下，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虽然在精神方面也有所低落，而工业无产者在这方面却会比他们更为低落，那末应该说，工业无产者在自己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毕竟能够重新把精神状态提高得超过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甚至当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由于受到这些阶级斗争及其成就的鼓舞也同样上升的时候，工业无产者也还能超过他们。

有两个方面使得无产者不仅比手工业工人和农民优异，而且也比资本家优异：首先，他不是同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那个企业聚生连生在一起的，那个企业不是他的企业。他对那个企业所起的作用，随着他在那里的劳动时间的结束而一同结束。超过他的劳动时间以外，他对企业就全然无关了。其次，他自己的发展不依存于这一个企业的发展，而是依存于他的阶级、整个共同体的发展。雇佣工人远比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人和资本家更能在他考虑政治事物的时候，摆脱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那个行业的特殊利益的影响，他能从一个比狭隘的行业利益更高的观点上观察共同体的情况。

和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其他阶级比较起来，雇佣工人更易于获得较高的观点，更易于对社会问题发生理论兴趣。在这方面，他仅次于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个别成员在这方面能够超过许多知识分子。

当然，必须存在着一定的物质先决条件，上述种种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但是，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比我们所谈到的其他阶级的阶级地位更有利于使这些可能转化为现实。

一种企业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潮，每一个企业主都会尽最大可能来延长工时，延长工时意味着增加收入——当然只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特别是在劳动的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会这样。企业主既然尽最大可能来延长他的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如

果他在企业里亲自参加劳动,他也会延长他自己的工作时间。但是,他是主人,他当然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延长得损伤他的体力和智力,虽然在业务繁忙时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雇佣工人是在企业中参加工作而反对延长工时这一意图的唯一的人。在最初,他们争取的是不使自己被完全损毁。只要是为的不让身体完全被摧毁,他们的缩短工时斗争就会得到有产者阶层的许多博爱主义者们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一些眼光较远的工业资本家本身的支持。

但是,一旦工时缩短到了防止工人身体迅速损毁所必需的极限之上的程度,这些人们就不再支持了。

与此相反,雇佣工人并不会停留在这个界限上。他的收入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他的工时的长短——即使就每个人说来并非如此,至少就阶级而论是如此——而是取决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这就是说取决于他的生活水平的高低;而他的生活水平则不能高到完全不生利润的地步,也就是说,不能高到使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继续进行的地步。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个水平还是可以超过的。社会主义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最大高度就是他自己的生产品的价值的高度。工人的工资不可能长期超过这个价值的高度,必须比它稍微低一点,这是马克思已经指出过的。

但是,我们现在离着这样的水平还有很远。只要情况是这样,工人的劳动日就永远还可以缩减。而且劳动日的长度并不决定工人的收入。工时最长的那些工人阶层工资最低。

同时,工厂里的劳动越来越变得劳累、单调、令人厌恶。工人不仅希望在劳动时间以外能有娱乐和休息的时间,而且希望还能有时间从事他所自由选择的令他满意的活动。

因此,工人不能满足于已经使他可以得到休息而有精力再来上工的那种正常劳动日。他不断地要求继续缩短工时,直到在经济上既不妨害生产过程而又可能的限度。这样的限度不是绝对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能够因技术上的进步而不断推移的,并且不仅由于新的

机器，而且由于新的方法和新的组织形式也都可以作到这一点。

老实的市民们看见雇佣工人老是在要求缩短工时，便连连摇头不以为然。企业主则爱向工人们说，他比他们工作得时间更长，往往生产车间里四处静寂以后，他还在办公室里算帐写信。有的时候倒也真有其事。只是这些企业主老爷们忘记了，第一，他们是为他们自己工作，而雇佣工人们却是为了别人。其次，他们的工作一般说来，要比那种照料机器之类的刻板工作有趣味得多、令人起劲得多。而且最后，他们这个阶级虽然也在从事谋利生活，却有希望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站到最上层去，他们是最有时间在谋利工作之余还能从事文化修养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参加谋利工作，完全不是保证资本家们的精神和政治优越性的一个因素。

诚然，工人们并不是总把他们因缩短工时而得来的较长余暇应用于政治和文化教养。但是经验表明，有许多人以为缩短工时只不过加长工人们在酒店里玩牌、酗酒和醉后殴斗的时间，那是错误的看法。绝大多数干这些事的人都是劳动时间最长的工人，因为他们要在他们短暂的闲暇时刻里用这种方式来忘掉他们的痛苦。

虽然，劳动时间的缩短，并非总意味着工人们从事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就相应的增加。但是，工时的缩短即使只意味着对享受自然、对体育活动以及对种菜养花之类自由的变换性的劳动的兴趣的增加，那也能使工人们从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给他们造成的那种衰退状态里挣脱出来。越来越广大的雇佣工人阶层的工时的缩短，总会产生出越来越多过问政治的活动和追求一般文化的努力，以至使他们终于达到远远高出于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这些其他劳动阶级之上的程度。

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雇佣工人——仅次于知识分子——最具备那些使他们得以提高社会观点和望见远大目标的条件。雇佣工人阶级，因为没有私产，也是对现状最不感兴趣，因而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最后，工时的不断缩短，最易于给他们提供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可能，而知识和经验对于发展他们的单纯素质、使之产生新的伟

大思想；或使之实际采纳、具体结合和大力争取这些思想，都是很必需的。

争取劳动保护的斗争，特别是争取缩减每日劳动苦难的斗争也象争取民主的斗争一样，换句话说，经济斗争也象政治斗争一样，是有助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第一次伟大的工人运动，即宪章运动，提出了两个首要的目标：普遍选举权和十小时工作制，这在实际情况中是有深刻依据的。不论在什么地方，这两点都构成每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的出发点。职工会用别的手段去争取的，也完全是这些东西。凡是实现了这两个要求的地方，就都朝着这同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建立和巩固民主制度，缩短为企业主效劳的工作时间，也就是延长工人们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很少被用于、而且越来越少地被用于从事单纯的闲游浪荡，而毋宁是更多地被用于从事各人自己所选择的、有利于自己本人、有利于自己的阶级或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意义下的社会的活动。

一般所谓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象争取民主的斗争一样，也有着提高无产阶级的倾向，想使无产阶级最终由社会里最下层的阶级变成最高发展了的劳动阶级，甚至变成日益负担起领导社会的责任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最能够而且最愿意推行新制度，而新制度通过经济上的种种转变可能而且必然有利于社会。甚至一些不带有特殊阶级性质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可以协调的革新措施，这个阶级也能够并且愿意予以推行。

直到世界大战时为止，在德国只有一个主张共和制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实行了共和制，而且就连资产阶级分子此时也开始越来越安于接受共和制了。

直到世界大战时为止，在德国只有一个竭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所作的努力，造成了终于使1918年的革命实行了妇女选举权的那种气氛。今天，妇女选举权不仅已经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而且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懂得利用它来对抗社会民主党。

在德国除了社会民主党以外，没有一个政党曾经大力争取以普遍裁军和国际协商方法来代替军备竞赛。今天，凡是想把自己提高到超出那些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的政党的顽固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也都把这样的主张提到自己的日程上来了。

今天，各地的工人政党已经不仅在单纯有关工人的问题上，而且也在一切有关社会和政治继续发展的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了。

无产阶级中人数日益增多的那些最高阶层，不仅获得了精神独立性，而且也获得了相对于其余部分人民群众的精神优越性。

这些阶层相对于其余部分人民群众说来，还获得了日渐增长的团结性。小市民的和农民的利益都有两面性，正象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也不是纯粹无产阶级性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则有完全统一的性质。而且，无产阶级因为能够从一定的发展高度上开始使自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独立起来，所以也就能够形成一个自己的阶级政党。当然，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同情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给无产阶级带来无产者自己所无法获得的知识的时候，才能够作出重要的事情来。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决不会屈从于向它靠拢的那些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政党也都是阶级政党，但这只在一个意义上说来才是这样，即，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主要地代表着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但是如果它仅仅是、或者仅仅主要地是由那个阶级的阶级成员所组成的，那就不能算说它是阶级政党了。

不论大地主或资本家，人数都不足以在民主制下独自形成一个群众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不论农民、小市民或知识分子都一直没有能够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各自组成一个较大的政党。他们组织政党的一切尝试都是半途而废。农民和小市民被一些和他们有着许多共同利益的分子号召着和领导着，参加了政治斗争，而那些分子却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把他们当作喽囉来利用而已。

资产阶级政党就其组成而论不是阶级政党。每一个资产阶级政

党都包含极其各种各样的阶层、阶级和部分阶级,其中也包括还没有获得政治独立性的工人。

因此,和工人的政党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政党的团结性较差,统一性和政策上的一贯性也较差。

工人的政党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说来,除了上述这一切精神上组织上的优越性而外,还有人数不断增长这一优势。

随着工业资本向前发展,工业无产阶级也在扩大,而工业的企业主则人数增长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增长。他们相对于自己的雇佣工人说来,天然是一个很小的少数;如果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个少数,可以出现绝对的增长,但在日益扩大的大企业里面,却必然是经常在相对地缩小。

这样,在从前的德意志帝国境内,从1882年到1907年,工业中的雇佣工人和职员由4,195,000人增加到9,279,000人,而独立经营者则由2,221,000人减为1,977,000人。商业方面在同一时期内,虽然独立经营的人数由701,508增为1,012,192,但是,商业中雇佣劳动者和职员的人数却更大量地增加了。由869,000增为2,466,000。所以,在商业中,独立经营者虽然绝对人数有了增长,其百分数却是降低了。他们在这个行业的全体从业人员中所占的百分数,在1882年还是44.67,但到1907年就只还有29.11了。

有人也许会指出说,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大企业增长的规律,不适用于农业。这种说法一般说来有时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农业中出现了什么相反的规律,那就不对了。农业是带有保守性的,农业企业的规模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变化。在德意志帝国里,农业中的独立经营者从1882年到1895年,由2,288,000人增加为2,569,000人。从那以后到1907年又减为2,501,000人。农业劳动者的人数据报道在1882年时为5,948,000人,在1907年为7,382,283人。

但这些数字却不能不加考虑地拿过来就用,因为农业中的“独立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概念是非常不确定的。许多从事农业的人时而被算作是雇佣劳动者,时而又被算作是农民家庭的成员。而且,有不

少被算作“独立经营者”的农民，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根本不是从农业中取得的，而是从经营家庭工业或在林业、工业、交通业中从事雇佣劳动获得的。

农业中企业规模的微小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足以抵销社会中雇用劳动者人数的普遍增长，无论是绝对或相对的增长。

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一起计算的全体从业人员中，独立经营者所占的百分数在1882年为32，在1907年则仅为22，亦即在1882年还几乎有三分之一，在1907年则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属于无产阶级。

在旧文化国家里，尽管总人口增长，而农业人口则相对地下降，有时也绝对地下降。在德意志帝国从1882年到1907年，总人口由45,222,000人增长为61,721,000人，相反，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却在同一期间从19,225,000人下降为17,681,000人。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数，1882年还是44.52，而在1907年则仅为28.65。工业人口出现了相反的发展，由16,058,000人增为26,387,000人，亦即由百分之31.51增为百分之42.75。

但即使在较新的国家里，那里的农业人口虽然呈现绝对的增长，但相对地说来，也还是在减少。在美国，农业人口在1880年为36,000,000人，在1920年为51,000,000人。城市人口在同一期间由144,000,000(占总人口27%)增为544,000,000人(51%)。农业中的从业人员在美国1890年时人数为8,626,000人，1910年增为12,659,000人，以后又减为10,953,000人。工业从业人员则从1890年的5,478,000人增为11,954,000人(1910年)和14,300,000人(1920年)。在1890年时，相对于1,000个农业从业人员的工业从业人员人数，还仅仅只有635人，在1920年时则为1,306人。(参看威廷斯基所编《用数字来看世界》，第1卷第145页和第4卷第13页)

随着工业人口的数量、经济重要性和智慧力量的不断增长，无产阶级对于不完全隶属于它、但就生活水平和经济情况而论却与它相近的那些人民阶层的吸引力也增长了。无产阶级在精神和组织上

的独立性和团结性越高，它的这种吸引力就越强。因此，在美国，虽然美国工人的境况相对地说来很是优裕，这种吸引力却最最微乎其微。

社会中的阶级正如动物界中的属类，实际上不是象理论上应该的那样彼此截然划分开的，而毋宁常常被很多中间类型互相联系着。因此，在雇佣工人阶级和别的诸如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人这些阶级之间，也有许许多多中间阶段。在他們和知识分子之间也是这样。这些阶级和阶层中的个别成员甚至整个的集团，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他们按照特殊的私人影响、历史情况和经济境遇，有的决定拥护无产阶级有的决定反对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可能越来越和无产阶级尖锐对立起来，而其中日渐增多的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属于其中比较贫穷的阶层的那一部分人，则被无产阶级吸引过来，将无产阶级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正象我们在前面讨论许多知识分子的时候已经指出的那样。

由于同样的情形，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向前进军的军人群众也在增多。

第四章 无产阶级的胜利

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有的是从无产阶级抵御资本的造成贫困的倾向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的是因从这些斗争的成果的充分利用中产生出来的，最后，还有的是从资本主义大企业的增多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只要仔细考察所有这些因素就会明白看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升和进步是不可遏止的。不论在什么地方，或早或迟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对于资本的制造衰退的倾向不仅进行抵御，而且还要转而采取攻势，至少，在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经济繁荣时期会是这样。

人民里面从前最衰落、最无知、最缺乏教养的那些阶层，今天已经把领导社会发展的责任承担起来了。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

那些原始性的斗争，已经扩大成为争取变革国家和社会的斗争。

这个发展的结局不会是别的，只会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胜利。而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胜利导致出来的，因为通过民主而取得了全部国家机器的那个在国家中的胜利，已使民主国家的器官改由无产阶级来决定，从而变成无产阶级的器官了。

在世界大战前，人们时常听到有人说，甚至社会主义者之中也有人说，社会主义虽然不可避免，不过还得等上几百年，可是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工人政府了。我们所说的不是由一个社会主义派别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警察和军队的专政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工人政府，而是由民主机构里面产生出来的那些工人政府。这些工人政府不久将会增多，这是连社会主义的敌人们也不再怀疑了的。他们唯一聊以自慰的是，盼望这些政府会冒然去干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它们这样一来就会必然垮台。

而且，今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它怎样取得政权，而毋宁是它应该怎样掌握住政权，以便利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现有的人力作出许多成就，从而创造出一些不论按劳动群众的观点或按整个社会长久兴旺的观点来看都比迄今有过的生活方式较为优越因而为劳动人民所乐于接受和保持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将不是意味着什么别的，只不过要使新的生产力适应于新型无产阶级的需要，适应于消费者群众的、社会的需要。

更详细地深入地讨论应该怎样来实现这一点的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不是要在这里阐述和奠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无须一成不变。随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条件的改变，随着有关这些条件的认识上的进步，随着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力的增长，但也随着它们的经验的增长，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也能在许多点上有所改变。

但是，在人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而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的那一点上，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不会有改变

的。正如每一个被剥削、被统治的阶级那样，无产阶级也必须争取摆脱剥削和统治的枷锁。这就是它的最终目标。

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中始终保持如一的还不仅是这个最终目标而已。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提出的各种方案，尽管在许多细节方面变化甚大，在主要方面则是永远如一的。今天的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论多么不同于一百多年以前那些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乌托邦，归根到底它们一律都是力求以同一个手段达到同一个目标：废除社会性地使用了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一致并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一致，而是因为事实的逻辑指出了这个方向，因而凡是以争取无产阶级摆脱剥削和阶级统治为自己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研究经济和历史事实的人，都必然会采取这个方向。

依靠军事暴力、依靠征服行动的阶级统治，都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一下子被推翻。只是在对付这样的阶级统治时，人们才必须拥有内战中必要的军事强力手段。

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阶级统治。它不是依靠军事暴力，而是依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大企业给社会带来的那些经济利益。这种私有制跟小企业结合在一起，对于劳动人民群众说来是迫切需要的。大企业本身对于消费者群众说来，因而对于整个社会说来，也是同样迫切需要的。但是，大企业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结合，对工人和消费者却越来越成为一种制造苦难的制度——大企业所以使消费者受苦，是因为通过卡特尔化或托拉斯化产生了人为的垄断。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课题：保存大企业，但将大企业由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社会财产，将资本家在企业中的职能（只要这种职能在经济上还有重要性）由私人的职能变为公共的职能，并且不让追求私人利润的意图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而让满足社会需求的意图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力。

在这个目标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纲领都是一致的，并且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社会劳动组织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却彼此大有差异。

在今天已不再会有人以为，组织傅立叶的那种三百户左右人家的法郎吉，或欧文的那种大约一千二百个居民的方形新区，或卡贝的那种并不更大一些的伊卡利亚，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工业资本的力量以及工业联合的规模，业已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不可能设想利用一个比社会中最有权力的组织（即国家）还要小些弱些的组织来控制它们了。夺取国家机器越来越被社会主义者们看作是达到下列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了：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重新组织，把一批私人生产过程改变为一个共同的、自觉安排的社会生产过程。

今天几乎不再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了。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 和威廉·莫里斯（1834—1896）**应该算是最后两位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应该算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了。

但是，传统的国家机器并不适合于发展出一种优越于乃至仅仅平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方式。就其规定而言，它是一种强制服从的统治机器。适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要，这对它是陌生的。

工业国有化只能意味着：将资本主义大工业中那些非用合作社方式或公社方式便不能更好地经营下去、因而应该予以社会主义化的企业转变为国家的财产，而并不意味着：由旧有的国家官僚机制来管理这些企业。

早在巴黎公社时期马克思就曾经说过：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说这些话时想的是取消象法兰西帝国所表现的那样特别高度的“集权于中央的国家政权”，取消常备军、警察、官僚，而代之以人民武装和民选官吏，也就是代之以高度的民主。在一个现代的大国家里，有着许多复杂的问题，都需要很多专门知识才能妥善处理，

* Edward Bellamy 美国作家，著有小说《两千年的回顾》。

** William Morris 英国作家，著有小说《乌有乡消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5页。

因此在大国里实行民选官吏制度是否适当，诚然是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在 1871 年要求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时所主张的，同我们今天看见在各苏维埃共和国里所实行的，彼此恰恰形成一个对立面。

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是他所企望的那种高度民主制的实现。恩格斯 1891 年在他给《法兰西内战》新版本所写的《前言》里曾经说明，巴黎公社的那种“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正是实现了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

但事情并不是到国家机器的民主化就算已经了结。还必须创造出许多适合于每一个需要社会主义化的生产部门和交通部门的特点的特殊组织形式，以求最好地保证这些部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并使两者的利益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谐调起来，即有关的企业在尽可能最好地保障工人的安全舒适、劳动兴趣和劳动能力的条件之下，以尽可能最少的力量消耗，完成尽可能最多的生产任务。

在这个领域里，将还有很多东西有待于学习，各种各样的经验有待于取得，许多试验和改正有待于进行。我们在这里将要去完成的，不是一种一蹴而就的变革，象 1789 年 8 月 4 日几乎一夜之间整个推翻了法国封建权力那样，而是一种渐进的发展过程，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那样，不过，这种过程的完成当然会远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更为迅速。

不管实际上怎么样，不管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会采取怎样的速度，有一点是今天已经可以断言的：正如同无产阶级之有朝一日会取得国家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已被带动起来了的社会主义方向上的经济发展过程之终将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亦即终将建成一个全新的社会机体，也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就去预先确切规定这个机体最后会具有怎样的形式，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今天关于“未来国家”的一些观念完全不同于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乌托邦一样，实际的未来国家大概也会不同于我们今天的观念。但尽管如此，我们今天的这些观念并不是多余的和

无用的，而毋宁是社会的继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人如果头脑中事先一无所见，那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不论器械、工具、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都是这样。观念总是先于具体的事物——当然，只是先于人所自觉创造的事物，而不是先于世界上既成的事物。如果新创造的事物只是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经历了考验的事物的模制品，那末，它的样子就可以同创造者据以创造的观念分毫不差。反之，如果问题在于创造某一个还不曾有过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因为严格说来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问题在于使已经存在的一些形式去适合新的需要和情况，并相应地对这些形式加以改造，那末，人们将也同样只能联系着现有的事物形式，根据已经存在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辅助手段，在想象中构成新事物的图景，据以创造出新的东西或新的设施。但是，如果它接着经受实践检验，那就会显现出一系列人们在构成观念时所不曾预见到和考虑过，而对于那件东西或那种设施的实际作用说来却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起破坏作用，有的起促进作用，而只有对它们作了充分考虑才会使新创造物获得最后的确定的形式。然而，假如不是有了最初的计划，这种最后的形式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人们对于最初的计划所据以形成的现有情况愈有深刻的认识，最初的计划就愈会与最后的形式互相符合。

因此，如果说我们今天还不能确切断言未来国家会是什么样子，那末，这并不跟下列说法矛盾：我们今天就应该致力于建立关于未来国家的某种确定的观念。前一个论点不过是表明，形成未来国家的图景必须不是单纯按照我们的意愿，不是纯粹只按照我们的需要和愿望，而毋宁必须更多地根据对于经济现实的深入研究。而且它还表明，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仅仅是“作业假设”而已，对于我们的社会工作固然不可缺少，但必然要不断地经受检验和修改，如果实践经验有此要求的话。

我们在第三卷中关于发明所说的那些话，在这里也是同样适用的。

但是，不管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采取什么形式，它将必然永远是旨在结束一切剥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不是消灭职业差别。这并不是从什么地方突然涌现到人的心灵中来的神秘的绝对命令，而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造成的结果，本来社会主义就是从无产阶级反对剥削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自从国家和阶级形成以来，随同着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能够利用国家来解放自己的劳动阶级。迄今为止，那些夺得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始终都仅仅是剥削阶级，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派也不例外。国家政权争来夺去，始终仅只意味着剥削者的人手更替，和有时也会是剥削者的权力手段变换，而从来不意味着剥削制度的废除。

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被剥削阶级中地位最低下的阶级站立起来准备夺取国家政权了。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诸如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一些阶级的阶级，它永远也不可能由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增多而变成雇佣劳动者的或奴隶的使用者，即剥削者。

无产阶级唯有通过取消一切剥削关系才能最终地解放自己。

有人也许会认为，从殖民政策中可能产生出一种新的剥削关系，它使白种工人有可能变成有色人种工人的剥削者。白种工人夺得了国家政权，对生产实行社会主义化，将它组织得使自己总的说来成为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主人。不过，他们在社会主义化了的企业中只做些领导者的工作。在他们的指挥之下作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雇佣工人而进行劳动的，是中国和印度的苦力，卡菲尔人，黑人，等等。

这样的可能性也许是可以料想到的，而且已经有些端倪了，因为有许多白种的，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种的工人阶层，对于有色人种的工人十分傲慢，不把他们当作阶级弟兄看待，却视之为下贱的役畜，不屑与之为伍。

尽管如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这种可能性至今还没有被人认真地考虑过。而这是有道理的。这样的可能性由于存在着一个事实便已经完全被取消了，这个事实即是：白种工人人数太多了，他

们除了依靠自己的劳动，运用别的办法不可能得到更大的福利。

“西方人”（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所谓“西欧—美国文化”的主要代表者，人数大约在六亿以上（据威廷斯基所编《用数字来看世界》，第1卷，第35页）。地球上的总人口是十八亿，因此，相对于每一个“西方人”的只有两个其他种族的人。假定这两个人是这样受剥削的：以一半劳动时间为他们自己劳动，另一半为剥削者劳动，那末，这个剥削者用以维持其生活的物资就只能相当于一个有色人种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一个有色人种工人的产量是极低的。正巧，当这些章节行将付印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份关于印度纺织工业的统计，按照这份统计，平均四个当地纺织工人的生产量还不多于一个英国纺织工人的生产量。因此，白种工人将宁愿依靠自己的、生产率高得多的劳动的收益来自维生活。

剥削只对一小撮依靠大批群众劳动而生活的人说来才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说在许多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殖民地内，白种工人对于有色人种工人怀有敌意，那末这不能归因于他们想剥削他们，而是应该归因于他们害怕生活水平甚低有色人种工人会通过竞争把自己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下去。其实有色人种无产阶级争愈能争取较好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这种敌意就愈会相应地减少。当然，和有色人种工人共同劳动的白种工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他们不帮助有色人种工人去提高自己，反而通过高傲的种族隔离，通过对自己劳动领域的行会垄断，竭力阻碍有色人种工人的向上努力。在今天，美国的许多工会对于愿意入会的黑人，或者，南非的白种矿工对于争取符合人类尊严的劳动方式的黑种矿工，仍旧抱着这种态度。这样，他们便分裂了而不是团结了工人群众，因而帮了资本家的忙，即使十分心非所愿。

尽管一切如此，有色人种工人也已开始了白种工人大大展开了的那同一个运动，他们的上升也同白种工人的上升一样是不可遏止的。白种工人的上升愈有成就，他们赢得的实力和幸福愈多，他们的榜样就必然愈会促进有色人种工人的上升。

仅仅由于这一点，已经就注定不可能从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中产生什么新的阶级统治和剥削方法了。

第五章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必须同样估计到欧洲以外的无产阶级的上升和最后胜利，就象我们估计到了欧洲的以及可以算在欧洲之内的北美和澳洲的无产阶级的上升和最后胜利那样。这个上升和胜利的过程的进行，在欧洲以外也和在欧洲一样，根据的都是日益席卷整个世界的工业资本的那同一个规律性。然而这决不是说，同样的过程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必然采取同样的形式。

欧洲的无产阶级(英国领地和美国的无产阶级也一样)，是在一些有斗争能力的城市里的坚强而独立的小市民阶层所取得和奠定的基础上，进行它的阶级斗争和实现它的上升的。在东方专制政体的地区里，就缺乏这样的小市民阶层和这样的城市。当这些地区受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袭击，从而感到需要现代民主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阶级强有力地起来为民主而斗争，那就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身旁，有着一个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首先要求民主，却缺乏一种不依靠同盟者也能独自争取到民主的力量。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西欧，他们只要有革命性，便最容易受到小市民阶层和有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领导。而在东方专制国家里，他们只能找到无产阶级和一批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他们的领导。

这就使那里的无产阶级，正如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那样，远比处于同样的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对比关系之下的西方无产阶级，具有更大得多的势力。但这种局面也迫使无产阶级除了努力争取他们在现有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争取而且大概可以争取得到的民主而外，还得要担负起一个处于资本主义工业高级阶段并且自己有了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才能承担的那些任务；这样一种无产阶级，乃是通过民

主制和自由群众组织的长年锻炼已把自己提高到一个高级阶段的无产阶级，而处在专制主义和不健全的工业发展之下的无产阶级，是万万达不到这个高度的。

这种局面由于许多别的因素，还变得更为复杂。那些熟悉西方革命历史的东方知识分子，一方面易于将自己的革命只看作是西方革命的继续，极力仿效 1793 年的国民公会和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从而使自己的视线模糊，不能认清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特点。而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却又深受西欧社会主义理论的支配。

在一个东方国家里，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这种知识分子就会感到自己有责任利用这个政权，立刻建立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迄今还不曾尝试过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制度。他们想要赶到前面去，给西方作出榜样和指示道路。

无产阶级在进行这种力不胜任的努力的时候，一定会遭到失败，它所争取到的民主自由一定会重新丧失于一种新的专制主义手中，丧失于无产阶级自觉与之结为同盟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专政之下的官僚军事专制主义手中。从这个方面来看，专政可以说是起源于无产阶级。但是，它不能算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正如同从法国恐怖政权里产生出来的、由拿破仑一世手下一些将军进行的统治不能算作是巴黎小市民的统治一样。波拿巴主义实际上无宁说是建立在对巴黎小市民的压制上的。

同时在今天，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单纯出于权力的需要，也不能不要高度发展的工业。就连俄国，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继续发展它的工业。如果工业发展了，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它在壮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民主，就会增长力量和加强独立性。如果工业不能兴盛，那么造成国家普遍衰落的那个政权就会显得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国家就会陷入专政政权所难以克服的灾难之中。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也必然重新上升。工业资本主义当然也重新上升。无产阶级于是将不仅为了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而且还为了领导农民而不得不与工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然而最后，当国家工业

化不断进展而民主制完全建立了的时候，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领导以及国家中不断增长的权力势将日益落入无产阶级手中，而如果与此同时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执政，并且能为经济发展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它的这种权力就愈能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被利用起来。

在中国和印度这另外的两个庞大的东方国家里，发展的过程又有不同。在这两个国家里，也不存在那种有着能给现代民主制铺平道路的、坚强有力而独立自主的小市民阶层的、自治的城市。工业资本主义不是从这样的小市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外面被带进来的。象在俄国那样，在这两个国家那与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的无产阶级，也将必须同时既解决它的阶级地位提出来的革命任务，又解决西方小市民阶层所担当的那些任务，因为解决这后一类任务乃是无产阶级卓有成效地进行解放斗争的先决条件。

在这里，象在俄国一样，无产阶级的势力，相对于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言，会比西欧的无产阶级的势力更为强大，但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局面也更为复杂。

然而和俄国不同，这两个庞大的东亚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都年轻些，因而无产阶级发展得差些、力量弱些。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所受西欧的影响小些，而如果说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也主要是英国的（在中国还要加上美国的）影响而不是法国和德国的影响。直至今天，不论法国革命、或巴黎公社，或卡尔·马克思，对中国和印度的无产阶级斗争都不曾发生什么影响。

另一个方面，和俄国不同，中国和印度都有一种古老的、很高的、独特的文化，使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维带有特殊的性质，甚至当他们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时候也还不免这样。

最后，在这两个国家里，全体居民，知识分子和无产者也不例外，有时要以极大的规模进行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却经常会产生团结全国一切阶级采取共同行动和模糊彼此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倾向。

在中国，无产阶级还太软弱，根本不能保证民主，更不必说带头走向社会主义了。工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外国统治势力侵入中国之后，固然能够唤起一种强大的人民运动来推翻那根本不能与外国势力相抗衡的统治王朝。但是，推翻了满清以后，正如俄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以后那样，首先出现的不是一个民主时期，而是经过一度无政府状态而出现的一个专政时期。相应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专政比俄国的专政更低级得多。俄国的专政至少在初期和在意图上曾有许多伟大的目标，并且得到国内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在中国，我们至今所看到的，只是一些相互敌对的军阀们的专政，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而外没有任何别的目的。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1926年10月），在中国好象有了一个比较民主的政权，要从广东向外扩展，当然，它也还是只靠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军队如果取得了胜利，也总有带来新的刺刀统治的危险。

究竟中国的民主力量，特别是各种无产阶级组织是否已经坚强而富有独立性到能够防止刺刀统治的危险并从华南开始奠定一个经久的民主政权，还有待于证实。

或早或迟，中国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民主政权，无产阶级必然会对中国的民主并通过中国的民主发生强大的影响。

在印度，反对外来的英国统治的斗争还正在全力进行。如果英国统治能在短时期内被推翻，那末，在印度首先起来代替它的也会不是民主，而是许多军阀或公侯的相互倾轧的专政。但是，局面当然也可能这样，即，解放斗争延续一段较长时期，而解放战争所采取的形式能使印度居民的民族自决以和工业资本及无产阶级的发展相同的速度向前进展，并使盎格鲁萨克逊人在英属印度遗留下来的专制政权不经过本国人暂时专政的过渡时期就立即为一长期的民主政权所代替。

在印度，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之间的宗教对立，征服者（回教徒）和被征服者（印度教徒）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宿仇余痛，以及印度人因种姓区别而造成的社会生活隔离，凡此种种，都给民主和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增添了困难。

在从前西班牙的美洲领地上，无产阶级的上升又是另一种样式。

对于美国的建立，英国的小市民阶层曾以其叛逆的顽强的清教徒精神，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美国联邦，至少北部诸州，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纯粹的民主。那儿的无产阶级无须为民主而斗争。而且，就连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地产的私有制，在很长时期里也并没给无产阶级带来什么痛苦。由于这种原因，美国无产阶级至今还不能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这是我们早就谈过了的。

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自己上升时的基础，却与此完全不同。如果说在西班牙本国，由于存在着专制制度，城市的资产阶级被阻碍着不能及早上升，那末，在它的殖民地上连这种资产阶级也根本谈不上。西班牙征服者也不是作为农民来到美洲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谋生的，而是作为封建大地主，从强迫劳动者的劳动中取得收益。这些强迫劳动者一部分是买来的黑奴，一部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都负担着封建性的徭役，有的在“开明”时期变成了“佃农”身份的债奴、债农，被迫以劳动来向地主偿还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务。

除了大地产以外还有许多矿山，它们的劳动者也是以同样的方法被弄来和被强迫着为他们的剥削者作苦工的。

当拿破仑的战争使西班牙在军事上时时陷入完全瘫痪状态的时候，殖民地上的地主们便利用这种机会，使自己脱离祖国而独立。他们的祖国本来是他们的监护人，不许他们自由输入工业品，要求分享他们剥削奴隶的收益。在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期，殖民地上出生的西班牙人一直是不得充任殖民地官吏的。只有在欧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才可以充任殖民地官吏，他们利用官职尽量榨取，发了横财就离开殖民地，返回祖国去享用他们的掠夺品。

因此，殖民地上出生的西班牙人一见胜利有望便立刻反叛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他们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因为这两个国家看出获得自由以后的殖民地将是销售它们的工业产品的大好市场。在西班牙统治下，只有西班牙的商品才可以输入殖民地。

新的国家在获得独立以后制订的宪法，往往非常民主，例如墨西哥的宪法，就是按照美国宪法制订出来的。不过，就这种例子而论，人们倒确实可以说它是一种“形式的”民主。因为这些民主权利都不是人民群众斗争得来的，而是人民群众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们输入的，他们想以这种冠冕堂皇而又全然无害的点缀，向他们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者们炫耀一番。

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都有依赖性。取消奴隶买卖制对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大地产上和矿山上的劳动者，绝大部分是完全无知和目不识丁的印第安人，他们盲目地信从着他们的“灵魂拯救者”天主教神甫们，因为在多少受过一些较高的教育的人们里面，还只有这些神甫是唯一关心他们的人。

政治生活则仅限于个别的将军或富有的地主，他们可以收买一位将军带同他的雇佣军队，举行军事政变夺取国家机器，这就算是“革命”了。

这种形势，只是由于有了外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才发生一点变化。在这些地方和通常在西欧以外的一切其他地方一样，工业资本主义是以建设铁路开始侵入的。工业资本主义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特别兴盛活跃，墨西哥比任何一个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更多受到美国影响，它的矿藏，贵重金属和石油，不断引诱来各种各样的主子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家。

这样，在墨西哥便也出现了无产阶级，它的上升带动了那些大部分一直还生活在封建性依附关系中的人数极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墨西哥，无产阶级如果要为民主而奋斗，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它找不到一个自觉的小市民阶层能在政治上为它开辟利用民主的道路。它也找不到一批自己占有土地的自觉的农民群众，而只能找到一些大地产占有者控制下的贫苦小佃农和债奴。而且，也没有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既没有象在中国或印度那样有着自己古老文化坚强传统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象在俄国那样与西欧高等文化紧密结合的知识分子。天主教会的压力使任何一种活跃一点的生活都无法出现。一个

知识分子阶层还刚刚在开始形成。

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读书写字的。1910年屠纳尔(J. K. Turner)著了一本书(芝加哥出版,共340页),名叫《未开化的墨西哥》,这本书是对于该书写作时期独裁者狄亚士统治下墨西哥的未开化状态的一个控诉。狄亚士从1884年开始充当墨西哥的总统,直到1911年才被马德罗领导的民主运动赶下了台。那本书根据官方资料载称,墨西哥居民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能够读书写字。(该书第329页)

因此在精神上墨西哥的无产阶级比在任何其他国家的都更加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而且墨西哥固然邻近一个经济上高度发展了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里的工人群众,在阶级觉悟和阶级政策方面,迄今还是所有工业国家中的倒数第一位。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墨西哥的无产阶级在最近二十年里已经取得了非常的成就。

1911年打开了缺口并且推翻了狄亚士的那个民主运动,虽然遭遇到多次军人背叛和反击,却一次又一次地坚持继续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运动中并且通过这个运动,变得日益强大、日益独立,以至今今天它已在伽耶斯(Calles)总统的领导下统治着全国了。

墨西哥的无产阶级已经懂得给原有的徒具空洞形式的民主权利灌输一种生动活泼的内容,以阻止军人作乱。它现在甚至已经着手进行一件勇敢的工作:打倒罗马教会的统治。虽然墨西哥政府很早就曾对罗马教会施加重大压力,但它一直还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从1861年起担任总统的胡阿雷斯,取消僧侣寺院,没收教会财产。教士们当时向外国寻求支援,拿破仑三世和他派充墨西哥皇帝的哈布斯堡王室的马克西米连,都站在教士们的一边。然而胡阿雷斯还是战胜了皇帝和教士。

但是,天主教会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组织。而且传统势力对它在西班牙美洲的发展十分有利。因此胡阿雷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领导进行的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斗争,现在还必须继续下去。

教会从前本是被压迫人民的唯一避难所,现在却不能容忍独立

的工人组织。既然墨西哥的工会不在教会的领导之下，毋宁拒绝它的领导，于是教会就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凶恶的敌人，仅次于近邻美国的资本家们。

现在还难以确切断言，墨西哥的无产阶级组织和这些组织所支持的伽耶斯政府，现在是否已经能够对抗得住这些可怕的敌人，奠定一个长久的民主政权，并永远结束军人叛乱和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些军人都是效劳于教会、外国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们的。但是，只要雇农在变成占有土地的农民以后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无产阶级在墨西哥的民主中已经取得的领导地位就不会再失去。可以断言，墨西哥今后的任何进步行动，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有所成就。那里没有任何别的阶级具有这样的能力。墨西哥无产阶级愈是谨慎小心，不给自己提出眼前力不胜任反而可能在一个时期里消耗自己的那种任务，就愈能把国家领导权保持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我们现在看到，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上升所能采取的道路，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决定这些道路的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一般阶级地位，而且还有它在其中进行阶级斗争的那些特殊的地理上的和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条件。它在一个国家里某个时期的政治势力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不仅仅取决于那个国家里工业资本发展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那些特殊条件。

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驳斥，而无宁是警告不要过分机械地和过分简单化地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

而且，这个警告里还含有另一个警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場既已越来越变成世界市場，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既已越来越密切依存于世界市場，而且，资本家们既已组成国际性的卡特尔，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既已认识到国际联盟的必要，那么同样，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和其他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密切合作，也将不能胜利地进行自己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际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它的范围正在日渐扩大。如果说，它在1864年成

立初期，基本上只包括西欧——加入国际的美国人大部分也只是来自西欧的移民——，那末现在，它的领域越来越扩展到整个世界了。它今天要求西欧的工人不仅与东欧、美洲、澳洲的工人们通力合作，而且也与中国、日本、印度、西亚、埃及、南非，最后并与地球上所有的工人们通力合作。

但是，它越是这么扩大，就越是难以被形成一个“行动国际”(Internationale der Tat)，如果“行动”意味着按照共同的计划、在参加国际的所有国家里、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同一个时候以同样的方式来完成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行动的话。一个无产阶级国际由一个个别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作独裁式的领导，这已经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无产阶级国际越是扩大，它就越是必须着重地让自己成为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相互了解和彼此协商的一种手段。但它越是成长壮大，这个任务也就越是变得更重要和更艰难。国际的意义并不因为它的职能受了这样的限制而被缩小。

然而，不管无产阶级在工业资本占领的不同地区里所采取的获得政权的道路是怎样的不同，但这些道路通向的目的地却是处处相同的，正如工业资本和它的运动的经济规律是处处相同一样。马克思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所说的那句话，是至今仍是适用的：“工业比较发展的国家，不过为那些比较更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们自己未来的形象。”*

同一《序言》中以下这一段话也同样是至今适用的：“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把生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而这乃是说，“如果它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

如果说，在中世纪基督教社会里条条道路都通向罗马，那末在今天，无产阶级的条条道路都通向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Ⅹ—Ⅺ页。

** 同上书，第Ⅺ页。

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之下发展成熟的那些生产形式，不必到处都是相同的。正如它们赖以实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那样，它们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社会条件之下最后形成的形态也会是非常不同的。这些形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个时期中，也将不会在一切经济生活部门里都是相同的。技术和社会经验的进步，将使它们继续发展日臻完善，这就是说，将使它们对新的条件和需要适应得越来越好。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的一个一成不变的图景，而无宁只意味着社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向前发展时将会采取的一个方向。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那段著名的话，正是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par décret du peuple* 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第50页）*

社会的这个新发展方向的目标，将不会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但是，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产生出这个目标并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无产阶级运动是不能也不会中途停止的。无产阶级群众在他们亲受的剥削从而一切剥削（不仅在一个国家里、而且在整个世界上）统统消灭以前，是不会心满意足的。

第六章 埋葬资本主义

人类向着它走去的那个社会状态，是一个全新的、前所未闻的状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363页。

态。这一类的状态在远古时代是没有的，正如推动人类向这个状态发展的工业资本在远古时代也是未曾有过的一样。

但是，要想越出过去所获得的经验的范围，不仅对于一个保守者说来是十分困难，而且对于一个革命者说来，即使他还是个大胆的思想家，也是十分困难的。连革命者也必然总是倾向于按照过去的图景，来想象我们所走向的未来，即使他明明知道，这个未来一定会是全新的东西。

因此，在结束关于今天阶级斗争所包含着的发展倾向的研讨之前，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将同在它以前的、被它排除了的封建生产方式以同样的方式告终么？

这样的设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能够完全免除。在今天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这样的设想仍旧十分普遍。

和剥削社会的一切过去的文化一样，中世纪形成的封建文化也有由于自己所产生的、促使社会退化的那些后果而归于灭亡的危险。从十七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的封建国家都露出了衰落的倾向。其中有些国家的衰落倾向还曾经一直继续发展到十九世纪。

但是这一回，事情的进展却与在东方和古代不同。工业资本是在我们所已考察过的那些独特形势的一种后果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说，从前的许多剥削方法虽然有时也促进生产力，而最后总是摧毁生产力，那末，工业资本却有着增加生产力的倾向。

凡是从封建制度中形成起来工业资本的地方，在那里就生长出抵销封建制度的摧毁作用的倾向。不过，资本为了自己得到充分发展，就需要取消紧紧束缚着它的封建限制。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于是就成为一种社会必要。封建生产关系消灭不了，整个社会就会崩溃。

在古代，一个剥削的国家衰亡了，与这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也往往随即衰亡。这种衰亡最后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它首先带来的却并不是向一个更高级的新社会的前进，而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现在却与此相反，封建社会的衰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不可

缺少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这个清除工作所以得以完成，乃是因为，工业资本不仅给那因封建社会的衰落而岌岌可危的文化提供了唯一的挽救的可能，而且还生产了大批有兴趣有能力来推翻那个旧社会，并从而——往往是不自觉地——为资本开辟道路的人。这些人里面除了工业资本家，还有知识分子，小市民，农民，无产者。

这个过程特别是在法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法国的大革命，曾影响全欧洲所有进步分子的思想。

难道现在资本主义的处境，不是正象从前封建主义一样么？难道资本主义不是最后也会取得某些形式，以至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甚至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繁荣的障碍，因而现在如要挽救社会避免经济衰落就必须克服资本主义，正象从前必须克服封建主义那样么？

这种设想，在工业资本主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上一世纪前半期，是可以以工业资本主义给劳动阶级制造的那些可怕的苦难为自己的理由根据的。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就显得好象是一种可以挽救无产阶级免于完全毁灭并从而挽救社会本身免于衰亡的手段。

这种思想过程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是，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他们早期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免于这样的想法。在《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的话：

“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产条件当着支配一切的规律加强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

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这对于宣言写作时的英国情况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在英国废除了谷物税，争取到了十小时制的正常劳动日，导致了一个工业繁荣、但也是工会繁荣的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领救济金的穷人的人数在英国已不再增加了，而是减少了，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说来几乎是经常不断地在相对地减少，往往也还绝对地在减少。赤贫者的人数(根据波特尔编著的《民族的进步》一书，1912年新版，第70页)约如下表：

	绝对数字	每 1,000 居民中赤贫者人数
1850	1,008,700	574
1860	844,963	429
1870	1,032,800	465
1880	808,030	318
1900	792,367	226
1908	898,474	227

与此同时，在劳动保护法案所涉及的那些工业中，工人们的境况也大大改善了。马克思在他的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致词》中，就已经象他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里那样，以这些经验为根据而作了完全不同于1847年时的发言。他和1867年一样，着力地谴责了由于追求剩余价值而产生的使无产阶级每况愈下陷入贫困的那种倾向，但称赞了劳动保护法案，认为它是对付那种倾向的有效方法。

不错，他在《资本论》里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倾向，即不仅破坏了劳动者的生产力，而且也破坏了土地的生产力：在城市里集中了最大部分的人口从事工业，而广大的耕地却变为荒野。在《资本论》里“大工业与农业”一章中(《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这样说道：

“它破坏了人和土地间的物质变换，那就是，不让人类在食物衣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8页。

服形式上消费掉的土地成分回到土地，搅乱了土地持久丰度的永久自然条件。同时它还破坏了城市劳动者的肉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但不过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445, 446 页)*

就连这些说法，也还是就写作的当时而论是正确的，但由于有了许多较新的成就，它已经过时了。根据科学原则而经营的现代农业，尤其是由于在制造人工肥料上有了进步，虽然城市里人体排泄物不加利用地被浪费掉了，却仍能不断地提高土地的丰度。

另一方面，由于在大城市里民主不断增长，无产阶级就越来越有权过问大城市的管理工作，而且，即使还处在资本主义生产之下，已经懂得改善生活条件、特别是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以求显著地提高这些居民的一般健康。正如在总的方面一切技术都有了进步，公共卫生方面的技术也同样有了巨大的进步，而由于交通的改良和工人运动的增长，连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也大为提高了。

因此，我们今天再也不能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摧毁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从而通过自己的经济发展来埋葬自己了。摧毁城市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劳动者的精神生活的意向，在资本家身上一直还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只要有可能，便试图毫无顾虑地压制农村劳动者的任何一种组织，拒绝提供手段来实施任何有利于工人的居住政策和福利政策。但是，无产阶级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克服这些阻挠。

第七章 危 机

工业资本的发展，在暴露出上述种种事实之外，毕竟还暴露了另外一些事实，而另外一些事实似乎都指明，工业资本正在给它自己挖

*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6页。

掘坟墓。不过，它之所以在自掘坟墓，并不是由于它也象迄今一切剥削方法都曾由之而埋葬了自己的那样，最后会使生产力有了减弱，却正是由于它十分独特地使生产力有了异常巨大的发展。

看来，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剥削似乎必然要导致生产过剩。被剥削者当然不能自己消费掉自己所生产的一切。但是，资本家也并不是消费掉落入他们手中的全部剩余价值，而是将其中的一大部分积累起来。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于能够被消费掉的东西。结果就会造成销售危机，使资本大量损失，并且造成可怕的失业。失业不断增长，必然会使社会终于在它自己的脂肪里窒息。

按照这样的理解，危机是因群众消费不足而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接受西斯蒙第斯所倡导的这种学说。不过，他们却把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的危机，归咎于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这样写道：

“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那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周期性的而且愈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看到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受着危机的威胁，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写下上面那段话，正当一次危机前所未闻地凶猛爆发之际，在此以前还出现了一次歉收，使谷物价格猛涨，更加深了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而且，当时的政治对立和社会对立极度紧张，致使1847年的危机成为1848年革命的先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大概正是因此才料想在德国最初会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具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472页。

有比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当马克思在 1848 年的革命过去以后再来研讨销售危机的问题的时候，即 1867 年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已将繁荣和危机的交替看作是“近代产业的特有的生活进程。”** (570 页)

“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中就会不断反复相同的运动，社会生产一经投入扩张和收缩交替进行的运动中也是这样。结果会反过来变为原因。会不断把自身各种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这全部进程的沉浮变动，采取着周期性的形式。”*** (571 页)

这一段话丝毫不意味着，危机有朝一日必然扩展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纯粹经济上的理由而不可能继续保存下去。

不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末尾，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那著名的一章里，有着这样的话：

“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但是关于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并没有作出论证。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1883 年)才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里，也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论证，然而第二卷的思想进程所追溯的深度，和第一卷却是相同的。在第二卷里，危机被溯源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以及在个别的生产部门内部保持适当的平衡，保持适当的比例。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性质，这个平衡不可避免地不时遭到破坏，而破坏了平衡就带有危机的性质。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503—504 页。

**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95 页。

*** 同上书，第 696 页。

**** 同上书，第 842 页。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没有任何一处曾经指明,这样危机最后必然会带上一种性质,以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过程完全不可能进行下去。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1878年所著)里,也讨论到了危机的问题。他将危机归因于:由于现代技术的缘故生产有比市场扩展得更为迅速的趋势:

“大工业的巨大扩展能力——气体的膨胀力与之相较,简直是儿戏——现在表现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扩展这种工业的需要,这个需要丝毫也不顾虑任何的障碍。这就是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所形成的障碍。市场之向更广更深方面扩展的能力,是被完全不同的、其作用的力量弱得多的那种规律所决定的。市场的扩展赶不上生产的扩展。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日不被炸毁,这种冲突就一日不能得到解决,所以它(冲突。——译者)就带有周期的性质。”*(296页)

这里也没有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朝一日必然会达到一个界限,从此以后它的继续扩展会在经济上越来越有困难。这种情况,只有当市场的容纳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工业的扩展能力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必然性。

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倒是还曾亲身经历过一次危机,那次危机曾使人指望资本主义已经达了它的扩展能力的界限。

从1815年开始,危机大约每隔十年出现一次。1847年的危机之后出现了1857年的危机;接着便是1866年的危机。在这以后的一次危机大概是受了德法大战的影响,提前于1873年夏季到来了。马克思在这一年的一月间,就已经断言危机“迫临”。这次危机比早先的任何一次危机都牵涉更广,而且似乎没完没了。除了在1879年和1889年里有些短暂而轻微的间歇之外,它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期。马克思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它结束,恩格斯则在新的繁荣刚刚开始而

*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8页。

尚未十分显著之际便逝世了。

由于这样，恩格斯才得以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从1873年起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慢性危机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这个时期里长久持续地违抗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使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兴盛起来。资本主义是已经注定要象在它以前的封建主义那样归于衰亡，除非无产阶级能够夺得政治权力，把生产资料和这些资料所制造出的产品方面一向实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换为社会所有制。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当时都接受了这个看法。当时的局面开始甚至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也忧心忡忡了。然而，九十年代初期出现了新的经济繁荣，改变了这种局面。这次繁荣是和在它以前的持续萧条一样深远广大而历时长久的。当时，不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上钟摆移到相反的方面去了，连在许多社会主义者们中间也是如此。一个资本主义新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了。各种卡特尔在当时大起作用，许多人都盼望着它们能够组织生产和消除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近二十年来的历史又载满了痛苦不堪的危机，而这时期里各种卡特尔和托拉斯却是数目更增多、范围更扩大、组织更严密的，因此大概不会再有很多的人相信能依靠企业家组合来克服危机了。

但是，危机却也改变了性质。它们减少了对于资本——这是说，对于工业资本，而不是对于投机资本——的危险性，而没有减少对于工人阶级的危害性。危机期中的失业仍和从前一样是无产阶级最可怕的灾难。这种灾难所以多少能够有所缓和，并不是由于资本的一些新措施，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下争取到的一些新成就，由于国家和工会的失业保险制度。

但是，如果指望销售危机会有朝一日达到这样一种扩大和持久的程度，以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样的指望在今天再也找不到根据了。

第八章 资本积累的限制

在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以前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企图用另一种方式，说明资本主义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而只有靠着社会主义的帮助，生产的机构才能脱出这条死胡同而得以继续运行。

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是罗莎·卢森堡，她和马克思相反，在其《资本的积累，从经济学观点解释帝国主义》（《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ein Betrag zur ökonomischen Erklärung des Imperialismus》，柏林1913年版）一书中，重新起用了西斯蒙第的旧学说，力求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域以内资本在不断积累，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造出来的产品无法全部销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前资本主义地区里，才能为它的一部分产品找到销路。对它说来，开拓这样的地区就成了迫切的必要，因而就产生了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愈是大力扩张，它就愈缩小资本尚未达到的地区的范围，资本便愈接近它再也无法越过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各国已有高度发展而它们夺取非资本主义地区的竞争又日益激烈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就加强自己的势力和横暴，这无论在它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上，或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彼此对立的尖锐化上都是如此。但是，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着力地和彻底地促使非资本主义的文化衰亡，它就愈迅速地挖掉资本主义积累的墙脚。帝国主义既是使资本延续生存的一个方法，同时又是客观地在最短的道路上给资本的生存指定目的地的最可靠的手段。”（第424页）

因此，这也还是一个假说，这个假设尽管见到了或者毋宁说恰恰由于见到了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地增加生产力，却力图从资本主义循环过程的条件中得出结论，断言资本主义在数难逃地最后必然在经济上运转失灵乃至垮台。这是和马克思相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作了恰恰相反的论述。罗莎·卢森堡提到了《资本论》第二

卷里的论述并批评了马克思,她说:

“若按字面来理解第二卷末尾所阐发的那个公式,那就会造成一个印象,仿佛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自己在制造它的全部剩余价值,并且使用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是为了它自身的需要。”(第299页)

我的旧日的女友罗莎·卢森堡的这种积累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代表者们中间没有多少人欣赏。她遭到了几乎一切方面的拒绝。对她最重要的批判,是奥托·鲍威尔提出来的。(见《新时代》第31卷,第1期,第831、862页)

问题本身太复杂了,因而在这里一一讨论它所涉及的各种公式,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主义方面对卢森堡的书所作的那些批评,在我看来都是完全中肯的。然而,有一点不应该忽略过去,即作为卢森堡的书的出发点的那些设想,不完全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实际现象为依据的,不过这些现象都被罗莎·卢森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研究资本的循环过程时,提出了他在第一卷中没加考虑的一个因素。在第一卷里,马克思仅仅考察了价值的产生,因为归根到底是价值的高低决定价格的高低。

在第二卷里,马克思除了对于商品的价值进行考察以外,必须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加以考察,商品没有使用价值是不能销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也是为了消费,一种生产,如果它的产品消费不掉,也就是说找不到销路,则这种生产必然立即停止。

虽然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家并不是为自己个人的享用而积累资本,因为对资本起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把产品的‘享用’转移给别人”(第403页)。但是,资本家并不是把他的产品赠送给别人,而是出售他的产品以使用所获得的货币来购买他要消费的别种产品。这样,他的消费就可以算是他所从事的那种生产的目的。资本家,正如罗莎·卢森堡辩驳时所说的那样(第304页),只有“节制”他的个人消费才能进行积累,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农民也是这样的,农

民也要把他的一部分谷物省下来不吃，拿来作为种籽贮存起来。这种节制消费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为消费而生产。而且不管资本家的节制欲和积累欲多么高，不管他的清教主义思想多么狂热，他的经营决不是单纯地为生产而生产，而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不错，罗莎·卢森堡在该书第170页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如何能够迅速而无限制地提高他的消耗，以赶上劳动生产力的进展所促成的剩余产品的增长呢？”但是在该书第264页上，她却有了与司徒卢威相反的看法：

“显然，当我们就其绝对意义……谈论资本家的消费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资本家不是指个别的资本家私人，而是指作为整个的、连同着从属于它的职员、国家官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资本家阶级。”

清教徒们不论私人生活多么简朴，他们不断增长的收入却使他们能够给众多的传教者和别的一些“上帝容器”保证衣食丰足，使他们能够兴建礼拜堂等等。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如同在其他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下一样，是为了私人消费而进行劳动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企业，在从头到尾加工制造某一种个人消费所需的成品的时候，会自己生产它自己用的原料和机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那些只为加工工厂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其数目不仅有着绝对的增长，而且也有着相对的增长；而那些为个人消费提供最后完成了的、可以使用了的商品的企业，其数目则日益相对地减少。因此相对于制造消费资料的企业说来，制造生产资料的企业数目是在不断增长的。但是，生产资料如果消费不掉，那么它们就也是没有目的和不能出售的了，——这里所说的消费，相应于它们的使用形态而言，当然不是指私人生活上的消费，而是生产上的消费。

此外，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之间，必须经常保持一定的比例。必须始终保证着生产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在很大的程度上遭到破坏，整个生产机构就会脱节，危机就会出现。不过，

恰恰通过危机，整个经济机器才得到重新整复，尽管在整复过程中有关方面要受很大损害。适当平衡得到不断的恢复，生产进程就继续进行。

可是罗莎·卢森堡却想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域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生产出的消费资料，永远不可能被它自己全部消费掉；它经常需要前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市场，让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者购去资本家们在资本主义地区里无法脱手的剩余消费资料。

“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顾主的存在，是资本的直接的生存条件。”(第 338 页)

实际上，资本家什么也不赠送给“非资本主义顾主”。恰恰相反。资本家要向他们尽可能昂贵地出售自己的产品，以便尽可能廉价地获得非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这后一种产品却又不外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样，给资本主义货栈造成所谓为难局面的那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过剩状态，怎样会由于换进另外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便消除了呢？这后一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不因为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便别具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

如果人们只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差别上着眼，则卢森堡的设想始终没有任何真实基础。

不过，进入资本主义循环过程的全部商品，就它们的使用价值差异来说，除了可以象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外，还可以根据别的观点另行分类。马克思就已经将消费资料一方面又分为供应劳动者的消费资料和供应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另一方面又分为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我们也许还可以将生产资料分为劳动对象(例如原料和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例如工具和机器)，这样的分类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讨论生产过程时已经采取过的。这样的分类对于循环过程自然也是重要的。要想商品流通中不出故障，这样分类的物品之间也同样必须保持适当的平衡。不过，假如进行了这样的琐细分类，大概也不大会获得什么新的认识，而分析

正
(348)

就会比《资本论》第二卷的后面几部分更为复杂而繁难。所以马克思就没有进行那样的分析研究。

但是，全部商品还有另一种按照使用价值的分类法，我在1910年时，早在卢森堡的那本书发表以前，就已经提出过，这就是，分为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在我发表于《新时代》的那篇评论希法亭论金融资本那本书的书评里，就有一章讨论“工业和农业”（《新时代》，第29卷，第838页以下）。差不多与此同时，我还曾在我的《论自然和社会中的增殖和发展》一书里（第14章），用另一种方式研讨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区别。

最后，这一区别还曾被用作我的一篇论《帝国主义》的论文的出发点，那篇文章是我在1914年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之前，为国际预定召开的大会而写的。战争使大会没有开成，那篇文章后来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删去了其中有关大会的几处地方，增添了关于战争的几段话。

在这些论文和书里，我以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条件之间的区别作根据，结合着马克思的关于工业平衡的理论，建立了对于循环过程的一种看法，依照这种看法，我认为，不仅可以解释何以会发生危机，而且还可以解释危机何以必然按周期出现。

危机所以产生，大部分是由于农业生产不能象工业那么迅速的扩展，因而总是一再地被工业超过。这样，必然会不时地一再出现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这就是危机的唯一产生原因。

比如说，破坏生产平衡的一个另外的原因是由世界大战带来的，世界大战将全部生产单方面地导向消费资料的制造，强力地阻止着生产资料的恢复，更不用说生产资料的扩充了。和平重现以后，又有赔款、通货膨胀、象在鲁尔区那样的占领、政府补助以及其他种种，其中还可以计入保护政策，如果那些极小国家提高关税的捣乱行为和卡特尔之类的东西也能算作是保护政策的话。所有这一切都起了极坏的阻碍作用，使生产不能恢复到战前那样的平衡，使新的危机不

断地一再出现。

但是，危机的这些原因都是从特殊的情况、从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以及立法上的错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产生出来的。

相反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生产条件的区别，却不单单是一个偶然的区别，而毋宁是一个长久存在和不可避免的区别。由于它的缘故，工业的市场不能够象工业本身那样轻易而迅速地扩展。

罗莎·卢森堡对这个区别没有加以考虑，她仅仅提到魁奈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所作的区分。按照魁奈的区分，只有农业才产生剩余价值，工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罗莎·卢森堡很正确地指出，这样的区分是错误的，而且对于她所讨论的问题毫无意义。

然而，我所说的这个意义上的区分，对于她所提出的问题，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无宁提供了一个根据，因而这个区分比消费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之间的区分更能与她的那些看法协调一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内，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参与其间，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循环过程是能够向前进行的。对于马克思的这种设想，罗莎·卢森堡既没有反驳，也不能够反驳。

不过，她毕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事实。只是可以解释这些事实的道路，不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的区分，而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区分。

工业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以内，通过工业资本家和工人的购买，把它制造的全部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统统销售出去。它经常制造一批过剩产品，只有当一个在它的领域以外活动的因素承受它们时，它们才会完全销脱。农业就是这样一个因素。

但是，工业需要农业，不仅是作为它的部分产品的销售区，而且还是作为食粮和原料的供应者。

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领域。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的程度也很低。人们谈到资本主义生产，自然而然地总是想到工业，而另一方面，谈到农业经营，自然而

然地就总想到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卢森堡的设想也是不自觉地以这种想法为基础的。没有农业工业就无法进行，工业的积累使与工业联系着的农业地区的生产的扩展成为必要，这是全然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个事实在卢森堡那里却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不与前资本主义地区相联系就完全不可能，而工业的扩展经常要以扩大它所统治的前资本主义地区为前提。

为了要使这种设想能站得住，她不得不赋予内部市场以全新的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认为，内部市场是在本国的工业市场，它是从“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资本论》第1卷，第677页）*。他在题为“工业资本内部市场的形成”那一节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内部市场就是乡村居民，乡村居民从前是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工业产品，而现在他们向城市里的工业家（或者那些从工业家买进商品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

罗莎·卢森堡对这件事情却另有不同的看法。在她看来，内部市场并不是在本国的工业销售市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地区。与此相反，外部市场则是指一切以前资本主义方法经营的企业，也包括本国的这种企业：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说的内部市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作为自己的产品的承受者和自己的生产物资的来源地的话。资本的外部市场则是吸收资本的产品并向资本供应生产物资和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根据这个观点，在经济上说来，相互交换商品的德国和英国，彼此主要是互为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而德国工业^①和德国农民消费者以及德国农民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对于德国资本说来却是外部的市场关系。”（第338—339页）

这种关于外部市场的奇特看法，是以马克思用来解释内部市场

*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25页。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下面农民二字的着重号也是。——考茨基注

的形成的那同一个现象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区分。罗莎·卢森堡将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等同起来，将农业和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等同起来了。

第九章 农业中的积累

关于资本投向工业为什么比它投向农业远远在先和远远强烈的问题，我已在上述那些研究中讨论过了。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我在这里可以只提一提就够了，这特别是因为这个现象本身已是人所共知和无可争论的。

单只由于自然方面的理由，农业就已肯定不能象依靠高度技术的工业那样迅速地发展。何况资本涌向农业一直是远远不如它涌向工业那样迅速的。因此，每当不断增长的工业需要大量增加农产品的时候，农产品的增加通常总是优先选择最简单和最迅捷的途径，即使新的、一向与外界隔绝的农业居民地区同工业地点发生交通往来。

这种办法并非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凡是出现了工业和农业分离的地方，人们很早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它既是工业扩展超过某种程度以后的结果，也是造成那种扩展的先决条件。当工业在古代某些希腊城市发展起来的时候，那里与埃及和里海沿岸盛产谷物地区的商业往来，也就和那里的工业携手并进地扩展开来。这些盛产谷物的地区在文化上并非总是低于输出工业的城市。在黑海沿岸固然居住着未开化的民族。埃及却相反，在技术上和文化上久已处于比希腊更高的阶段。

交通扩展的最重要的手段不是征服，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交通工具的改善。在多数情况下，只在有了廉价的成批搬运的工具时，农业产品的运输才能合算。一直到上一个世纪，这方面的考虑都只限于水路上的航运。从前的输出工业，如果它依靠同一个广大地区交换农业产品，它便只能在沿海和靠近易于通航的河流的地区发展

起来。

一百年以前，整个世界上的这些可供欧洲输出工业的农业地区，都已有了交往，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太平洋两岸，美洲这一边的交通所以极不发达，是因为缺乏农产生产者，而人口稠密的亚洲那一边的交通所以不发达，则是因为存在着禁止通商的政策。

后来，铁路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不依靠水路的陆上大量廉价的强有力的交通工具。于是开始了一个农业地区最迅速地向工业敞开大门的时期，这些农业地区有的是人口已经十分稠密，有的则迅速地迁来许多殖民者了。

这样便产生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辅助手段，这件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着同等的意义。因此，不定期的繁荣和危机时期就和铁路建设的进展联系起来，而这些繁荣和危机时期又经常成为工业的繁荣和危机时期。

是修筑铁路，而不是帝国主义，曾经成为替资本亦即替工业开发它所需要的那些农业地区，当然也包括前资本主义地区，使之充当它的购买者和供应者的最主要的手段。在这个一般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即工业国家对农业地区的征服，只是一段插曲，这是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意义重大、却也很不吉祥的一段插曲。帝国主义决不是在经济上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条件。

欧洲殖民政策的那些最重要地区，是自中世纪结束以来，在还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工业以前，就被征服了的。这些征服都属于出现在资本主义工业之前的那种原始资本积累。

这些征服都是为了虏掠，而不是为了工业的发展。使它们最受吸引的地点，最初并不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在经济上，当然不在军事上，处于和西欧几乎同样高度的那些东印度国家。欧洲人前往美洲，首先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往那条路上走去可以到达印度。后来，使他们受到吸引的是那些贵重金属发现地，而决不是什么“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当欧洲工业尤其是英国工业的扩张唤起了开辟农业市场的需要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些殖民地区都已被放弃了。那在最大程度上适应这种需要的铁路建设，最初并不是和任何工业国家的“帝国主义”联系着的，不论在美洲、在澳洲，还是在英属和荷属印度、在西伯利亚或在日本，都是如此。在中国，铁路建设的扩展，也决不是和欧洲的征服行动结合在一起的。

那些近百年来才不得不被欧洲人征服，以便通过铁路纳入于资本主义工业势力圈内的前资本主义地区，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地区比较起来，只就面积而论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如就经济意义而论则更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实际上仅仅包括非洲和近东。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世界已经基本上被分割完了。而且一个新的、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纪元，已经开始了：被欧洲人征服和剥削的人民，已纷纷起来反抗任何欧洲统治，甚至要反抗任何欧洲影响。如果说有一个时期中国好象将要变成某一个“帝国主义”、某一种外国统治的对象，那末事实表明得越来越清楚，不能够再有那样的想法了。中国作为欧洲和美洲产品的市场是极端重要的，某些工业国家之间为了这个市场，尽管有可能还进行许多明争暗斗，但即使还有，却再也不会如同当初争夺欧洲或美洲本部的任何一个市场时那个样子了。

象中国一样，印度也日益独立起来了，近东和北非许多地区，首先是埃及，也同样如此。

但是，帝国主义日益受阻，决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行将崩溃。帝国主义遭受的阻遏，只将促成一种新式的、亚细亚式的资本主义。同时，一旦资本主义世界克服了世界大战的后果，自己稳定下来并且积累起了足够的资本，可以用于非欧洲的事业，那末，铁路建设将会日益开展。

在迄今交通还不发达的地区修筑铁路，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如果这些地区人烟稀少，修筑铁路就可以带来移民作为农民来提高该地区的生产。或者，如果这些地区已经有了人数众多的居民而还没有发生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过程，修筑铁路就可以促使这一过程迅速完成。不论朝着哪一个方向进行，铁路建设都还能在很长时期里起

到下列作用：使农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齐头并进，使充足的食粮和原料源源流向日益增长的工业并使大批新销售市场向工业敞开大门。

当然，这个过程不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而且在今天，由于每一个农业国家都在竭尽最大努力来发展自己的工业，甚至只要能够办得到，便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具有适当的设厂地点而把生存必需的各种工业一下子全部建立起来，所以，工业将越来越倾向于比农业发展得更快，而这就必然一再引起新的危机。何况这么一来，今天看来似乎还很遥远的日子也许就并不那么遥远了，那时地球上所有可供使用的农业地区全部住满了人，全都筑起了铁路，而继续修筑铁路就既不会再带来什么新的供应者，也不会再开辟出什么重要的新市场了。

然而，即使到了那个日子，也还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末日。

资本主义的末日也许会到来，可是那就得假定工业的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农业只可能以前资本主义形式来经营。诚然，这种设想在今天甚至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圈子里也非常流行，有很多人认为农业只能作为农民的农业，以前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才能经营得好。然而这种设想的依据，毕竟只不过是些目前一时的现象。

因为，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或技术上的规律在阻碍资本使之不能象迄今占领工业那样深入地占领农业。而资本一定是会那样作的，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此的话。

资本家们可以说并没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一定要将他们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投入到这个剩余价值所从出的那同一个生产领域里去。罗莎·卢森堡在论证她的观点时运用了这样一种设想，认为如果所有的资本家将他们的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生产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的积累，就一定会以不同于消费资料的生产领域里积累的速度而进行，这样发展的后果就必然是两个领域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比例失调（该书第307页，在这一页以前也曾提出过这样的设

想)。但是，资本家实在不是从生产资料中积累生产资料，或者从消费资料中积累生产资料，毋宁他的剩余价值在被积累以前就获得了货币的形式，而且这些货币资本家究竟消费掉其中多少并将其余部分投入哪个生产部门，都完全决定于他本人。因此，从工业中积累资本，决不就一定就意味着扩充工业，它也可以意味着扩展或加强农业。而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即，工业利润因工业生产过剩而长久下降，并且农业方面不仅地租上升而且利润也在上升的时候，情况就更会是如此。

今天已经有很多资本被投入于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的事业。例如，美洲和埃及（包括苏丹）的庞大水利设备。工业和农业分离的过程正在继续不断地前进，并把一直是农民所从事的活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工业的活动。因此，如果说这个过程是以破坏农民的家庭工业开始的，那末现在，它连农业自己领域里的生产活动也从农业那里夺走了。奶油和干酪不再由农民制造而在特设的大工厂里制造了。从前，农民以自己的养蜂事业中获得的蜂蜜的形式供应甜味食品。今天则是由甜菜农民们所依附的许多食糖工厂以庞大的规模担负这一供应了。从前农业依靠饲养马匹和耕牛自行解决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今天，作为耕畜的牛马越来越被工业提供的由电力或汽油开动的动力机排挤掉了。就连在肥料生产方面，自己农庄上的生产面对着工厂里人工肥料的生产，也越来越失去重要性了。谷物脱粒已经由专门的企业家利用机器来处理了。耕田犁地以及其他等等工作，也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农业的职能一项接着一项地受到剥夺，被移交给工业了。其结果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外，还会导致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口普遍减少，而且就连这一部分农业人口也只在某些时候才全力从事农业，而在某些时候则至少有一部分的劳动力可供工业使用。

这个发展的趋向，会一直达到重新消除工业资本所带来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但是，消除分离的方式不会再是使工业还象当初那样，成为农业经营的附属物，而毋宁是农业经营会成为工业的附

属物。

不过,农业生产对于经济过程的重要性,自然是始终不变的。如果农业生产的收获对于工业生产的收获不保持着适当的比例,生产过程是不会永远顺利前进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在使用上总是先工业而后农业。单单农业的日益工业化这一点,就已经在造成相反的趋势。

诚然,工业人口以及与其相随的世界总人口,最后可能增长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连最广泛的资本积累和最精深的技术进步,也不再能使农业有能力来满足原料和食粮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然而,那将意味着一切进一步发展的终结,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此,对于任何生产方式也不例外。

在半个世纪以前,这种马尔萨斯式的忧虑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还非常深重。在今天,一般说来这种忧虑已经消释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地球上有着无限多的地方可供无数亿万人使用,而是因为人为的节育已经十分流行,竟至于出现了相反的忧虑:我们是否会走到人口不断减少的地步。而人口不断减少,对于我们的文明将象对于近两千年前古代文明那样意味着同一个结局。然而,没有任何事实表明,今天的文明也同样是不能应付这个问题。我们有着一切理由来期望,人类今天能够使社会中的生育量适应于社会的经济条件和需要。

无论由于人口减少,或是由于人口过剩,无论由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积累和生产的日益比例失调,或是由于因这种比例失调而产生的危机,我们都沒有理由指望资本主义经济一定要崩溃或失灵,一定要造成一场大灾难,非让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出来代替它不可。

在上一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即使在资产阶级圈子里也有不少经济观察家忧心忡忡,以为眼见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了。接着在九十年代,这种调子在资产阶级世界里一变而为 *dulci júbilo**: 资本主义

* 拉丁文音乐用語: 甜美的欢乐。

从此永远太平无事了。当时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甚至在觉得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错误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们中间，也有许多人脑子里浮起了一个惶惶不宁的疑问：是否特别地由于卡特尔的巩固增强，将会不出现社会主义，而能出现一种新式的资本主义，一种以卡特尔巨头们代替封建统治者进行领导的封建化资本主义呢？罗莎·卢森堡针对这种疑惑所提出的那些论据，显然是不够充足的。纯粹从经济上考察，无法证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失灵或垮台。

上一世纪末开始的海上军备竞赛，以及欧洲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势力范围的斗争，确实曾重新引起沉重的忧虑。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预见到在那种情势下必然会爆发世界大战，虽然大战的规模及其破坏的惨重也许谁也不曾全面料到。难道这场大灾难不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么？难道这么复杂、这么脆弱、这么密切依存于信贷和国际贸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能够经得起这样一场破坏么？

破坏来到了，其规模超过了最坏的预料和悬虑。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崩溃。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弹性，它对改变了的形势的适应能力，远比它的脆弱性更为强大。它经住了战争的烈火考验，而今天，纯粹从经济上来看，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稳固。尽管各国政府和眼光短浅的资本家们及农业家们战后作了许多极其重大的蠢事，尽管有了荒唐的凡尔赛条约及其种种强制规定，尽管有着通货膨胀和各种各样的贸易限制，资本主义还是恢复元气了。

诚然，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1926年11月），经济局面是一片光明，大有前途。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毕竟还流行着纯粹经济观点上的悲观主义，虽然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抱悲观主义，却是对欧洲经济抱悲观主义。人们暗自疑惑，究竟欧洲会重新兴盛起来呢，还是会象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意大利许多小国那样由于互相侵袭、由于依附于外国而趋于衰亡呢？那些小国失去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经济领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经济和文化都衰落了，而毋宁仅仅意味着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从地中海沿岸移到北海沿岸去了。

因此,在今天,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可能会从北海沿岸移向美洲的两个大洋的沿岸。但是这决不会带来资本主义的衰落,甚至也不会使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动摇。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已经极深刻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它对于最多样的、甚至最绝望的局面的适应能力,没有任何经济理论上的论据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生命力。

这就证明社会主义前途无望了吗?罗莎·卢森堡在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本书里所写下的是正确的吗?他说:

“很显然,如果承认资本积累毫无限制,那也就证明了资本的生命力是无限的……”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制地提高生产力,保证经济向前进展,那末,它就是不可战胜的^①。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客观支柱便倒塌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就不再是经济现实的反映了,社会主义不再是历史的必然发展了。从论证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出发,最后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第296页)

这段话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如果全部论证的前提是站得住的话,具体地说,如果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确实只有一个限制,只有资本积累方面的限制的话。

然而,这个前提并不真实。

第十章 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前提

社会主义如果把它希望统统寄托于这样一个因素上,即危机会象《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越变越“更全面更猛烈”,或者说,日益增长的资本积累会从自己本身里产生出限制来,那它的事业就确实是前途渺茫了。

但是,《共产党宣言》同时还曾指出另一个因素,它肯定要成为资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考茨基注

本主义“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而且，这同一个宣言就已经指明，这个阶级的上升和强大及其最后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的。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表明它在经济上是有生命力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否还必然导向社会主义呢？

不应该这样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一种生产方式只要在经济上还有生命力，它就是不可战胜的。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关于国家和阶级的最初形成的那些讨论。民族之间的劳动分工从前总是按照它们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来进行的，有的民族成为定居务农的民族，有的民族成为饲养牲畜的游牧民族。农业民族的生产条件使农民们生活富裕，却也使他们的战斗能力衰弱。游牧民族在他们自己那种生产方式之下始终是贫穷的，但是却变得骁勇善战。他们喜欢侵袭和掳掠农业民族，直到最后移居到农业民族中间来充当永久的统治者。农业民族的经济在技术上仍停留在原有的阶段，仍按从来的那种方式继续进行，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却改变了。他们从为自己而劳动的自由农民，变成了不仅为自己、而且还要为统治者劳动的纳贡的农奴。

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既不是前此的自由的农民经济的衰落所造成的后果，也不是胜利的牧民经济的经济优势所造成的后果。毋宁说是，胜利的游牧民族一经作为统治者定居下来，牧民经济便结束了。新的生产方式是暴力的产物，是对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兴趣并坚决使用这种方式的那些人的优势的产物。这种优势可能是、但不一定是经济上的优势——就游牧民族而论则肯定地不是经济优势。它也可能是一种单纯的人数上的优势——在民主制条件下——或者是知识上或战斗能力上的优势。但是这样一种优势当然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主观上想要成为强者的单纯意愿，并不足以也在实际上使人成为强者。而且胜利者创造什么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单纯意愿，而取决于他们现有的经济条件和对这些条件的必要认识。

不论什么地方，如果游牧民族缺乏这种认识，他们就只能利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进行劫夺和掳掠，而不能利用它来建立新的生产方式。而且，不论什么地方，如果终于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那么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只有当它能满足胜利者的需要的时候才能保存下来。假如就我们所谈的这个事例而论，那就是说，只在农民有了可能长久大量生产，其产品不仅能够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能供应他们的统治者的时候，这种新生产方式才能保存下来。

所以，社会主义的到来肯定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出现和对这些条件的一定的认识为转移的，有了这样的条件和认识，胜利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用它满意的另一种生产方式来代替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另一种生产方式我们才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当它证明自己在长久满足城市和农村劳动阶级的需要方面优于现有的生产方式的时候，才会比现有的生产方式更受欢迎，才会保存下来——这里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劳动阶级对剥削阶级具有经久的优势。假如新的生产方式证明自己的效率低于今天的生产方式，则劳动阶级就会要求并实行恢复今天的生产方式。

有人说，即使遇到这样的情况，工人们也一定会为他们的理想而忍受牺牲。但是，工人们在经济方面的理想，毕竟是要有一个比现有的生产方式更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生产方式，当然它不仅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带来更多的知识和自由。他们固然可以忍受暂时的牺牲，以便后来取得更多的收获。如同资本家那样可以“节欲”，以便积累和从更多的资本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如果说他们会为一种给他们带来长久的贫困、无知和不自由的生产制度而忍受长久的牺牲，那就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了。

因此，新的生产方式的到来永远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存在为转移的。可是，并非在任何情况之下现有生产方式的衰落都必须算是上述条件之一。但在任何情况之下，一定的优势却大概必须属于上述条件之列，不论是战斗力量上的优势、或是社会认识上的优势，或者至少是社会对于这种新生产方式感兴趣的那些人

的人数上的优势。

每一种这样的优势都是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经济条件。

社会主义的前途不依赖于资本主义行将崩溃或衰落的可能性或必然性，而是依赖于我们可以怀抱的那些期望的实现，这些期望就是：无产阶级会足够地坚强起来；生产力会有充分的增长，以便提供丰富的物资以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生产力在那时会采取易于利用社会组织的形式；最后，必要的经济知识和良心会在劳动阶级中增长起来，以保证他们卓有成效地使用这些生产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先决条件。

关于这些因素，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社会主义文献里都已有过很多的讨论，在本书当前这几页里我们也已经谈了一些。

在这一方面只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谈一谈。

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们常常说：《共产党宣言》里面认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那种观点，对于写作宣言的那个时期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期无产阶级日益陷入贫困，越来越将资本看作是最凶恶的敌人。但是，宣言本身也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一些因素，它们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强大和上升。自从那时以来，无产阶级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走上了这个强大和上升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它愈是向前发展，就愈是看来会造成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胜利，但是也愈使社会主义成为多余的东西。工人们在资本主义之下愈是福利已有增长，就愈会安于接受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和解，而放弃一切没有把握的试验。无产阶级愈是强大，阶级对立的日益缓和就愈会在与此相应的程度上将社会主义推得更远。

社会主义的命运问题实际上正是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发生于资本积累或危机加深。

这一点不能被理解为，仿佛任何社会改革只要能够缓和阶级对立，我们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加以反对。汉斯·莫斯特 (Hans Most) 之流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这种见解，只会出现于那些从来

不把工人阶级的提高放在心上，而一味想念着尽快发动内战的职业革命家或狂热家的头脑里。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真想阻止能对工人阶级产生有利作用的社会改革，那他就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别的结果，只会在劳动群众中间丧失他所赢得的充分信任。

社会改革，或象许多人所认为的，民主权利，亦即工人阶级上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假如真的缓和了阶级对立，那末，社会主义的事业就该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业了。

就我而论，我必须说：假如我能确切相信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会不断缓和阶级对立，那我就感到义不容辞，非放弃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放弃社会主义的事业我会十分痛心，因为我势必承认我毕生所做的工作都是走错了方向。但同时却也有一定的安慰。因为社会主义原本只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我们今天只看出了一个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假如与此相反，这一目的在今天的生产方式范围以内就能达到，那末这将意味着，达到我们的目的原本可以比我们社会主义者迄今所设想的要更轻易、更简单、更少需要牺牲。

因此，我们可以毫无成见地来考察一下阶级对立缓和的问题。假如结果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其本身中势所必然地要造成阶级对立的缓和，以至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引导之下会日益感到幸福，那末，我们就必须公开地承认这个事实并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这样的行动中不会含有任何对劳动解放事业的背叛。

第十一章 阶级对立的尖锐化

在我们探讨阶级对立是否缓和的问题以前，我们必须知道阶级对立的缓和是什么意思。如果一听到“阶级对立尖锐化”这个词语，就以为阶级斗争是在采取日益猛烈的形式，那末这里面所包含的理解就肯定是不恰当的。

无产者们对剥削和压迫进行的那些早期反抗行动，都不过是陷

入最深的贫困而又毫无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绝望的爆发。他们在偶然的刺激驱使之下发泄一阵，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胜利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长久压抑着的盲目的忿怒就易于转化为既残暴又无目的的破坏行动，例如，捣毁新采用的机器或打死特别可恨的工人虐待者等等。

工人们愈强大起来，愈组织得好，愈多有经济上的认识，他们的斗争就愈有较好的筹划和准备，愈不指向单独的个人或事物，而愈多地指向某些对工人的工资、工时和独立性等等起决定作用的有害于工人群众的社会制度。这类的斗争在进行的时候并不是不坚决，但是它们却能不带无意义的忿怒，不带疯狂性的破坏，而且即使在企业主万分招人忿恨的情况下也能不带什么附随现象，而且工人们的斗争组织愈增强，发生附随现象的情况也就愈少见。

此外，还有一种道德风尚普遍温和化倾向，它从十八世纪起在劳动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就开始出现了，当然并不是没有强烈的反倾向。我在我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柏林1925年第二版，第7章：“道德风尚的温和化”，第182页以下）一书中，详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在那里曾经说明，特别是无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地位的缘故，容易接受人道的观念。

“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迫使着它，将人的生命看作是神圣的，这正是因为它不仅仅不是一个剥削阶级，而且更是一个被剥削阶级，它所受的人命被轻视的痛苦最深。战争给它带来的……也只有苦难和危险，而给有权势的人们带来的则是成功和战利品。这一切使得无产阶级极端憎恨流血，憎恨任何暴行。”（第196页）

但是，这个倾向久已被一个反倾向压倒和盖过了，这个反倾向是从资本主义剥削者和全体统治阶级用以迫害无产阶级的那种可怕的暴行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对无产阶级起了反作用。

“无产阶级只是在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才一个阶层接着一个阶层缓慢地从看来毫无希望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愈向前

进,人道倾向就愈能得到发展,而更加有利于这种发展的是,在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影响下,就连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刑法也渐渐减轻了它们原来的残酷性质。”

“这些原因产生了下列现象……一部分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十九世纪的那些运动中,表现为一个充满最大人道精神的阶级,它越来越远离凶残横暴。凶残横暴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的先辈们的特征,也是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谈到英国的工厂无产阶级时还曾经论述过的。”

无产阶级愈强大,它在人道的道路上正象在民主的道路上一样,就愈会成为社会中的领导阶级。

这两条道路常常互相交叉。不断增强的人道精神会促进民主,反过来民主也促进人道精神。承认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自然会抵消对人命的轻视。另一方面,如果政治上的决斗不再使用火枪,而改用投票箱和选票,则政治方面的道德风尚也必然会趋于温和。

在十八世纪时,知识分子曾担负过民主和人道道路上领先带头的职能。现在,他们必须将这个职能移交给无产阶级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满脑子装着资本主义思想或图谋永远垄断他们的地位的时候,就时常表现出一种开倒车的动向。一部分反动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今天已经干脆领头走向血腥残暴。

但无产阶级却能在自己的前进过程中渐渐地使资产阶级(即使还没有能使上面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分大学生和教授们)也养成比较温和的德行,或者至少使他们同工人交往时采取较好的作风。

今天普遍存在着的颓风败俗,好象是和无产阶级的上述作用互相矛盾。然而,这种情况仅仅表明,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一场战争能够造成如何可怕的道德败坏,并且表明,道德败坏足以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道德温和化倾向。但是倾向还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的后果愈得到克服,这个倾向就愈将重新发挥作用。

诚然,在战争中,广大的无产阶级分子也避免不了战争对道德风尚的败坏作用。不过,在所有阶级和社会阶层里面,无产阶级终究是

最能够在自己的队伍里抵抗那种影响和高高举起人道原则的。

和经常地、即使并非毫无间断地向前发展着的一般的道德温和化一同携手并进的，还有一种阶级斗争方面的道德温和化。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这决不是一定就意味着阶级对立有了缓和，也就是说，决不是一定就意味着无产者的社会目的已经和资本家的社会目的互相接近了，他们所共同的利益已经增多了。

下面应该只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资本家和工人所以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所以谐调了起来，据说是因为工业资本所促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各种进步不仅对于工业资本有好处，而且也对于工人有好处，工人也和资本家一样地对经济繁荣感到兴趣。

这是正确的，然而，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利益共同性却是很微小的。

生产力的各种进步既然是来自于科学的普遍进步，那么它们就是全社会所取得的成果。资本家只不过是它们的占有者和享益者。他促进和利用这些进步，主要是为了节省工资。工人们作为消费者，和全体消费者一道，诚然也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是，他们不仅是消费者，而且还是生产者，而作为生产者，机器往往象仇敌一样和他们作对。

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一个繁荣时期不是后面必然跟着一个危机时期。在今天，危机也许可以不再被看作是危及资本主义生产继续进行的因素，但是，他们确实是促使阶级对立尖锐化的因素。即使人们已不能维持从前的看法，以为危机总是危害性越来越大，但马克思关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不可避免的论断毕竟始终没有驳倒。

毫无疑问，有许多工人阶层——虽然远非一切工人阶层——的境况在最近半个世纪里有了改善，其中有些阶层的境况改善得还更早一些。但是，工人境况的改善，必须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才会导致阶级对立的缓和。事实却决非如此。

马克思曾经承认，“在这几个作为近代生产方式最有特色的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工人的境况无疑地是改善了。法定的缩短工时，使工人们的生活有所提高，而决没有妨碍工业的兴盛。

“从 1853 年到 1860 年，这几种工业的惊人发展，是和工厂工人生理方面道德方面的再生结合在一起的。这件事，冲击着那些十分近视的眼睛。”*

马克思在 1867 年就这样写了（在初版第 273 页上就已经有了这句话）。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 年）里，他同样地强调了当时工厂工人受到的“生理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巨大好处”。但是，在这个宣言中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境况改进毫不相干，一切资本主义成就都没有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开辟新的市场，自由贸易（在今天还可以加上：保护关税，企业主联合——考茨基），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相反地，在现代的错误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必然要加深社会差别和加强社会对立。这在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用虚伪的期望来迷乱别人而从中取利的人才不会否认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卡尔·考茨基版，柏林，1922 年，第 25 页）**

这个观点是否和承认 1853 年至 1860 年期间“工厂工人的再生”那个观点相矛盾呢？决不是。因为，马克思所断定为这一再生的原因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强斗争，是争取后来在 1847 年取得并在 1850 年最后确定的十小时工作制的斗

*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06 页。

** 译文以考茨基的引文为依据，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10 页。

爭。在这场斗争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考茨基版，第27页）投降了。

从那时起，工人阶级中的一系列阶层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始终只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方面的进步。那些斗争还不曾也不可能完全窒息资本家们想使工人陷入贫困的意图。不论什么地方，只要看来有机会能使工人争取到的成果化为乌有，资本就总是利用这个机会力图达到那样的目的。

因此，被压抑到社会最下层的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在于他们减少了对资本的斗争，而毋宁在于他们除了争取改善无产者自己的境遇的斗争而外，还加上了保卫已赢得的阵地的斗争。但这些斗争大都是最剧烈的斗争。保卫已获得的东西的斗争，通常总是比赢取尚未得到的东西的斗争更费力些的。

时代变了，人们可以象《共产党宣言》那样不加区别地谈论无产阶级，说“他们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那种时代，肯定是已经过去了。

从那时起，他们要去夺取的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富裕得多了。诚然，在这同一期间里，也有很多无产者获得了不少财富，然而与一般的财富增长相比就微乎其微了。但是，不论他们所获得的究竟是多还是少，无论如何，其数量总是多得足以一方面刺激资本家，使之力图将它重新夺回，另一方面激励无产者，使之不惜进行任何斗争来守卫他们的既得利益。

这样一来，阶级斗争就变得多种多样，但阶级对立却没有变得比较缓和，倒是变得更加激烈了。这不仅是因为失去一项已获得的权利远比被扣留着一项从来不曾有过的权利更为令人不堪忍受，而且还因为即使在利益的对立始终保持同样程度的情况下，争夺愈是为期长久，愈是一再重复，争夺者的情绪就愈益忿激。

而且，随着生产力和一般社会财富的增长，工人的需要也比他们取得的改善增长得远更迅速，这就必然既加深他们的不满，又使阶级

对立尖锐化。他们受到的剥削日益加重，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中留给工人阶级享用的那部分东西的数量，增加得远不及产品本身增加得那么迅速。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倾向，只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迄今所取得的那些成就，是万万不够的。资本方面的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比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进步，迅速得多。而后者是能加速前者的。工资愈高，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和方法的诱力就愈大。

诚然，工人们通常不搞什么统计，也很少让自己的情感生活为统计所左右——至少他们作为群众是如此的。而且，给日益增长的剥削作出统计上的证据，是不容易的事情，并且这种做法至今还有争论。但是，日益增长的剥削有着一些表现形式，这是人民群众不要任何统计也能了解的，而且正对人民群众起着刺激鼓动的作用。

这些表现形式之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个人消费的增长，远比工人和一般下层阶级消费的增长更快。工人和一般下层阶级里面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一般不大看得出来，有些人在今天还在不断地深深陷入贫困，在危机和失业的时期尤其如此。而且，即使就生活水平已有改善的那些人而论，他们的上升也非常缓慢，只有进行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而与此相对地说来，大剥削者们的生活水平上升却是既迅速而又常常完全无须进行什么斗争。

这种情形惹起了劳动群众的愤怒，这特别是因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开支所以迅速加多，并不是由于他们增加了生活快乐，增加了对自然和艺术的享受，而是由于毫无意义的浪费，这或者是为了需要给迟钝了的神经寻求新的刺激，或者是为了在同辈中间讲排场、摆阔气，以资炫耀。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担负职能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们在个人的需要上仍然可以十分简朴。但他们的家人亲属通常会因之而更加疯狂起来，完全就象被推翻以前的封建贵族那样。其间只有一个小小的差别：贵族因浪费而倾家荡产，因为他们的剥削行为并不增

长生产力，所以是有着限度的。相反，资本的剥削所得，增长得比它的浪费增长得更为迅速，因为资本所掌握的劳动力是也在增长。个别的资本主义工厂可能会因厂主的个人浪费而破产，资本家阶级却尽管有着不断增长的个人浪费也还是越来越富裕的。

德·曼认为，在人类目前的心理状况下，没有贵族就不可能有社会（《论社会主义心理学》，第211页）。必须有一个“上层”社会，“充当值得人类企望的典范”。

在今天，工人们眼中典范就是那“一万个上等人”。这些人就是工人人们的理想。

再没有比这更可笑的说了。

那一万个上等人的所行所为，恰恰起着激怒劳动群众的作用。劳动群众因而力图建立一个其中不可能有那样行为的社会。

有一点却是正确的。有产者阶级作出来的典范，当然不只限于那一万个上等人作出来的典范，对工人群众不是没有影响的。工人们在有产者阶级那种高水平的生活中，认识到了一些可以普遍推广的因素。这样一些因素成了他们的典范，在他们身上发展成为他们所力求满足、不得满足就心生忿恨的那些需要。对工人的剥削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提高得愈迅速，工人人们的需要就愈增长得远比他们的工资更为迅速，从而使他们和剥削统治阶级的对立尖锐化。连那些境况有了改进的工人们也增长了“想望”，实在说来，自己觉得有斗争能力的工人们会比那些陷入贫困的工人们更其如此，因为后者往往满足于哀叹自己的贫困和乞求微少的救济。

因此，“一万个上等人”的那种典范并非对于工人毫无作用，这作用就在于激起了想望。只要工人们眼见着他们上面的那些阶级享有可供挥霍浪费而无所减少的巨大财富，只要他们发现在有产者们那里有着许多促成人生幸福和快乐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从世上现有的巨大财富看来原是可以人人有分的，他们却分享不到，那么他们要求不断改善生活的愿望就永远不会平息，倒是会越来越更强烈。

在那些表明资本家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正在日益加重并促使阶级

之间敌对关系日趋紧张的现象之中，最显眼最明确的一个，当然是比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得远更迅速的资本家们的消费，尤其是他们的个人浪费。但是除此而外，还有另外一些现象，它们也是由不断增高的剥削中产生出来的，它们在阶级斗争上的意义虽然不是一望而知，却是更为重要。

资本家为他个人消费而使用掉的，并不是全部的剩余价值。他将一部分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在资本主义积累刚刚开始的地方，最初的积累行动甚至就在于资本家限制、“克制”他的个人消费。这种情形在清教主义时代确实是常见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全面开展的地方，每年的剩余价值的增产就意味着，有可能逐年既增加消费同时又增加积累。

但是，消费掉剩余价值的方法不仅限于资本家（及其家属和寄生者）的个人消费，而且还有资本家所掌握和利用的国家政权的消费。

这种消费也许比剥削者的个人消费增长得还更迅速些。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是军务、军备和战争所需的消费。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良，使军队扩大到庞大的规模。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也使破坏性的技术手段及其所造成的灾害日益猛烈。这些可以说都是老生常谈了。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不断进行斗争，反对军备竞赛政策，这固然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但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最后必然使国家资财枯竭。但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确实也有象麦克斯·席佩耳这样的人——在大战之前曾经得意洋洋地断言，德国尽管扩充军备，也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富足的。

果然是那样。这个看来与我们的预言不合的矛盾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十分简单，这是由于我们低估了对劳动阶级的剥削的程度。我们虽然也料到剥削是在增长，但它竟增长到能以最荒唐的方式浪费国家资财而不至于使经济增长陷入瘫痪的程度，却超出了我们的料想。实际上竟然能够那样，完全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增长，在比例上远较落入工人阶级手中的产品总量的增长更为迅速。因此，在这里又是一个工人大众所受的剥削在不断加重的证明。

国家的支出归根到底都是由剩余价值来承担的，如果我们将剩余价值理解为工人——雇佣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的全部产品扣除工人及其家属生活所需以后的剩余部分的话。不过，即使国家支出归根到底是出自于剩余价值，但为应付国家支出而征的税究竟由谁来缴付，由工人还是由剥削者，这却不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如果税收是加在工人身上的，那么这就是说，国家政权本身从工人那里提走一部分工资使之转化为剩余价值，从而使工人的工资减少这么大的成数。如果税收是加在资本家或其他剥削者如土地占有者身上的，那末，资本家或其他剥削者就必须用他已经从工人那里取得的剩余价值来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在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中所要对付的只有一个敌人，即雇用他的个别企业主。在前一种情况下，他就既要对付企业主又要对付国家，而国家的威力通常是比个别的企业主还更可怕得多的。因此，加在工人身上的税收就成了压低工资的最有效的方法。

有人可能认为，向工人征税可以减轻或者掩盖住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因为这样一来，使工资不高的祸首就显得不再是企业主而是国家了。但是，对立是不会减轻的，只不过是推到另一个轨道上去了。如果资本家必须缴付的税额增高了，资本家就首先要竭力提高产品价格以作弥补，但能否提高价格却以市场情况为转移，并非永远可以提高物价而不妨害产品的销售。所以资本家倒是更想利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相反地，如果工人们必须缴税，他们就要为此而竭力作斗争以求提高工资。在向资本征税的情况下，工人们必须保卫他们的现有工资；在向工人征税的情况下，工人们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前一种情况比后一种情况对工人处境更有利些。

但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阶级的对立都会日趋尖锐。如果，至少在民主国家里，除了征税所引起的为工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之外，还加上有关征税的政治斗争，并且要在决定税政的议会里和在选举议员时来进行这种斗争，那末，两个阶级的对立就会更加尖锐

化。

随着剥削的日益加重，资本主义方式管理之下的国家就日益浪费，而随着国家的日趋浪费，表现于征税斗争中的社会对立就会日趋尖锐化。

即使无产者赢得了影响国家机器的势力，这一对立也不会缓和。因为无产者固然必须利用这种势力尽最大可能来减少非生产性的军备开支和避免战争，但是也还必须利用这种势力来尽可能提高没有财产的那些阶级和阶层的生活状况。这就重新产生出新的赋税和为新税而进行的斗争，不仅要为税额高低而斗争，而且还要为税收用途而斗争。

这种斗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个环节使阶级斗争表现得日益激烈起来。

资本家除了越来越追求享受和越来越竭力扩张他的阶级所统治的国家的军事实力而外，首先就想扩张他所统一掌握的经济实力，以便争取在国家和社会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势力。于是他就无止无休地设法扩大资本。

“积累啊！积累啊！那是摩西和预言家们的教训！”*

尽管资本家们的个人浪费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的浪费都在不断增长，对工人大众的剥削所得却仍有那么巨大的提高，以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膨胀到了令人头晕眼花的程度。

卡尔·黑耳费里希 (Karl Helfferich) 在他于大战以前不久出版的《1888—1913年德国的国民福利》(«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1888—1913»柏林 1914年版)一书中，作了这样的结论：

“在今天，德国的国民总收入每年将近 430 亿马克，而在 1895 年时则为 230—250 亿马克。

“在这 430 亿马克中，每年约有 70 亿马克，即 1/6 弱，用于公共目的；约有 270—280 亿马克用为私人花费；约有 80—85 亿马克作为

*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652 页。

(每年——考茨基) 添加到国民财富(！——考茨基) 上去的增额, 这项国民财富增额由于现有财产的自动的(！——考茨基) 价值增长, 已提高为 100 亿马克, 而在十五年前则为 45—50 亿马克。

“德国国民财富在今天总计已达 3,000 亿马克以上, 而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则仅约为 2,000 亿马克。

“这些以货币价值表达的简明数字, 概括了我们的皇帝政府之下的德国所作的巨大经济工作的成就。”(第 124 页)

最后这一句话只不过是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集中于“我们的皇帝政府之下的”德国学者和资本家们身上的奴颜婢膝, 这些学者和资本家即使在最不得当的场合也难以自禁要颂扬皇帝。上面所引的这些话写出以后过了四年, 就连一位黑耳费里希也不敢再将德国的经济状况吹嘘为威廉二世政府的成就了。不过, 既然人们可以把德国的经济和皇帝扯在一起, 那末, 皇帝的政府倒是应该对于帝国因世界大战而遭到的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崩溃负有罪责, 而不是对于在此以前的巨大上升尽过什么责任。大战前的上升不折不扣地是德国人的劳动产物, 就是说, 是德国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产物。但是根据黑耳费里希的数字却也可以衡量出, 总的劳动产品之中有多少已年复一年地变成了剩余价值的形式, 一部分被国家、一部分被资本家们消费掉, 一部分被积累起来了。如果说, 这份统计不让我们知道资本家及其寄生者们的私人消费数额, 那末, 无可怀疑的是: 这种消费连同每年 100 亿马克的积累和每年 70 亿马克的各共同体亦即帝国和各邦的支出, 总所占所计算的每年 430 亿马克国民总收入之中的一半——实际只会更多。难道资本家及其寄生者为了他们的私人消费而花费和浪费掉的, 会不超过德国每年总消费的四分之一么?

但是, 先于一切而且在这里对我们说来最为重要的是: 在 15 年的期间以内, 德国每年的积累数额从 45—50 亿马克增长为 100 亿马克。因此也就是它增长了一倍。

居民向国家和各邦交纳的税额, 也同样增长了一倍。

德意志帝国年鉴从 1902 年度起才开始除刊载帝国的收支以外也刊载联邦各邦的收支。而即使刊载各邦的收支也只把它们各邦各邦分别刊载。年鉴避免刊载总数，大概盼望读者会不去自找麻烦把它们加在一起，而不加在一起他们就不至于见到总数大为吃惊。另外，黑耳费里希也似乎是不愿精确地运用加法，否则他就不至于将 1914 年的“被用于公众目的”的数额算作“约有 70 亿马克”了。这个数额在 1913 年就已达到将近 110 亿马克(10,863.4 百万马克)，其中 40 亿马克以上是帝国的支出。而在 1901 年则略超过 60 亿马克(6,239 百万马克)，其中将近 25 亿马克(2,470 百万马克)是帝国的支出。社会集团的支出完全不在计算之内。

德累斯顿银行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而出版的名为《德国的经济力量》的纪念专刊(1913 年柏林出版)上刊载着：帝国和联邦各邦的收入在 1881 年为 2,860.4 百万马克，在 1911 年为 8,543 百万马克。

上面已经提到，1913 年的支出上升为 10,863 百万马克。收入与此差不多相等(10,838 百万马克)。

因此，帝国和各邦的支出在 30 年内就增加了两倍，15 年内就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多么迅速。

据这同一纪念专刊所载，多特蒙德地区石炭矿工每值一班的工资 1890 年为 3.98 马克，1910 年为 5.37 马克，也就是增加了 1.39 马克，还不到 35%，即 20 年内增加 1/3 稍多一点。此外还可以从人口的增长来看。人口从 4,940 万增为 6,500 万，即增加了 31%。相反地，国家支出和每年的积累总额在 15 年内，从 1895 年至 1910 年，却增加了一倍。

这是关于剥削的增长的一个十分明白的证明。

促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的因素是，数字上难以弄清楚的消费的增长，尤其是，资本家阶级的浪费，以及抗拒不断增税的斗争，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积累的迅速增长。积累仅仅由于经常改变两个阶级之间的势力对比，从而一再制造出新的冲突导火线，就足够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了。资

本家阶级总是越来越要利用他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为自己一再创造新的和更强的对抗工人阶级的实力地位。

资本主义积累的巨大增长，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域、尤其是在西欧和美国，有可能出现同样巨大的技术改变。技术改变早在十八世纪之末就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的大师们曾经对此进行观察和研究，但毕竟只是到上一世纪将近终了它才达到了今天使我们简直吐不过气来的巨大规模，不仅旧有的工业部门完全改变了，而且崭新的大工业部门，例如电气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等也创造出来了。而且，从相对说来十分渺小的西欧北部地区和美国东北地区开始，整个世界的交通都改变了，出现了迅速变得繁密起来的铁路网，使那些从来是未开化民族或野兽居住的地区里，同样迅速地出现了与铁路网相联结的巨大矿场、纺织工厂、钢铁工厂。

在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地区里，对工人日益加重的剥削使资本积累也日益加快速度。然后积累又转而迅速扩大资本主义剥削的领域，使剥削的全部所得以狂潮之势猛增不已。尽管资本家阶级会将这些剥削所得有的作为（自己及其寄生者的）个人花费、有的作为他们的统治机器的开支浪费掉很多很多，而资本的实力的总和，对于无产阶级，还是不断在增长的。何况无产者的人数也在日益增多，而资本家阶级成员人数的增长相对说来却无足轻重。资本家的人数甚至能有绝对的减少，至于相对的减少则是肯定的。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越来越成为民族的主要群众。它的利益越来越和所有劳动阶级的利益即是同一个东西。

站在另一边与不断增多的群众对立的，是一些人数几乎无所增长的资本家。其中又有一个日益变得狭小的资本巨头圈子，这些巨头越来越取得支配和利用不断增长的大量资本的权力。庞大的财富并不是单纯由于进行积累而日益迅速增多的。这些财富和大企业的优势，造成小资本家的破产，并促成资本的集中，股票交易和银行业务以及卡特尔组织，最后又迫使外国资本日益屈服于资本巨头的威势之下。

股票交易据说是能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实际上它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反。介于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以及一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工资比较高些的雇佣工人阶层，也能节省出一些钱来，但数额太小，不足以用来开办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这些钱就被这些小人物通过股票和银行存款的形式双手奉献给大资本家们使用，从而增添了他们的经济势力。

资本巨头们越来越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统一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就形成了希法亭所谓金融资本，希法亭曾对这一形成过程作过典范性的研究。资本巨头们由于这样统一掌握着资本，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统治者，越来越不受限制地左右着整个社会的命运。

不仅那些没有财产的劳动者，就连象农民和手工业者那样的人数众多的有财产的劳动者，甚至人数众多的资本占有者，都越来越受到资本巨头们的压迫和威胁。这些新垄断者也象所有的垄断者们一样，在对内和对外的政策上越来越力图使用野蛮的暴力，来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因而他们的统治就更加凶狠残暴。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早期的工业资本家有着根本的不同，而和他们从前的那些有远见的理论先锋们则有着更大的不同。那些理论先锋们把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民主和国际和平，视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从一开始就曾经被一些破坏性的反倾向搅浑了，但毕竟不失为货币资本家们那种倾向的对立物。货币资本家们永远是与大土地占有和专制主义携手同行、倾向于暴力政策的。

最近几十年里，这种暴力政策越来越成为所有掌握着资本的势力手段的人的政策。

呻吟在这种暴力政策之下的，越来越是整个社会了。但是，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坚强斗争来反抗大资本的桎梏，因为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反抗资本的，而其他受着资本的统治的阶层，由于种种财产利益和甚至资本利益的阻碍，都难以进行这样的斗争。

然而，具有着自己的特殊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也日益代表社会

中广大群众的利益，甚至日益成为社会中的多数，这乃是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实。无产阶级将因此而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战斗先锋，使原来在它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越来越聚集在它的周围。

但无产者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并不按同样步调趋于缓和，毋宁更加增强。资本会越来越感到不仅在工资和工时方面，而是在一切方面都受到无产者的威胁。民主的成长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互相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面和冲突导火线。这样，阶级对立便日益加深了。

在上一个世纪里，英国工人的许多工会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来，德国工人的许多工会在九十年代，都提供过一些现象，使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们认为，有希望出现阶级对立的缓和。

今天，阶级对立在英国表现得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为激烈。

恰好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1926年11月），劳合·乔治*发表了一篇题为《八年后的欧洲》的文章，据他报道，在英国，战前八年里的罢工和闭厂，一共曾造成8,900万个劳动日的损失。战后八年里的劳工斗争带来的损失，则为31,900万个劳动日。

阶级斗争看来不象是在趋于缓和。

至于在德国，不仅那些自由工会都已表明自己具有了抵抗劳资谐调的幻想的免疫力，而且甚至在那些天主教工会里阶级斗争的思想也日益生根了。

第十二章 经济与政治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化，是无可怀疑的了。但是这种尖锐化，难道不是从那种使无产阶级感到前途颇为黯淡的形势里产生出来的么？

* Lloyd George, 1916—1922年的英国首相。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资本主义的崩溃或衰落，资本主义会产生自己不能克服的经济限制，等等，都是不能指望的。现在事实却又表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势力不仅是在绝对地日益增长，而且，和其他阶级的经济势力相比较，也在相对地日益增长。所以面对着资本，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不是变得更强，而是变得更弱。那么无产阶级应该从什么地方去获得它所必需的用来击败资本的力量呢？

当然我们也曾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工业资本日益增强，工业无产阶级也在日益增强。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个阶级，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越来越有力量的阶级，它们完全不同于其他阶级，其他阶级相对于这两个阶级说来，其社会意义是在不断地降低的。

但是，两个彼此对立的阶级如何能够同时都不仅在绝对地增强，而且还在相对地增强呢？这一表面看来的矛盾是这样解决的：这两个阶级各自分别在其中不断获得力量的领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资本家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强，无产者们在政治上日益增强。

但是，按照我们的历史观，难道不是经济始终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政治仅仅算作依赖于经济的上层建筑么？

确实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不少轻视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强调这一点。他们宣称，首先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然后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在此以前，民主只是欺骗和幻想而已。

这样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倒是很便当的事。可是这只不过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加以庸俗化和不适当地简单化。实际上，唯物主义历史观决没有说，经济上的强者，即富有者，永远都能证明自己也是社会上的强者。它仅仅说，任何一种社会变革归根结蒂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变革，任何一种与人们现有的生活条件不相适应的社会结构都不能维持下去。

人类社会是一个方面极其众多的结构。新出现的经济关系对于它的每一个方面都起着变革性的作用，但并不是对于它的一切方面都以同一种方式并在同一种意义下起着变革作用。至少在一个阶级

社会里是如此。

从同一片经济土壤里会萌生出极其多种多样的倾向，它们互相促进、互相交错、互相斗争或互相干扰。它们全都是受了经济的制约的，但并非都是纯粹经济性质的。在这样的斗争里起着巨大作用的，除了经济上的需要和力量而外，还有野蛮的暴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性。我们的历史观决不否认这一点，它只是把这类暴力和优越性的一切变革和差别，也象经济需要和经济力量的一切变革和差别一样，统统归因于生产关系的变革。

在同一片经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种种不同的经济倾向会变得多么互相对立，我们只从我们的时代里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行了。

资本主义生产是大量生产。它的市场愈扩大，它愈能控制它的市场，使其中的贸易关系适应它的需要，它就愈兴旺。这种控制和适应，最适用于国内市场。依靠争取自由贸易来扩大市场曾是最合理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曾遇到过种种障碍。凡是国内市场扩大了和迅速地成长起来了的地方，那儿的工业资本也就愈兴盛，这种情形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美国之所以在经济上胜过欧洲的国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此。在欧洲国家里，资本家们也在不断努力扩大他们在政治上控制着的经济地区。这种努力乃是人们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那种现象的、以及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之一。

曾经有过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认为，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里面的大多数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们，由此便作出结论说，为了使任何战争都没有发生的可能，我们的最迫切的任务乃是尽快地使资本主义彻底结束。走别的道路都不可能防止战争。这样对于我们这些人说来，可真是前途黯淡了。我们这些人也是万分坚决地反对战争的，但并不认为现在确实已经有可能一下子在整个世界上消灭资本主义。而这样消灭资本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是必需的，如果战争是和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

的话。至于只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国家里消灭资本主义，那是万万确保不了和平的。

然而，也还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当然人数要少得多，却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作论证说：资本主义的末日既然还没有到来，帝国主义和侵略战争就暂时构成一种经济上的必然性，任何一个有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该违抗这种必然性。

库诺夫在他的《党的崩溃》（«Parteizusammenbruch», 1915年柏林版）一书中首先为上述论点作了辩护。他在那本书里提出，帝国主义是和机器制造等等“完全同样必要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而想要不让帝国主义出现或者想要根绝帝国主义，是和人们在大工业初兴时期想用捣毁机器的办法来促进工人的事业“完全相同的一种愚蠢”。（第14页）

联系着这一点，他接着就对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1914年8月4日的声明所明确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表示了反对（第29页）。他倒毋宁赞成通过迫使一国之内各小民族合并起来的那种征服行动，来形成大的帝国。他在一篇反驳我对他的观点的批判的文章里，提到了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国家的形成经过，并且解释道：

“只有在这种国家组合的基础上，虽然又要部分地通过强迫^①，才能形成起来这些国家的一种民族性格。

“从亚洲和美洲的古代文化帝国直到最近时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些新的小的民族的形成，而是国家的组合和最后以至民族的融合！”（《新时代》，第33卷第2期，第176页）

库诺夫并且还用极度轻蔑的口吻作出这样的结论：

“因此，所谓民族独立或国家独立的权利，不过是毫无历史根据的一种伦理学—美学的虚构而已。”（第178页）

关于民族自决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在论民族国家的一章里（本卷第七篇第十一章），已经讨论过了。

① 本段引文及下段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库诺夫加的。——考茨基注

对于那一章里所述各节，我们在这里只作几点补充。

无可怀疑，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某些个别国家企图以侵略战争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的产生，不是仅仅由于专制主义力图扩展其权力范围和统一国家行政；国家行政的统一不待说既要求统一的语言，也要求统一的币制等等。资本的需要也是走的这同一个方向，也支持这种扩展经济地区和消除一切国内贸易往来的限制的努力，国内贸易往来的限制不仅是指内地关税，而且也指居民之间的语言差异。在西欧那些国内贸易往来已很活跃的国家里，消除语言差异这一倾向不曾遇到过什么抵抗。

在十八世纪时，广大的群众，至少是农村的人民群众，但也包括一部分城市居民，都还不会读书写字。统治等级的语言，也就是都邑、宫廷、官衙和军队的语言，被提高成为书写的语言，成为全国有教养的人的语言。每一个想要在国家里或在京城里向上爬的人，都必须懂得这种语言，不管他在家里同自己的家族，或比如在酒馆里同朋友们说的是什么语言。国家语言之外的一些国内通行的语言，学校里都不讲授，文献上也不使用，都降低到了受鄙视的地位。谁如果想走出农村，或在农村里想知道一些外面的、不管是政治方面的或经济方面的消息，就必须学会国家语言。这种语言随着交通往来的发展而日益推广，愈来愈把别的语言排挤掉。

于是就出现了使用同国家语言不同的语言的那些民族集团的非民族化。但是，这种情况只限于西欧。

在东欧，封建性的分立主义在较晚的一个时期里才得到克服，在那个时期，普通学校教育为了经济发展的利益，即使在广大农村地区也愈来愈变得迫切需要，因而甚至沙皇俄国也开始考虑到这样的发展。十九世纪的时候，欧洲各地，包括东欧，那里稍为迟点也紧接着西欧之后，到处的不同民族的下层阶级都开始用他们唯一懂得的本民族的语言来学习读书写字。就连一些直到那时为止不曾有过自己的文献的语言，此时也都有得到机会变成书面语言。近百年来，这种获得书面形式的语言的数目，可以说是每隔十年都有一次增长。

文字或书面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保守性。凡是一种语言变成了书面语言的地方，那末要想强迫那些说这种语言的、彼此亲切联系着的居民接受另一种语言，就不大容易。这在民主上升的时代，在抗拒官厅阶层的无上权力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凡是在官厅们讲说一种外来语言的地方，反抗官厅的斗争就会成为反抗外来统治的斗争。

非民族化是在普遍专制主义的时代实现了的，它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有书面语言的民族，例如，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盖伦族人，普鲁士和萨克森的温德族人，法国的不列塔尼族人。想为这些民族创造书面语言的种种尝试，都进行得太晚，始终只是闹着玩玩。

强迫一个被先进民族统治着的落后民族去接受那个统治民族的语言，在我们的时代已不再象十八世纪时那么容易，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已愈来愈减小了。这一点，在上一世纪中叶还不曾明白显露出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因反革命派在某些斯拉夫部族那里得到援助而大为忿怒时，还会认为那些部族如同盖伦族人和不列塔尼族人一样注定要灭亡。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大师们后来也没有再发表这样的意见。但是，库诺夫在1915年却觉得自己可以引证马克思在1848年的意见，来反对我们的党所提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

库诺夫那时宣称，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民族独立的权利，是和历史的发展相矛盾的，因为历史的发展最近几十年来所表明的，撇开东南欧不论，“决不是民族分化的过程，而是巨大的民族聚集的过程，是各小民族不断融合为几个大的文化国家。”

针对着这一点，我在我的一篇批判文章里指出了完全相反的倾向，例如：瑞典人和挪威人分离了，捷克人和拉脱维亚人变得强大起来了，比利时境内的佛来米人面对着瓦龙人不断地提高自觉了。（《新时代》，第33卷，第2期，第77页）

我其实本还可以补充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甚至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将方言提高为独特的书面语言，让使用这类语言的人成为特

殊的民族。

由此可见，少数几个大国家里有许多民族组合和融合起来，这并不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特征。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一点显露得最清楚，世界大战将许多战败的大国分裂了，只要它们原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就让它们变为一系列较小的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爱尔兰获得了它自己的国家存在。

从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说来，如果战胜国在这样做时所考虑的单纯是民族自决的问题，那末这样做法倒确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和平实际上只是一种暴力和平，不是一种谅解和平，这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军人的胜利。因此，在划定新的国界时，民族自决仅只得到了局部的考虑，并且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要求割占有利的战略据点和财富资源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不过，我们在这里无须讨论这个问题。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有关的一点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道路，并非仅仅一条创造越来越大的国家和经济地区的道路，而毋宁主要是一条与此相反的、趋向于使现有的大国和由关税划分开来的经济地区分成许许多多小国家的道路。

毫无疑问，第一种倾向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条件中产生出来的。但第二种相反的倾向也同样是由此而产生的，它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需要普及国民教育和需要提高民主有着关联。

前一种倾向使用的是专制主义的方法，使居民适应国家政权的需要；后一种倾向则依据民主的方法，使国家适应居民的需要。

这两种倾向虽然是从同一片土壤里萌生出来，却经常互相冲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那个归根到底固然也以经济为基础、但直接具有政治性质的倾向，战胜那个不仅具有经济的基础、而且还直接来自经济需要的倾向。

因此，政治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变得比纯经济的因素更有力量些。

当然，政治的因素也不可能长久脱离它的经济基础。它始终是倚

赖于经济基础的。这在我们刚才考察的那一特殊事例中，也是如此。

东欧的那些由很多民族集团组成的大国家之分裂为许多较小国家，这在当时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这一倾向不能同另一相反的、要求不断扩大经济地区的倾向协调一致，则分裂就会导致极严重的经济恶果。新创建的小国家如果继续通过关税界线和其他种种贸易障碍以及币制的差异等等彼此隔绝开来，结果必然是经济生活的不断衰落。

从同一片经济土壤里产生出来的种种不同的倾向是彼此矛盾的，其中颇有一些从经济上说来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国家之内的这些倾向之间展开着各自争取实现的斗争，而同时，同样生产方式下的不同国家之间也展开着各自争取生存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必一定成为战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常毋宁总是一种经济竞争的斗争。

从一个国家的胎胞里产生出来的种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倾向，如果其中那些于经济有利的倾向愈比其他倾向占优势，或者将它们压倒，或者使它们适应于自己，那末，这个国家就将愈趋繁荣，愈易于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就是经济的必然性赖以实现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象许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以及甚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此，在国家生活中，表面上的经济现象不一定证明自己比政治现象更强有力。无产阶级虽然实际上只是在政治势力上，而不是在经济势力上比资本更强胜一筹，但这一事实决不证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前途无望。它仅仅证明，要想用纯经济的手段来进行这场斗争，象许多社会改革者、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社主义者、新区创建者和工团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那就确是前途无望的。当然，无产阶级的许多经济性的组织，首先是工会，此外还有合作社，都很兴盛发达。为了保持无产阶级的战斗能力，为了迫使资本让步，这些组织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们都不能够赶上资本的经济势力的增长和

结束资本的统治。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莎·卢森堡曾有一次将工会的活动称作西普福斯劳动*。这个语词在德国职工会里曾经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而且从一个意义上说也确是选用得很不恰当，因为这个语词人们惯于用以表示一种完全无益的劳动。如果她确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那当然完全用错了。没有工会，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上升，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是仅仅有工会，还不能使阶级斗争成为解放斗争。能够使阶级斗争成为解放斗争的，唯有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特殊的政党以后所展开的政治行动。

尽管资本的经济势力在不断增长，无产阶级却在西欧的一些大国里，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已经接近于取得独占国家政权的胜利了，在其他许多国家里，它也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迅速前进。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便能够将斧头向着资本主义势力的两条大根的至少其中之一砍去，即向着私有制、向着生产资料砍去。所有制依靠共同体的认可。认为某一财产所有制是必要的并加以保护的，乃是共同体，而当普遍利益需要的时候，它也能推行另一种所有制。

但是，随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也一同废除了，但新的生产方式却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要社会能够存在，要工人本身能够存在，生产过程就必须继续下去。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从而也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不危及社会，就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可以由另一种生产方式来代替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另一种生产方式给劳动群众创造的经济效果即使不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好，至少也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好。

在这里，政治又回到它所摆脱不掉的经济制约性上去了。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想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夺取国家政权固然绝对必要，但是，如果一定的先决条件尚未满足，仅仅夺

* 欧洲古代传说中的柯林斯国王，他因在世时有罪，被罚在地狱里将一块大石从山下推到山顶上去，石头快到山顶时又滚下来，如此反复劳动，永远徒劳无功，永远不得休息。

取政权是不够的。这些先决条件有的直接是经济的，有的是道德的和知识的，只要它们还没有由那些受经济决定的生活条件产生出来，我们就不能盼望它们出现。

如果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两条大根之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末，另一条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特殊方式，这种方式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且至今还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最高和最有生产力的形式。这种方式是适应于资本占有者的需要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甚至对于在它之下受着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来说，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其所以不可缺少，是因为还没有能够用另一种物品生产和流通的方式来代替它，代替它的这一方式不仅要适合于工人种的种种需要——对自由和权利平等的需要，对知识和生活乐趣的需要，以及对足够的衣、食、住的需要——，并且要能在比至今的方式更高的程度上满足这些需要，而这是要以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至少不低于至今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力为前提的。

工人们自己当了统治阶级，就不会安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如果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他们的处境要长期比在旧的方式下还更恶劣。人们也许会说，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理想而作出牺牲。他们是作出牺牲的。但是，一种强烈得足以令人乐于牺牲的热情，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而不能从经济生活的日常活动中产生出来。而且说热情是从争取一种伟大目标的斗争中产生出来，意思就是说，个别的人牺牲自己个人，是为了给别人，给孩子们、给同志们以及给社会，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如果为的是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孩子们、同志们和社会境况都比从前恶劣，甚至活不下去，那末，热情和牺牲精神将从何而来呢？

第十三章 生产社会化的条件

如果无产阶级不仅要取得胜利，而且还要巩固胜利，那就必须已

经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剥夺资本家阶级,并且还能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充分代替资本家阶级,以保证这些过程不受破坏地继续进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在通过资本的集中和中心化,向着一个方向进行,这一发展方向在今天,由于有了股份公司和企业联合,已经使资本家个人愈来愈成为多余的人了。股份公司和企业联合,使历来备受称誉的那种个人主动精神愈来愈无用武之地,使各别的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和投机愈来愈被某种坚定的调整和组织所代替,这种坚定的调整和组织,不仅在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方面实行了,而且在它们的销售方面也实行了。这种调整一旦不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就可能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不过,使生产资料愈来愈集中,使生产和销售愈来愈接受调整,还是不够的。这样做,一旦生产资料成为社会财产,使用生产资料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追求私人利润,那倒很可以成为一种防止危机的手段。

但是,在今天正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在向工人们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以便使剩余价值的总额能有极度的增长。而且,对利润的追求也力图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如果生产资料成为一个以工人为统治阶级的社会的财产,那末,资本家所挥舞的、用来强迫工人尽可能多和尽可能省地从事生产的那条饥饿的鞭子就消失了。而要使新的生产方式能够消除今天所存在的极度贫困,那就要使它能提供和旧的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同样多、甚至还要多得多的产品。

要作到这一点,唯有当工人们已具备一定的心理特性时才有可能,这些心理特性足以促使工人们自觉自愿地作出他们迄今只在资本主义的强迫之下作出过的那样最好的成绩。

要作出最好的成绩并不意味着比如说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延长工时势将和正要通过新的生产方式来达到的那个目标、即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精神提高发生矛盾。充分的闲暇是一切劳动者提供最佳成

绩所迫切需要的。可是，在缩减了的工时之内进行的那种全力以赴的劳动所具有的最高生产率，也同样是迫切需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督促，只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就可以了：停办一切设备不良的企业，普遍采用最先进的机器和方法，以及在生产中使用那些迄今非生产的甚至无所事事的有劳动能力的人，特别是失业者、无益的小企业或多余的经纪行业中的劳动者，等等。

但是最后，还有一点也是提供最好的劳动成绩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工人们经济的充分了解。他们既要能够理解经济上有利的事情和必要的事情，也要能够理解经济上不利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能够识别称职的领导者和不称职的领导者，从而清除后者，而愉快地团结在前者周围，同心协力地和他们合作。

但是，和需要经济有认识一样，还需要有高度的道德感，有一种伟大的集体精神 (Solidarität)，本着这种集体精神，就能感觉到，在一个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也就是属于工人阶级所统治的社会的企业里，不管这个企业在形式上是合作社所有的、公社所有的还是国家所有的，如果劳动时不尽忠职守，那就是对同志们，对整个工人阶级和社会不忠实。

经济方面的认识，工人们可以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来，而工会和工人政党都在为此而努力，尽管有一些伦理学家在那里胡说八道。这些伦理学家认为经济知识是多余的东西，所以避而不谈，却向工人们大肆吹嘘一套，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用思辩的蛛丝织成的、绣满辞令花彩和浸透甜蜜温情之泪的神秘外衣”。*

工人的各种进步，如合作社、基尔特、公益所等等的建立，企业委员会的组成，也都同样有助于向更广大的工人群众传授关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各种条件的知识。

就这一方面说来，在社会主义者取得国家政权以前，工业大城市的一些个别的社团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无产阶级首先取得权力，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04 页。

在那里,无产阶级由于享有社团活动的充分自由,能够首先较大规模地建立初步的社会主义生产,这种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为了谋求利润,并且是由工人阶级管理的。

这正是1871年巴黎公社里无产阶级的代表所不曾直接说出或明确看出、却在实际追求的目标。半个世纪以后,奥地利的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维也纳公社能够成为巴黎公社当年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

巴黎公社在五十年前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能以今天维也纳那样的社会主义精神进行工作。何况当年的巴黎,小市民气息还太重,工人们还过分受单纯的、当然是英勇的情感所支配,没有任何经济知识,因而也过于混乱和分裂。

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及政治的和经济的战斗组织的日渐扩大,它在经济方面的经验和认识也日益增长,而且它掌握经济知识并以之作为行动依据的可能、手段以及必要,也都在日益增长。

在工人们所必须具备的道德方面,情况就不象在必要的知识方面那么简单。请不要误解我的话。我不想在这里宣扬道德,那是一种全然无益的事情,也不想断言工人们缺乏道德或道德感。但是,任何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都要求具有某种特殊的道德,如果没有,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完成那一行动。士兵要能效命疆场,他所需要的道德就完全不同于医生在医院里、母亲在家庭里、司机在机车里等等所应有的道德。

阶级斗争使工人们培养起了一种高尚的道德,但是,那是斗争者的道德。那种道德使工人有条件争取胜利和夺取政权。

但是,当工人着手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时候,这种斗争道德就必须适应于个体工人要去为他的阶级服务的那种新的活动方式。

斗争教导工人,在自己的组织内自愿地遵守纪律,和战友们团结一致,鄙弃一切叛徒和工贼、一切损害集体以谋取私利的人。同时,斗争也还教导工人,经常不信任、在某些情况下还要憎恨企业中作为工人的剥削者或作为剥削者的代表者的那些领导人。还教导他随时准备着抗拒领导人所颁布的、看来没有正当理由的新规章。还教导

他不关心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生产果实原是只归剥削者和敌人们所有的。还教导他有这种要求：对企业尽可能地少付出、多索取，以求减轻所受剥削的程度。

在社会化的生产中，必须把在阶级斗争中反对资本时培养起来的、斗争组织中的纪律性和战友们之间的团结性等等道德，转移到现在已成一种工人阶级福利增进过程的生产过程上来，必须从工人身上消除掉生产过程从前作为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时使雇佣劳动者养成的那种思维方式。

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以往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会和政党，现在也必须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化了的企业。他在这种企业里也必须感到应该遵守纪律和维护团结。他向来怎样以鄙弃的态度看待工贼，现在必须用同样的鄙弃态度看待那些企图通过故意降低工作效率以求减轻其对集体负担的劳动的人，看待那些利用社会主义化企业中的特殊有利条件，不通过特殊的超额劳动成绩，却牺牲全体工人的利益而为自己谋得额外好处的个别工人或工人阶层。

把无产阶级的阶级道德转移到新的生产关系上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种新的道德不同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其他物质先决条件和精神先决条件，它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已经产生出来了的。它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环境里才能够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化的企业愈不再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例外现象，愈扩展到了足以影响全体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情感的程度，那末新的道德就将愈容易出现。

在社会主义初期，新的生产方式可能难以充分发挥它的生产效率。为充分发挥生产效率而作的努力可能会遇到各种障碍，比如，工人们对于他们在其中从事劳动的企业缺乏足够的休戚相关之感，还有，某些在一个社会主义化了的企业里从事劳动的工人集团，企图从该企业中谋取额外好处，从而使尚未社会主义化的企业里的工人们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此付出代价。

工人的经济知识愈增加，但也必须说，企业内部民主愈扩大，

那末，生产中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也就愈容易建立起来，工人们也就愈会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企业，愈会将任何不尽职责的人当作工人事业的危害者来看待——情况需要时，还会不止于如此。

最颠倒错乱的事无过于试图采用恐怖手段强令工人产生他们所缺乏的劳动热情、自觉纪律和对企业的休戚相关之感了。那样做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工人把社会主义企业看作是同资本主义企业同样的敌人，并以同样顽强的态度进行抵制。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新道德是不可能这样产生出来的。

对于把无产阶级在斗争组织中培养起来的道德转移到无产阶级的生产企业中，最大可能充足的社会财富也象最大可能广泛的企业民主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财富愈多，就愈容易满足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就愈能够早日消除亟待解救的那种极端贫困状态。新政权能够迅速给予工人利益就愈大。工人们就会愈热烈地维护新政权并关怀它的强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花繁叶茂，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愈是前景美好。

这一点，同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将从资本主义的“崩溃”、“失灵”和“衰败”里产生出来的人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可是这同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寄望于资本在经济上的衰落，而应寄望于无产阶级在道德、知识和政治上的上升与增强的观点，却并不矛盾。

这一认识，对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的实践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对于无产阶级要想打开的那条走向胜利的道路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问题上，我也许可以作几点有关个人的说明。我在我的《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89年版)一书里，还抱着一种见解，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它所不能逾越的经济界限。不过，就在当时，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被我看作即是这个界限的那种慢性危机，并不是必然要出现的。

“慢性生产过剩的出现过程，可能是一种蹒跚其来的过程。关于它怎样出现和什么时候出现，我们都不大知道。我简直乐于承认，它

究竟是否有一天会出现,甚至都是大可怀疑的;我们愈想象社会主义运动进展迅速,就愈会有这样的怀疑。

“不可挽救的慢性生产过剩,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够保持下去的最后界限,却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死亡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进入它的解体阶段以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能使它倾复。”(第145页)

三年以后,我在我的《论社会革命》(«Die soziale Revolution»)一书里,除了讨论其他问题,也研讨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可能采取的形式和能够促成这一胜利的条件。

我在那里指出,在今天的紧张形势下,一场战争可以很容易在战败国里变成一种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然而,我们仍然不可盼望有战争。

“战争的恐怖是那么惊人,在今天大概只有军国主义狂人还能鼓起可悲的勇气,冷酷地要求战争。但是,即使革命不是一种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一个最终目的,人们也不能盼望以战争为发动革命的手段,因为战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最不合理性的手段。敌人的入侵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破坏,会向国家提出许多非常巨大的要求,从而会给战争中所产生的革命加上许多并非革命所固有的极为沉重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将会瞬息之间耗尽革命的几乎一切力量和资财。而且,从一场战争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往往会随着革命阶级的失败而归于失败,如果革命阶级因战争而需要过早地担当起解决自己还力不胜任的那些任务的话。战争本身还可能更加削弱革命阶级的力量,因为战争总会造成牺牲,总要招致道德和知识上的退化。于是革命政权的任务大大加重而同时力量却大大削弱。因此,从战争中所产生出来的革命,如果不是客观形势里有着很深的基础,就容易失败或很快地丧失动力。”(第三版第58页)

我在1902年所担心的事,在1917年和1918年竟不幸出现了。

然而,曾经有不少的社会主义者,却将当时革命所以力量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即经济全面崩溃,看作是一个胜利的因素。许多共产

党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为这种经济全面崩溃而欢呼，认为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灵，因此也就意味着它的末日的来临。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事无过于防止倒在地上的资本主义重新站起来。从现在起，除了社会主义化了的生产以外，应该使任何其他方式的生产都成为不可能。

这真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口号。1919年1月12日，在国民大会选举之前，当时尚未弄明确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仅占少数，我就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制定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的准则》（«Richtlinien für ein sozialistisches Aktionsprogramm»）。我在那里写道：

“德意志共和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但它应该不止于此，它应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一个不再有人剥削人的共同体。”

“然而，比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更为迫切的，是生产本身的问题。战争已经剧烈地破坏了生产。使生产重新活跃和正常进行，是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任何想使生产社会化的试图，都要以此为先决条件。”

我还曾接着说明，这种社会化本身，不可能反掌之间就完成，而只能逐步实行，而且先要对实际的情况仔细加以考察，要对新的制度做好准备工作。

1919年4月14日，我在全国工人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作了一个论《社会化》的报告，表示了同样的意见。我在那里说道：

“俄国人想干就干、干了再看的工作方法，没有产生大快人意的经济效果，却加深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困难处境，使他们为吸取教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的俄国同志们亲自告诫我们，要我们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一教训。

“尤其是，战争已经消耗尽了我们的一切储藏，如果不尽可能地处处恢复生产，我们就必然会饿死。没有生产，我们连片刻的生存也无法维持。因此，我们必须全面进行生产，不只限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而且，在还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的地方，也要进行资本主义

的生产。

“立即实行全面社会化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如果说立即全面社会化不可能，那末，要求立即使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成为完全不可能，其危害性也同样地大。

“想要用一种非常通俗的办法，来加速整整一个工业部门的社会化，实在是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那种办法就是鼓动工人们提出许多要求，而其必然结果要么是生产亏本，要么是产品价格提高，以致没法畅销。这就只能意味着，把这个生产部门从一种使社会富裕的工具，变成使社会贫困的工具。这样的社会化不是生产的社会化，而是破产的社会化。”

这些看法，今天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八年以前，当革命看来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党左派人士却对这种看法大不以为然，个个摇头，表示怀疑，或者甚至忿怒地加以拒斥。

我在1919年4月的报告的结尾，谈到了使社会化问题未能见于实际的“祸根”。我认为祸根就在于：

“无产阶级的分裂。这一分裂首先使得由革命而产生的政府，不得不依靠旧日的官厅、将军和资本巨头”。

“有人认为，国民大会就是普遍选举权不好的一个证据。但是，这种选举权不过是一面反映实物的镜子。如果它反映出一副丑态，那末本来面目也就不会更美些，而且看到这副嘴脸的原主即使在盛怒之下把镜子砸碎，那也丝毫无补于实际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无产阶级是分裂的，议会制度也就创造不出无产阶级的单独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都只能意味着一部分无产阶级对其余部分的无产阶级实行专政。”

“当务之急在于统一无产阶级……”

“马克思用来结束《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今天必须加上一句：德国的无产者统一起来。”

我的报告结束语中的这个呼吁，在当时算是向空虚发了。连最

起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都还需要等待许多年。

但是，没有统一的无产阶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某一个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或暗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单独夺得国家机器，并用一切恐怖手段牢牢掌握住这部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成为解放全体无产阶级的手段，而只能成为压制工人阶级中没有参与宗派活动的那些人的手段。它能使生产过程国家化，却不能使生产过程民主化。而只有民主化的生产过程，才能被无产阶级看作是解放自己和满足自己的一种手段而乐于接受。

而且，只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才有力量在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民主形式下，长久保持自己的统治。什么地方如果无产阶级在内部斗争中自相摧残，在那里就总是资本家阶级坐收渔翁之利。精神思想方面的斗争，关于理论问题、策略问题、组织问题的斗争，对本身毫无害处，作为澄清思想的手段可能非常有益。但是，这样的斗争如果导致了组织上的分裂，甚至使无产阶级的某一组织用暴力手段来对付另一组织，那就很有害了。

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组织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也是一个组织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前一方面和在后一方面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但在生产建设方面，我们又重新看到了经济繁荣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没有什么比经济萧条时期的贫困和失业更能使无产阶级的团结受到威胁。没有别的情况更能使一部分无产阶级对斗争不感兴趣，使另一部分无产阶级急于从事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没有失业的人，以及明白认识当前力量对比和经济条件的人，会提出警告，要人避免任何可以避免的较量力量的行动。相反的，那些失业的人和无知的人，由于绝望和抑制不住的行动欲的驱使，却容易受幻想家和煽动家们的摆布，从事注定要失败的暴动，其作用只能是加深工人运动内部的不和与分裂。

工人阶级内部从来总有两翼：一边是谨慎小心和深谋远虑的人，另一边是勇猛大胆和缺乏耐性的人。这样不同的两翼，和理论上、策略上、组织上不同的方向没有什么关联。在上述各种方向中的每一个方向的内部，都可以找到这两派人物。而且，方向会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和经验而改变，而那两翼却总要一再出现。两翼只要不妨害整体的统一性，只要它们的交互作用能防止整体犯片面性的错误，那就都是有益的。但是，两翼的对立，如果尖锐化到了分裂整体的程度，那就非常有害了。

这种情况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容易发生；相反地，在经济繁荣时期就最不容易发生。

资本主义的繁荣还能以另一种方式使社会主义的措施易于实行。资本家们愈是由于活跃的流通而不是由于加重了工人剥削而增加收入，人们就愈可能以抽税的形式从他们的收入中多多征取，而仍不至于妨碍生产过程，不至于助长增加工人负担的倾向。这样，国家就最容易获得自己所需的资金，来实施有利于群众的重大的革新。

在繁荣时期，也最容易在不损害生产的条件下强使资本家进行一些重大的改革，例如缩短工时、改善卫生条件，等等。因为，在这种时期，企业主最有资金来应付这些任务所带来的负担，或通过企业中的技术革新来弥补这些开支。

但是最后，在经济繁荣时期，一些以社会化为方向的革新，例如，新建立的公营企业，也能获得最良好的先决条件，来渡过最初的最困难的年份，即吸取教训的年份，以便站稳脚根，打下基础。

所以，我们必须一再强调，能创造出最良好的条件、使社会主义政权在初期多有成就的，不是工业资本的经济衰退，而是它的繁荣。

我们曾经谈到，从一片现有的经济土壤里，可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倾向，有的互相促进，有的互相妨害。但是，即使是互相促进的倾向，也并不是都以同样的速度和同样的程度成长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可能由于某些特殊情况而在某一个国家提早取得政权，即，早在那里的物质、知识、道德方面的条件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行具有

工人高度自决的社会主义生产之前,就取得政权。

这样的一种政权,也能给劳动阶级带来资本主义政权所不会给予的许多好处。但这种政权只有当它放弃经济上不可能作到的事情时,才能给劳动阶级带来那些好处。相反,如果这种政权想要立即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那就总是要遭到失败,不是被推翻,便是走到它最初力求实现的目标的反面。

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总是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小心翼翼,试探着脚下的土地。因为,它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两者并不总是程度相当。即使这样小心翼翼,也还可能遭到不少的失败。而且在取得各种经验之后,最后证明最为适当的那些社会主义形式,也许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心目中悬想的那些形式。

个别的挫折甚至在一些最先进的国家里也还是有可能的,例如,也许由于资产阶级政党提出漂亮的诺言,说得比社会主义者多数派一向实际作出的成就还要好些,使一些半无产阶级阶层或无知的无产阶级阶层受迷惑而转入资产阶级阵营,这样,社会主义者就可能会由多数派暂时变成少数派。至于采取非民主的办法,由武力造成的挫折,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

这些挫折将会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是决不应该成为令人绝望的理由。它们即使是由于社会主义者多数派的失败或无能而引起的,那也只是证明在有关的国家里,夺取政权的条件在当时比运用这一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革新的条件先有了发展。

即使遭遇这类挫折,也还远不是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已经失败了。

至今还不曾有过一次失败,即使看来似乎已给无产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能使无产阶级长时期一蹶不振。弗莱利格拉特* 1849年

* Ferdinand Freiligrath(1810—1876):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诗人,“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曾与马克思一同编辑《新莱茵报》。1868年转入资产阶级阵营。

5月19日发表在被查禁的《新莱茵报》上的诗句,对于全体无产阶级说来永远是切合的:

“我不久跃然而起,
骑上马重返战场!”

无产阶级每次失败以后总是重新振作起来,而且队伍更壮大,更有力,更成熟,从过去的活动中取得丰富的经验。

但是同时,不管无产阶级的活动及其结果在形式上有什么改变,它的最终目的却是始终只有一个。工人阶级,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所说,“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也就是,正如马克思在这句话的前面所说的,“没有想……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但虽然如此,工人阶级却始终不渝地在追求着一个目标,他们必然追求着,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不是某一个理论家设计出来的或某一位满怀渴望的诗人梦想出来的理想,而是一个随着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一同产生、并只能随着它一同消失的理想。

自从出现阶级和国家以来,每一个被剥削阶级只要一般地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都已把消除自己所受的剥削定为自己的目标。现在,对于被剥削者说来,这个目标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生存条件的缘故,被无限地扩大了。现在,在阶级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条件,使所有的阶级中最下层的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并从而结束一切阶级统治。

它仍旧是构成被剥削者的一切阶级斗争基础的那个目标,但是它扩大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程度。现在还不能够确切断言,这一巨大的解放斗争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会带来哪些新的社会形式。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可以肯定断言: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与否都卷入其中的这一运动,只有在它终于永远结束一切剥削时才会终止。

我们这个世纪里无产阶级斗争所实有的最终目标就是这个,而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363页。

不是臆想出来的什么乌托邦。达到这个最终目标所需要的力量和条件，正在一天天地不断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它的实现。

第十四章 国家的转变

工业资本的出现导致出来的、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推进着的整个巨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不同时引起国家的全面的变革，它不仅引起国家内部的种种变革，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本身的实质。

仅仅由于现代民主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出现，上述改变就已经发生了。现代民主国家，正如我们所已谈到的那样，已经和由历史演变而成的国家的本质极端矛盾了。由历史演变而成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组成它的各个不同的共同体、等级和阶级的权利不平等上面的。国家的所有成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一成员享有同等的政治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这就已经意味着同最初的那种国家有了歧异。因为最初的那种国家，是建立在胜利的少数人对于组成国家的各民族部分和其他各民族的多数人的掠夺和暴力压制上面的。

但是，现代民主国家还并不意味着一切阶级的消灭。它仅仅意味着以暴力为基础的那些等级差别的消灭。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消除已在国家内部形成而属于纯经济性质的那些阶级差别。这种阶级差别是以某些能和普遍的权利平等协调得起来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

民主制国家并不妨碍剥削阶级攫取国家政权，不妨碍它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在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中利用国家政权。

但是，现代民主国家不同于以前各种形式的国家的地方是在于，国家机器这样被利用来为剥削阶级服务并不是现代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并不是和现代国家的本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正相反，现代民主国家就其素质而论，并不象以前的国家那样，注定要成

为少数人的器官，而毋宁注定要成为多数居民中的、即劳动阶级的器官。如果它竟变成了少数剥削者的器官，那末，其根源并不在于国家的素质，而是在于劳动阶级的素质，在于劳动阶级的不统一、无知、缺乏独立性或没有斗争能力，这些又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条件所造成的。

民主本身，就提供了可能性，来消除大剥削者在民主制下取得政治权力的这些根源，至少，人数不断增长的雇佣劳动者，愈来愈能作到这一点。

愈能这样，民主国家就愈不再仅仅是剥削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器于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开始转过来反对剥削阶级，也就是开始执行和它至今的活动恰恰相反的职能。它就开始从镇压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为解放被剥削者的工具。

当然，今天有些人宁愿承认现代国家正在经历着的转变是另外一种转变。并不是民主在变成解放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而是民主本身正在丧失其效用。民主和议会政治今天正在经历着一场将使自己归于完蛋的危机。

这种看法只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正确的，即，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尤其是这些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实际地位，今天都在要求实行重大的革新，而工人们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也正在提高他们对国家的要求。但是，在民主制下至今还不曾出现能够推行重大革新的多数派，国家的立法目前毫无进展，议会这座磨房只是在转动着空磨。

这种状态确实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怎样产生的呢？非常简单，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政党还不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获得多数居民的支持。这些政党是现存社会里唯一拟有重大革新纲领的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则安于现状，迁就在它们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的利益。

这种状态在今天议会和民主的活动中或者说在它们的不起作用中反映了出来。它是极其令人不快的。可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援用前面已经用过的关于镜子的比喻来说，造成令人不快的状态

的原因，不会由于砸碎向我们反映这一状态的镜子而消除。只有极其肤浅的观察，才会认为镜子应该对它所反映的状态负责。

人们应该设法使每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使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得到多数居民的支持，这样，民主和议会就会立刻生气勃勃起来而发挥出最大的效用。而能为做到这一点提供最良好甚至唯一基础的，就是民主本身。

批评民主的人们，能够提出什么别的政治体制来对抗民主制度呢？在今天的社会里，除了民主而外，只还有一种政治状态至少暂时是可能的，那就是：没有法律的、纯粹依靠暴力的独裁。

这样一种政治状态，我们在古代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势力均衡的时代，就已经见到过了。在古代希腊的那些国家里，当两种倾向势力均衡时，往往出现一位暴君，高踞于这两种倾向之上。在罗马，从与此类似的敌对阶级势力均衡的状态里，产生出了恺撒主义。在我们的上一个世纪，由于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也同样出现了一种势力均衡状态，从而产生了波拿巴主义。今天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时代，在好些国家里出现了独裁。

从前的独裁几乎全都是短命的，用历史的尺度来衡量，10——20年在历史上不能算是很长的时期。古希腊的那些独裁，寿命大都没有超过这个时限。象罗马的皇帝们所实行的那种长期的独裁，其所以能够维持得下去，只因为那里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已陷入衰颓，一切阶级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兴趣都已归于沉寂，阶级之间的均势已演变为阶级之间的僵持——这当然都是经济不断衰退的结果。在上一个世纪的法国，拿破仑第一和拿破仑第二都活得比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还长久些。

凡是经济生活继续活跃的地方，独裁政治从来没有长期保持下去过。

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不是出现在旧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里，而是出现在工业资本主义还很年轻、因而工业无产阶级还缺乏锻炼的那些国家里。这种国家里的独裁所以能够站得住脚，只因为它们使

用这样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使人民的任何自由活动愈来愈不安全,使人民之间的任何自由来往愈来愈受限制,使自己的国家愈来愈陷于孤立,愈来愈多地和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因为和别的国家交往的时候也喜欢使用统治本国内部的办法),从而使这些国家原已相对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

那些独裁者们所以能够抛弃民主,所以能够不依靠人民群众,只是由于他们有官厅、警察、军队或庞大的匪帮(法西斯)这样一套权力机器的支持。在表面上看来,这部机器把他们抬高成为具有无限权力的独断统治者,实际上却使他们日益堕落为它的俘虏。满足这部机器的需要,必然越来越成为他们主要操心的事情,而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却只可能使用那些对任何经济的上升都起着阻碍和束缚作用的方法。

这就使每一个独裁政权必然和居民中所有的阶级,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业劳动者,是资本家还是无产者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对立起来,只要这些人不属于俸禄优厚、享有特权的独裁政权的工具之列。

因各阶级势均力敌剧烈倾轧而得以趁机上台高踞于各阶级之上的独裁政权,最后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一切阶级对立都通过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而缓和下来。

在今天,这些独裁没有一个能维持长久,迟早都必然要倒台。但是,它的制度,将不会比看来不起作用的民主制度使国家得到更多的进展。恰恰相反,它所遗留下来的将是国家在经济、道德、知识等等方面削弱。

独裁可能暂时阻碍民主和无产阶级的上升——这往往从一开始就是它的目的——,它却不能促进社会的任何发展。它不论在哪个国家里得势,它都注定只是一段插曲,而且只是一段多所牺牲、饱经痛苦的插曲,却决不是能在任何方面代替民主的插曲,更不必说什么能比民主多有成就了。

民主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是无可代替的。民主如果受到暴力的威胁,就只能用暴力来保卫,而不能仅仅依靠说服或投票。可

是斗争的无产阶级永远不可抛弃民主。

有朝一日只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员的人数众多得足以形成居民中的多数，并且只要他们的独立性和斗争能力充分得足以使这个多数在民主制中发挥作用，那末仅仅通过民主，至今的国家最终就会转化为它的反面了。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胜利最初将不会改变国家的本质。国家将仍和从前一样，是镇压个别阶级的工具。所不同的将仅是人员的更替。从前坐牢的那些被压迫者的先锋战士们，现在进入宫殿。而原来住在宫殿里的人，现在去坐牢了。纪元前 2400 年埃及发生革命时，情形就是这样。

有着这种想法的人，对现代民主的实质体会得太少了。一个在原则上主张民主的政党，不能在当权以后采用它在野时所谴责的那种办法，对付反对自己的人。“在我没有当权期间，就该给与我的党以国内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旦我成了执政者，就让所有不向我的党宣誓效忠的人都进巴士底狱。”这样的口号不只是天真，它简直是极度的愚蠢。因为，喊这种口号时就忘记了其他国家里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的兄弟党的同志，并且满以为自己的党在本国只要获得了胜利就会永远当权，再也不会被迫退居在野的地位。那可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保险的，而在一个党自以为依靠巴士底狱就能永远保持政权的地方，就尤其靠不住。

正是多数派和执政党的经常更替，在英国成了确保民主权利的有力手段，因为每一个执政的党都必须考虑到，自己不久可能会、甚至势必会变成在野党而必须利用民主权利。

一个在无数群众性斗争中取得了民主并且掌握了民主本质的无产阶级，如果利用政治权力，对那些以民主为凭借的反对派实行政治压迫，从而限制了民主，那是和它的无产阶级精神完全相矛盾的。至于在内战中用来对付内战发动者的那些措施，我们在这里无须加以讨论。

关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对资本家所实行的压制，我们

当然也可以另作理解，不把它视为政治压制。

今天，恰恰是民主的最凶恶的敌人最热中于“劳动自由”，而他们所理解的劳动自由，实在是无限制地剥削劳动者的自由。

这种自由肯定是要被取消的。企业主们迄今对任何法规，甚至对最无害的劳动保护法也都感到忿懑，仿佛是——工人的一种向所未闻的压迫。他们今后将会还有更多的忿懑。民主将会经受得住他们的这种态度。

一个由无产阶级多数统治着的国家，当然不会停留于这类的“压迫”而止步不前。它将会变成最有力的工具，一个接一个地夺下资本主义剥削的堡垒，把它们改变为真正自由劳动的场所。这一过程的最后终结，必然是一切剥削的消灭。但是，国家本身不会因此而消灭吗？国家不会因此而丧失其迄今所凭以立足的基础吗？

第十五章 国家的消灭*

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里写道：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的居民变成为无产者，因而，就造成了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起来完成这个（对生产实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以满足全社会以及社会每一成员的需要——考茨基）革命的力量。资本主义迫使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日益转变为国有财产。因此它自己指出了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而把生产资料首先变为国家的财产。可是因此，它也就消灭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那种性质，这样也就消灭了所有的阶级区别和阶级对立，跟着这些也就消灭了作为国家的那种国家。直到现在所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运动于阶级之中的那种社会，需要有国家，即剥削阶级用以维持它的生产的外部条件的那种组织，也就是

* “消灭”二字原文是 Aufhebung，一般所說国家的消亡中的“消亡”，原文是 Absterbung。

用以强制地束缚被剥削阶级于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被压迫状态(奴隶制、农奴制、封建隶属制、雇佣劳动制)之下的组织。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的代表,是社会总括为一个可见的团体;但是国家之能成为这样的代表,仅仅因为它是当代唯一代表了全社会的那一阶级的国家:在古代,它是奴隶主—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等到最后,国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的时候,它本身就变成为多余的了。当社会上没有必须被压迫的阶级的时候,当从现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和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缚什么人了,那时候,现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国家以全社会的真正代表的资格而作的第一次行动——将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渐成为多余的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治理(Regierung)将被对物的管理(Verwaltung)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Leitung)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abgeschafft)的而是自行消亡(absterbt)的。应该根据这点去估价‘自由的人民的国家’这一词句,它在鼓动中有暂时存在的理由,可是它从科学意义上讲来,毕竟是没有根据的;同样应该根据这点去估价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要求,即在一个晚上废除国家的要求。”*

这一段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将国家看作统治工具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逻辑结论。它在精确性和明晰性上也是无以复加的,而即使在享用的时候加了些必要的适度的调味香料,它也没有任何可以非议的地方。恩格斯将国家没收生产资料说成是一次“行动”,我们决不可以由此作出推断,认为他所设想的是一切生产资

•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4—295页。着重点以考茨基的引文为依据。

料在一个新的（自然是1789年式的，不是1914年式的）8月4日晚上，一下子变为国家所有；决不可以认为恩格斯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只能够是一个或多或少缓慢进行的过程。恩格斯自己就立刻形象化地谈到国家政权的逐渐的眠逝和消亡（Einschlafen und Absterben），因而这不是一种一次性的行动。而且，恩格斯谈到国家的时候只把它说成生产资料的没收者，这一点我们也只可以认为是出于行文上的简练的缘故。第一，这里所说的生产资料决不可能是指一切生产资料，而只能是指对社会性劳动起着制约作用的那些大企业的生产资料。其次，这些大企业也是可以由不同的社会代表者来经营的，既能由国家来经营，也能由合作社和公众团体来经营。不过理所当然，国家将必须自己管理那些包罗的方面最广和最有决定性的生产场所，就连公社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生产场所也需要相应的国家立法，才得以建立和兴盛起来。因此，整个庞大的社会生产过程，将一定是日益由国家政权来调节和领导的——当然，这个政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民主政权。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只要人们不作简单化的理解——恩格斯本来也不曾把它简单化——那就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却需要一个注释，因为它留下了一些待决的问题，会引起误解。

恩格斯在这段论述的结尾处，指责了无政府主义者，但仅仅出于一个理由，即，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一个晚上废除”国家。

这一点可能被人理解为——而且确实曾被理解为——社会民主党人在其所力求达到的最终结局上是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致的，只在所走的道路上彼此有所不同而已。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废除国家是消除剥削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人却相反，认为国家的消亡是剥削的消灭的必然后果。但不论按照前一种程序或后一种程序，最后出现的社会状况总是一样的。

这决不是恩格斯所想说明的，然而人们却可以从他的话里读出这层意思。

人们也许会反驳说，最终结局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问题，可以留

给我们的后代去解决。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影响到我们今天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不可忘记：国家所以对人类发展十分重要，并不是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统治组织。它是一个统治组织，这是它的最显著的特征，而且对于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的人说来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但并不是它的唯一的特征。

我们在开始考察国家的时候，就曾有机会指出，国家由于是一种将各别的小的原始的共同体结合成为一个大的组织的手段，因而起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作用。这种作用，是和作为某一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的那种性质密切相关的。剥削阶级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的统治和剥削区域已经足够广大。它总是竭力通过侵略来扩大这个区域，从而提高自己从国内劳动阶级的总产品中所攫取的剩余产品数量。

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据并使现代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成就，恰恰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国家自始就大于、并且必然大于它所征服的、并据以把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些原始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共同体。而这些成就又将产生下列这些事实：国家通过侵略建立起一些较为广大的、彼此有着较密切贸易往来的经济区域，从而使城市得以形成，使城市工业得以脱离农业，最后并使艺术和科学得以产生。如果今天的国家领域分解为它所由组成的那些部分，那么上述一切都要瓦解，而现代社会主义本身的基础也将随同瓦解。但这正是无政府主义所竭力追求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应该由无数独立自主的小乡社和小公社出来代替国家，这些小乡社和小公社随心所欲地各自经营，只为自己，或者彼此偶尔有些松懈的联系。

这种乌托邦与其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倒不如说是真正史前时期的，它如果实现了，就将直接引导我们返回野蛮时代。它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民主国家本身，早已不再是对互相敌对的、一遇机会就要脱

离国家而独立的那些组成部分的一种强制结合力量了。相反，在民主的、依据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的民族国家里，组成部分都最坚韧地结合在一起，都最强烈地反对与国家有任何分离。一个民族的个别部分如果因受暴力阻挠而不得与一个共同的国家组织里的民族群体联合统一起来，那末它们不达到统一结合是不会宁息的。这种民族倾向，如同民主倾向和无产阶级解放倾向一样，是不可消除和不可抗拒的。它同它们是从同样的经济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解放的时代也将是一个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时代、一切被强制分离的民族结合为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民族国家无须任何压制机器，本身就会最亲切地团结一致，并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既不会因阶级消灭而眠逝，也不会因之而消亡。国家将会胜利地抗拒任何使国家消除 (Auflösung) 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即使当这种倾向还是严肃考虑的问题时也是如此。至于目前，无政府主义可以说主要只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陈迹了。在恩格斯写作上引那段论述的时候，巴枯宁主义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还是有着一定作用的。

不过就在今天，为求认识明确，同无政府主义划清理论界限也还不是不重要的。

恩格斯的论述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

国家消亡这个说法，可能被理解为国家机器本身将逐渐地不复存在，不复行使职能。这种理解，就它的某些部分而论，肯定是对的，例如普遍裁军时的政治警察，等等。但是，国家机器的其他部分，却会更扩展它们至今的职能，例如由国家推动的教育事业、卫生事业、艺术活动等等。在古代象雅典那样的国家里，艺术一直起着极重大的作用，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那半个世纪，取得了极其惊人的成就的造型艺术，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为国家而活动的——此外还有戏剧艺术也是如此。那时没有私人剧院，而私人建筑包括富人的在内，都是并不堂皇的。

除了促进艺术、教育、卫生等事业之外，国家也还必须担当起一个巨大的任务：调节我们这个时代的庞大生产机构。在这方面必须作到使一切尽可能民主、尽可能有弹性、不带官衙气息，但是，却并不排除一切官衙机制。在今天，当某些要求承办人员具有专门知识和拿出全副精力来处理的任务都交由官衙来担当的时候，没有官衙机制就不可能再出现任何巨大的组织。

这种转变的前景，将断断不是国家机器的消亡，而毋宁是它的职能的增加——当然也会是它的某些职能的改变甚至完全停止。

恩格斯本人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时说：“对人员的统辖将被对事务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对于这一句话的重点，不可以放在人员和事务的对立上。至今的国家也曾有过对事务的管理，例如，对堡垒、军械库、大炮以及教堂和王宫的管理。另一方面，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无非就是对从事生产的人员的领导。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倒是更应放在统辖或统治为一方和管理与领导为另一方的对立上。

什么地方，如果那里是一个居民中占少数而凭借暴力、较大的财富或较高的知识来对广大的多数实行统治的阶级在担负着统辖的责任，那么在那里，统辖就意味着老爷统治(Herrentum)。

一个由国家中多数人任命的国家领导，就具有另外一种性质。

如果所有的居民部分，在有无战斗能力方面是平等的，在教养和财产方面是平等的，那末，国家领导就不拥有对付多数人的特殊权力手段。同时也不需要拥有那样的手段来贯彻对付个别人或少数集团的措施，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多数人的重力一旦通过自由表决明确无误地显示了出来，就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

任何一种组织，即使它的成员一律平等而且它的领导完全依靠它的成员，也还是需要有管理或领导。那么当统辖由这样一种单纯的管理或领导所代替的时候，人们固然可以看作是至今的国家已停止存在，但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传统的国家机器通过一种彻底的机能变换而取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当人们考虑阶级消灭对于国家

所产生的后果时，人们似乎应该不那么大谈国家的消亡，而毋宁应该谈到国家的机能变换。

这种机能变换，我们在自然界也能见到，比如说，在毛虫向蝴蝶阶段过渡的时候。蝴蝶是作为一种带有全新的机能的全新的动物而出现的。它不再依靠树叶，而是依靠花蜜生活了。它不是在树枝上艰难地爬行着，而是欢乐地翩翩飞翔于花间了。它享受着毛虫因器官欠缺而无法享受的爱情游戏。然而，蝴蝶仍然与毛虫是同一个个体，而不是从毛虫的消亡里产生出来的。

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事实真相，那末，怎样表述它才算最恰当就不那么重要了。毫无疑问，由历史形成而传留给我们的那种旧国家，是会告终的。由旧国家成长起来的新的共同体（Gemeinwesen 亦译公团）不妨仍旧称作国家，正如同不妨说，蛱蝶是和它的原虫同一种属的。但是，尽管那样，毛虫和蝴蝶还是显然有别，我们力求明晰精确，也无妨赋予新的共同体以不同于旧有的名称，从而使新旧之间的根本对立可以识别。

将新的共同体称作共和国，不足以表明它的特征。贵族共和国不是有过很多很多吗！“民主共和国”这个词也还表示得不够充分。社会民主党当然赞成民主共和国，但是它也知道得很清楚，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决不排除某种阶级统治。

“人民国家”这个词也是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运动初期曾经使用过这个词，用它却不是为了标志一种完全新型的国家，而是为了隐蔽民主共和国这一概念。在当时，党假如公开表明自己是主张共和制的，则一定使任何合法的、亦即任何能够掌握群众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宣传的形式都成为不可能了。但是，党又不愿放弃宣布党纲中的这一重要部分，所以提出“人民国家”来代替“民主共和国”，这在基本上是同一个东西，却不太刺激德国的官厅和法官们。

奥本海姆曾经建议，将未来的共同体称作“自由公民社”（Freibürgerschaft）。他在他的第一本小册子《论国家》（1907年版）里，就曾对此有所论述，许多论点和恩格斯相接近，也有一些论点却和我们

接近：

“国家发展的趋势明确地倾向于在本质上消灭国家：国家将不再是‘发展了的政治手段’，而将变成‘自由公民社’。不过，立宪国家发展出来的那种外在形式，即由官厅机制（Beamtentum）负责管理，本质上仍将保持不变；但是，至今的国家生活的內容，即一个阶级受另一阶级的经济剥削，将会消失。而由于这样一来既不再有阶级也不再有阶级利益，未来国家的官厅机制将会真正达到今天的（官厅机制——考茨基）所劳神费心力求接近的那种无党派的公众利益保卫者的理想。未来的‘国家’将是由自治机构领导的‘社会’。”（第159—160页）

这段话听来同我们的说法非常相似，却在一点上非常不同于我们的观点，即奥本海姆所盼望由之而达到阶级消灭的那条道路，在我们看来是南辕而北辙。不过，在这里我们无须讨论这个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奥本海姆也同恩格斯一样，将无阶级的社会的共同体看作与无阶级的社会是同一个东西，看作是整个社会的实际代表者。

但是，严格地说，只有在一个意义上才可以那样看，即国家不再是一个居于社会之上的组织，它从属于社会。然而，社会的范围和国家的范围决不互相吻合。在古代贸易往来略有发展以后就已经不是那样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更完全不可能是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市场，因而社会日益成为人类的同义语了。

世界贸易愈开展，贸易关系就愈复杂而方面众多，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和团体就愈有赖于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早在世界大战以前，在最不相同的地区里就已经出现了一种要求，即要求所有的国家或者至少某些国家遵守共同制定和认可的一定规约，从而限制各自的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原本是旧国家的标志，从来是被热切维护着的。

这些当然还不算非常重要的国际协定，例如世界邮政联盟以及日内瓦协定等等，都是试图在国际间防止战祸的，当然，在现代毁灭性技术日益增长的威势之下，象日内瓦协定之类的东西是不会收到多大成效的。试图通过一些对各国都有好处的共同协议来限制各别国家的国家主权的，德意志关税联盟可以算是一个实例，它的成立远在1819年。另外一类协议就是由一些“拉丁”国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于1865年订立的货币协定，规定这些国家一律采用相同的币值，后来西班牙和南美洲与巴尔干各国，也都以此币值为标准。

拉丁国家的这一货币协定，原本已经扩及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后来被世界大战，或者毋宁说被战后的通货膨胀摧毁了。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还以另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方式，摧毁了各国之间的互相接近，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隔绝和孤立，从而更加延续了和加重了战争对经济和道德的破坏作用。

但是，对经济生活作新的、国际性的调节这个要求仍旧存在，而且，随着生产的重新活跃和战争心理的消失，这一要求又增强了，它找到了一个借以获得满足的新工具：国际联盟。国际联盟当初创立，原是作为战胜国用以对付战败国的一种工具，后来却有了新的生命，代表了一种属于未来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是不可缺少的。在最初，战败国的人民群众和其他国家里的许多社会主义政党，都对它不表信任而颇有反感。但是，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机构有它的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前途，因而再被废除掉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即使促成创立这个机构的情况有了改变，即使它不再是战胜国的驯服的工具，它也还是可望存在下去。可以说，即使当它开始变得使这一个或那一个战胜国感到很不便利时，它也仍然可望存在下去。至于说它会变得使某些大国感到不便，那是一种很容易出现的情况，特别是因为，主权国家之间的任何同盟和协约都是不会永远有效，而且各大国的那些内心里彼此猜忌互相敌对的强权政治家们，已经愈来愈面临着和平政治家们、尤其是受社会主义者影响的那些国家的和平政

治家们结成的一个紧密的联合阵线。

我们可以将国际联盟比拟于俾斯麦给德意志帝国所规定的普遍选举权。俾斯麦规定普遍选举权，只是为了加强霍亨索伦王朝和帝政的势力，以对抗那些自由主义者。不久他却发现这一着失算了，普遍选举权给霍亨索伦王朝的更危险得多的敌人敞开了大门。但是，等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再也无法摆脱这个致命的选举权了。

国际联盟的情形也可能是这样，它最后可能会被一些分子夺取过来，使它不再成为个别国家的强权政治工具，而改变成为反对大国强权政治、促进各民族国际团结的有效工具，改变成为以和平的方式调整各民族的共同生活问题并调整受国际性因素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工具。

国际联盟如果存在下去和增强起来，那它就必须担负起另外一项任务。有一些原料，只存在于某些地区，却是全世界的生活必需品。一些国家，由于自己的地区里单独含有这些原料，就取得一种对其他需要这些原料的国家的优势地位。对这类原料(例如石油矿)的产地的追求，成了列强之间的不断冲突的根源。同时，某些国家对这些原料的开发的垄断，可以同国家内部重大的、决定性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同样令人难以容忍。由国际联盟来接管各别国家的这种自然垄断，可能也象上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一样，成为必要的事情。

国际联盟今天的组织，肯定还不是它的最后定型。还不可能预料它会有怎样的历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不仅对于消除战争危险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建设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也是不可缺少的。今天已经意味深长的是，只有当新社会的各种成分发挥了力量而社会主义民主政府领导了举足轻重的世界各大国的时候，国际联盟才会获得充分的力量。

到了那个时候，关税界线将会随同关税一起失去意义。对战略性疆界的热衷，将会随同战争一起消逝。所有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使划定国界受到阻碍而不能纯粹根据民族自决要求的一切因素，将

会失去它们的作用。那时，纯粹的民族国家——不计那些语言孤岛*——才将有可能在一切地方圆满无缺地得以实现。但是同时，国家也将要把一系列的重要职能移交给国际联盟，国际联盟那时将成为社会的最高组织。

这样，国家就向着极不相同的许多方面不断改变着职能。国家将失去一系列的职能，有的是因为被国际联盟接替了，有的是因为无须再执行了，而且它将因此而重新承担起别种职能或扩大它今天已经担负的一些职能。

今天的国家正处在这种使旧国家走向“自由公民社”或新国家的转变中。因此在今天，国家是一个非常变化多端和充满矛盾的东西。它不再完全是旧的国家，却又还长久不能算是新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各个国家，各按其历史形态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彼此极不相同，而且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局面下，甚至在同一个时期内，也不是始终如一的。

因此，最颠倒错乱的莫过于在今天的实际政治中谈论国家自身和区分什么“肯定国家的”政党和“否定国家的”政党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是绝对地属于前一类或属于后一类的。一个政党究竟是“肯定”国家还是“否定”国家，就是说，究竟是赞成国家的既定疆界、宪法、权力手段和各种机构还是不赞成，完全决定于国家的和历史局面的特点。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那些不想研究由历史演变而成的国家，而想研究国家自身的观念的国家理论家们，也就不能获得任何肯定的结论。他们想怎样从今天的国家的变幻无定的性质里找出一个国家自身呢？他们或者将国家与一般主权社会组织相混淆，将这些组织共有的东西转加给国家，或者不想研究国家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而试图研究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应该是什么。这样是不会有有助于我们对国家的实际认识的。

* 指处于他种语言区域中的孤立的语言地区。

这个话不应该意味着，一个政党究竟应该力求实现何种政治状况，也就是说国家依照该党的信念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今天这样的过渡时期里不是万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次于政党应该力求实现何种经济状况、应该实行何种生产方式的问题。但是，如果对于现存国家或现存生产方式的性质不先取得认识，这种“应该”就悬空了。

关于术语的问题，我们是可争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将在阶级消灭以后自行消亡，但是在他们当时看来，术语问题没有重要到那样程度，使他们一定要为必将代替国家的那种组织提出一个特殊的名称。然而，我们既然必须谈论这种新的组织，也就不得不用一个特殊的名词来指称它。也许，最恰当的还是仍旧保留国家这个名称，以便表明问题不在于至今的国家机器的消亡，而在于用一个特殊的名称，例如工人国家或社会国家这样的名称，来将未来的国家同至今的国家亦即同阶级国家区别开来。

这种新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返回共同体在国家出现以前的形式，返回无阶级时代的民主制。

但是，这种新的共同体将不再是极小的、互相孤立的部落，技术十分简单，没有重大的分工，而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它将全人类结合为一个组织，具备着由阶级国家产生的巨大文明成就。

在阶级统治下取得了巨大发展的文明，在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着高等知识和技能的源泉的无阶级社会里，将会更加迅速地向上发展。

这就是成为工人国家的实质的、并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的那种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

这种状况在根本上不同于至今的国家状况，正如同至今的国家状况不同于国家出现以前的状况。社会的、同时也就是国家的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惟其说这个时代是全新的，所以不言而喻，这个以“国家”这样一个名称来指称的新的共同体，被标明为仅仅是至今的国家的延续，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愿意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人类的真正的历史这时才开始。全部至今的人类发展都只构成史前时期。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里，也谈到了现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第九篇

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論述

第一章 再谈马克思的序言

a)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关于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作的经典性论述，我们在本书第三卷最后一篇里已经讨论过了。但是，我们在那里沒有讨论马克思说明他的历史观的全部陈述，而仅只讨论了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哲学的头几段话。

我们在那里不得不把关于那后面的几段话的讨论暂时搁置下来。那后面的几段话，是论述马克思在写作那本书时所见到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的。

当我们还没有讨论过具体的历史至今的发展过程的时候，研究那几段话是不适宜的。现在，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在第四卷里已经考察过了。如果说，在第二卷里我们是以类人猿变成人作起点的，那末现在，我们已经一直追踪到了“未来国家”的大门口。对于马克思的序言里面我们至今尚未论及的那几段话，我们现在可以也来考察一下了。

马克思说：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当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上面这一段里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在上一篇的结语中已经提到了。由这句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我们从他的序言中引述的上面那一段里所指出的，不是所有一切历史的发展规律，而只是至今的历史即人类的“史前时期”的发展规律。

因此，这一段话和我们在第三卷的末尾考察过的那段话，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我们在第三卷的末尾考察过的那段话，是表述一切“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根本原则。相反地，现在我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们所考察的这一段话仅仅阐明，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至今的一切历史的根本原则。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实在不是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规律，而是仅仅提出至今的历史的规律。如果人们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对至今的历史进行研究，是可以得出这种规律来的。我们的历史观是能够始终如一的，但我们为至今的历史得出来的规律，却可能有所改变，如果出现了、或者我们认识到了在原先得出这些规律时未曾见到的事实的话。

现在，让我们首先来考察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段里最后的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建立在对立上面的）对抗形式”，但是，在它的胎胞里形成的生产力却成为解决这种对抗的条件，因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个社会形式而告终。用另外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在这里说，至今的历史，即“社会的史前时期”，是建立在对立上面的社会形式的历史，而且这种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补充说明的，不是个人的对立，而是社会的对立，是“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这恰恰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那个观点：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正是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在上引部分序言里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这四种社会形态，是吻合于我们在第四卷里已考察过的阶级社会四大阶级的。马克思没有谈到在这四种阶级社会形态以前出现的社会形式。因此，他在1859年论述社会发展的机制时，所考虑的还仅仅是阶级社会。

这个观点也支配着马克思的序言里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部分开头的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认为，就迄今所曾有过的情况而论，社会的运动形式就是社会革命的形式。革命所以产生，是由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延续下来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了矛

盾。那种关系变成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马克思接着说：“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在这一句话和上一句话之间，显然缺乏一个中间环节，马克思将它省略了，因为从上下文的前后关联中，可以自然而然地看到这个中间环节。财产关系一旦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求有利于社会继续发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破这个桎梏。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在这里经常只谈以生产力为一方、以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为另一方的冲突。理论家总是有权利、而且往往有必要运用抽象概念的。但是，我们如果眼里不是始终注视着抽象概念所依据的具体现象，就会获得错误的印象，并且容易陷入神秘的观念之中。

生产力和财产关系不可能有感觉、有意志、有思想。它们不能够彼此冲突起来，一方战胜另一方，从而爆发社会革命。马克思本人接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说道，意识到这一冲突并且真正冲突起来的乃是人。

因此，在现实中，财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占有生产力这种财产的人和使用生产力进行生产的人之间的冲突。每当生产力的占有者和它的使用者，生产者和他们所创造的产品的享用者，就是同一的人的时候，那就不会出现生产力和财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冲突是以不同的阶级为前提的。因此，社会革命就是使用生产力的阶级（这个阶级在使用生产力方面以及在占有生产力所产生的产品方面，日益感到受现存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抑制）战胜那向来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受益者阶级的结果。

由此看来，这里所依据的观点，也还是使《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即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得以成立的那个观点。

人们不仅在1847年可以发表这一见解，并且在1859年也还可以发表这一见解，而不至于和当时的流行的科学发生矛盾。然而就在那一年里，正如我们所已提到的，出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

书。在这以前不久，即在1857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头骨，引起过许多关于它的意义的长久争论。最初的湖上桩屋在1854年就已被人注意到了。从这些发现里，以及从对还处在自然状态的许多民族的观察里，只是慢慢地才形成起来人类史前史的某些因素，人类的史前史长久以来还没有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来被人认作是真正的历史。这两部分历史自然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没有早期的历史，后期的历史就不可理解。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二版时，对于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还不曾加过附注。不过，在这以后的十年里，他们两人极勤奋地研究了原始时代的历史，恩格斯关于家庭等等的起源的著作就是明显的证明。马克思逝世以后不多几年，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德文本第四版。在这个版本里，恩格斯对那句有问题的话加了附注，声明那句话确切地说不是：至今所有一切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应该是：一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恩格斯所作的这个限制，适用于《共产党宣言》，同样也适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书序言。我们必须设想，马克思如果今天未写这篇序言，至少在这一点上不会将这句话当作是普遍的。

而且，大概还会不仅限于在这一点上。如果说，自从1859年以来，即自从马克思写作这篇序言的那一年以来，原始时代的历史已经揭示出了阶级社会和阶级国家出现以前的一段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发展，那末，在另一个方面，经济史的研究也在古代东方史和古代史上投下了极多新的光明，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东方的和古代的社会特点。这样就迫使我们再来提出另一个限制。就连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范围以内，社会革命这条规律也不是普遍适用的，甚至即使在具有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传统的地方，也不是总能适用的。

我们曾经提到，在古代城市国家里，尤其在希腊的古代城市国家里，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竟至发展成为社会革命。无

产者们夺得了国家政权，剥夺了有产者们的财物，收归己有。

但是，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向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的情形。古代社会革命者的社会理想是寄托于过去的，不曾形成任何新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的理想是回到自由农民的经济上去，回到国家成立和阶级分化的出发点上去。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革命的结果是，大片的土地被分为小块，变成许多农民的份地。这自然毫不意味着任何的社会进步。几年以后，最多几十年以后，旧日的阶级区别又出现了，旧日的状况又恢复了，只不过换了一班人而已。

这种情形原因何在，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了。

随着国家亦即剥削地区的不断扩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就把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少数统治者手中。这样，工业、艺术、科学乃至生产力就得到往往完全象童话一般的突然兴盛。但是，这种增长了的生产力几乎全部被用于满足剥削者的奢侈欲望。为维持群众的生活而进行的生产，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因此对于被剥削者说来，也就没有形成什么新的劳动和生存方面的物质基础，能够促使他们努力追求新的生产方式。对于群众说来，生产形式始终没有改变。他们所向往的较好的状况不是在他们的前面，而是在他们的后面，在别人还不曾夺去他们的自由和财产的那种美好的时代里。

诚然，在东方的和古代的许多国家里，曾经形成起来一种非常高的文明。但是，在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里，这种文明最后都走进了没有任何社会革命能将它拯救出来的死胡同，以国家的衰落为结局。能够将它救出这条死胡同的不是内部的革命，而是外来的推动，是一个或许多个未开化部族对文明地区的征服。这些未开化部族给衰老腐朽的国家重新灌输了生命力，当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部族不让那传统的而又实在衰朽了的文明保留下很多东西，并且差不多就在被征服的国家当初开始其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地方，重新开始推动一次新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

这样，历史在这个阶段上，就象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它不象是一种被社会斗争所促进的不断上升的运动，而象是一种不从内部

而从外部获得推动力的循环。当然，这个循环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每一个东方国家和古代国家固然不仅都有它的上升时期，而且也有它的下降时期。但是，它每一次因受蛮族的新的侵略打断从而达到的下降终结的那一点，并不就是它上升起始的那一点，而是比起点略为高一些。取得胜利的蛮族所承继的技术遗产和文化遗产，毕竟一次比一次都有所增多，因而胜利者以此遗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一般地毕竟要比它以前的社会优越些。所以，精确地说，历史的循环是一种缓慢地向上进展的螺旋。

中世纪开始以前的社会运动的机制，就是这种螺旋上升的循环，而不是社会革命。

只是在日尔曼人占领了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些日尔曼人才遇着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经他们继续发展，就使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形式，即通过社会革命的社会运动形式有可能出现。

有不少的历史家抱着一种看法，认为象东方和古代那种方式的社会运动，在今天也还是在继续着，许多国家都没有能力从其内部通过革命来使它的社会获得新生，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注定了迟早必然衰落和崩溃，要由一个新的国家来代替。这帮历史家们对于中世纪以来欧洲发展的特点确是盲无所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把欧洲发展的规律普遍化，不可将它抬高成为全部至今的社会发展的规律。

严格地说，马克思在1859年看作是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东西，在今天只能算作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少着重于奢侈品的生产而多着重大量产品的生产，以及与此相随的生产关系和需求的改变、劳动阶级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改变，都只是由于工业资本的缘故才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致使生产力越来越和相沿下来的财产关系不能相容。自从中世纪结束以来，新的生产力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和传统的财产制度有了冲突。首先是和封建的所有制有了冲突，然后，从上一个世纪起，和商品生产所依存的那种所有制有了冲突。

b) 經濟变革对于意識形态的反作用

如果说,通过社会革命的社会运动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特征,那末,马克思描述社会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变革的那些话,却不仅适用于有着阶级社会的一切世纪,而且适用于有着人类社会的一切世纪。这些话适用于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一切变化,不管它是通过社会革命的道路或别的什么道路引起的。这些话适用于这种变化所引起的任何冲突,不仅适用于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和传统的所有制的代表者之间的冲突,而且也适用于思想迟钝、不能立刻理解新事物的个人,和思想灵活、即使在新事物尚未通过考验以前也易于为之欢欣鼓舞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自然是在任何社会里总会有的,即使在完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也会有。这样的冲突也可能变得十分激烈,不过决不会采取有着对立利益的阶级之间的冲突那么普遍、那么猛烈的形式。对于以上这一切,马克思所说的关于社会革命的后果的那些话都是适用的。

必须带着这样的限制来读那些论社会革命后果的话,这样来理解,那些话就成为一切社会形态下任何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规律。那些话是这样说的: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这段话适用于因新的社会生产力出现而产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内部冲突,也适用于不过是遗留下来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和新出现的、没

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之间的那种冲突。

当然，人们可以提出疑问：在阶级和国家尚未出现以前，是否可能曾经有过由于新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而被引起的激烈社会冲突？在这种远古时代，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几乎觉察不出，因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冲突必定是很稀有的。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只能揣想，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即使在毫无冲突而逐步走向新的生产关系的地方，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那些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的人的意识，也必然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给他们带来过新的观点和新的情感的，这些新的观点和情感，不同传统的观点和情感发生冲突，是行不通的。

c)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那末，相反地，我们对于接在上面那一段引文后面的一句话，又必须加上一个限制：

这句话是：

“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我们所必须加给这句话的限制，在性质方面，当然和关于社会革命的那句话促使我们作出的那个限制不同。如果说，我们对于有关社会革命的那句话需要说，它不适用于古代的国家 and 东方的国家，而只适用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亦即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时代，那末，我们对于上面所引的这句话却必须反过来说，它虽然可以适用于至今一切形态的阶级社会，但是不适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因而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

这句话大概是由于研究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总结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表明，封建社会在它的没落时期，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开展生产力了，它无宁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开展。

所有封建社会以前的阶级社会也都有这个现象，其区别只在于，

在那些社会里还不曾有过工业资本成长的条件，因而那些社会都不能通过社会革命打破生产力的桎梏来解放生产力，却都因受了这种桎梏而趋于崩溃。

但是，工业资本主义却是同它的先行者完全不同的一种剥削制度。它剥削群众，不是仅仅为了要将剥削所得用在享受上；它力求经常不断地提高这种所得，不仅使用奴隶贵族和封建主们也同样懂得使用的那种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而且还要使用发展生产力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那些奴主贵族和封建主们所不知道的。因此，在奴主贵族和封建主们夺取了他们所能夺取到的一切以后，他们的统治就以生产力的衰落为结局。工业资本主义则与此相反，是导致着生产力的日益蓬勃发展的。我们已经谈到，不可能指望从资本主义本身会产生出必然要使生产力发展陷入停顿的一些相反的经济倾向。

人们曾期望经济危机会起那样的作用，可是在最近几十年里这种期望已经落空了。

当然，人们不能确切断言，工业资本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任何时候也不可能遇到阻碍。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这种阻碍是否会从资本以及资本积累的本质中必然产生，而这个问题是可以断然予以否定的。

我认为我已指明，资本主义的扩展表面看来所遇到的界限，只不过是任何生产方式下的工业扩展都会因始终依赖农业而遇到的界限。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的扩展，片面的工业扩展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工业发展由于农业落后而开始停滞时，没有任何东西会阻碍资本投入全力来加强农业发展。

可能对此起阻碍作用的，也许是现存的财产关系。例如，土地私有制也许会损害农业生产力的必然发展。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也许只导致某种土地改革，而土地改革是很可以和资本主义并行不悖的。

同时，我们也无须为这个问题而过分伤脑筋。不管人们怎样考

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出现的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这个问题，我们总归是无法让我们的意见分歧由实践的经验来作决断的，因为我们将不会有这种经验。

因为，最近几十年里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在我们的许多理论家们给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力的发展规定的种种界限中任何一个能够达到之前先就到来。

三十年前我就已经看出了上面所说的这种可能性，即这一胜利可能比当时我还估计的慢性危机更早地到来。自从那时以来，资本主义经受住了那么多的危机，懂得了适应那么多新的、往往十分令人惊骇的、极其巨大的要求，结果今天在我看来，纯粹从经济上来观察，它远比半个世纪以前更有生命力了。

但是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在许多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国家里，已接近于要成为统治阶级了。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马克思的序言中的话来说，“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不会灭亡，就必然显得是不可能的事了。

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看来，马克思的这句话对于我们不再适用了。因此，对于马克思用来结束他的《资本论》的、那著名的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里的一些话，我们也必须加以限制。

在那些极有份量的话里面，一直受资产阶级批评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们攻击的几句，曾经指明：一方面资本的日益集中和形成中心使资本终于成熟，能够被转化为社会财产和社会企业；另一方面，工人贫困化的趋势和工人对贫困化所感到的激烈忿懣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可是在由此而产生的阶级斗争中，人数不绝增加的工人阶级也受到了训练，并且统一和组织起来了。

责难这一论述的那些批评是见识浅陋的。与这一论述所指明的某种发展相反的一些极其微小的倾向，被过分夸大了，或者说，在马克思的话里发现了有头脑的读者所不会发现的漠视现实的情况，而那些言简意赅的话里的整个伟大内容却不曾被理解到。然而，这一总的內容每天都得到日益有力的证实。如果说，马克思在这里见

到了必然会导致消除资本主义、导致“剥夺剥夺者”的趋势，那末，他就借此指出了经济发展实际所走的道路，指出了工人阶级争取达到解放自己的目标时最有保证的道路。

但是，当马克思紧接着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又说了一段话时，我们就不能够再追随他了：

“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地步。这种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

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我们并不盼望资本主义的末日出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变得过于狭窄而不能再加以使用的那些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冲突；我们并不盼望这个末日要到“资本垄断”变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时才到来。我们认为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这个末日将会更早的到来。

d) 任何新的生产方式都受物质条件的制约

马克思的序言里随后一句话，和我们上面讨论过的那句话有着极密切的关联。马克思在说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句话以后，接着说道：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句话自从写下以来，肯定地不曾在任何方式下失去它的正确性。自从那时以来的所有一切观察，都证实它是正确的。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它所说明的，在基本上也正是《资本论》初版序里所说明的那一点：一个社会“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

*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2页。

** 同上书，第Ⅺ页。

这句话对于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说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使新的生产关系成为合用的、最后成为必要的，谁也不会有兴趣或有理由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现存的生产关系。

在一个阶级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因为被剥削的阶级总是对现存的生产关系感到不满，力求取消这种生产关系，而且剥削者阶级中有些人有时候也会这样。一个感到不满的阶级，即使在新的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胎胞成熟以前，只要特殊的历史形势给予它进行试验的力量，它就要进行试验来创造新的、对它更有利的生产关系，当然，这样的事只在阶级社会里才可能出现。但是，既然条件没有成熟，新创造出来的东西就难以持久，尽管颁布各种法令，尽管也采取一切恐怖政策，借此以求补偿新生产关系所缺乏的历史先决条件，新东西还是会很快地变成一场灾祸而终于瓦解。

这个认识，是预防一切空想主义作法的一条坚固堤坝。全然不可理解的是，竟有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徒，在自己的实践中恰恰忽视了这个基本命题。

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只要全然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存在的条件还不具备，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代表者就应该放弃取得政权的机会。但是，这句话倒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取得了政权，就有责任来检验一下，新社会的存在条件究竟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孕育到了什么成熟程度，并以此为根据，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安排自己的实践，人们即使在致力于“全面社会化”以前，对劳动阶级也有很多事情可作。

可能会令人诧异的是，马克思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这句话里，仅只谈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存在的物质条件。这一点我们不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即，仿佛只有一定的材料和工具才能算是物质生产力。我们已经指出过，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本身，只有人才能把其他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使它们开动起来，并且有目的地加以使用。一定种类的劳动纪律、组织、知识，等等也属于物质生产力。因此，我们不

应将那些在新社会可能存在以前必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理解为仅只是指某些有机的和无机的材料和劳动工具，而应把它理解为也指人所具有的某些心理能力。但这些心理能力，不是在旧社会的胎胞中从心灵的某种神秘的、无缘无故的内在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它们的出现最后说来毋宁应归因于新创造的技术，因此，在这里就技术这个词的完全的意义来说，也就是应归因于新的、物质的存在条件。

马克思在考虑那些在旧社会的胎胞中孕育成熟的新社会的先决条件时，并没有忽视时常必需的心理先决条件，这一点是他本人表明了的。我们只须指出《资本论》里我们刚刚谈到过的那一段话就够了。

马克思在那段话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孕育的社会主义社会先决条件之下，还提到了“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

不过，这一认识他也不是在《资本论》里才说出来的。早在《共产党宣言》里，他就描述过生产过程所促成的这种训练工人和组织工人的情形。而且，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850 年 9 月 15 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宣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们说：

“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

因此，我们对于新社会如果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先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的那些物质条件，决不可过分粗疏地作“唯物的”理解。

e) 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只再讨论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里的一句话。

*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841—842 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65 页。

在我们上面讨论的那段话的末尾，马克思接着又说：

“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的。”

这句话乍一看来似乎十分玄秘而晦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各别的人们始终只提出他们能够解决的任务。就整个的阶级而论，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别的阶级会给自己提出一些与他们的利益对立的、彼此极端矛盾的任务，因而这些任务里面必然地总会有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我们不是曾经听说有些革命归于失败了么？大多数的革命不正是在革命者在革命中没有达到他们所力求达到的目的这个意义上说来被算作是失败了么？即使在革命者取得了胜利的地方，当运动结束时也往往会出现某种完全不同于革命者所想造成的局面。

因此，这里所谈的不可能是各别的人们或人群给自己提出任务。但是，人类能给自己提出任务么？提出任务却本来是只有各别的个人才能够作到的事。人类是不具备有意愿或能思想的头脑的，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人们的总和。

但是，正因为所谈论的是一个抽象概念，所以我们决不可从字面上理解这里所用的形象语言。人类是不能够随心所欲地给自己提出任务的，但那些不时地在新出现的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却倒会以同样的方式向他们涉及的所有的人们，因而也就可以说是向人类，提出一定的社会任务，社会要想兴盛繁荣或者哪怕只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解决这些任务。

提出任务的那些新的条件，就是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不仅创造任务，而且也提供解决任务的手段。

任务就在于，使社会组织适应提高了的的生产的新手段，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任务。在不存在阶级对立，而且所有的人都对任务的最适当的解决能获得同样的利益的地方，任务的解决是不会遇到不可

克服的困难的。

在存在着对立的阶级的地方，从旧的社会组织中获得利益的那些阶级就会给任务的解决造成困难。它们能够阻碍任务的解决，虽然任务的解决仍是可能的。但是，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互相对立着的阶级里面，最容易变得强大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即和使用胜过旧生产力的新生产力有着最密切的关联、最先寻找出能够最好地适应新生产力的社会方法和社会组织，并通过这些方法和组织而得以增长自己的人数和重要性的那个阶级，这些阶级最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正确解决新生产力向社会提出的社会任务。

当一项新的社会任务出现时，各别的人们就会从最不不同的观点出发、根据最不不同的需要和认识，来着手解决这一任务。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会遭到失败，整个整个的阶级也会这样，甚至整个整个的国家都可能因而崩溃，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找到解决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任务的办法。但是，在所有这些失败之中，经验都会增长起来，最能因任务的适当解决而获得利益的那些人的力量会壮大起来。

一旦人们对问题发现了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说，一旦人们确切认识到了实际已有的解决问题的条件，解决的办法就找到了。

所以，如果人们不就各别的人、或阶级、或国家来看，而就一般的人类来看，那么一切因新生产力的出现而产生的社会任务，都不断地找到了它的解决办法，而提供解决方法的因素也就是提出问题的这些因素。

没有根据可以让人设想，在社会的继续向前发展中，即当社会从有阶级的阶段又达到无阶级的阶段的时候，情况将不会是上述那样。

因此，我们满可以说，人类永远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第二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作完了对马克思的序言里面几段话的考察，

马克思在那几段话里，从他的历史观出发，论述了社会发展的机制，也可以说，论述了社会的动力学，而在这以前，他已经先确定了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经常存在的关系，也可以说，确定了社会的静力学。事实上，上层建筑的形象只可能在静力学中予以确定，在动力学中它就变得空无内容。

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十年，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概述社会运动规律的社会动力学，正如他提出的、与此关联着的社会静力学那样，至今仍不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论述。

然而，时间并不是在它们上面没留痕迹。其中有一些话已经毫无动摇了保持住了自己的无条件的适用性，但对其中另外一些话，我们必须断言：新的经验和新的发现，已使它们的适用性成为有条件的，已限制它们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一如既往，仍然说明历史过程，标志它的特征，但是，它们所说明和标志的不再是历史过程的全部范围，而仅仅限于其中的个别部分。

不过，就认识当前的斗争而言，这些论述却丝毫没有失去其实践的意义。它们是由于深入地研究了工业资本主义和导致工业资本主义的那些历史过程才被作出的。只在与我们相距更远的过去时代方面，在古代国家和古代东方国家方面，以及尤其在无阶级时代方面，马克思的话才不是句句毫无限制的适用。另一方面，马克思逝世以来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似乎表明，有一个他所作的设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必定不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未来。不过，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中间，这还是一个有着争论的问题。

一般而论，人们可以说，1859年所作出的这一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述所受到的时代变迁的影响，远比在这同一年里初次发表和奠立的关于物种进化的达尔文学说所受到的少。

当然，我们的历史观也不应该是永远原封不动，不许对它不断重新检验和修正的。恰恰相反，它不是僵固的教条，而是一种有弹性的方法。同它本身所代表的观点相适应，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

能够是它的时代的产儿，是一定的条件的产儿，必须随着那些条件而改变，必须适应新的经验、新的认识并将它们接受到自己本身来。

而且，一种方法，仅仅通过应用，也就已经会不断发展。它被我们大师们遗留给我们，不是如同一个金镑那样，要我们埋藏起来，好好保存着不去花费它；而是如同一笔要我们拿去生利的钱，以便从其中尽可能地多有所得，有助于科学和社会的进展。

因此，不时修正马克思主义乃是不可避免的，简直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带来的认识，即使并不是无须改变就能应用于一切未来时代的绝对的永恒真理，可是这些知识毕竟是在它们以前的和被它们战胜了的那些知识更高些的真理。一种并不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只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使之退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方法上去的修正主义，肯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科学进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首先应尽的责任，就是扩大它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适应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科学状况，不得不把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建立为一种关于阶级社会和阶级国家的历史的学说。只是到了晚年，他们才开始不只象从前那样偶然零星地、而是以联贯系统的陈述，将国家出现以前的无阶级的社会也纳入于他们的历史观范围以内。

恩格斯的《论家庭的起源》的小书，是作为一份遗嘱留给我们的，它向我们指示了一条道路，我们应该循着这条道路，来扩大我们的大师们遗留下来的历史观。

我在本书中力求遵循这条道路。同时，我尽力扩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领域，以求涉及生物学的领域。我曾研究，是否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动物的和植物的种属发展没有内在关联，因而人类历史仅只成为生物历史的一个具有独特规律的特例，而这些独特规律却又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有着关联。

我相信，人类的发展以及动物和植物的发展所须共同遵从的普遍规律，就是：社会的改变是和物种的改变一样都可归因于环境的

改变。如果环境保持不变，这个环境里居住的有机体和社会组织也就不变。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的新形态是由于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才出现的。

这一条规律如果说是普遍适用的，那末，应该说，适应的方式却是在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的不同范围内各不相同的。

植物始终只限于作被动的适应。环境、气候和土地的改变，通过改变了的养分、改变了的化学刺激等等，使与此有关的有机体本身有了改变。有机体本身的这种改变，如果不适当，就会使那种有机体逐渐绝灭；如果适当，就能保存下去，终于成为遗传性的，从而形成新的品种。

在另一些有机体即动物方面，意愿和认识的能力以及自由行动的能力都已有了发展，因而除了上述那种被动的适应而外，它们还有主动的适应。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促使动物改变自己器官的使用，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器官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器官的这种改变，如果适当，就会保存并且遗传下来。

但是在人这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还要加上第三种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方式：人的智力和技巧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而能够有意识地创造人为的器官，亦即劳动工具和各种组织，以应付新的需要。

这样一来，发展中就引进了一个全新的因素。

在尚未创造人为的器官来作有意识的适应以前，一个物种的任何进一步发展，都取决于不经它的参与而自然发生的环境变化，而这些环境变化也许是由例如地质的或宇宙的变化引起的，有机体对此不发生丝毫影响。

一旦人发展到能创造人为的器官，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器官并不是人的身体的一个部分，它们存在于人的身体以外，并且作为外在的东西转而对人发生作用，促使人们为了在一定的新的方式下采取一定的新行动，而团结起来，建立一些居于各别的个人之上的新组织。

因此，人所创造的新的的人为器官，连同这些新器官所招致的新组

织,就成了环境的一个新因素。

人在适应他的环境的时候,不仅象植物和动物那样也改变自己,而且还改变他的环境。这种改变就是他的业绩(Werk)。但这并不是他的自觉的业绩。人创造新器官和新组织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是自觉的。但是,这些器官和组织之变成一种新的环境,给人提出新的问题,却不能归因于自觉的行动。人所创造的劳动工具和制度竟有这种新的作用,这是人所极少料到的,而即使有所预见也决不会是全面料到的,它的出现往往十分违背人的心愿。

因此,人们满可以同意马克思的话: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恩格斯有一次在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时,当然在与上面所引这句话无关的场合下,曾经认为人的不自由只存在于至今的历史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定不会再有不自由了。恩格斯指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要由社会来安排,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以及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都不会再存在了。

“这时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才脱离了动物界并且从畜牲似的生存条件转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绕着人们并且直到现在支配了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它直到现在还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与人们相对立——将被人们十分内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将服从于人们的支配了。人们的社会生存,直到现在,作为自然和历史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事物,而和人们相对立,现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直到现在统治于历史之上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才受到人们自己的控制。只有从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其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

我在本书第一卷里已经提到，上面这一段里最后一句话曾经被人理解为，仿佛恩格斯要说，随同着商品生产的废除，因果律也将不再对人发生作用。这样的理解自然是十分荒谬的。

恩格斯在这里只不过是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人不是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主人，生产是由一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在不顾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情况下，只凭自己的意愿来经营的。而且，生产资料的主人们自己也不按照共同的计划来生产，而毋宁是各不相涉甚至互相敌对的。这样就造成混乱，仅仅由于违反一定的生产规律一再招致危机，危机的破坏性作用一再促使遵守那些规律，这才在混乱之中出现一些秩序。

这种状态，即，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规律“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与人们相对立”这样一种状态，将因社会出来管理生产而在生产上被清除掉。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见解，因为他由此作出结论说，这样一来，人就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如果支配是指对自然的支配，那末，工业资本主义早已在很高的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支配。相反地，如果支配是指由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来有计划地、不招致危机地控制生产资料的使用，那末，这样的支配早在商品生产出现以前的远古时代就已有过了。只是商品生产才给生产带来了无政府状态并使人们屈服于自己不自觉地遵循着的规律之下。

如果公社对生产实行社会主义控制是自由的王国的同义语，而商品生产是必然的王国的同义语，那末，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只意味着

•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8—299页。

返向人在商品生产以前已经有过的那种自由的飞跃，而不是意味着朝向唯一能使人超脱至今的“畜牲似的生存条件”的那种状态的飞跃。

但是，恩格斯还走得更远。他从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将完全自觉地组织自己的生产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那时起人们也将完全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以致“他们所推动的那些社会原因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其所希望的结果。”

这种情况人们完全可以期待，如果问题在于通过创立新的“社会原因”，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新的器官和新的组织，来适当地处理新的社会问题的话。

社会科学愈进步，人就愈能正确地预先估计到新设施作为人的器官所起的作用。

我们在科学里见到，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不随后会引起新的前此不曾预料到的问题。因此，在至今的历史中，也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技术的或经济的新设施，不是除了产生其始创者所预计的作用而外，还产生其始创者所不曾预计的、造成新的社会问题的作用，这后一类作用如果说并非总是立即产生的，也总是过了某些时候一定要产生的。人类的历史从开始至今一直是这种情况，我们看不出何以取消商品生产以后这种情况就会有所改变。

诚然，社会研究的方法正在日益改善，随着传统的考察所涉及的时间领域的日益延长和其所考察的社会领域的日益扩大，研究的材料也会日益丰富起来，社会规律也会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但是，随着解决社会任务的手段日益增多，社会任务本身也日益增多。人类的原始群是多么小、多么易于了解啊，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还只多么少啊！他们形成的合作关系是多么简单啊！那时的人们给自己创造的新设施主要的仍然是他们的器官，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变成了对他们有着决定作用的环境。与此相反，今天的社会所具有的技术器械是多么强大，国家是多么广阔，国家和社会的活动领域是多么繁杂，人们的一切活动，不仅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而且还包括文化的活

动,是多么密切地有着国际间的错综交织。今天,如果想要在人们的生活里引入一项起深刻作用的革新,要考虑的就不是二三百人的一个部族的关系,而是整个人类的关系。

有计划地安排人类的经济活动,这本身已经就是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我们倒是决不可以期望还能预先见出由经济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对人类全部非经济生活(人们的科学活动、艺术活动、两性关系、社交关系等等)将要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也决不可以期望能够对这些后果的胎胞里孕育着的种种新问题还没有出生以前就采取对策。

我们可以设想,胜利的无产阶级所要创造的社会设施,大概会产生无产阶级想通过这些措施来达到的那些作用,无产阶级大概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取消一切剥削。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设想,随着今天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就都永远解决了。

这也决不是恩格斯的看法。只有空想主义者才力图建立一个只要一建立起来就截断了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发展的完善社会。恩格斯不属于这些空想主义者之列。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都已解决了,如果不是新创造的状态引起新问题,如果新状态不是除了会产生在其实现之初曾被想到的作用而外,还蕴藏着我们不曾预料也不可能预料而终有一天会要出现的别的作用,那末,能引起新运动的那些新问题将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呢?

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

人类发展的规律始终如一,即,创造新设施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这些设施不仅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本身还孕育着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又使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必要再创造新的设施。如此往复不已。

正如认识的过程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样,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这就是说,它是一个人类能力及其至今的自然环境延续多久它也就延续多久的过程。

一种永久完善的社会是和一种绝对的真理同样不可能的。完善社会也好，绝对真理也好，不会意味着什么别的，只会意味着社会的停顿和死亡。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八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 1 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 5 分册

作者 =

页数 = 3 4 2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四卷

阶级和国家（下）

第六篇 城市国家

- 第一章 城市国家的起源
- 第二章 城市国家中的阶级斗争
- 第三章 城市国家中的民主与剥削
- 第四章 国家的混合形式
- 第五章 城市国家的没落
- 第六章 古代社会主义

第七篇 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 第一章 工业资本主义
- 第二章 工业资本主义的进步力量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精神
- 第四章 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
- 第五章 自由劳动
- 第六章 禁欲主义
- 第七章 工业资本的兴起
- 第八章 进步与社会革命
- 第九章 现代民主制
- 第十章 民主国家中的资本
- 第十一章 民族国家
- 第十二章 国家机器的成长
 - a) 军队、交通、关税
 - b) 教育、司法、卫生事业
 - c) 税收
 - d) 国家性质的转变

- 第十三章 作为职业的政治
- 第十四章 暴力与民主
- 第十五章 异能
- 第十六章 知识分子

第八篇 阶级和国家的消灭

- 第一章 无产阶级的衰落
- 第二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争取民主的斗争
- 第三章 无产阶级的上升和缩短工时
- 第四章 无产阶级的胜利
- 第五章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 第六章 埋葬资本主义
- 第七章 危机
- 第八章 资本积累的限制
- 第九章 农业中的积累
- 第十章 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的前提

	第十一章	阶级对立的尖锐化
	第十二章	经济与政治
	第十三章	生产社会化的条件
	第十四章	国家的转变
	第十五章	国家的消灭
第九篇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论述
	第一章	再谈马克思的序言
		a) 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b) 经济变革对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c)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d) 任何新的生产方式都受物质条件的制约
		e) 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第二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附录页